

第一章 旁遮普锡克人 走向现代发展的历史背景

现代印度国家的整合是建立在近代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历史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是不存在的，英印殖民政府在印度特别是旁遮普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是大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印度社会经济的变化及文化的复兴等印度社会本身的变化是锡克民族所面对的社会因素。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民族的宗教文化复兴、锡克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在民族独立运动和宪政改革两个方面的政治参与、在印度独立印巴分治中的立场，以及上述诸方面对独立以后锡克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英印殖民统治政策与旁遮普

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双重性质

英国殖民者从 18 世纪中叶起通过武力征服和威胁利诱等手段，在日渐腐败的莫卧儿帝国内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逐渐取代了原莫卧儿帝国的地位，最终建立和巩固了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到了 19 世纪末，英国已成为南亚次大陆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从此印度也成了大英帝国王冠上一颗最璀璨宝石。直到 1947 年英国退出次大陆印度独立为止，英国对印度进行了长达近 200 年的殖民统治。这种绵延久长的殖民主义统治结果构成了印度国家现代发展与整合的基础。

总体而言，英国人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作用可以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经典理论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它既有破坏作用也有建设作用。首先它是对印度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架构极度的破坏，其次也将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行为模式传入了印度。

具体地讲，在政治上，英国用其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取代了旧的盛行于次大陆的封建主义统治。一方面，实行以英国利益为中心的政治政策，一切政令的发出都来自于伦敦，印度的政治利益必须完全服从于大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在印度政治制度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形式对印度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面对印度资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殖民统治者不得不逐渐重视印度人的政治要求，让当地人参与对印度的管理，对印度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的要求作出一定的让步，在印度逐步实施宪政改革，实行不完全的省自治，直到最后被迫完全退出印度次大陆。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的宪政制度为独立之后印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提供了长期的政治基础。然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政治上还有一个负面影响，由于英国人的统治是外来殖民的统治，印度的面积和人口都远远超过英国本土，对这样一个大国，英国殖民者要想实行相对稳定的统治，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要在印度各种族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地在印度各民族中制造矛盾。例如它在征兵问题上，把印度的民族人为地分为军事民族和非军事民族。锡克族就是一个军事民族。再就是 20 世纪初，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国大党的自治要求，英印殖民政府便大力扶持伊斯兰教派政治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鼓吹穆斯林的利益与印度教徒的利益是对立的，在立法会议中引入教派单独选区制度，在正常的议会政治中植入教派政治的毒瘤，其危害性不仅仅在于印度独立之日，即是印巴分治之时，以及以后几十年中印巴之间的长期对立，更在于在分裂后的印度国家中教

派政治长期以来仍然对印度的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经济上，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英国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渐压倒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英国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从早期的重商主义摇身一变为自由贸易。为了向海外推销英国的工业品并获得必需的原料，英国将印度变成了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政策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在转动，英国对印度的开发都是为了满足英国本上的需要，根本不顾及印度自身的发展利益。英国在印度修筑了庞大的铁路网络，但是这些铁路都是通向各个港口的，而不是与印度各地的内在发展有机地连结起来的。任何有损于英帝国经济利益的行为即使不会被明文禁止，也会遭到百般阻挠。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相对较快，一方面使资源缺乏的地区经济愈益落后，从而造成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同的人群由于英国的经济开发政策而受益不同，与英国殖民开发政策相契合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从中得到了收益，而与英国殖民开发政策不相契合的那部分社会阶层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甚至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上看，也必然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框架。因此尽管印度独立时，号称是世界第十大工业国，但是它的经济门类依然残缺不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印度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满足印度迫切进行现代化的要求，印度有必要对经济战略作出新的调整，既要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又要考虑到各地区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方面，英国人到印度之后，遭遇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伊斯兰教是帝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徒主要分布于印度次大陆的东北部（今天的孟加拉国）和西北部（今天的巴基斯坦），而次大陆的其他地区则是印度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到了 19 世纪，这些印度地方本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

化相比愈显示出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就印度教文化而言，旧式的种姓制度将人们按种姓出身完全分裂开来，整个印度教社会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新的文化冲击面前，印度教的文化人物不仅没有革新自己的文化，反而愈益顽固不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印度与西方的联系日益增多，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到海外留学经商的印度人很多，但是每一个到外国进行留学或经商的印度教徒，一旦离开印度本土，就被认为是受到了不洁的污染，丧失了自己的种姓，回国以后要想重归自己的种姓都必须重新受洗，否则就会被逐出其原来的种姓。这种固步自封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根本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侵入。起初英国人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笼络印度的旧式文人，还在印度专门开办梵文学院，教授印度的旧学，而不是向印度人传授西方的新学。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巩固，英国人又开始极力贬低印度本土文化，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大批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在印度各地建立起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一部分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印度民族精英的领导下，印度终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复兴运动。既有印度教徒的，也有穆斯林的，当然也有锡克的。印度本土文化的复兴，对于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斗争形式，其哲学本质就是来自印度教本源文化。然而，印度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那就是教派主义现象纷呈。各教派之间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相互攻讦，迄无宁日，不仅加深了教派之间的成见，影响了印度各教派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也给印度的政治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教派烙印。这种教派文化的盛行，对于独立后力图奉行世俗主义的印度政府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二、英国对旁遮普的殖民政策及影响

旁遮普地处印度的西北边陲，是英国在印度最后征服的一个地区。在英国完成对旁遮普的征服之前，这个地区是兰吉特·辛格所统治的锡克王国所在地。历史再向前溯，则是锡克反对莫卧儿帝国在旁遮普统治的斗争时期，这种斗争的结果，动摇了旁遮普的种姓制度，推翻了统治这个地区的属于刹帝利种姓的拉吉普特贵族，剥夺了他们通过征收土地赋税对村社土地的控制，瓦解了种姓与土地所有之间的关系。在兰吉特·辛格统治时期，他将大量的土地连同村庄作为封邑分给锡克贵族，实行与莫卧儿帝国相类似的土地分封制度，但并没有改变最底层的土地关系。英国政府接手对旁遮普的统治后，如何在这个地区进行土地整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不仅仅是尽可能地榨取当地的田赋，而且从 19 世纪初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将印度变成英国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要铲除存在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切寄生阶级。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收田赋，并参与土地的经营。在旁遮普特别是旁遮普的东部，柴明达已经很少，所以柴明达不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锡克王国的封建采邑。

当时存在于锡克王国土地上的这些封建采邑大致可分为二种：其一是军事扎吉尔，包括以向国家提供军事服务为条件取得的土地和有功之臣的封地；其二是作为文武官员俸禄的采邑。锡克将领大部分都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争，根据 1843 年 3 月 14 日的投降议定书，参加反英起义的军事首领的扎吉尔全部被没收，每月从英国政府领取固定的最高不超过 300 卢比的生活费。没有参加反英战争的军事将领们也应交出军事扎吉尔，只保留个人的封地，向政府缴纳 25% 的收入，代替以前所应承担的封建义务。同时规定封地只能终身享有，不得世袭。就连曾为英国人过大功的人，其扎吉尔一般也不允许世袭。例如在旁遮普臭名昭

著的泰贾·辛格(曾任锡克军队的总指挥,在对英战争中通敌,是锡克王国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他尽管保留了每年可收入达 92779 卢比的扎吉尔,但仅有 2 万卢比收入的封地可以传给子孙。据此,用不了多长时间,扎吉尔便会在旁遮普消失。另外锡克官员中愿意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也多以固定年金取代了扎吉尔。不愿或无法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人大部分交出扎吉尔换取年金。英国政府从各个方面限制扎吉达尔(占有扎吉尔的人)对土地的权利,一再强调扎吉尔不是个人的财产,因而扎吉达尔无权过问土地的经营,扎吉尔内的土地按英国政府规定的土地整理原则进行登记,由官方确定租赋数额。而且扎吉达尔要负担这项工作的费用,扎吉达尔也不能在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在兼并初期,财政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绝对掌握在英国税务长手中,当地的扎吉达尔和他们领地上的农民,一律受税务长的管辖。这些措施的主要结果是,削弱或完全剥夺了扎吉达尔对农村公社的控制,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新的困难,感到入不敷出,久而久之,有些人自动放弃扎吉尔,接受政府的年金。如锡克著名人物萨达尔·勒纳·辛格·马吉斯亚即是典型的事例。旁遮普被兼并初期,赋税比较低,而且还一再降低,开始占产值的 $\frac{1}{3}$,几年后降到 $\frac{1}{6}$ 。1871 年田赋法规定,赋额为地租总额的一半,而同一时期,马德拉斯的田赋约占土地产值的 45%,北印度的田赋占地租总额的 66%,1822 年还曾高达 83%。孟加拉的田赋在 1793 年为地租总额的 90%,后来虽然降低了不少,但是多数农民还要向柴明达尔交租,负担远远超过旁遮普的农民。那时旁遮普的农民很少因欠税而出卖土地,同时政府实收田赋总额却在不断增加。1850—1851 年间为 102 万英镑,到 1856—1857 年度时为 145 万英镑。田赋总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打击封建主那里得到的。

进行土地的整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确定土地所有者即纳税人,按英国的财产观念建立起土地私有制,英国人的上述政策使旁

遮普上层封建势力的力量大为削弱，确立土地私有制使农村的土地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地权，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且还便于政府干预土地的经营，让农民为英帝国的市场需要而生产。客观上讲，这也为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土地所有者的登记很简单，只要村子里的人共同证明一个人多年耕种同一块土地，向政府交税，并且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生产的产品，就可以登记为土地的所有者。在发生争议时，政府的土地整理员有权作出裁决。而这类裁决往往有利于直接耕作者，不直接经营土地的上层所有者，从国库领取津贴，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经过土地整理和登记，虽然政府仍然和整个村庄结算田赋，但是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却建立起来了。

英国人的土地政策还加强了佃户的地位，早在锡克王国统治时期，旁遮普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贾特人夺取了政权，使得不事生产的高种姓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被削弱了，为了向政府缴纳高额田赋，这些高种姓土地所有者情愿以优越的条件接受低种姓为佃户，或共同所有者，并由后者负责向政府纳税。锡克王国政府为了保证田赋收入，也限制佃户向土地所有者缴纳过高的地租。佃户的地位改善了，永佃户是锡克王国最有效的纳税人。到英国人进行土地整理时，发现不少佃户几乎成了土地的主人，完全停止向土地所有者纳租，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缴纳少量地租。例如在阿姆利则，锡阿尔科特和古达斯普尔三个县进行土地整理时，共有 168976 户登记为佃农，其中有 60530 为永佃户，这些人中又有 1/3 只纳税不缴租。英国殖民者统治这一地区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欣然接受这一事实，把他们登记为“没有地租义务的永佃户”。永佃户的登记条件也很松，只要能证明在一块土地上耕种 12 年以上就算永佃户，1854 年，《旁遮普民法》进一步确定了永佃权，规定凡在一个土地整理期内（一般为 20—30 年）登记为永佃户的佃农地租不变，永佃户甚至有权砍树，掘井，围园，这样永佃户对

土地的权限与自耕农相差无几。印度独立后进行土地改革时，旁遮普近 65 万永佃户获得了对 185 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① 这同永佃户长期以来对土地的较大控制权有一定的关系。从经济政策措施方面而论，英国人的土地整理政策使当地的生产关系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阶段。

除了在土地整理方面工作，建立土地私有制外，英国殖民政府还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措施，为了使旁遮普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政府还改善了交通，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而对旁遮普的发展作用最大的措施莫过于进行水利建设，将大量荒地变成肥沃的水浇地。旁遮普地处印度西北，降雨量极少，但是水资源却十分丰富，旁遮普的当地语意就是“五河”之意，发展灌溉是历代王朝都做的大事，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治理下，除了对旧有的一些灌渠进行改造扩建之外，19 世纪后期先后完成了巴里河间地上游灌溉渠（1876 年）、西朱木拿河灌渠（1871 年）、木尔坦工程（1888 年）、切纳布垦区（1892 年），20 世纪又建成了著名的三角工程，从杰卢姆河引水至切纳尔河，然后注入拉维河的运河。这些灌渠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多为可以常年使用的灌溉工程，到了 1905—1906 年度，总灌溉面积达 280 万公顷。对英国殖民者而言，这些灌溉工程的建设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人在运河上投入的前 10 年，光是通过收取水税就捞回了全部投资成本，除了从税收中获取大量的收益外，英国殖民者也在旁遮普的高产中获得收益。英国人在切纳布河，杰卢姆和雅木拿三个移民区的灌渠总投资不过 350 万英镑，1907 年这些垦区的农产品价值即达 600 万英镑。切纳布河下游的垦区每年净征赋税额就达到灌渠成本的 40%，从卡拉奇出口的大麦 1898—1899 年度价值 255 万英镑，1904—1905 年度为 800 万英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庶的

^① M.S. 兰达瓦：《旁遮普的绿色革命》，新德里，1974 年，第 47 页。

旁遮普承担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大量的战争费用。“事实上，旁遮普成了英国在战争和平时时期维护其霸权的有效后院。”^①但是这些灌溉设施和垦区在印巴分治时大部分都划给了巴基斯坦，因而要看它们对印度旁遮普的农业发展的作用，主要看它们给旁遮普社会带来的变化。它们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使残余的村社土地关系瓦解。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小麦成了印度的重要出口物资，而旁遮普是最大的小麦产地和出口地，几家大的出口公司在旁遮普每个大城市都有代理人，他们经常用电话与总公司进行联系，通过总公司与欧美市场发生关系，旁遮普市场上的农产品的价格随着伦敦、利物浦或芝加哥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涨落不定，最典型的莫过于 1929—1931 年世界性农业危机使得旁遮普的农产品特别是小麦大跌其价的事例。由于旁遮普农民需要用货币缴纳田赋，因此，他们不得不关心市场上小麦的价格，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约的状况，使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良生产技术，在竞争中求得生存，这样一来，需要到市场上购买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被打破了。水利工程的修建促成了残存的村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旁遮普村社土地所有制对农村人口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者种姓的集体性，他们对政府共同负责，土地名义上属于全体所有者，不得转于本村本种姓之外；二是低级种姓对土地所有者的依赖，他们不得不为别人做工，否则会被剥夺在村社中居住的权利。前者随土地私有制的建立而大大削弱，而水利工程的修建对这两种关系起了更大的破坏作用。人口稠密的地区向新垦区的大量移民，其中锡克贾特人集中在切纳布垦区，殖民政府还许可无力购买土地的人可以无偿得到小块土地。有资金的人可

^① 吴永年、季平：《当代印度宗教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264 页。

以购买大片土地，切纳布垦区的移民始于 1892 年，到 1901 年时人数已达到 80 万，移民在新垦区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过去依附土地所有者的低级种姓，有些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有的成了独立经营的工匠，随着经济的发展，留在村社的低级种姓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巨大的灌溉工程需要大批的雇佣劳动者。在英国政府自由雇佣的法律保护下，雇工有权离开主人或主顾另觅生路，就是不离开原来村庄的也逐渐摆脱了依附关系。

此外，几乎在向新垦区移民的同时，旁遮普还出现了大量向海外移民的风潮，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和北美，加上英印军队中锡克教徒的比例很高，并大批派驻海外，旁遮普人特别是锡克人在海外的印度人中就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不仅造成大量的侨民进入旁遮普，而且使旁遮普有机会接触新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旁遮普土地的开发除了服务于帝国的经济目的，为英帝国提供大量的粮食外，还被英印政府有意识地用于政治目的。英印政府通过投资建设的灌渠，使大片土地（除一部分原来就处于人口密集的地区外，大部分原先都是荒地）一旦有了稳定的水源，很快就会变成肥沃的粮田。由于英印政府法律规定，荒地归帝国政府所有，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土地所有权自然也属于帝国政府所有。政府除了将这些新开发出来的土地一部分用于拍卖外，另外一大部分有意识地给予旁遮普某些集团，使他们忠诚于英国殖民政府。这其中锡克人受惠较多，这除了锡克离灌渠开发区很近，以及锡克特别是贾特锡克崇尚农业职业，吃苦耐劳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锡克士兵和锡克王公在英国镇压 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得英印政府改变了刚吞并旁遮普时对锡克人冷淡疏远的态度，转而对他们采取笼络利用的政策。让他们成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吸引锡克为帝国的利益服务，政府挑选大量的贾特锡克前往运河殖民地，并让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得到大量土地。例如在索哈格殖民地，贾特

锡克得到的土地占这个殖民地土地总数的 38%，平均规模达 55.3 英亩，比给其他任何种姓的都要多。^① 所有忠诚于英国殖民者的锡克大地主和宗教人士都从政府那儿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例如古鲁纳拉克的直系后裔巴巴凯姆·辛格·贝蒂因为在锡克社会中有巨大影响以及在镇压 1857 年印度大起义中表现出对英国的忠诚，在索哈格殖民地一次就获得 7800 英亩土地，占这个殖民地土地总量的 10%。^② 为了稳定锡克社会，英国人对他们还实施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如当英国人实施税收管理的新制度，导致土地私有化，印度教徒的高利贷者开始涌入乡村，大量购买土地，影响锡克农业社会的稳定时，英印政府实施的《1900 年土地转让法》，将从事农业和商业的人群人为地划分成农业种姓和非农业种姓，将土地转让限制在农业种姓之间。由于来到此地的大量的印度教徒是商业高利贷种姓，一些有着教派主义意识的印度教徒便将此事说成是对印度教集团的歧视。而锡克特别是贾特锡克基本上都是农民，英印政府的做法使得大量的锡克农民忠诚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普遍缺乏坚决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意识。这也可以从独立前旁遮普政治上最活跃的主要是由穆斯林和锡克大地主组成的旁遮普统一党上看出来

旁遮普的田地整理，新垦区的开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英国殖民者对土地在人群中有意识地分配，不仅瓦解了旁遮普的旧有的村社体制；确立了土地的私有制度，进一步瓦解了旧的种姓关系，使旁遮普成为英印殖民统治下印度经济上最繁荣的地区，同时由于旁遮普粮食生产的大量出口的性质，一方面使得旁

^① 伊姆兰·阿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旁遮普：1885—1947》，普林斯顿，1988，第 47 页。

^② 伊姆兰·阿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旁遮普：1885—1947》，普林斯顿，1988，第 17 页。

遮普的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极其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却减少了与印度其他广大地区的联系，由于它是英国对旁遮普经济开发的受益者，它的要求与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垦区的大量移民，加上海外移民和锡克大量当兵等因素，使得旁遮普很容易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锡克作为其中的一支，由于其本身的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及印度教文化相比又具有更大的世俗性和开明性质，使得锡克族人中的思想非常活跃。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冲击下以及国内印度教徒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下，它的以宗教复兴为形式的初始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锡克民族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

锡克民族是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旁遮普地区的一个十分年轻的民族，15 世纪末锡克教创始人古鲁纳拉克吸收了印度教虔诚派和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一些开明的宗教理论，创建一个“既非印度教，也非伊斯兰教”的宗教派别。“锡克”在梵文中的本意即为弟子之意。这个教派起初主要的信奉者是一些商人，可是很快这个宗教教派的思想就与旁遮普当地的贾特^① 农民文化逐渐融合，成为一

^① 贾特是公元 7 世纪到公元 10 世纪期间从信德迁入旁遮普的游牧部族，是旁遮普最主要的农业种姓，主要居住在拉维河的上游和加格加尔河之间的平原地区。他们在旁遮普地区定居下来组成农村公社，他们是村子的主人，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其他种姓如织工、皮匠、铁匠、木匠、清洁夫、背水夫等都在经济上依附他们，只有为他们服务才有能得到在村子里居住和领取一份口粮的权利。贾特人的五老会是村子中最权威的机构，婆罗门不过是为贾特人举行宗教仪式的仆人。在印度的种姓等级中他们属于首陀罗种姓，但他们即使当上贵族，也不认为从事生产是玷污了他的种姓，即使地位提高了，经营农业也是最光荣的事情。

种主要流传于旁遮普当地的宗教。锡克民族的形成同这个宗教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经了从一个教派到一个社会集团再到初步的民族形成的鲜明发展过程，是在苦难和腥风血雨的洗礼中，形成的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族。在反抗莫卧儿帝国宗教压迫的斗争中，在兰吉特·辛格的领导下，锡克人最终在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锡克国家，直到 1849 年才最后为英国殖民者所吞并。

英国殖民统治下兴起的近代锡克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这场复兴运动的产生是当时旁遮普的社会环境与锡克民族内在的复兴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锡克民族文化复兴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促成锡克民族文化复兴的社会因素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宗教和文化领域，英国殖民政府利用西方的宗教作为对旁遮普进行殖民统治的辅助手段。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英国殖民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利用西方统治种族的思想和文化渗透进这一地区，西方的宗教和近代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外来文化的冲击促使锡克社会作出自己的反应。早在 1834 年兰吉特·辛格统治时期，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团体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约翰·C. 洛里就来到了旁遮普地区，建立了著名的卢迪亚纳传教团。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吃苦耐劳的人民，特别是锡克，一方面是这个地区气候宜人，对传教士们本身的健康有好处，他们可以从这里很快前往喜马拉雅地区避暑。^① 在英国征服了旁遮普锡克王国后，外国传教团体纷至沓来。卢迪亚纳的美国传教团将他们的传教范围扩大到拉合尔，英国传教团在阿姆利则——锡克的麦加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传教中心。在传教活动中，他们还使用了印度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孟加拉的基督徒，通过本地化了的传教士

^① 约翰·C. 洛里：《北印度旅行》，费城，1842 年，第 41 页。

在旁遮普迅速建立他们的基础。^① 英印政府官员也大力支持基督教的传播。旁遮普被吞并后，在亨利·劳伦斯的“仁慈统治”下，锡克与英国之间因为战争引起的敌对意识逐渐减弱，1857年印度大起义使得作为统治者英国人与作为被统治者锡克之间开始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关系，锡克开始受到英国人的信任并且比其他地方更快地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明方式，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英语教育的机会。从英国军队回到家中的锡克士兵也帮助人们理解和熟悉基督教和西方其他社会文化，尽管在锡克士兵中的改宗是罕见的。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旁遮普地区改宗基督教人逐渐增多，到1881年旁遮普改宗基督教的人数只有4000人，而在1881年到1891年这十年间，改宗基督教徒的人数猛增至18000人。^② 1891年到1901年，在印度人口增长率只有1.5%的同时，本地基督徒人数的增长率却超过30%。^③ 基督教的传播使锡克教精英感到锡克宗教受到威胁，特别是1873年阿姆利则教会还发生了四名锡克小学生公开声明放弃锡克信仰和打算加入基督教的事件，该事件在锡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锡克教的宗教基础有被外来宗教销蚀的可能，这刺激了锡克对锡克宗教文化复兴的要求。

其次，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各种族所实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及其对锡克宗教的有意识的利用。1859年孟买总督爱尔芬斯顿在一篇备忘录中写到：“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

^① K.W. 琼斯：“在被吞并后的旁遮普的孟加拉国的精英——19世纪印度的地区间关系互动的一个实例”，《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1966年，第376—395页。

^② K.W. 琼斯：“论旁遮普的教派主义中的圣社的作用”，《亚洲研究》月刊，第28卷，1968年，第42页。

^③ R. 格拉汉：《作为一个印度教改革组织的圣社》（博士论文），耶鲁大学，1942年，第491页。

们的座右铭。”^① 在军队征召上，英国殖民者特别炮制了所谓尚武民族的理论，在尚武民族的借口下，把士兵的征召限定在政治上较为可靠的集团范围内。尚武民族理论在印度有一定的市场，人们普遍认为适合扛枪的阶级是刹帝利种姓及其后裔，这样，许多尚武民族便具有了或声称具有刹帝利血统，而这种血统是根据对英国人的忠诚而定的。1857年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起义的孟加拉人就在非尚武民族的借口下，一直被排斥在帝国的军队之外。而锡克人则因为参加镇压这场起义，而被列入尚武种族一类。英国殖民政府大量征召锡克人当兵，让他们成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军事支柱。曾在旁遮普任职的英国人约翰·劳伦斯就说过：“锡克是印度最勇敢的和最具有武士精神的种族……”^② 大贺胥爵士更是将征召锡克进入印度军队作为首要事情来抓。他与英印军队总司令以及旁遮普管理当局一起讨论并且决定征召锡克加入印度军队的问题。英国统治者在使用锡克士兵过程中强化锡克教徒的宗教意识。英国政府的有关规章制度写道：“决不干涉帕胡尔(pahul 锡克教的洗礼)或者锡克宗教团体的宗教宣誓。允许锡克就像他的宗教所要求的那样，留胡子、留头发。无论如何，任何在宗教上对这些事务干涉都会被看作是一个改变他的信仰的图谋，那将导致恶劣的后果，并且自然地引起普遍的不信任和震惊。”^③ 英印政府于1851年颁布的锡克征兵政策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严格执行。军方对每一个入伍的锡克都实行锡克教传统的卡尔萨洗礼，让他们在锡克教圣典《阿迪·格兰特》之前进行效忠帝国的宣誓。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对锡克大量征召，使得锡克族成为印度诸民族中当兵人数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锡克族人口数量

① A. 拉其普特：《穆斯林联盟，昨天与今天》，拉合尔，1948年，第14页。

② 史密斯 R. 包斯沃斯：《劳伦斯爵士的生平》，伦敦，1983年，第287页。

③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112—113页。

不到印度总人口的 2%，可是锡克士兵人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达到英印军队总人数的 60%，即使在印度独立前夕，仍然占英印军队总数的 33%。英国殖民者军事上对锡克的大量利用，也使得锡克忠于英属印度政府，1893 年乔治·坎贝尔就说：“与印度的任何其他种族相比，英国人与贾特以及锡克有更多的共同之处。”^① 这样，锡克的宗教意识首先在军队中得以保持和强化。

再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印度教伊斯兰教先进知识分子先后起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呼吁在西方文化面前，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新的适应性，由此产生的各种宗教文化组织对锡克教文化的复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1828 年兰姆·莫罕·罗易建立了第一个印度教的宗教和社会改革组织梵社，由此开始了印度教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的征途。此后不断有新的印度教文化复兴组织建立。其中对旁遮普社会影响最深的印度教复兴组织是由斯瓦米·达耶南达·萨拉斯瓦米于 1875 年创建的圣社。由于这个组织以群众比较熟悉的“回到吠陀去”、“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等回归传统的形式出现，受到当地被压迫的人们的欢迎。该组织既接受了西方某些现代精神和开明思想，又具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反映了北印度人民维护自己文化传统的要求，因此，成了旁遮普和北印度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组织。起初锡克对宗教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对本教派的影响上，而对印度教复兴的影响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许多锡克还是圣社的积极分子。原因之一，即使在锡克王国统治时期，印度教在旁遮普也有巨大的影响，即使是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的宫廷也时常举行盛大的印度教的宗教仪式。锡克王室向印度教寺院的捐赠也非常丰厚。原因之二，对锡克而言，印度教对锡克教的影响与基督教对锡克教的挑战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锡克著名人物一般也认为古鲁

^① 萨廷达尔·辛格：《卡利斯坦：一个学术研究》，新德里，1982 年，第 5 页。

纳拉克建立锡克教是为了复兴古代的吠陀教，锡克教只是古代雅利安信仰的复兴，锡克师尊们是代表雅利安社会和印度教徒国家与莫卧儿帝国进行斗争的。此外，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关系密切，积极从事宗教复兴运动还有另一个更为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受过西式教育的锡克和保守的印度教徒希望从英国统治的旁遮普获取更大的权益，排除外来的孟加拉人。孟加拉地区是较早被英国征服的，随后英国人在征服印度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孟加拉人作为中低级官员和职员。然而，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间甜蜜关系十分短暂，圣社在成立不久，就竭力贬低锡克教和锡克师尊。圣社领导人认为通过贬低锡克教的精神和道德遗产的地位，不仅不会疏远锡克，反而会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的教义。对锡克历代师尊及其圣典进行大肆攻击几乎成了圣社集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圣社在进行印度教教义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使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皈依印度教的所谓“净化运动”。这个运动所具有的攻击性引起了包括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在内的其他教派与圣社的尖锐对立，并刺激了这些教派的独立自主的教派意识的发展，特别是对锡克精英而言，他们必须对诸如何为锡克，如何才能过好锡克生活，锡克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究竟如何等问题作出严肃的解释。

继印度教宗教改革运动之后，1863 年第一个穆斯林启蒙团体成立，1877 年赛义德·阿赫穆德罕创建的阿里加学院成了穆斯林启蒙运动的中心。穆斯林启蒙运动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对穆斯林传统中的陋习进行改革，在穆斯林中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一方面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的帮助。英国殖民者对此欣然接受，这符合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早在印度大起义之后，穆拉达巴德地方的驻军司令琼·柯克中校就在一份文件中写道：“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而不是努力使之融洽相处。”^① 西北边省的

^① A. 拉其普特：《穆斯林联盟昨天与今天》，拉合尔，1948 年，第 13 页。

总督约翰·斯柴奇也说过：“各种敌对信仰的同时并存是我们在印度的政治地位之所以能够强劲有力的因素之一。”^① 在复兴运动中穆斯林组织和圣社组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作为吸收一部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思想而建立起来的锡克教也不由自主地卷了进来，因为无论是印度教团体还是伊斯兰教组织，都不认为锡克教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仅仅是印度教的一个派别而已，这使得锡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宗教的地位。如何在旁遮普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是摆在锡克精英面前的一个必须处理的现实问题。

从促成锡克宗教文化复兴的内部因素看，主要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旁遮普的第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锡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的复兴浪潮，锡克教向何处去，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后，锡克教内部出现了回归印度教的现象。由于锡克教的宗教哲学基础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印度教，有相当一部分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都不认为锡克是一个独立于印度教社会之外的一个具有明确特性的人群。锡克的身份也是不明确的，有一定的弹性，并与印度教徒身份有一定的重叠，只有卡尔萨“五 K”（即头上留长发，蓄胡须，戴梳子，穿短裤，手戴铁镯，腰间佩剑。）将锡克与印度教徒在表面上区别开来，但是卡尔萨成员是流动的，他们的巨大力量的一部分来源于印度教社会的改宗者，他们还不时地重回印度教社会。此外，甚至卡尔萨的成员也遵循印度教的许多习惯和传统，并且通过亲戚和婚姻关系与印度教徒联系在一起。在英国殖民者的扶植下，原来一

^① 约翰·斯柴奇：《印度》，拉合尔，1894年，240页，引自林承节《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北京，1984年，第237页。

直主持锡克寺院的乌达斯派^①的苦行者大多已经腐化堕落，不再坚持苦行，寺院管理人依靠大量的锡克寺院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将锡克寺院财产据为己有。在锡克的寺院内也供上印度教的各种神像，就连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阿姆利则金庙也不例外。同时，印度教中原有的种姓陋规在锡克教徒中也大量出现，一些锡克教派别炫耀自己集团原来所属的印度教种姓，在婚丧嫁娶等日常的生活中也大量使用印度教的仪式，让婆罗门主持各种礼仪。根据锡克教教义，锡克之间在宗教上是平等的，每一个锡克都可以进入锡克寺院进行朝拜祈祷，然而，由于回归印度教的影响，有些锡克寺院就不允许已经受过洗礼成为锡克教徒的贱民入内。

为了保持锡克宗教的纯洁，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锡克教内部就出现了由巴巴达雅尔建立的锡克教改革组织——呼神派，宣扬神的无形，拒绝印度教所有的男神女神，拒绝所有的婆罗门的仪式和礼仪，坚持按照《古鲁格兰特·萨西布》的要求进行宗教活动。这个教派中的巴巴·兰姆·辛格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强调锡克教主体性的宗教领袖，并且在 1872 年举行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但是这个教派不久就在许多方面违背锡克教的经典，被指斥为锡克教中的异端，并没有能够成为锡克教中的主流。锡克教内部也不断有人改宗其他宗教。原来的锡克王公达力普·辛格改宗基督教使整个锡克社会都感到震惊。此外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相比，锡克社会中知识分子较少，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也不多，因此锡克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振兴锡

^①此派由古鲁纳拉克的长子斯里·昌德所创。是一个信奉苦行得教的宗教派别。乌达斯(Udas)本意是一个抛弃世俗生活的人。他们遵循印度教、佛教及耆那教的许多禁欲主义原则和规定，奉行独身主义，其服装束与佛教徒相差无几，从理论上讲他们惟一的财产是乞钵。

克教，系统地阐明锡克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主体性，为锡克社会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益是摆在锡克社会主要人物特别是新的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任务。

此外，随着 20 世纪的降临，英国殖民者逐渐将其权力转交给印度人，受过英语教育的锡克和印度教徒在新成立的省立法机构中争夺位置，对于拥有政治权力和职位的争夺，也促成了政治上的教派之争。在一个庞大的印度社会中，锡克及其领导人没有多少政治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特质明确的少数民族集团，他们有一个战斗的讲坛，对于锡克政治家而言，从印度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他们要求政府将锡克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锡克只占旁遮普人口的 13%。锡克政治家们认识到在印度教派政治的氛围中，要有效地保护他们的社群地位，只有取得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政治代表权才行。印度教徒政治家们拒绝锡克人单独的政治代表权的要求，原因就是锡克也是印度教徒。此外这种要求还将减少议会中的印度教徒的政治代表权。宗教改革的要求与政治上的利益分享又一次挂上了钩。

二、从辛格协会运动到锡克寺院改革

锡克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辛格协会和大卡尔萨协会领导人的宗教启蒙运动，从思想上阐述锡克教与印度教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锡克文化组织和锡克教的理论著作。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锡克寺院改革运动。目的是让真正的锡克僧侣管理锡克教寺院，在宗教组织形态上与印度教区别开来，同时进一步纯洁锡克信仰，更明确地界定锡克教社会与印度教社会之间的差别。在这一运动中既产生了管理锡克寺院的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又产生了锡克教社会宗教政治组织阿卡利党。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区别于旁遮普的其他两个教派的独立的锡克主体性并由此而获得应

有的权益。这两点又贯穿于整个锡克民族宗教文化复兴运动的始终。

1873 年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出现了第一个锡克教的宗教改革组织——斯里·古鲁·辛格协会。阿姆利则辛格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宣扬锡克教的教义和古鲁们的训戒，出版旁遮普语（古鲁穆克体）书刊杂志，消除锡克人中的文盲现象，致力于宣扬锡克教的文化，兴办慈善事业，同时也介绍西方文化。“辛格协会运动的目的是寻求锡克的主体意识和自豪感，将锡克教从极端僵化和毫无活力的状态中解救出来。”^① 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寻求恢复锡克教的思想与实践的纯洁性。1902 年大卡尔萨协会成立的目标也是要促进锡克教的宣传和锡克宗教社团的发展。并且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要为这个卡尔萨社会谋求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② 在这个问题上，辛格协会像穆斯林组织一样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的帮助。^③ 1888 年辛格协会写信给杜夫林爵士，要求承认锡克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集团。在辛格协会给杜夫林爵士的欢送辞中，管理锡克圣殿的金庙委员会主席曼·辛格说道：“我们的身体是英国的特别财产，此外，我们……一定忠实地服务于英王陛下，为承担起这个义务，我们正根据我们伟大的古鲁们的希望行事，我们希望成为陛下的最重要的臣民，维护和增进英王的荣誉，我们将自己看作是受到大英皇后陛下的宠爱的儿子。”^④ 印度殖民政府完全支持辛格协会计划，在 1890 年帕提亚拉举行的辛格协会会议上，印度总督兰斯栋说：“印度政府由衷地同情这个运动，我们赞赏锡克民族 (Sikh nation) 的极佳的品质，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高兴认识到

① 哈尔班斯·辛格：《锡克的传统》，新德里，1983 年，第 238 页。

② 哈尔班斯·辛格：《锡克的传统》，新德里，1983 年，第 242 页。

③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 2 卷，德里，1977 年，第 142 页脚注 15。

④ 《论坛》1889 年 11 月 15 日。

他们是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人，我们能够在皇后陛下的真正的忠诚的臣民中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① 锡克教的组织辛格协会发展很快，1879 年第二个辛格协会在拉合尔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旁遮普的所有城市和大多数城镇以及一部分乡村都有了它的支部。为了协调这些组织，1902 年成立了大卡尔萨协会。到了 1908 年，大卡尔萨协会的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锡克教育会议，从此以后每年召开，一直没有中断，这对锡克社会的宗教事业和一般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了 1928 年，大卡尔萨协会管理着 275 个教育机构和 100 个辛格协会。此外锡克社会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锡克教外围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锡克王公贵族，也有一般的小商人和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都关注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锡克教的宗教改革和锡克社会的权益。

第二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锡克宗教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了锡克寺院改革。因为这既是进一步纯洁锡克教所必需的举措，也是使锡克教与印度教区别开来的必要步骤。当锡克宗教改革组织极力宣传锡克教与印度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宗教派别时，锡克的寺院却一直被印度教的一支乌达斯派僧侣把持着。这个派别由锡克教的创始人古鲁纳拉克的长子，斯里·昌德所创建。在管理这些寺院的僧侣去世之前，还由他们自己选择任命继承者。由于在 1780 年到 1849 年旁遮普处于锡克国王统治时期，随着国家对锡克寺院的财产的赐与，锡克寺院的收入大为增长。1849 年英国人吞并旁遮普后，大多数锡克寺院的管理人需要得到英国政府认可。英国政府在旁遮普实施土地改革时，有意识地进行土地重组，在许多情况下，锡克宗教财产被登记在管理人名下。部分寺院管理者心安理得地认为民法将保护他们对所管理的

^①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 2 卷，德里，1977 年，第 142—143 页。

财产的所有权，于是他们盗用宗教资金，并滥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而根据锡克教法的规定，庙宇和庙产的收入应归锡克教团共有，任何人不得任意侵占。对锡克宗教财产的滥用成为锡克改革者关注的重要因素。锡克改革者制定并向地方政府提出了要求改革锡克改革者关于寺院管理办法的民事请求书，但是没有作用，因为根据英国法律，所有权是构成管理权的决定因素。这些寺院管理人自恃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和任命，根本不将锡克寺院改革的要求放在眼里。此外，由于乌达斯派本身自建立起就不是一个锡克教派别，而是一个印度教派别，因此这些锡克寺院的管理者基本不奉行严格的卡尔萨教义，这些人拒绝接受锡克改革者所提出的正统的锡克教的原则，拒绝让属于贱民的锡克进入锡克寺院。当有锡克对此提出异议，指出这不符合锡克教的传统时，他们便受到寺院祭祀们的惩罚——禁止他们参拜寺院中的神像。在锡克复兴运动力图在印度教徒与锡克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时，在锡克的寺院里却摆放着印度教的各种神祇显然让锡克教改革者们难以接受。他们将这看作是管理者堕落的又一个例证。剔除锡克教中的印度教因素对于一个单独的锡克教派的主体性申明而言，是一个基本要求。正统的锡克教徒们提出把庙宇及庙产的管理权交给一个由锡克人民选举出来的组织进行管理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因此，锡克改革者开始了夺取锡克寺院的运动。当锡克寺院的管理人向地方政府起诉，而地方政府引用官方法律对付这些改革者时，便爆发了政府与锡克改革运动之间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使得这场运动又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含义。政府与锡克改革者之间出现了对立。锡克寺院管理人竟然授予在阿姆利则的贾利安瓦拉巴格进行大屠杀的刽子手荣誉称号的做法更使锡克改革者感到愤怒。锡克反对寺院管理人、要求收回锡克寺院管理权的斗争，事实上也是对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寺院统治锡克民族的反抗。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锡克移民海外的进程受阻，特别是当满载锡克移民前往加拿大的船只被迫返回印度以及这些移民在回国后受到的种种虐待，加之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政策使锡克大为不满。在锡克寺院改革运动中也伴随着政治上的要求。由于英印殖民政府对锡克收回寺院的要求加以阻挠和打击，为联合锡克社会的各部分力量，各锡克组织于 1919 年 12 月成立了中央锡克联盟组织。圣雄甘地参加了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在他的影响下，该组织通过决议，要求将金庙的管理权置于一个民选的锡克组织之下，并要求在帝国的框架内让锡克人自治。甘地也参加了 1920 年 10 月该组织在拉合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参加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同年 12 月，中央锡克联盟在阿姆利则召开会议，会上选举出了一个由 175 人组成的管理锡克寺院的最高组织——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锡克人的准军事组织，阿卡利党。阿卡利党领导人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锡克寺院从腐败的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来。于是在争夺锡克寺院的管理权上，形成了 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极有影响的阿卡利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锡克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 1920—1925 年与政府的对抗中，“有 30000 以上的男女被投入监狱，近 400 人被杀，2000 多人在警察的枪击和警棍下受伤，700 个村庄的官员被撤职，150 万卢比被政府作为罚金没收。”^① 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该运动还有向政治斗争的方向转化的可能。1924 年 2 月，锡克中央联盟甚至发表声明，要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为实现自治而斗争。阿卡利党的坚决斗争最终迫使英印政府让步，英印政府通过政府内部专家和锡克立法委员会联合起草了《锡克寺庙和圣地法案》，该法案主张建立一个由 121 名各区锡克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对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124 页。

所有的锡克圣地实行统一的管理，代表们通过选举产生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位主席，负责日常事务。根据该委员会的章程，锡克寺庙被认为是一个供奉和祭祀锡克教十位祖师的地方，任何有 50 名锡克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申请建立一个寺庙。对于现存锡克寺院管理表示不满的可向当地政府申诉，地方法院需组织一个 3 人法庭对此作出裁决。但这三名法官必须都是锡克人。英印政府于 1925 年颁布的锡克寺院法，实际上承认了 1920 年成立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的合法地位。锡克寺院改革运动为锡克社会主体性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从另一方面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金庙金库的钥匙交到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的主席 S.沙拉克·辛格手中时，甘地特地打电报给他，称这是“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赢得的第一场胜利”^①。

三、锡克民族主体性的构建

锡克教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又是锡克民族主体性得以进一步确立的过程。前面我们就说过，这个运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锡克宗教教义和教规的强调，另一个方面就是锡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集团关系的明确界定。锡克民族主体性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锡克教传统和锡克王国的历史有意识地解释和利用，在锡克中重塑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的历史自豪感；与锡克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锡克教宗教意识的独特性解释，使之在文化社会上成为锡克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作为民族文化精神传承工具的、使用古鲁穆克体书写的旁遮普语言。

锡克教和文化复兴组织宣扬锡克历史自豪感的主要内容是，宣扬锡克教在十位古鲁的领导下，如何由一个宗教团体向一个

^① 阿托尔·钱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旁遮普的政治》，新德里，1989 年，第 170 页。

社会集团(community)的转变,再由一个社会集团向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宣扬他们这个民族在成长的过程中反对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中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在自己的民族英雄兰吉特·辛格领导下最终建立锡克人王国,以及在这个锡克王国内政府所实施的各项开明政策。当然就像其他民族只宣传本民族的光荣的历史一样,这种对历史的利用也是有意识地有选择地进行的,自然不会拿本民族中发生的不体面的东西加以宣传,只会选择最值得夸耀的东西,锡克民族也不例外。用历史发展来说明锡克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并论证锡克民族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为了博得英国统治者的欢心,赢得英国殖民政府对锡克宗教文化复兴运动的支持,锡克宗教文化复兴组织很注意宣传锡克人对帝国政府的忠诚。

宗教是将锡克与旁遮普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就锡克教的主要教义而言,锡克教是锡克师尊们吸收了印度教虔诚派的思想以及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思想发展而成的,从本质上看锡克教属于一个神崇拜的宗教。起初锡克教徒主要以商人为主,可是不久它就为对印度教种姓等级制度不感兴趣的贾特种姓的农民所接受,并且他们很快成了这个教派的主要成员。在锡克教的发展过程中,贾特农民自身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内容也逐步地融会到这个宗教之中,因此,锡克教中的许多思想事实上反映了贾特的文化特征和种族特性。锡克人的早期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与莫卧儿帝国进行斗争的历史,尽管起初莫卧儿帝国的君主还曾邀请锡克的师尊到首都作客,但是,在五世古鲁之后,锡克教派就与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政府发生了长期的冲突。由于莫卧儿帝国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实行宗教迫害政策,所以,锡克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兰吉特·辛格建立的锡克王国时期政府曾实行宗教一律平等的政策,但是由于锡克王国并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因此锡克与穆斯林之间的嫌隙并没有消除。因而在宗教改革和复兴运动中,锡克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使得他

们之间的差距只会更大，也根本不存在将锡克教并入伊斯兰教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锡克教改革组织与印度教改革组织之间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由于印度教宗教组织总是将锡克教作为印度教众多支脉中的一支来看待，根本不承认锡克教是一个独立的宗教，锡克教徒如果要表明自己的宗教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并有自己的不同于它教的主体意识，进而让世人承认锡克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就必须与占人口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社会组织展开辩论。在印度教组织圣社活动的早期，许多锡克知识分子都曾加入圣社，与这个组织的印度教徒一起工作。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尚能和睦相处。然而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圣社的一些保守的领导人如潘迪特·古鲁·达特和拉克·兰姆开始抨击锡克教，锡克教与印度教社会之间的关系渐趋恶化。1888 年拉合尔的卡尔萨协会向印度总督要求“不要将锡克教徒混同于印度教徒，而应该在各个方面将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集团(community)加以对待。”^① 尽管圣社所组织的“净化运动”的对象，大多是指向穆斯林，其进行的臭名昭著的猪肉测试就是例证，^② 但是净化运动也涉及到锡克教徒，因此，当 1900 年 6 月拉合尔的圣社为属于锡克教的拉赫提亚贱民举行净化仪式时，锡克与圣社的关系完全破裂，圣社中的锡克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力图寻求自身宗教的独立身份。^③ 这一独立身份问题由于马吉斯亚遗产继承案的出现而变得更加迫切。

1898 年，锡克教徒达雅尔·辛格·马吉斯亚死后，他的遗孀向

^① 《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第 7 卷，第一部分(1973 年 4 月)，昌迪加尔，第 92 页，引自 J.S. 格瑞纳尔的《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 年，第 146 页。

^② K.W. 琼斯：“我们不是印度教徒：1877—1905 年间的圣社与锡克之间的关系”，《亚洲研究》月刊，第 32 卷，1973 年，第 463—464 页。

^③ K.W. 琼斯：“我们不是印度教徒：1877—1905 年间的圣社与锡克之间的关系”，《亚洲研究》月刊，第 32 卷，1973 年，第 468—72 页。

法庭提出他不是印度教徒，不能使用印度教徒的遗产继承法。但是当时的英印法庭却判定他是印度教徒，适用印度教徒继承法。这使得锡克与圣社的争吵更为激烈。在这个时刻，巴伊·卡汗·辛格出版了他的名著《我们不是印度教徒》，人们现在都将这本书看作是具有明确的个性的锡克身份的经典阐述。巴格特·辛格·拉赫曼批驳圣社著名人物恰吉·辛格关于锡克古鲁仅仅是印度教的改革家，锡克的经典只是印度教著作的“支离破碎的拼凑”的观点，他提出锡克教教义和教规是一个独立的宗教体系，而不是建立在印度教哲学之上的附属体系。^① 在 1900 年圣社公开为拉赫提亚锡克剃去头发举行重回印度教的净化洗礼时，锡克改革者们制定出自己的净化仪式，继续与圣社进行宗教斗争。

锡克改革者在外部与圣社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在锡克社会内部确定锡克的身份。传统上锡克教内部就分成遵守第十世古鲁戈宾德·辛格教义的凯萨德里锡克（即遵守五 K 的锡克）和不遵守第十世古鲁教义的萨哈吉德里锡克（不遵守五 K 的锡克），^② 后一种锡克多是在锡克教发展过程中在某一阶段产生的。这一时期，锡克社会内部对萨哈吉德里锡克究竟是不是锡克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萨哈吉德里坚持他们是锡克，凯萨德里锡克坚持他们不是真正的锡克。真正的卡尔萨宣布锡克身份只限于卡尔萨成员，那些不遵守卡尔萨五 K 标志的锡克，虽然他们可能对锡克师尊们极为尊重，并在锡克寺院中顶礼膜拜，但他们只能被看作是锡克教的叛教者，或者是一个印度教徒。古鲁纳拉克的后裔巴巴·古尔巴克斯·辛格·贝蒂于 1910 年公开宣布锡克是印度教徒，由他所支持

^① 巴格特·拉赫曼·辛格：《自传》，第 132—133 页。

^② 凯萨德里锡克意即完全遵守锡克教教规的人。萨哈吉德里意即尚未完全遵守锡克教教规的人，主要指不遵守锡克十世古鲁制定的锡克教洗礼仪式和锡克五 K 准则。

的巴伊·奥托·辛格在 1911 年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坚持锡克古鲁们崇拜男神和女神，不接受穆斯林为他们的伙伴，坚持种姓差别等论点。这种使锡克教“印度教化”的解释立即遭到辛格协会改革者的坚决反击。辛格协会支持巴依·卡汗·辛格在 1900 年左右发表的两本关于锡克教的著作《圣典释义》和《圣典通解》中提出的观点。M. A. 麦考利夫在 1909 年出版的多卷本著作《锡克宗教》中也支持辛格协会的观点。锡克改革者在与印度教教派组织的斗争中，确立了锡克教的几个最基本的教义，即一神论，诚实的劳动、圣训的沉思和锡克教洗礼、共食以及所有的人一律平等。^①最后，他们也使得英印政府在 1925 年锡克寺院法中对锡克身份特征作了明确的界定，即锡克是“信仰神、十位古鲁、《古鲁·格兰特·萨西布》和十位古鲁们的其他著作，以及信仰由第十世古鲁创建的卡尔萨洗礼仪式、不信仰其他任何别的宗教教义的人”^②。从而在官方层面上明确界定了锡克的身份，从而也给了锡克一个活动于这个社会

的身份标记。

在语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旁遮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乌尔都语。但是这两种语言都不是当地人民的主要语言。他们之所以被当做官方语言是因为英语是英国殖民者的语言，而乌尔都语是以前的莫卧儿帝国的官方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方语言或者母语在旁遮普西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是拉亨达语，在中部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居住的地区是旁遮普语，而在东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是印地语。19 世纪后半期在旁遮普包括圣社在内的印度教团体开展了印地语运动，试图用天城体的印地语取代乌尔都语。他们认为乌尔都语是与穆斯林以及他们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① 理查德·G. 福克斯：《旁遮普的狮子：形成中的文化》，伯克利，1985 年，第 7 页，转引自 W. 欧文·考尔等《锡克教》，伦敦，1973 年。

^② 卡斯米尔·辛格：《锡克寺院宗教指导法》，阿姆利则，1989 年，第 301 页。

的，而印地语是同印度教徒以及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愿望联系在一起。这样这些宗教复兴组织就将语言问题教派化了。虽然在英印旁遮普省，印度教徒占人口的少数，穆斯林占多数，用印地语取代乌尔都语的运动一直没有成功，但是这种用印地语取代乌尔都语的运动最后随着教派斗争发展成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之间的三角语言斗争。这场语言斗争中最大的牺牲者是旁遮普语。出于教派考虑，说旁遮普语的穆斯林选择了乌尔都语，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选择了印地语，只有说旁遮普语的锡克选择了旁遮普语。旁遮普语的书写体可以是天城体也可以是古鲁穆克体，锡克主要使用古鲁穆克体，因为这种字体是锡克师尊创立的，而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则选择使用天城体。由于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没有能够成功地将锡克教徒同化。因此，他们自己便拒绝使用旁遮普语，力图让锡克在语言上也成了少数民族，这样旁遮普语的命运就同锡克民族锡克文化的命运牢牢地连在一起。任何对旁遮普语言的贬低都有可能对锡克文化构成伤害。

通过历史、宗教和语言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标记，锡克作为单独民族的身份得以确立。在与印度教徒的斗争中，锡克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nationality)^①，锡克民族可以被解释为由凯萨达里锡克为核心组成的民族，他们说旁遮普语，用古鲁穆克体写旁遮普语，集中聚住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地理区域——旁遮普。^②

四、锡克宗教文化复兴和改革运动的意义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锡克宗教文化复兴与改革运动对现代锡克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重构了锡克的身份特质，并为锡克教的正统学说提供了新的规则。首先，在宗教上，到目前为止，1925 年锡克寺院管理法虽经历了 30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71 页。

② 保罗·R. 布拉斯：《北印度的宗教语言与政治》，德里，1975 年，第 410 页。

余次修改，但是它确定的基本制度依然没有改变。随着锡克教的最高管理机构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的出现和合法化，使得锡克宗教寺院的管理变得日益规范化，它使得锡克教本身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锡克教的发展得以建立在比较牢固的组织基础之上，同时也使得锡克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据估计，1925年锡克寺院法通过时，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控制了大约700余个寺院，巨额的寺院财产和信徒的源源不断的捐赠使得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掌握了巨额的财富。所有的锡克寺院的管理人员都是它的雇员。锡克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可以利用它所掌握的巨大的财政资源，在锡克社会的重要集团中求得支持。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也可以通过它在各地的锡克寺院和它的宗教监护人身份对锡克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控制有助于获得锡克社会的领导资格。任何希望主导锡克政治的人首先必须控制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因此，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同时也成了锡克从事政治活动的讲坛。

其次，在锡克寺院改革运动中阿卡利党的诞生使得锡克人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这个原先只从事宗教改革运动的组织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对锡克寺院改革运动的镇压而逐渐转变为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由于它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同时产生并且主要是为了锡克教的改革而产生的，是“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臂膀”，因此，它自称代表了整个锡克社会。由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和阿卡利党的二位一体的性质，使得它一方面在锡克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寺院管理委员会掌握巨大财源，加强了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使它成为锡克中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阿卡利党领导人意识到保持一个锡克身份承诺的重要性，并且清楚地意识到锡克社区有明显的软弱性所在，一旦锡克社会放弃它的卡尔萨特征，他们很快就会同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没有任何区别

了。因此，阿卡利党政治上的要求及其宗教上的要求都同锡克教的保持和发展，并且寻求政府将锡克教徒看作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愿望有关。阿卡利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使用的战略战术在以后的斗争中也不断重现。

最后，通过几十年的宗教复兴和改革运动，在锡克社会中进一步形成和巩固了锡克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族体的独立主体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古鲁戈宾德之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此时已经明朗化，通过近代锡克宗教文化复兴和锡克寺院改革运动，糅合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锡克社会初步实现了向近代民族的转化，二三十年代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和印度分治中锡克的民族性得到进一步伸张。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对它的独立主体性要求的坚决排斥，使得它与这两个社会群体特别是和印度教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化，这使得锡克在参与整个民族运动的同时时刻注意保持自身的利益不受影响。

第三节 民族独立运动和宪政改革中的锡克

在文化复兴和锡克寺院改革中兴起的锡克各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的活动对锡克社会政治经济权益的维护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锡克社会的浓厚的教派特质，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锡克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和宪政改革既有符合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锡克民族的主要社会组织卡尔萨协会、中央锡克联盟（1919 年成立）和阿卡利党积极参与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为印度的独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它小心地保持自己的组织和锡克社会的主体性，时刻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它要求锡克参加印度民族独立运

动，同时要求他们在阿卡利党领导下进行维护锡克利益的政治斗争。它与国大党的关系是时分时合的，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一个代表地方利益民族政治集团，它要求国大党将锡克人的要求也写进国大党的民族斗争的纲领中去，它与代表全印利益的国大党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一、民族独立运动与锡克

尽管印度的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早在 1888 年就成立了，但是这个由英国退休文官休谟领导组织起来的政党，在其成立初期的十几年中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一个效忠大英帝国、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的政治沙龙而已。到了 20 世纪初期，由于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加入，给这个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国大党才变得活跃起来，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并进而在提拉克的领导下促成 1905 年到 1908 年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由于国大党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政治组织，许多锡克也参加了国大党，并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参加了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1907 年阿吉特·辛格在旁遮普成立了“印度爱国者协会”，这个协会提出的口号是团结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人民，为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印度的其他地方以国大党为主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再次掀起，而以穆斯林联盟为主的伊斯兰教政治组织也逐渐加入这一运动的洪流。锡克以锡克寺院改革运动方式参与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因为锡克寺院的管理人是英印政府认可的，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英印政府的支持。锡克争取从乌达斯派僧侣手中夺回锡克寺院控制权的斗争，也是本民族寻求宗教自主权的斗争。由锡克人管理锡克寺院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从英印政府手中夺回对锡克寺院管理人的任命权，从而使英国殖民者少了一个对锡克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也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所以阿卡利党领导的锡克寺院改革运动得到了当时的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的大力支持。甘地先后两次出席了中央

锡克联盟的会议，对锡克夺取锡克寺院管理权的运动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当金庙金库的钥匙交到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S. 沙拉克·辛格手中时，甘地曾特地打电报给他，称这是“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赢得的第一场胜利”。^①而锡克在争取锡克寺院过程中采取的一些非暴力的斗争方式，也是甘地对英印殖民政府斗争所采用的策略。

在印度全境掀起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中，除了锡克社会一些成员直接加入国大党，参加由它领导的斗争外，还有一部分锡克组织秘密团体，以恐怖暴力活动的形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一点，卡达尔党可以作为代表。这个组织从国外购买武器，或是袭击国家的官员及宅邸，或是政府机关，交通要道，给殖民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虽不是锡克社会参加民族独立斗争的主流，但是他们使用的暴力方式却是他们传统上反对压迫的最熟悉的方式。主流的锡克社会组织也积极参加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在阿卡利党成立前夕，中央锡克联盟就在 1919 年 12 月的会议上作出了动员锡克参加争取民族自由斗争的决定。^②1920 年 10 月在拉合尔召开的第二届中央锡克联盟的会议上，该组织通过了参加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决议。1927 年 11 月国大党宣布抵制西蒙调查团后，1928 年 1 月在阿姆利则召开的、阿卡利党占优势的全体锡克政党的会议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阿卡利党和中央锡克联盟也决定与国大党人一起举行反对西蒙调查团的游行。1930 年，国大党宣布抵制西蒙调查团的报告，阿卡利党也宣布拒绝接受这个报告。他们响应国大党的号召，抵制在 8 月份举行的选举，同

^① 阿托尔·钱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旁遮普的政治》，新德里，1989 年，第 170 页。

^② 哈尔吉特·辛格：“从拉克巴甘吉到副王宫殿——宗教抗议的研究”《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第 14 卷，第 1 部（1980 年 4 月）第 182—198 页。

时也抵制第一次圆桌会议。

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锡克也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尽管阿卡利党利用各种机会表示反对设立单独的选举区，赞成一般选举区制度。他们在国大党任命的莫蒂拉尔·尼赫鲁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向该委员会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上表示，在成立民族政府的问题上，如果不考虑种姓和宗教因素，他们将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欢迎。但是当 1928 年 8 月 10 日尼赫鲁报告公布，宣布在未来的议会中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为其保留一定的席位，却没有为其他少数民族提出席位保留后，锡克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们对《尼赫鲁报告》中所提出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塔拉·辛格、吉亚尼·宰尔·辛格和其他阿卡利党的领导人指责《尼赫鲁报告》损害了锡克的权益，^① 中央锡克联盟总书记萨达尔·哈尔兰姆·辛格称这个报告事实上已经将印度分裂成了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印度。^② 最后阿卡利党宣布抵制预定在拉合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只是在甘地、莫蒂拉尔·尼赫鲁和安沙里会晤了塔拉·辛格和巴巴·卡拉克·辛格并向他们作出许诺之后，他们才答应出席 1929 年底召开的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在这次会议上，国大党向包括锡克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出承诺：国大党将不接受任何使处于少数地位的锡克和穆斯林不能感到“完全满意”的宪法。^③ 巴巴·卡拉克·辛格和塔拉·辛格等锡克领导人对此感到满意，于是他们决定参加 1930 年 1 月 26 日的印度独立日活动。

当 1930 年甘地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主席巴巴·卡拉克却以印度国旗中没有代表锡克的颜色而拒

① 《论坛》，1929 年 4 月 13 日。

②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75 页。

③ 古尔拉提·凯拉斯·钱德：《阿卡利党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 年，第 50 页。

绝参加。尽管尼赫鲁明确地向他解释，印度国旗的颜色并不是用来代表印度各个社会群体的，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效果。只是在西斯甘吉锡克寺院发生枪击事件之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才决定参加这一运动。而在此之前，阿卡利党虽发表了一份号召锡克参加这场运动的宣言，但是它同时又要求参加这一运动的锡克必须聚集在阿卡利党的旗帜之下。^①

1937年旁遮普省议会选举结束，代表旁遮普大地主利益的旁遮普统一党领导人与穆斯林联盟之间达成锡康达尔—真纳协定后，阿卡利党与国大党这两个政党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亲近起来。阿卡利党领导人称赞国大党是这个国家惟一的代议制政党，是民族荣誉和自尊的真正受托人。^② 阿卡利党的最高领导人号召党员加入国大党，包括塔拉·辛格在内的一些阿卡利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大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阿卡利党与国大党的这种亲密的合作的关系未能持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卡利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便放弃了与国大党的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印度参战，并呼吁印度各政党、各宗教团体不要用战争来要挟英国政府，而应全力以赴地支持英国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对此，印度各政党反应不一。国大党反对英国政府未经与印度商量就将印度拖入战争的政策，国大党领导人宣布不能在自身的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参加一场所谓的为了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作为旁遮普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的塔拉·辛格却在与印度总督会晤之后，采取了与国大党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他宣称阿卡利党

^① 古尔拉提·凯拉斯·钱德：《阿卡利党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55—56页。

^②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171页。

关注的是锡克人抵制战争会对锡克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印度军队中的锡克士兵的人数已经由于锡克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大为下降。事实上，锡克在印度政治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锡克在这个国家的军队中所占的分量。塔拉·辛格辞去了国大党的职务，积极帮助政府从事进行战争的努力。正如塔拉·辛格的传记作家所说：“如果塔拉·辛格沉醉于民族主义之中，抵制征召锡克士兵进入印度军队，那么今天的锡克将什么地位也没有。”^①塔拉·辛格辞职之后，积极帮助帕提亚拉王公建立卡尔萨防卫联盟，并且通过这个组织积极帮助政府征召锡克当兵。即使此举被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反民族主义的，他也不在乎。

二、锡克对印度宪政改革的参与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与印度的宪政改革运动近乎同步进行的，英国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压力下逐步退出印度的过程同时也是印度实行宪政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印度开始宪政改革时候起，阿卡利党完整地参与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进行的宪政改革的全过程。锡克参与印度宪政改革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旁遮普地方的，另一个层面是全印的。

在英印旁遮普省的人口分布上，旁遮普的锡克人数既少于印度教徒，更少于伊斯兰教徒，只占该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印度独立前在旁遮普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党有穆斯林联盟，国大党，阿卡利党和旁遮普统一党。穆斯林联盟的主要成员都是伊斯兰教徒，国大党的成员既有印度教徒，又有锡克教徒，也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等等。阿卡利党的成员仅限于锡克。旁遮普统一党的成员即有印度教徒，也有锡克教徒，更多是伊斯兰教徒。但由于旁遮普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穆斯林参加穆斯林联盟的并不多，穆斯林联盟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78 页。转引自吉亚尼·古尔查兰·辛格的《塔拉·辛格的生平》，德里，1950 年。

在旁遮普地区的影响一直非常有限，直到 1946 年教派冲突气氛异常浓烈，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几乎势不两立时，旁遮普统一党中的伊斯兰教徒大量加入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才获得一定的影响力。穆斯林联盟在旁遮普的力量有限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独立后巴基斯坦的政党力量分布中得到有力的佐证。国大党的成员主要是印度教徒，另外也有一部分锡克加入国大党。但是由于国大党具有相当大的世俗性特质，而旁遮普地区又是伊斯兰教、锡克教和印度教三大宗教派别教派斗争较为激烈的地方，于是许多印度教徒加入了圣社和印度的教派政治组织——印度教大斋会和国民志愿团，国大党的力量并不强。锡克人虽然在锡克寺院改革运动中表现出异常的团结一致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但是这个社会群体中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差很大，个人的利益重点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在政治取向上是多元化的，尽管有一部分锡克参加了自称为代表锡克社区的阿卡利党，但由于这个政党的浓厚的宗教色彩，还有一部分锡克加入国大党，成了国大党的著名政治家。也有一部分保守的锡克大地主加入了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旁遮普统一党。此外，锡克政党除了阿卡利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锡克组织也发挥政治作用，可以说锡克在政治取向上是比较分散的。而由穆斯林大地主和锡克大地主参加的旁遮普统一党才是旁遮普省最具实力的政党，在 1935 年印度政府法通过以后，在旁遮普省的选举中，旁遮普统一党独占鳌头，他们执掌着旁遮普邦的地方政权。

在参加全印宪政改革这一点上，锡克社会也显得非常积极，同时由于英印殖民者对教派的有意识地利用，锡克在全印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更为显眼。早在 1909 年英国政府在莫莱—明托法案中给予穆斯林教派单独选区时，锡克的政治组织大卡尔萨协会就要求英印政府给予锡克同样的待遇，当时担任旁遮普省的省督也支持锡克的要求，他在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说：“旁遮普锡克具

有最大的重要性，是否应该考虑采取措施确保锡克的单独代表权。”^① 1916年12月，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盟在勒克瑙发表共同宣言：“该是英王陛下政府发布他早日给予印度自治政府的政策目标和意图的时候了”。^②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为未来的印度的管理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该方案构想将处理一个省内部的所有事务的权力交给省内的立法会议，该会议的议员中的 4/5 应尽可能地在成人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同时它也为重要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权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条款。为保护穆斯林的利益，该方案宣称给予穆斯林特别代表权，在省立法会议中根据比例代表制原则为他们保留席位，专门由穆斯林选民选举产生。在旁遮普，为确保人数众多，教育上却相当落后的穆斯林社区的利益，在省立法会议内要给他们 50% 的选举席位。

由于锡克没有参与制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宣布的这个改革方案，该方案在锡克社会中引起忧虑，因为该方案具有为保护穆斯林的利益而特别制定的席位保留条款，但是却没有给锡克社会特别代表权。锡克政治家认为没有锡克单独选举权，锡克的利益将受到损害。锡克政治家认为根据 1909年莫莱一明托改革方案在省立法会议的选举中锡克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根据这个方案，穆斯林社会受到特别的照顾，他们被给予单独选举区，在印度教徒占绝对优势的省区，穆斯林被给予特别的照顾。但是当大卡尔萨协会向政府提出同样要求时，却没有得到政府的允准。根据这个方案，选举主要是沿教派路线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进行，锡克在选举中迷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候选人之间，锡克的代表权只有通过政府的任命才得以维持。在 1909年所有 3个公开选举的职位均为穆斯林所获得，在 1912年的选举中，6个代表由选

①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 2 卷，德里，1977 年，第 218 页。

② 《印度国大党》，1917 年，马德拉斯，第 180 页。

举产生,其中 4 个归了印度教徒,一个归了穆斯林,一个归属于锡克。在 1916 年选举的 11 个席位中,6 个为印度教徒所得,5 个为穆斯林所得,政府将 1 个独立席位给了欧洲人,没有一个锡克当选。

由于穆斯林教派意识的增强和锡克宗教复兴运动所带来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间的疏远,使得锡克日益关注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社区的政治地位,而这种地位的社会认可,反过来又可以加强对锡克是一个有别于印度教的单独社会群体的认可。对锡克而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方案拒绝承认他们的单独存在,他们通过自己的报刊指责国大党在保护穆斯林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锡克的利益。印度事务国务秘书 1917 年宣布的改革计划使锡克更加直率地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1917 年 10 月 16 日,有影响的《卡尔萨之声报》表达了锡克知识分子的情感。该报写道:“在印度正处于一个政治危机之时,锡克世界却普遍地保持沉默,这个沉默的含义是什么?它意味着锡克有做值得回报的牺牲吗?……那么这意味着锡克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一个对政治和军事战略无知的民族?不!锡克是一个明确的政治实体,他们并非不怎么过问政治,锡克民族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军事民族,沉默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迄今为止大卡尔萨协会一直追求一个明智的政策,即在政治活动方面保持克制,但是蒙塔古先生的决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形势,特别的问题需要特别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必须说出我们的民族需要,我们不应失去我们的机会。”^① 1917 年 1 月,大卡尔萨协会书记桑德·辛格·马吉斯亚向旁遮普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宣称没有专门为锡克社区提供恰当的代表权的方案是注定要失败的,^② 该备忘录要求政府未来的宪政改革计划中,应该给

^① 《卡尔萨之声》,1917 年 10 月 16 日。

^② 拉吉·A. 卡普尔:《锡克分离主义:信仰的政治》,伦敦,1986 年,第 72 页。

让锡克接受包括旁遮普自治省在内的联邦计划是不可能的。”^① 乌吉贾尔还提议将拉瓦尔品第和木尔坦行政区（除了里亚拉普尔和蒙塔高梅里）从旁遮普划出，从而将旁遮普的人口比例变成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各占 43.3%、43.3%、14.4%。1932 年 4 月麦克唐纳首相的教派裁决给了锡克在旁遮普省近 19% 的席位，而锡克人口只占该省人口的 13.2%。萨姆普兰·辛格和乌吉贾尔·辛格强烈地反对这个裁决，并且以退出会议的方式表示抗议。1932 年一个以阿卡利党和中央锡克联盟为主体的锡克会议在拉合尔召开，会议认为政府给予锡克代表的比例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表示“它决心不允许任何没有……给予锡克人以完全保护的宪法成功运作。”^② 会上还决定成立一个反对“教派裁决”的联合阵线卡尔萨大会。但是，这个比例在 1935 年《印度政府法》中仍然得到维持。

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锡克各个政治组织在参与印度民族运动和印度的宪政改革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但是锡克政治家无论是加入阿卡利党的，还是参加国大党的，他们对维护锡克社会的利益都十分积极。锡克政党和政治家参与宪政改革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求在印度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同时，还要求殖民政府在立法会议中，给锡克单独代表权，为他们保留一定数量的席位，让他们在立法会议中的分量与他们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相一致。在政府机构的人员录用上给锡克更多的照顾。他们一致支持以国大党为首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积极投身其中，同时又时刻注意保护本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不盲目追随

^① 《第二次圆桌会议》，少数民族委员会，第一部分，第 89 页，转引自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一书，第 76 页。

^② 凯拉斯·钱德·古尔拉提：《阿卡利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 年，第 62—63 页。

国大党。它们作为一个处于旁遮普的三极社会群体最弱勢的集团，要求保护自身的利益。在印度的宪政进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们一直要求给予锡克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保留席位，以免在纯粹的多数的选票面前，失去一个少数社会群体所应有的地位。而国大党则主张在印度实行完全的选举制度，不给予任何社区，任何团体以政治上的保留。因此锡克社团与国大党在这个方面的立场是互相对立的。作为具有地方民族性的政党，锡克政党已经显示出其成熟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能力。他们的活动有助于对独立以后锡克社会政党活动的理解。

第四节 印巴分治对锡克民族的影响

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锡克虽然比较集中，但是它与周围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相比，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在两大教派的斗争压力下，任何一方过激的行动，都有可能使处于夹缝中的锡克沦为牺牲品。锡克民族的领导人一直对本民族的脆弱的地位极为担心是很有现实的理由的。锡克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宪政运动中的种种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锡克地位忧虑的体现。在印度分治问题上锡克的表现更是如此。针对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巴基斯坦”的口号，及其发展的势头，锡克政党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因应措施，首先是坚决反对印巴分治的思想，其次是要求成为一个自由的旁遮普省，最后提出了独立的锡克斯坦思想。

1930年，伊克巴尔爵士提出在印度西北部成立一个穆斯林自治邦的思想，锡克政治组织立即作出了反应，当时他们向甘地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将旁遮普穆斯林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西北边省以便使旁遮普教派人口比例获得某种平衡，一方面避免锡克遭到穆斯林教派统治的命运，一方面这种平衡也可以让锡克在印

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起杠杆作用。但是锡克的这个要求遭到甘地的批评。

1940 年穆斯林联盟作出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表明印度的政治发展趋向是明显地走向了分裂之途,“分治的建议已经改变了印一穆问题的性质。表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在相互战争,并且在准备最后的战斗。”^① 阿卡利党同以往一样,立即对这个决议作出反应,同时它对国大党无动于衷的态度表示极为愤怒。1941 年 3 月,锡克议员首先在旁遮普议会向邦首席部长也是旁遮普统一党的领导人锡康达尔提出质询,锡康达尔表示穆斯林联盟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是因为它反对任何享有全权的联邦政府,他们害怕在中央执政的教派将危害或否定省自治。他说旁遮普省是印度“武装的臂膀”,他要求外人(联邦政府)不要干涉旁遮普的事务,最后他肯定地说:“我们不要求这儿是穆斯林的统治、那儿是印度教徒的统治,如果那是巴基斯坦的含义,那么我与它没有任何关系。”^② 然而随着巴基斯坦运动的发展,锡克人的忧虑有增无减。

1942 年前来印度进行政治调查的克里普斯使团提出的建议间接地认可了巴基斯坦的原则,因为它允许不准备接受新宪法的省有保留他们目前的宪政地位的权利。这遭到了阿卡利党政治家们的坚决反对,塔拉·辛格和吉亚尼·卡塔尔·辛格表示巴基斯坦只能建立在他们的死亡之躯上。塔拉·辛格写信给克里普斯,表示既然锡克人在旁遮普的分布是分散的,因此要求统治权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总能够建立起一个锡克人“不受任何单个社会群体统治的省”^③。无论如何“我们将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阻止旁遮普从全印

① 《哈里真》,1940 年 9 月号。

②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文》,普林斯顿,1957 年,第 106 页。

③ 科尔帕尔·辛格:《旁遮普的分治》,帕提亚拉,1972 年,第 10 页。

联邦中被分离出去。”^①

为了应付旁遮普被分裂的前景，阿卡利党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自由旁遮普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 1930 年塔拉·辛格给甘地的备忘录中提到的建议，也就是说将穆斯林占多数的行政区从旁遮普划出，重新划分边界，建立一个新的旁遮普省，在这样一个省中，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拥有占人口多数的地位，同时这个省中将包括最大数量的锡克人口。在这个旁遮普省中穆斯林在西部占多数，印度教徒在东部占多数，而锡克人口在旁遮普的中部，同时在这个地区三个社会集团平均分布，没有一个占多数。在 1942 年 12 月塔拉·辛格宣布他所设想的自由旁遮普省将由 40% 的穆斯林、40% 的印度教徒和 20% 的锡克组成。1943 年 3 月，他宣布，建立自由旁遮普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巴基斯坦的幽灵。至于新的旁遮普邦的边界划分，1943 年 6 月阿卡利党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自由旁遮普，其边界将在考虑了每个社会集团的人口、财产、土地税收和历史传统之后被固定下来。”^② 同年，阿卡利党在它出版的详细解释这个方案的小册子中，还建议将锡克土邦也包括进来，这样锡克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到 24%，而且通过人口的快速增长，锡克人口最终将达到 30%，那样对锡克社会会更加有益。^③ 锡克社会更加能够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起到平衡作用。

尽管阿卡利党人的要求仅仅是对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要求的一种反击，萨达尔·乌吉贾尔和吉亚尼·卡塔尔·辛格明确表示“自由旁遮普”只是一个对抗巴基斯坦的要求的武器，但是它仍然受到国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70 页。

②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3 年》，第 1 卷，加尔各答，1944 年，第 298 页。

③ 巴尔德夫·辛格·纳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 年，第 60 页。

大党和印度教社会特别是圣社以及印度教徒创办的报刊的攻击，巴巴·卡拉克·辛格认为在巴基斯坦和自由旁遮普之间没有任何区别，都包含有分裂印度、破坏印度统一和完整的意图。

1944年7月，国大党著名政治家拉贾戈帕拉查里提出：在战争结束后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划出穆斯林占多数的西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举行公民投票或其他可行的投票方式，决定这些地区是否留在印度。这个方案“明显的得到了甘地的认可，他的建议在公众看来是同国大党联系在一起的。”^① 尽管这个方案为真纳拒绝，但是它在锡克领导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阿卡利党认为拉贾戈帕拉查里方案和甘地对这个方案的支持事实上就等于国大党支持巴基斯坦。这必将导致旁遮普被一分为二，而锡克社会也将因此被分割成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两个部分。阿卡利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它与国大党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疏远。^②

眼看印度分治已经不可避免时，阿卡利党宣布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自己的民族权益不能因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斗争导致的印度分治而受到损害。

1944年8月2日，在阿姆利则阿卡利党的会议上，塔拉·辛格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主权国家的方案，但是该方案遭到会议的拒绝。在同月20至21日阿卡利党召集的全印锡克会议上，塔拉·辛格宣布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如果这个国家分裂了，那么锡克不能成为印度斯坦或者巴基斯坦的奴隶。^③ 吉亚尼·卡塔尔·辛格也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锡克国家。他说现在不应该以印度的名义向锡克作出呼吁，因为分治之后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①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174页。

②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4年》，第2卷，加尔各答，1945年，第212页。

③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4年》，第2卷，加尔各答，1945年，第213页。

而如果巴基斯坦在英国人刺刀的帮助下，强锡克所难，那么他们会像古鲁戈宾德一样，将这个国家撕成碎片^①。鉴于国大党背弃了它在 1929 年拉合尔年会上作出的承诺，大会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审议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国家的可能性。

在 1944 年 10 月全印阿卡利党的第 15 次年会上，塔拉·辛格宣布锡克的主体性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就是甘地和真纳。他们正在让其教派主义集团对锡克的主体性发起恶毒的攻击。他说锡克在反对剥夺了他们自由的英国人的同时，也反对像甘地和真纳那样妄想通过分裂印度而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能够强行统治锡克的独裁者。^② 其他阿卡利党的领导人吉亚尼·卡塔尔·辛格、贾萨达尔·普里塔姆·辛格等人也纷纷谴责甘地和国大党的行为。1944 年 12 月 3 日泰吉·巴哈杜尔爵士成立以他为首的协调委员会后，阿卡利党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备忘录中，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的锡克国家，这个国家将包括绝大部分的锡克人口和他们的重要的寺院，为此即使意味着人口和财产的迁移与交换也在所不惜。

在 1945 年印度总督魏菲尔召集的由印度各党派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塔拉·辛格明确表示，“他们自己不认同国大党，虽然就国大党赞成印度的自由而言，他们同情它。”^③ 塔拉·辛格认为巴基斯坦对锡克的威胁最大，但是他又公开表示如果真纳方面同意锡克人建立一个单独的邦 (state)，那么他准备认可巴基斯坦。在 1945 年 2 月 22 日由塔拉·辛格等 29 位锡克领导人签名的递交给非官方的萨普鲁调解委员会的备忘录中，锡克领导人也宣布他们

①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4 年》，第 2 卷，加尔各答，1945 年，第 214 页。

②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4 年》，第 2 卷，加尔各答，1945 年，第 218 页。

③ V. 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 年，第 221 页。

支持对在旁遮普的锡克有着某种保护的统一的印度，但是如果巴基斯坦被认可，那么锡克就将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①在这个备忘录的前言中，巴尔德夫·辛格写道：“锡克决不同意生活在一个神权政体的穆斯林国家中。无论这个国家的名字是‘巴基斯坦’还是别的什么，”^②

1946年2月塔拉·辛格、吉亚尼·卡塔尔·辛格和乌尔兰姆·辛格作为锡克政党领导人，巴尔德夫·辛格作为锡克部长分别会晤了英国工党内阁使团。阐明了他们对印度分治的立场。尽管这些领导人之间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全部表示赞成一个对少数集团有一定保护的统一的印度国家，印度的分裂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害的，甚至会招致外来势力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但是如果印度分治，巴基斯坦成立，那么锡克人应该有权成立一个锡克国家或者一个单独的锡克邦，这个邦有选择与印度斯坦或者巴基斯坦结成联邦的自由。同时锡克领导人仍然坚持在这样一个锡克邦或者国家中，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人口都不占多数。^③

1946年3月，阿卡利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将建立一个锡克斯坦或者卡利斯坦作为奋斗的目标。该决议说：“由于神圣的寺院、财产和语言而同旁遮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锡克人有权宣布，旁遮普是他们的家园和神圣的土地，英国人是在锡克最后一个统治者年幼时，作为受托者而取得这块土地的。鉴于锡克社会既受到穆斯林的成立巴基斯坦要求的威胁，又有被印度教吞并的危险，阿卡利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为了保护和保持锡克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经济权利，建立一个锡克邦。”^④

① 胡卡姆·辛格：《旁遮普：锡克家园》，拉合尔，1945年，第78页。

② 胡卡姆·辛格：《旁遮普：锡克家园》，拉合尔，1945年，第78页。

③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年，第243页。

④ 哈尔班斯·辛格：《锡克的传统》，孟买，1964年，302页。

1946年5月16日,内阁使团提出由省、联省组和一个非常软弱的中央构成的联邦结构,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包括旁遮普省在内的西北联省组中没有给予少数民族多于他们人口比例的代表权的保护。塔拉·辛格认为在这种制度下,锡克未来的命运将是悲惨的^①。

面对锡克人的维护本民族权益的要求,英国工党内阁使团当然也希望能够像解决穆斯林问题那样解决锡克问题,但是限于锡克的人口和它的地理分布条件而无法做到。1946年6月斯坦福德·克里普斯在英国议会发言中就说:“困难并不是来自任何对于锡克人重要性的低估,而是来自无法回避的地理因素。……可以看出他们的要求是给予他们如同给予穆斯林那样的某种特殊的待遇。然而,锡克是一个极小的社会集团,只有550万人口,而穆斯林有9千万人口。此外,锡克在地理上的分布也让人无法划出一块锡克人在其中占多数的地区——我不否认将来有一天有人能够划出这样一块地区来。”^②

1946年6月10日,锡克政党联席会议在阿姆利则召开,大会抨击了内阁使团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以纳林江·辛格·吉尔为首的锡克代表委员会,和由前印度国民军中的锡克军官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授权锡克代表委员会同英国政府展开坚决的斗争^③。塔拉·辛格呼吁锡克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献出他们的生命。”^④大会还决定拒绝任何没有能够满足锡克正当要求的宪法。7月初,

①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年,第272页。

② 瓜耶尔·毛里斯和阿帕多里《关于印度宪法的演讲与文件,1921—1947年》,第2卷,孟买,1957年,第638—639页。

③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6年》,第I部分,加尔各答,1947年,第203页。

④ N. 纳特·米斯拉:《印度年鉴,1946年》,第I部分,加尔各答,1947年,第202页。

巴尔德夫·辛格写信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寻求他个人纠正由内阁使团给锡克社会带来的不公正待遇的做法。巴尔德夫·辛格认为，很显然，内阁使团在酝酿他们的意见时，主要的考虑是尽可能地照顾穆斯林联盟的利益，而穆斯林联盟已经明确地表示它是带着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穆斯林国家的目的接受这个建议的。巴尔德夫·辛格强调内阁使团已经承认将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主要是锡克）包括在一个主权的巴基斯坦国家内的不公正性，并且已经认识到锡克害怕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虽然内阁使团确实已经拒绝了一个主权的穆斯林国家的要求，然而，不管怎样，通过实施联省组方案，他们已经将锡克纳入了一个等于是永久地接受穆斯林教派统治的框架中了。这样的联省组中没有任何可以让锡克脱离这种统治的条款，或者是给予锡克在文化上、社会上以至宗教权利上的保护。锡克社会认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立法会议已经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主要的教派议题的解决制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条款，但是作为印度三个主要社会集团之一的锡克却被忽略了。巴尔德夫·辛格认为这个条款应该被同样公正地扩大到锡克社区。^①然而，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在给巴尔德夫的回信中却说，他对此事一直予以密切的注视，不过很显然 5 月 16 日的声明是不可能按照锡克所希望的那样予以修改的。同时艾德礼说总督正准备与国大党主席讨论时局，而且如果穆斯林联盟接受 5 月 16 日的声明，他将同样与穆斯林联盟讨论这些事。艾德礼表示很遗憾锡克社区决定不选举他们的代表参加立法会议，由于他们留在立法会议之外，这将使得在立法会议上，政府在向其他政党提出有关锡克地位的问题时，变得更加困难。艾德礼希望锡克社会最终将在立宪进程中持合作态度。如果锡克社会认为将来他们仅有的选举权利将会被人用来伤害他们的重要利益和拒绝他们的民族愿望，因

①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 年，第 290 页。

而拒绝使用提供给他们的机会，这将是真正的错误。他认为立宪会议将会以一种相当不同的精神处理它面对的问题。^①显然，英国殖民政府是不愿意满足锡克的要求的。

面对锡克的坚决的权利要求，同时也鉴于巴基斯坦的鼓动迅速发展的势头，国大党为了赢得锡克对成立一个完整的印度联邦的支持，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软化锡克对国大党的敌视态度，改变了以往对锡克保护民族权益的要求一律加以排斥的做法。1946年6月2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指出内阁使团的建议对锡克人是不公平的。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向锡克人保证在消除他们的合法的不满上，以及在旁遮普的正当权益的获得与保护上，国大党将给予尽可能的支持。^②国大党对锡克态度的转变使得锡克和国大党关系逐渐靠近。1946年8月14日，锡克行动委员会在重申内阁使团对锡克人不公的同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决定参加临时政府。在巴尔德夫加入临时政府之后，斯瓦兰·辛格成了阿卡利党立法会议议员的领导人，他同旁遮普的国大党领导人比姆森·萨恰尔签订了一个协定，确保立法会议中国大党议员和阿卡利党议员行动的一致性。^③

1946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后，由于国大党和阿卡利党拒绝与穆斯林联盟合作，获得多数席位的穆斯林联盟没有能够在旁遮普组成自己的政府，最后反而是旁遮普统一党、国大党和阿卡利党组成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穆斯林联盟认为国大党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排斥穆斯林的教派做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中穆斯林政党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要求在穆斯林占少数的省中给穆斯林以保护，也只会名而无其实。于是穆斯林联盟采取种种手段在旁遮普制

①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年，第 290—291 页。

②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 177 页。

③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 177 页。

造教派骚乱，最终迫使卡兹尔·海亚特罕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于 1947 年 3 月初辞职，而穆斯林联盟的组阁努力因国大党和锡克的坚决抵制又一次遭到挫折，结果旁遮普实行总督治理。紧接着旁遮普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教派骚乱。穆斯林教派组织、印度教徒教派组织和锡克教徒组织都建立了武装团体，准备相互厮杀，印度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印度分治已经不可避免。面对这种形势，1947 年 3 月 5 日国大党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任何派别压力，这个省应该被分成两个部分，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与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分开来。”^① 同一天，尼赫鲁对报界发表声明，宣布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实行分治是永久解决教派冲突的惟一办法。^② 大致同时，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徒和锡克立法议员以及来自这个省的中央会议和立宪会议的非穆斯林成员们在德里集会，通过一项决议：旁遮普政治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是在这个省实行公正平等的分治，旁遮普的非穆斯林人口应该被保证得到与他们在省的人数和利益相称的领土和财产。决议同时也要求保持锡克社区的完整和一致性。

1947 年 3 月，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到印度之后发现他所面临的是一种爆炸性的政治局面，此时的印度就像是“一艘满载弹药而在汪洋大海中着火的船。”^③ 各个政党都在积极备战。蒙巴顿认为旁遮普省的分治是不可避免的，4 月 18 日，他与塔拉·辛格、吉亚尼·卡塔尔·辛格以及巴尔德夫·辛格举行了会谈，锡克领导人表示如果他们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恳求以财产、宗教以及历史的联系作为这个省分治划界的标

①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1957 年，普林斯顿，第 346—347 页。

② G. 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中文版，袁维学译），北京，商务，1983 年，第 371 页。

③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 年，第 172 页。

准。并且谈到建立一个有权选择加入印度斯坦或者巴基斯坦的，以便使他们能够得到双方最大让步的“锡克斯坦”。^①然而，在现实形势下，锡克领导人的锡克斯坦是行不通的。蒙巴顿也不可能将任何穆斯林或者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他们。

1947年6月3日，在与包括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以及锡克领导人协商之后，印度政府公布了分治印度的《蒙巴顿方案》。此方案公布的前一天，当代表锡克的巴尔德夫·辛格与总督蒙巴顿举行会谈时，这位总督表示他最担心锡克人的地位问题。锡克人是如此地遍及整个旁遮普，以至于任何分治都一定会分裂这个民族，然而锡克领导人仍然宣称他们赞成分治。^②在发布这个方案的当天，蒙巴顿就锡克人的地位发表谈话，因为旁遮普的任何分治都将不可避免地分裂锡克人，总督说他是如此地感到不安，并称旁遮普分治将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蒙巴顿方案是当时印度社会教派政治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锡克只是汹涌奔流的教派浪潮中的一叶小舟，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因此，尽管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对此方案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又全都表示接受这一方案。为了争取锡克民族站到自己一边，两党又假惺惺地对锡克人表示同情。国大党主席克里帕拉尼在写信给总督蒙巴顿表示接受这个方案的同时，对锡克问题也表示关注。他说如果帝国政府不对锡克进行极大的照顾以及没有完全认识到锡克在旁遮普的特别地位，那么，帝国政府的方案将会导致对锡克的伤害。^③穆盟领导人也是如此。巴尔德夫·辛格代表锡克接受了这一方案的分治原则，他说这个方案开始了一个明显的超越于各种争论之上的事业，它不是一种妥协，他宁

① 劳里·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蒙巴顿和印度的分治》，第91页。

②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年，第373页。

③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年，第376页。

可称之为一个协定，“它不能够使任何人感到满意，同样也一点不让锡克社会感到满意，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肯定是值得的，让我们就此接受它。”^①但是在为划界委员会制定指导原则时，他强调应该注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由各个锡克组织参加的特别会议，虽然欢迎旁遮普的分治，但是会议公开提出任何不能保持这个锡克社区的完整和统一的旁遮普的分治是锡克人所不能接受的。^②

现在，摆在国大党和阿卡利党面前的目标是使英国人统治时的旁遮普省为印度联邦获得尽可能多的领土。对锡克社会而言，同时也是要求将更多的锡克人口合并到同一个政治疆域之内。然而在领土的划分上，穆斯林联盟坚持每个地区的划分应该绝对以人口为标准，拒绝任何领土划分标准上的变动。但是阿卡利党坚持应该考虑到宗教和历史联系以及在财产上的占有关系，据此锡克提出了对几乎整个莱契纳河间地的要求。但最后边界委员会裁定的结果是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古尔达斯普尔行政区的大部分和拉合尔行政区的小部分划给了东旁遮普。

早在 1943 年彭德雷尔·穆恩曾经写到：“如果目的是建立巴基斯坦，那么把锡克教徒包括在其内看来是有必要的。把他们排除在外，就意味着要在旁遮普中部划出巴基斯坦和剩余的印度之间的边界，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地理、经济、种族和语言上，中旁遮普是统一的。任何人为地从它中间划分出边界的做法，都将是分开一个长期存在和紧密结合起来的社会，而且将切断公路，铁路和河流网，使人们面临一个即便不是讨厌的也一定是很棘手的问题。这条界线可以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之间的边界线，但是它不能成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国境线。”^③事实不幸而言中，由

①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 年，第 380 页。

② V.P. 梅农：《印度权力的移交》，普林斯顿，1957 年，第 384 页。

③ 彭德雷尔·穆恩：《印度的未来》，伦敦，1943 年，第 30 页。

于锡克与穆盟进行了多次谈判，而且穆盟也向锡克作出了令其感到意外的让步，但是锡克与穆斯林之间历史上很长的教派斗争的历史，穆盟长期以来所实行的教派主义政策，使锡克难以相信穆盟的诚意，锡克更害怕穆盟的让步只是一个诱使他们加入巴基斯坦的权宜之计，因此对遭到穆斯林进行教派统治的前景的忧虑，使得锡克无法与穆盟进行政治上的合作，更不用说加入巴基斯坦了。

由于锡克不是一个在地缘上人口集中的民族，加之锡克人口太少，它的民族政治力量无法与穆斯林联盟或者国大党抗衡，作为一个处于夹缝之中的少数民族，锡克人虽然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这个锡克政党片面依靠英国殖民者的保护，在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搞没有实力的政治投机，没有能够发动起自己的民族大众起来保卫本民族的利益，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下，它选择了加入印度联邦。锡克最终无奈地选择加入印度联邦，由此也给印度联邦带来了一大片领土，从这个角度看，东旁遮普是锡克人带给印度的一份厚礼。

西里亚·拉德克里夫一人决定的西部印巴分界线，完全违背了锡克民族的希望和愿望，他们在西旁遮普的土地和财产被剥夺，也失去了他们的寺院和圣地。他们的人力和财力受到分治影响的程度比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大，2.5%锡克居民在这场分治中死去，将近40%的锡克居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空前的人口迁徙使得锡克民族变得前所未有的集中，增加了锡克民族领导人为锡克民族争取更大的利益的力量和自信心。由于此前作为这个邦多数的穆斯林几乎完全离去，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移入，在东旁遮普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三者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已经下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1年，据人口统计，在未分割的旁遮普，

印度教徒占这个省的组成人口的 26%，锡克则占 13% 左右。^①但是在 1951 年印度政府进行人口统计时，印度教徒人口占当时印度旁遮普省的 61%，锡克教徒占这个省的人口的 35%，^②锡克人口在旁遮普的比例上升了 2.5 倍。锡克人口在 6 个行政区中占主导地位，在 5 行政区中也占大多数。这种人口的相对集中使得他们以后为了这个民族不会再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断地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和要求得到更大的民族自治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本章从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双重作用，英印政府对旁遮普的开发政策和对锡克民族的笼络利用，近代锡克民族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主体性的塑造，锡克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印度立宪改革进程的参与，锡克与印度的分治等几个方面，在论述了印度进入现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了锡克进入现代发展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这个历史时期中，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印度尽管有了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与发展，但却存有教派的毒瘤。新的国家在继承独立前已有的民主制度的同时，有必要消除政治生活中的教派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尽管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但是依然十分落后，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并没有废除。在社会文化方面，尽管经历了长达 200 年的殖民统治，西方文化对印度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经历了民族宗教文化复兴的印度文化更有其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各个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下，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如何在多民族的国家中既有效地发展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同时又能将多个不同特质的民族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印度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期间，锡克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建立了民族政党，民族意识使得锡克能够区别于

① 印度政府，1941 年人口统计，第 1 卷，98—100 页，西姆拉，1943 年。

② 印度政府，1951 年人口统计，7—8 页，新德里，1959 年。

其他任何社会群体而自成一体。民族政党能够维护本民族的利益，锡克政党既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又要求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政党国大党将锡克民族的要求纳入它的纲领中。在印度的民主政治上，它要求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保护，不同于国大党的不考虑少数民族利益或者特殊性的绝对民主制。在印度分治的过程中，锡克为了避免成为印巴分治的牺牲品，坚决反对印巴分治，拥护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为了对抗穆斯林的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旁遮普的纲领；在分治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锡克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要求建立一个锡克邦或者锡克斯坦（卡利斯坦）。由于它的人口太少，分布太散和政党的力量有限才未能实现，结果成了印巴分治的最大的牺牲品。但是经过独立以前几十年的宗教文化复兴和政治运动，锡克的民族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的参政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锡克认识到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利益，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被侵蚀，维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锡克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加上锡克在分治后相对的集中，使得他们能够有力地提出自己民族的要求。如何在新的国家中既能适应国家的新的发展与整合战略，同时又能让本民族在各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既是摆在锡克社会面前的难题，又是印度国家与锡克社会无法回避的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建立旁遮普语言邦 问题上的冲突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既是民族内各组成成员间相互交流的工具，又是民族遗产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语言的发达程度，也是衡量民族发展程度的一个有效的工具，更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的标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还将它列为界定民族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在语言问题上的政策可以反映出它对发展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语言政策又是民族国家整合的一个重要工具，既要发展统一国家的通用语言，又要尊重各地区各民族原有的语言及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议题。本章将讨论在印度国家整合政策上的这一重要方面，即语言邦政策上国大党政府对锡克民族要求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态度、围绕语言邦产生的旁遮普地区各个政治和宗教文化势力的活动，以及旁遮普语言邦的最终建立，由此在这一问题上对印度国家整合能力的表现加以分析，并进一步研究旁遮普语言邦运动本身对以后锡克政治的影响。

第一节 国大党的语言邦政策和 印度的语言邦运动

印度独立以后，在印度联邦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政治

联合体。在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作为对印度分而治之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保留或人为地制造了数目极大的土邦，总数高达 562 个。^① 英属印度省与印度土邦犬牙交错。行政区划上的混乱不利于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为了便于管理和促进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政府有必要对印度原有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至于按什么样的原则重组印度的行政区划，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按照语言进行重组。语言邦是国大党独立之前几十年中一直宣传的，早已深入人心。

英国人在征服印度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各个省都是根据其征服进程的实际情况划定的，每一省的面积大小不等，省内各地区的组成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英国人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基本上不用印度的本地语言，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英语。起初管理印度事务的都是英国人，随着英国对印度征服的加深，英印政府中也起用了大量的本地人到政府中担任各级职务，然而到政府担任职务者，接受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教育，而考取政府的公职成为真正的文官更得通过在英国的文官考试，自然这些考试所用的语言也都是英语。用外族语言治理殖民地人民，既不利于政府与人民的沟通，也不利于人民参与民主政治，但它是一个殖民政权，本来就不愿意让当地居民参政，外来的殖民者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本地居民在政治上觉醒，参政意识增强时，只会加快殖民统治的终结。国大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与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在这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国大党领导人认为英属印度的省级行政单位是英国征服印度的历史进程和偶然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人为划定的色彩很浓，在英印各省的建立上缺乏任何合理的、科学的考虑。在同一个省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语言集团的存在，会导致

^① 由于引用的材料不一，精确的数目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总数都在五六百个。

行政的低效率，以及处于语言少数地位的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国大党主张在印度建立语言邦，一方面，语言邦的建立有利于唤醒民众的参政意识，更积极地参与印度的民主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按语言建立语言省，可以使各个省面积大为减小，而且每个管理单元在语言上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便于政府的管理工作的进行。语言省建立将导致政府为执行自己的事务而采取当地的语言，吸引那些不懂英语的人关注公共事务，从而扩大人民对政治的参与，一个邦的人民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他们的政府使用的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压迫。就地方而言，语言省的建立能够促进各个地方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语言邦的建立也能促进民族国家的整合，新建立的邦在有着充满自我意识的凝聚力和荣誉感的同时，也能够作为印度国家整体的一部分更好地与中央合作，参与整个国家的发展。

在英国人统治下，国大党没有能力要求英国人这样做，于是国大党首先在自己的组织上这样做了。1907年国大党首先在信德和安德拉（此时信德仍是孟买省的一部分，安德拉是马德拉斯的一部分）建立了国大党省一级组织，1908年又在比哈尔建立了自己的省一级的组织。在1920年国大党年会上，国大党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国大党组织的领土—语言原则，也就是语言邦的原则。1921年，国大党的各个省组织都按照这一原则建立了起来。^①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一直是语言邦的积极鼓吹者。在1937年、1938年、1945年，国大党多次保证要在语言的基础上重建各省。1947年1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又一次重申他的政府认可语言邦的原则。

1948年到1949年，当制宪议会制定新宪法时，语言问题的复

^① 鲍里斯·I. 克鲁耶夫：《印度的民族与语言问题》，新德里，1981年，第121页，转引自《印度国大党关于邦重组的决议案，1920—1956年》，新德里，1957年，第2页。

杂性体现了出来，议会普遍同意用一种语言取代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尽管印度有 15 种语言，但是没有哪一种语言具有成为印度全国通用语的实力，而不致引起其他语言地区的异议。15 种主要语言中印地语的使用最为广泛，但是也只限于印度中部恒河流域的一些地区，而且印地语在近代文学发展史上获得的成就还不及印度其他几种语言，如孟加拉语，马拉特语和泰米尔语等，印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作品就是用孟加拉语写成的。然而，比较起来说印地语的人最多，因而最后通过的宪法规定印地语为正式的国语，不过在 15 年内，它还必须与英语分享同等地位。但是就是这一条款，南方各邦还是勉强接受了，它们之所以接受它，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认为国大党会信守它的诺言，迅速成立语言邦。但是由于国大党迅速推进印地语为国语的政策，而不实行建立语言邦的政策，于是遭到各邦的强烈抵制，同时各邦开始了语言邦运动。

国大党在语言邦问题上改变以往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1947 年印巴分治前后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它迫使国大党对建立语言邦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印巴分治以及分散在印度各地的大土邦王公不愿加入印度联邦使得尼赫鲁、巴特尔等印度政府的领导人考虑应该首先注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而不是建立语言邦。在这个动荡的时刻就实行按语言建省，很可能会助长地方上的分裂主义情绪，反而对印度国家的整合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1948 年 6 月，立法会议宣布建立一个由 S.K. 达尔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审查当时语言邦运动发展最激烈的安德拉、卡尔纳塔克、喀拉拉等地建立语言省的要求。^① 同年 12 月达尔委员会递交它的研究报告，不仅否定了在这几个邦建立语言省的建议，而且也在整体上否定了按照语言进行邦的重组的原则。报告认为“在建立

^① 《国大党手册》，新德里，1948 年，第 48 页。

语言省上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管理的便利。语言只能够被作为便于管理的一件因素来考虑，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对待。”^① 而且“语言省的建立将肯定在别的地方会引起语言集团的分裂的要求，……这些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激化”，^② 达尔委员会警告说具有语言一致性的省具有威胁国家统一的巨大的危险性，而且，无论如何，由于印度语言种类极多，即使成立了语言邦，每个语言邦也还会有处于少数地位的语言。达尔委员会认为，区域邻接性、财政有效性、管理便利、有助于未来的发展，以及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民之间的更大程度一致性将是重组的标准。同时，在语言问题上它也坚持无论如何大多数人的观点决不能强加于少数语言集团身上。此外，这个委员会报告还对建立语言省的宣传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最后该委员会认为“专门或者主要基于语言考虑的省的建立不符合印度国家的更大的利益，因此不应该实施。”^③ 该报告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印度南方各地政治家对此表示极为不满。南方各地特别是安德拉邦的建立语言邦的鼓动进一步增强。

面对这种形势，在 1948 年 12 月的斋普尔年会上，国大党决定成立一个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伐拉白·帕特尔和帕特拜·斯塔拉马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检查国大党过去所作出的（语言省）决定以及目前形势下的要求。”^④ 这就是 JVP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 1949 年 4 月 1 日提交了报告，肯定了达尔委员会的立场，认为“语言邦将明显地阻碍整合巩固的进程，打乱我们的管理、经济和财政结构。并且在我们仍处在国家的初建时期就释放出扰乱与分

① 巴布拉尔·法地亚：《印度的邦政治》，第一卷，新德里，1984 年，第 47 页。

② 《1948 年语言省调查委员会报告》，德里，1948 年，第 120 节。

③ R. 戈帕尔：《印度的语言事件》，孟买，1966 年，第 73 页。

④ 琼·V. 邦德万特：《地方主义对省主义，印度国家统一问题之研究》，伯克利，1958 年，第 29 页。

裂的力量。”^① 报告说：“我们宁愿推迟一些年建立新的省，这样我们能够在这个时期集中力量处理其他最重要的事情，而不让这个问题来困扰我们自己。”^② 然而它同时承认，将马德拉斯邦的说泰卢固语的地区划出建立安得拉邦是一个强烈的要求，并且说如果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而且具有压倒性多数，”这样或那样的个案将会被给予进一步考虑，^③ 这为以后数年间主导印度政治的邦重组斗争打开了一个缺口。^④

1952年底，甘地的门徒波蒂·斯里拉摩奴因为坚决要求国大党实现建立语言邦的承诺而绝食至死，这在马德拉斯邦说泰卢固语的地区引起了普遍的骚乱。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尼赫鲁所领导的联邦政府最后同意成立安得拉邦。与此同时，其他要求成立语言邦的地区也没有停止语言邦的鼓动。结果，1953年12月22日尼赫鲁不得不在印度人民院宣布任命一个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客观冷静地”研究印度联邦的语言邦重组问题。根据印度政府内政部的决议，政府任命了以法兹尔·阿里为主席，H. 康祖鲁和 K.M. 潘尼迦为委员的邦重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语言邦)问题的含义,历史背景和现状,以及所有相关的重要因素。他们将自由地考虑与任何这样的重组相关的建议。政府希望这个委员会将首先就处理这个问题的一般原则提出建议。一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化就其代表一个地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在考虑邦的重组时，还必须注意其他重要的因素。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保持和加强印度的统一和安全。而财政经济和管理上的考虑不仅对邦而且对整个国家都几乎同样重要。联

① 米歇尔·布里切：《尼赫鲁,政治传记》，纽约，1959年，第481页。

② 斋普尔国大党年会(1948年12月)任命的语言省委员会报告，新德里，1953年，第15页。

③ 米歇尔·布里切：《尼赫鲁,政治传记》，纽约，1959年，第481页。

④ 米歇尔·布里切：《尼赫鲁,政治传记》，纽约，1959年，第481页。

邦政府强调，印度正在有步骤地实施一项伟大的推动经济、文化和道德进步的计划，导致妨碍这样一个国家计划的成功运作的任何变化都将危害整个国家的利益。”^①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1955年语言邦重组委员会提交了它的研究报告，1956年8月，印度政府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在议会进行辩论并略作修改后通过了邦重组法案。根据这部法案，印度各个主要的省都先后进行了重组，建立起大小不等的语言邦。尽管在建立语言邦的过程中有一些反复，但是最终印度各主要行政区还是按语言的原则建立了起来，到了1960年，印度的十多种主要语言除了旁遮普语外，都建立了以该主要语言为特征的语言邦。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而言，事实证明语言邦的建立有助于中央政府使用地方语言管理各个邦，有助于当地的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当地的政治精英和广大的民众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从而扩大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尽管它有一些负面作用，但是积极方面是语言邦的主流。印度自独立初期以来的20多年，国大党一直执掌中央和地方的多数邦的权力，国大党在语言邦问题上的立场的转变，反映了以国大党治理下的印度中央政府在语言邦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原则立场，而这种灵活性和原则立场就是，既满足地方政治经济和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又要反对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借语言问题闹事。

第二节 从萨恰尔协定到地区管理协定

一、教派席位保留的拒绝和旁遮普语言邦的提出

随着印度独立，印巴分治，印度获得了原旁遮普邦 19 个县中

^① V.D. 马哈江：《现代印度史》，第1卷，新德里，1983年，第462页。

的 13 个，印度分得的旁遮普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原来的英印旁遮普省划出的东旁遮普省，第二部分就是由原来散落于东旁遮普各地的土邦（主要是锡克土邦王公统治的锡克土邦）组成的帕提亚拉及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锡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益，是锡克各政党组织及领导人关注的中心议题。旁遮普经过分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人口迁徙，宗教和语言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印度旁遮普，原来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现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原来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构成了旁遮普的主要人口。印度教徒在这两个行政区人口的比例由 30% 上升到 67%，锡克则由 14% 上升到了 30%，在 1955 年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并入东旁遮普之后，锡克人口在某些地域上的集中变得更为明显。就语言而言，经过独立前长期的教派斗争，旁遮普语言的界限也很明显，印度的旁遮普省中在哈里亚纳地区主要是说印地语，其余地区则说旁遮普语，锡克人集中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说旁遮普语言的地区。由于分治，留在印度旁遮普内的穆斯林人数已是屈指可数，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这两个宗教派别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主流，或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教派矛盾依然存在。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情况下，锡克教徒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作的选择就是，要么像要求英印政府那样要求新的印度政府给这个少数民族以较多席位保留和建立属于锡克的单独选举区，要么是建立单独的锡克自治区。至于这个自治区的名字叫旁遮普省还是旁遮普语言邦并不重要。锡克领导人首先选择了前者。

1947 年 8 月，印巴分治以前印度的立宪议会还积极支持考虑为宗教少数集团提供宪政权利的保留。在旁遮普实行分治和交换少数民族人口之前，巴尔德夫·辛格和吉亚尼·卡塔尔·辛格曾经会晤过蒙巴顿爵士，建议立法会议要么在新的宪法中给锡克一个高

于其人口比例的代表权，^① 要么从东旁遮普的印地语地区将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划出建立单独的锡克邦。1948年10月，阿卡利党通过一个决议继续要求政府给锡克人以单独的代表权。三个星期后，由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任命的代表邦政府官方观点的一个委员会，向印度立宪会议建议，希望考虑让锡克在旁遮普省的立法机构中有50%的席位，在政府服务机构中有40%的职位，如果做不到，可以建立一个以古尔达斯普尔、阿姆利则、朱朗达尔、豪斯亚尔普尔、卢迪亚纳、费罗兹普尔和安巴拉为核心的新的省份。1948年11月15日，塔拉·辛格和东旁遮普立法会议中所有锡克议员（除了普尔塔普·辛格·凯隆之外）向政府提出一份有五项要求的议案，希望得到印度立宪会议的考虑，这些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央立法会议中给予锡克5%的代表权，在其他省给予锡克保留席位；在中央内阁中应该有一位锡克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在东旁遮普，在省政府和立法会议中给锡克50%的代表权，旁遮普邦的邦长和首席部长由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轮流担任；古尔冈行政区和拉哈鲁行政区应该从东旁遮普分出；在服务机构中应该为锡克保留40%的岗位。如果上述要求被拒绝，那么应该允许锡克建立一个包括安巴拉、胡西尔普尔，费罗兹普尔，古尔达斯普尔，卢迪亚纳，朱朗达尔和阿姆利则在内的七个行政区组成的新省。^② 尽管塔拉·辛格分别于1948年2月、1949年2月宣布“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文化和传统的省。”^{③④} 但是塔拉·辛格此时只是将

① 拉吉夫·A.卡帕尔：《锡克分裂主义：信仰的政治》，伦敦，1986年，序第15页。

② 《政治家》1948年11月9日。

③ 《论坛》，1948年2月26日。

④ 《政治家》，1949年2月29日，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98页。

旁遮普语言邦的口号作为宪政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一个选择。^①

但是在巴基斯坦成立之后，印度立宪会议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它支持废除所有这种类型的席位和单独选举区的保留。1949年5月立宪会议的顾问委员会又一次明确表态，在一个成人普遍选举权制度下的议会民主制度中，在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保存在一个书面形式宪法中的情况下，不存在为任何宗教少数提供席位照顾的空间。无论如何，锡克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和强健的社会集团”不需要给予任何额外的政治照顾。^②印度政府的不妥协态度，甚至可以从它拒绝将给予印度教徒表列种姓的让步和席位保留扩大到锡克教徒表列种姓这一点上看出来。由于教派分裂导致印巴分治，也使得绝大多数印度教徒要求严厉地对待少数教派。立法会议中的锡克议员坚持为锡克要求席位保留或者单独的代表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锡克感到极为失望，以至于在新的印度宪法草案即将生效时，他们拒绝在上面签字。

立宪会议对锡克民族在宪政上要求照顾的坚决拒绝，使得锡克政治家逐渐产生出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一个印度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印度社会以及对锡克人没有任何特别的政治保护的前景，不能不引起以锡克社会保护人自居的阿卡利党的忧虑。19世纪中叶以来的印度教的复兴和它同化少数民族的文化的的可能性，印度教宗教组织的建立，印度语所受到的热情支持，旁遮普印度教徒被宗教所煽动起来的极大的好斗性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③旁遮普的圣社长期以来一直就是阿卡利党的对手，国民自愿团(RSS)以及独立后由穆克吉和国民自愿团干部成立起来的教派政

^① 古尔拉提·凯拉斯·辛格：《阿卡利党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147页；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28页。

^② A.S. 纳朗：《苏特里季上空的风暴》，新德里，1983年，第91页。

^③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普林斯顿，1966年，第293页。

治组织人民同盟更使阿卡利党感到不安。人民同盟是在国民自愿团被禁后不久成立的，它的创始人穆克吉原来是印度教大会的主席，而印度教大会的前身是旁遮普印度教协会。印度教大会在独立前一直是印度主要的教派政党。1925年印度教大会党的会议中明确宣布在一切争端中代表印度教教派的利益。它不仅排斥穆斯林还排斥一切非印度教徒，甚至提出在印度实行强制性的印度教教育，在印度独立后它主张建立印度教国家，重新合并巴基斯坦，成立一个“婆罗多国家”。1951年5月，穆克吉在德里成立的人民同盟首先就包括旁遮普省和喜马偕尔省。人民同盟是在成立五个月后才成为全国性政党的。人民同盟的纲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和法制。”一个国家指统一的印度，一个民族就是印度教民族，一个文化即印度教为主的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锡克政党和政治家认为，统一的印度教徒的教派势力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锡克精英提出了锡克教是一个独立于印度教的宗教，锡克是一个民族，那么在浓厚的印度教教派氛围下，锡克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锡克政治家在反思“穆斯林得到了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得到了印度斯坦，而锡克得到了什么？”^①对于阿卡利党领导人而言，在独立的印度为了保持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和保护锡克社会免于消融在印度教社会的命运，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权益和文化，除了席位保留，惟一的出路就只能是争取旁遮普语言邦，只有在这个邦内锡克人的文化语言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能得到维护。

锡克领导人在进行议会斗争要求席位照顾和单独选举区的同时，在议会外同时开展了要求成立语言邦的运动。早在1948年2月，塔拉·辛格就宣布“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

^① P.C. 约西(主编)《旁遮普语言省：一次专题研讨会》，德里(此书无年代标注)，第60页。

与传统的省”；“我们的文化不同于印度教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古鲁穆克体的文化，我们的文献也是用古鲁穆克字体写成的。”^① 阿卡利党还决定在德里进行游行。为此，德里的政府机构颁布了禁令禁止 5 人或 5 个以上的人集会。塔拉·辛格也被政府拘捕，这是印度独立以来，除了对印度共产党以外，第一次逮捕民族运动的政治家。

1948 年 5 月，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PEPSU)成立，该邦成立时，当时的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的帕特尔称之为“锡克人的家园”，因为在这个邦内锡克的人数相对较多，人们也相信这个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将东旁遮普的锡克人占多数的地区并入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以满足锡克人有一个家园的要求的机会。^② 但是阿卡利党此时不同意与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合并，坚持它的单独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印度政府也根本没有这个打算。1949 年 9 月在塔拉·辛格指示下，萨达尔·胡卡姆·辛格在向立宪会议主席递交的备忘录中要求“在旁遮普语言的基础上划定语言邦。”^③

二、语言邦鼓动和萨恰尔协定

尽管旁遮普政府已于 1948 年 6 月宣布用印地语和旁遮普语取代乌尔都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然而印度教教派组织拒绝将旁遮普语作为教育语言。1949 年 2 月，一直是圣社的强有力的据点的贾兰德哈尔的市政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它属下的所有学校都使用天城体的印地语。这个决议引起锡克的极大不满。1949 年 4 月 4 日，在阿姆利则举行的由政治家、知识分子、教授、商人和

^① 《论坛》，1948 年 2 月 26 日，转引自巴尔德夫·拉吉·纳雅尔的《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 年，第 98 页。

^②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 2 卷，普林斯顿，1966 年，第 294 页。

^③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第 128 页。

医生等参加的锡克会议上，成立一个旁遮普语言省的要求第一次得到了清晰的表述，而且得到与会者的一致通过。^① 1949年6月，基本上是圣社堡垒的旁遮普大学的评议会，拒绝以古鲁穆克体甚至是天城体的旁遮普语作为它的学院中的教育语言媒介。锡克人更加忧虑即使在自由印度的旁遮普邦，旁遮普语也可能是第二语

1949年10月，塔拉·辛格被释放后开始领导建立语言邦的鼓动工作。阿卡利党的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加入国大党的23位阿卡利党立法会议员退出国大党，决议声称：阿卡利党此前允许锡克社会的省立法议员加入国大党，是相信和信任有着像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和萨德尔·帕特尔等著名人物的国大党，会对处于被人逐出家园、被毁灭、被连根拔除的悲惨境地中的锡克民族给予建设性的同情和支持。然而所有希望都令人悲伤地落空了，并且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对锡克不断的压迫和镇压……因此阿卡利党在经过深入周密的考虑和讨论之后，指示所有以锡克社团的选票当选的阿卡利党议员离开国大党，并且在议会中建立一个单独的锡克议会党团。^②

然而这一决议没有多少效果，原阿卡利党的立法会议员没有几位退出邦国大党议会党团，因为随着印度独立，一部分贾特锡克已经逐渐在国大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旁遮普邦国大党内部发生了权力中心由都市资产阶级向乡村富农的转变。锡克议员们认为在国大党内是可以取得所希望的成果的。吉亚尼·卡塔尔·辛格也认为语言邦要求是“反民族国家的（anti-national），对锡克是有

^① 乌尔查兰·辛格·巴吉瓦：《锡克政治五十年，1920—1970》，昌迪加尔，1979年，第20页。

^② K.C. 古尔拉提：《阿卡利的过去和现在》，昌迪加尔，1974年，第155页。

害的，它将会以比 1947 年分治还要糟糕的方式分裂锡克的人口”。^① 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报刊和印度教徒自然都反对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指责这个要求是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的一个复制品。

由于国大党内部戈皮·钱德·博加法和萨蒂亚·帕尔集团之间的派别斗争，国大党内部集团为了获取阿卡利党的支持，同意与阿卡利党谈判，寻求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1949 年 10 月 1 日，包括锡克领导人吉亚尼·卡塔尔·辛格和首席部长比姆森·萨恰尔在内的两位锡克政治家与印教徒政治家就旁遮普达成了一个协定，以解决包括各土邦在内的旁遮普地区学校的教育媒介问题。这就是萨恰尔方案。邦政府希望用这个方案取代独立前旁遮普政府教育部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是：在东旁遮普学校中的教育应使用儿童的母语进行教学，在第一二年级，既可用天城体，也可以使用古鲁穆克体。在起初教授印度语的学校内，从三年级起采取措施教授古鲁穆克体，在起初使用天城体的学校内，从三年级起教授天城体。^② 这个命令强调了两个原则，即通过母语实施教育，同时必须强制实施双语制度。然而这个命令有三点含糊不清，即其一，它没有决定在学校的母语教学选择上谁将作出进行选择的决定；其二，“旁遮普语”一词没有出现在命令中，仅仅使用了古鲁穆克体这个词；其三，没有明确在使用印地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从三年级起是开始学习旁遮普语还是仅仅教授古鲁穆克体的字母。

萨恰尔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印地语和旁遮普语都被看作是这个省的地区语言（Regional Language）；它在语言上将东旁遮普省

^① 萨蒂雅·M. 瑞伊：《旁遮普的分治》，新德里，1965 年，第 227 页。

^② 印度政府，内政部：《旁遮普边界委员会报告》，德里管理出版社，1966 年，第 3 页。

划为旁遮普语区和印地语区两个部分，古尔达斯普尔、阿姆利则、贾兰德哈尔、豪斯亚尔普尔、鲁迪亚纳、和费罗兹普尔行政区以及安巴拉行政区的罗帕尔和卡拉尔县以及坐落在嘎加尔北部的海撒尔行政区的一部分为旁遮普语区，旁遮普的其余部分为印地语区；在旁遮普语区使用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在直到大学入学考试将一直是教学语言媒介。在那儿，从小学的最后一年起开始教授使用天城体的印地语。在印地语地区，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地位正好颠倒过来；孩子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有权为孩子选择接受印地语或者旁遮普语作为主要的教育语言。凡被政府正式认可的没有接受政府资助的学校，教育的媒介将由管理者自行决定。^①

与旁遮普独立前发布的命令相比，萨恰尔方案维持了母语教育和强制实行双语制两个基本原则，同时消除了教育命令中具有模糊性的一面。在一个双语社会中，萨恰尔方案对于强制双语制而言，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它也保持母语作为教育媒介和给父母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决定教育媒介的自由选择权的原则。这个方案是理想的。换句话说，对两个主要语言集团几乎在规模上相等并且希望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构架内保持社会和政治交流的一个双语社会而言，无法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多元模式了。^② 大致同时，在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也有一个与萨恰尔方案相类似的教育方案，即将该地区划分成说印地语和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并且让他们成为各自地区的教育媒介，但是它与萨恰尔方案不同的是，它要求必须从小学三年级起在印地语地区教授旁遮普语，在旁遮普语地区教授印地语。并且，该方案没有给予父母选择孩子受教育使

^① 普拉麦德·库马尔：《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昌迪加尔，1984年，第101—102页。

^② 尼加尔·巴克西斯：《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28—129页。

用何种语言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它违背了印度宪法第三百五十条 A 款。

面对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政治家达成的萨恰尔方案，旁遮普各派别的立场不一。阿卡利党尽管对该方案给予父母在子女的教育语言媒介上的自由选择权表示反对，无论对印地语区还是旁遮普语区都是如此，但是它不失为可以接受的保证旁遮普语得到发展的一个折衷方案，因此它对该方案表示接受。

印度教教派组织反对这个方案，他们对允许使用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作为教育媒介感到愤怒，圣社成员尤甚。他们在朱朗达尔和德里的乌尔都语报纸发表文章反对这一方案。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的立场同圣社一样。因此萨恰尔方案从未在圣社成员领导的学校中得到实施。萨恰尔在与锡克领导人达成协议的同月就在一次立法会议的信任选举中败北，博戈法担任首席部长组织了邦内阁。以印度教徒为首席部长的旁遮普新内阁的部长们都鼓励印度教徒将印地语说成是他们的母语。结果萨恰尔协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导致锡克要求成立旁遮普语言邦。

1949年11月27日，塔拉·辛格在《胜利报》上撰文，提出成立语言邦。文章说“根据我的估计，这个省将由东旁遮普的七个、八个乃至九个甚至更多的行政区组成。人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锡克地区，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这将仅仅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一个省，它可以被叫做‘旁遮普苏巴’（苏巴一词在波斯语中即省的意思）”。同时塔拉·辛格本人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共同选举制度已经消除了对少数教派构成危险的论点。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一种说法是既然现在已经实行了共同选举制度，少数教派将不用担忧他们的前途。我的回答是新建的旁遮普苏巴也将实行共同选举制度。既然共同选举制度是民族主义的万灵药，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因为建立旁遮普苏巴而担心他的地位呢？印度教徒的地位将同以前一样强，因为在中央他们占

多数。”他进一步写道：“另一个被提出的论点是如果这样一个省建立起来，那么锡克将被要求离开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对此我感到惊讶。当建立巴基斯坦的时候对穆斯林没有出现过这种威胁。在我们要求在印度联邦内建立语言邦的事后，穆斯林仍然生活在印度。而我们现在却被威胁要逐出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我们有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那里锡克人占有人口的多数。这影响到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方的锡克人的地位了吗？”

为了澄清印度教社会对锡克要求的误解，1950年1月1日，萨达尔·胡卡姆·辛格在孟买向新闻界解释了阿卡利党的立场，表示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不是教派的而是世俗的和民主的要求。他说“由阿卡利党支持的公正的机构提出的在语言的基础上重建旁遮普的要求，是保持旁遮普文化和语言的惟一方法。这完全是一个民主的要求，只有最荒谬的想象才会将它贴上教派的标签。事实上我们希望国大党履行其对少数教派作出的保证。”^① 1950年5月，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要求成立一个建立在旁遮普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旁遮普邦。^② 塔拉·辛格声称，除非有一个满意的忠诚的锡克社会群体，否则一个和睦的印度是不可能的。由于国大党反对阿卡利党的要求，导致大批锡克离开国大党和阿卡利党与国大党长达两年半的合作关系的破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7月初，阿卡利党再次公开发表声明敦促加入国大党议会党团的锡克议员退出国大党。

1950年的12月16日，在塔拉·辛格主持下，各锡克组织在阿姆利则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为了推动各个不同的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30页。

^② 德文德尔·帕尔·桑都：《印度政治中的锡克：一个少数民族的研究》，新德里，1992年，第89页。

社会群体的健康发展，应该在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划定省的边界。阿卡利党前主席萨达尔·胡卡姆·辛格说：“今天锡克人所要的只是一个受尊敬的和有尊严的公民资格。他们不期望任何对他们的偏袒，也不要任何让步。他们只希望得到保护，不受教派多数的专制统治，他们有权成为这个国家的守法的公民。”^①

然而，在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一事上国大党态度十分坚决，国大党人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教派的要求。当时任旁遮普邦的国大党主席的帕尔塔普·辛格·凯隆宣布他坚决反对在语言的基础上分裂这个邦。他说此时需要的是扩大旁遮普的边界而不是分裂旁遮普。他也宣布他将领导锡克人反对建立一个语言邦。1950年10月，国大党组织的全印国大党锡克会议也作出决议：“在教派的基础上建立新邦一定会在国家政治中导致分裂的倾向，所有那些希望为国家的统一与强大而工作的人都必须反对它。”^②1950年底被锡克戏称为“民族主义者”的乌德海姆·辛格·纳高克、古尔迪亚尔·辛格·迪隆、苏尔吉特·辛格·马吉斯亚、索汗·辛格·贾拉尔乌斯曼和吉亚尼·宰尔·辛格等加入国大党的锡克在阿姆利则召开了一个对抗阿卡利党的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③同时国大党政府采取了强制的手段和镇压措施，逮捕阿卡利党领导人及其工作人员，并且发布命令禁止在旁遮普省任何地方举行集会。

1950年11月，所有印度教政党在阿姆利则举行大会。圣社是旁遮普邦中反对成立语言邦最激烈的印度教派组织。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一直否认锡克教是一个单独的宗教，否认锡克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34页。

② 凯拉斯·钱德·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156页。

③ 凯拉斯·钱德·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203页。

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印度独立以后，它以将锡克从印度政治中消除掉，将这个群体完全吸收进印度教作为它的目标。基于“印地语，印度教和印度斯坦”原则，他们甚至反对使用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圣社领导人瑞伊·巴哈杜尔·拉拉·巴德里·达斯在发言中，对萨恰尔方案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方案在宣布之前，在这个影响儿童的重要利益的事情上是否征询了专家的意见。然而可以肯定公众没有得到政府的信任。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上，政府匆忙地作出了不恰当的决定。”在谈到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时，他说“另一个并且可能也是最激烈的要求是赞同一个旁遮普语言省。这个要求同样遭到锡克以外的人的激烈反对。在这里，这个要求又一次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没有谈到经济的和其他任何益处。这个运动得到可怕的手段的支持。没有人试图向这个省的非锡克人谈到一个分裂的省的好处。我们是旁遮普人并且早已经有了一个以旁遮普为名的省份。（阿卡利党的）想法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得到不能为理性所支持的东西。这已经在人民中引起了愤怒和分裂。”^① 印度教徒的圣社和旁遮普的印度国大党在语言邦问题上与锡克是如此的对立，使得锡克和印度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裂隙增大了，两者之间似乎已处于战争状态。

在 1951 年初印度人口调查时，旁遮普的圣社成员以及其他包括旁遮普国大党在内的、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和态度的人，开展了一场说服印度教徒否认旁遮普语为他们的母语，登记印地语为他们母语的运功，想以此消除要求阿卡利党建立一个说旁遮普语言邦要求的语言依据。他们试图通过表明旁遮普的大多数居民的母语甚至不是旁遮普语这一点，力图将锡克阿卡利党的要求说成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33页。

是一种本质上的教派要求。旁遮普国大党中的许多印度教徒像斯里·维伦德拉、拉拉·贾格特·纳瑞因和瑞伊·巴合杜尔、拉拉·巴德里。达斯等人都在这一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些人中有一位还一度担任过旁遮普邦国大党组织的总书记。围绕语言问题，旁遮普的教派之间的气氛十分紧张，许多地区发生了教派冲突。在贾兰德哈尔的一个村庄中甚至有人为此而丧命。^① 当时的印度政府内政部长拉贾戈帕拉查里在人民院不得不承认“在人口调查前后，在旁遮普及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在语言问题上出现了一场争论。”^② 这种严重的威胁政治安定的局面使得印度总理不得不指示在所有的人口调查中取消语言登记一栏。

三、语言邦问题上斗争的激烈化和地区管理方案

随着印度各地语言邦运动的广泛开展，在旁遮普要求建立语言邦和反对建立语立邦的斗争也风潮不断。1951年以后围绕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整个旁遮普省和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内各派别各个组织和各个政党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一个是由大多数锡克人以及部分印度教徒组成的，支持旁遮普语言邦；另一个是由圣社、人民同盟和国大党领导的所有组织，反对建立旁遮普语言邦。这一时期的形势正如《印度时代》一位记者所说的：“无可否认，大多数锡克对国大党感到愤怒，特别是在旁遮普所谓的国大党人一直对锡克教徒和锡克教徒的一切主张怀有敌意。他们反对旁遮普语的态度是毁灭锡克耐心的最后一击。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大党人，没有一个最高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值得去理解锡克的观点或者高举和平的橄榄枝。”^③

^① 凯拉斯·钱德·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157页。

^②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年》，朱朗达尔，1985年，第134页。

^③ 《印度时报》，1951年8月15日。

1952年，根据印度新宪法进行了全印第一次大选。在竞选中阿卡利党以建立语言邦作为竞选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阿卡利党的竞选宣言宣称：“在阿卡利党看来，对民主的真正考验是应该使少数民族感到他们是真正自由的，并且在决定他们的国家命运上是一个平等的伙伴。为使锡克具有这种自由的感觉，建立一个旁遮普语和文化的邦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实践国大党独立之前的纲领和誓言，而且也与主导联邦各省重新组建的普遍被认可的原则完全一致。阿卡利党支持在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全印各邦，但是它认为对锡克而言，立即建立一个新旁遮普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阿卡利党有理由认为一个旁遮普语言省能够给锡克带来所需要安全感。”^①

在竞选运动中，阿卡利党领导人塔拉·辛格同以前一样树起了教派的旗帜，作为向锡克诉求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一个政治动员工具。他在竞选中只有一个口号：“锡克教！锡克教！锡克教！”在一篇演说中，他宣称阿卡利党认为一个说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是保持锡克人独立存在的最佳方式。在这样一个邦中，锡克人将占大多数并因此在立法机构中避开印度教徒的统治。他宣称印度教徒是狂热的教派主义者，在印度教徒的统治下锡克不可能得救，因此为了宗教、为了文化、为了锡克社会、为了高举师尊的旗帜，锡克已经让他的狮子们为争取独立而工作。^②他宣称希望将锡克从印度教徒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强调在印度应该有一块地方，在师尊的诞辰日，锡克队伍在街上行进，锡克旗帜同国旗在政府的建筑上一起飘扬。锡克应该有一个能够根据他们的想法和传统决定他

^①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295页。

^② 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36页。

们自己命运的自由环境。^①

但是，语言邦鼓动并不符合当时旁遮普的实际形势。与印度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此时的旁遮普刚刚经历分治不久，它所需要的是重新安置大量难民和尽早恢复生产，经历了分治，旁遮普已经由余粮邦变成了缺粮邦。占锡克人口的大部分的贾特锡克农民此时正处于重建家园的阶段，教派政治导致的分治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印度政府对他们的安置，使得他们又有了土地，尽管与在西旁遮普相比，数量上少了许多，质量也差了许多，但是负责安置农民难民的邦国大党和印度联邦对他们是尽了很大力量的。对此他们是感激的，并且希望保持安定的环境。此时，阿卡利党主要由从事工商业的城市锡克领导，塔拉·辛格就属于来自拉瓦尔品第的城市难民锡克教徒，对城市难民的安置是由印度中央政府进行的。锡克城市难民到东旁遮普之后面临与原有的印度教徒工商业者的竞争，他们多属小本经营者，没有多少经济实力，在与印度教徒工商业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处境与农民相比，更加困难，他们认为政府忽视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他们惟一的出路是读书受教育，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必须确保这些工作职位能够超过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因此他们政治上的要求更加迫切。此外，都市锡克在从事农业的锡克贾特中影响十分有限。他们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没有多少交往，在经济利益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加之此时国大党有力地维护了反教派主义立场，更多的乡村锡克领导人留在国大党内，他们认为阿卡利党的鼓动确实是具有教派性质的，所以阿卡利党的鼓动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阿卡利党领导人无法打着教派的旗帜获得政治上的回报，尽管他们维护锡克利益方面比一般的锡克看得远一些。在 1950

^① 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36页。

年进行的邦立法会议选举中，阿卡利党甚至在锡克人占多数的地区也不是国大党的对手。最后这个邦的 126 个议席中阿卡利党只赢得了 13 个席位。

阿卡利党在邦立法议会竞选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语言邦的鼓动，相反他们希望成为“这个国家的命运的自由的平等的伙伴”的愿望更加强烈。^① 1952 年 10 月，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后，在印度各地要求组建语言邦的声浪中，阿卡利党加强了要求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鼓动。

1953 年由于安得拉邦争取语言邦斗争的胜利激发了印度各地新一轮争取语言邦的高潮。为此印度政府不得不成立邦重组委员会，就各个地方成立语言邦的要求进行调查。像其他地方一样，旁遮普省的阿卡利党、圣社、人民同盟、旁遮普政府和旁遮普省国大党委员会以及许多个人都向该委员会递交了备忘录。阿卡利党的备忘录要求以旁遮普语为基础将旁遮普、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以及拉贾斯坦的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合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该备忘录中强调旁遮普有一个富有特色的共同文化，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因此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邦。它指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将会有下列好处：它将是一个地理上紧密连接的单元，财政上可以支持的、粮食上有剩余的、资源上丰富的邦；将消除目前旁遮普所有骚动不安的起因，消除语言争议，能够使用母语教育，有助人民成长与进步；它将是一个勤劳的人民居住的并具有一致性的邦，因此将能够加强西北边境的国防力量；它的成立能够为这个国家赢得一个满意的锡克群体。^② 阿卡利党利用 1947 年以前的人口统计数据，小心谨慎地准备他们的严格地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方案，争辩说：旁遮普语的人口有近 1200 万，范围达 3.5

① 凯拉斯·钱德·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 年，第 157 页。

② 邦重组委员会报告，新德里，1956 年，第 141 页。

万平方英里。其中锡克人远不到一半，因此，这决不是一个教派要求。

而大旁遮普协会、圣社、人民同盟、旁遮普国大党委员会、以及许多个人则向该委员会提出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备忘录。其中的主要观点是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将是分裂国家的第一步，它将进一步加剧教派间的紧张气氛；旁遮普语仅仅是印地语的一个方言而已。圣社和人民同盟这两个组织在他们提出的备忘录强调旁遮普邦不是单一旁遮普语言构成的语言邦，因为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的“母语”是印地语，他们喜欢天城体字母的印地语而不是用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作为教育媒介。他们鼓吹将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以及喜马偕尔，甚至还包括北方邦的一部分行政区，与旁遮普邦合并成立一个大旁遮普省。他们宣称语言邦的要求只是成立一个锡克人占多数的邦的计谋；他们担心这样一个邦的建立最终将导致这个邦的分离和印度国家的瓦解；他们坚持旁遮普的语言实际上是印地语，与印地语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的旁遮普语只是它的方言；最后他们为了反对旁遮普语言邦，替他们的让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将母语登记为印地语的行为辩解，竟然荒诞地宣称每一个印度公民都有权“选择”他的“母语”。^①除了向邦重组委员会递交他们的备忘录之外，同“旁遮普语省”的鼓动者们一样，“大旁遮普”的鼓吹者还使用出版物、举行示威、集会、演说等方式宣传他们的观点。

旁遮普邦政府在给邦重组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支持成立大旁遮普的要求，理由同印度教徒的国大党人一样。在 1954 年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的中期选举中，印度总理尼赫鲁重申他坚决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不过成立大旁遮普省的动议却不受喜马偕尔邦和旁遮普哈里亚纳的地方领导人的欢迎，他们希望在各自

^①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 年，第 189 页。

的地区成立单独的邦，因此他们支持成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在旁遮普实力较弱的印度共产党和人民社会党则支持在语言的基础上将旁遮普省和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合并成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①

1954 年阿卡利党与印度共产党结成竞选联盟，参与 1955 年初的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在竞选中以建立语言邦为主要纲领。国大党组织了一个名为卡尔萨党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与之进行竞争，在竞选过程中国大党动用了所有的官方机器，但结果仍以失败告终。在选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像国大党组织的卡尔萨党输得那样惨。国大党的卡尔萨党参加了 132 个席位的竞选，结果只赢得 3 个席位。阿卡利党参加了 112 个席位的竞选，全部获得胜利，阿卡利党大获全胜。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素有锡克议会之称，不仅具有强大的宗教影响，而且掌握大量的金钱，还可以对政治发挥有效的影响。阿卡利党的胜利，表明他们的主张得到锡克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无疑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这样它争取语言邦的热情更加高涨。阿卡利党的小分队到处进行宣传和游行，鼓动人们起来支持旁遮普语言邦。为了赢得锡克大众的支持，他们还提出了许多有关印度政府歧视锡克人和干涉锡克人事务的指控，尽管许多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这样在邦重组委员会仍在考虑在语言基础上重组印度各邦的时候，旁遮普已经被一场支持和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口号战搅得天昏地暗。在以阿卡利党为一方和以圣社等组织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集团之间，这种语言邦的支持与反对很快演变成锡克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教派对立，呼喊反对锡克或者反对印度教徒的口号成了这种集会上的普遍现象。旁遮普邦国大党政府也卷入其中，首席部长比姆森·萨恰尔指责塔拉·辛格本质上是想要一个锡克

^① J.S. 巴拉尔：《旁遮普的共产主义政党》，新德里，1989 年，第 148 页。

邦。1955年4月6日，旁遮普邦政府决定禁止呼喊任何与旁遮普语言邦有关的口号。

阿卡利党认为这个禁令本质上就是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既然合法的宪政手段已经失去了作用，于是它决定重新拾起政治鼓动的斗争方式。1955年4月24日阿卡利党在阿姆利则通过决议，表示除非政府在1955年5月10日前撤消这个禁令，否则他们将进行一场和平的坚持真理运动以获得他们呼喊支持旁遮普语言邦口号的权利。邦政府没有作出退让，也没有取消禁令。在这场运动达到一定规模之前，国大党邦政府逮捕了上千名阿卡利党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1955年5月10日，塔拉·辛格和其他10人因违令呼喊口号而遭到逮捕。在被逮捕之前，他向集结在金庙的锡克民众发表演讲，说：“啊，狮子们！我们要求自由，他们却想将我们诱入更深的遭受奴役的陷阱。我们不满意于目前的形势，要求一个语言邦，但是他们竟然连我们对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宣传都不让。他们已经发布禁令禁止我们呼喊支持旁遮普语言邦的口号。卡尔萨先生们！记住，这是要结束我们的荣誉。而荣誉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果这个也丧失了，一切都丧失了，因此请你们为了保持我们的荣誉而献出一切！我们应该向古鲁泰格·巴哈杜尔一样平和地伸出我们的头颅。尽管面对的是一个傲慢的统治者，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位师尊。”^①不可否认，阿卡利党这一正义要求吸引了来自乡村的锡克的大量支持和各个政党的支持。^②

在斗争中，阿卡利党号召它的自愿者以自愿被捕的方式抵制政府的禁令。大量锡克民众从四面八方前往阿姆利则主动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于是组织者将参加坚持真理运动的人数从每个集团

^① 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第242页，普林斯顿，1966年。

^② 《论坛》，1955年6月16日。

50 人扩大到 100 人。大量的锡克不仅来自旁遮普各地，而且来自印度各地。他们一起涌向阿姆利则金庙里的阿卡尔·塔哈特宫。后来成了阿卡利党领导人的法特赫·辛格在他的一生中首次加入了这场斗争。

邦政府的对策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这场运动。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武器许可证被吊销，并被要求交出用来保护金庙财产的武器。由于金庙管理人拒绝交出武器，1955 年 7 月 4 日。警察进入金庙建筑，停止了锡克的共食制，进入了古鲁兰姆·达斯殿堂，逮捕了金庙和阿卡尔·塔哈特的主持僧，攻击阿卡利党的办公机构，对结集在金庙广场上表示抗议的人群和自愿者们使用催泪瓦斯；政府命令军队在金庙周围的市场和街道上巡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吓住阿卡利党人和锡克群众。政府武装进入金庙一事更伤害了锡克民族的宗教感情，激起全体锡克民族的愤怒，使得这场坚持真理运动更加高涨。到了 7 月初，包括阿卡利党领导人、主要工作人员和所有阿卡利党邦立法会议议员在内的近 8000 名自愿者被政府逮捕。到政府取消禁令时，共有近 12000 名锡克被政府拘捕。这场运动规模如此之大，使得旁遮普政府难以应付，为了这些被捕的人吃上饭，政府的财政都感到十分紧张。

另外，阿卡利党要求政府废除关于语言邦口号禁令的要求，还得到了旁遮普哈里亚纳地区印度教徒领导人的支持。斯里·拉姆·沙尔马和乔杜里·斯里·钱德在印度语言邦会议西北组别的地区委员会上，提议通过了这样一个议案：“本委员会认为，在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重组邦的要求和它的宣传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和组织的权利。旁遮普政府……的禁令是绝对不公正的和不符合宪法的。”^①

在对待阿卡利党鼓动的处理方式上，邦政府和国大党内部发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第 137 页。

生了分裂，主张与阿卡利党和解的一方最终占据上风。7月12日旁遮普邦政府以庆祝尼赫鲁海外和平之旅圆满成功为由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锡克鼓动者。数日后邦首席部长萨恰尔访问阿卡尔·塔哈特，表示他个人对警察进入金庙，亵渎锡克宗教圣地的歉意。不久，萨恰尔失去了首席部长职务，让位给了他的政治对手普尔塔普·辛格·凯隆。阿卡利党也就逐渐停止了长达64天的反对政府的和平的坚持真理运动。

然而阿卡利党在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选举中所获得的胜利，以及它所发起的支持旁遮普语言邦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没能够打动邦重组委员会。邦重组委员会将旁遮普问题看成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认为“旁遮普语言邦要求遭到了大部分说旁遮普语的民众，以及被提议要包括进旁遮普语言邦内的地区民众的强烈反对。”^①因此这个语言邦问题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性的问题，应该用它自身特殊历史背景对它进行检查。^②这个委员会不认为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是有理由的，无论是说旁遮普语言还是说印地语，当地居民都能够很容易听懂和理解。在这个委员会看来，“旁遮普的语言问题主要是字体问题，在这场字体斗争中，一种感情被用来反对另一种感情”^③委员会还认为旁遮普问题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是一种宗教的感情被安排反对另一种宗教的感情，重新划分领土并非解决之道。^④邦重组委员会最终拒绝了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并指出了它的许多缺点：“它缺乏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众的普遍支持；它不能消除任何产生出建立一个单独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的矛盾起因；拟议中的邦既不能解决

^①事实上，那些人大部分已经宣称印地语是他们的母语。一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第121页注17。

^② 1955年邦重组委员会报告，新德里，1956年，第141页。

^③ 1955年，SRC报告，1956年，新德里，第143页。

^④ 撒提亚·M. 瑞伊：《分治以来的旁遮普》，第292页，德里，1986年。

语言问题也不能解决教派问题，也不能消除那种存在于教派之间的而不是语言和地方集团之间的紧张。建立语言邦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现存的情感。”^①

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承认旁遮普语言邦的鼓动已经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教派关系的激化现象，和印度教徒中很大一部分人否认旁遮普语为他们的母语的现象。邦重组委员会以旁遮普的大多数人不接受古鲁穆克体为由，反对阿卡利党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这个“大多数”实际上是旁遮普省的旁遮普语地区的印度教徒。因为旁遮普的哈里亚纳地区是希望成立单独的哈里亚纳邦的。并且就民众支持和组织力量而言，争取建立一个单独的哈里亚纳邦的运动一直伴随着旁遮普语言邦运动。虽然建立一个单独的哈里亚纳邦要求在 1954 和 1955 年在邦重组委员会面前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哈里亚纳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但是邦重组委员会也毫不动心。因此可以说，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印度教徒反对旁遮普语的“情感”赢得了胜利。此外，该委员会还建议将喜马偕尔邦和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以及旁遮普邦这三个邦合并成立一个大旁遮普邦。^②理由是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太小，自身无力生存下去。这三个邦在管理上和经济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将它们合并为一个邦是完全合理的，可行的。

邦重组委员会的报告使所有支持成立旁遮普语言邦、哈里亚纳邦和喜马偕尔邦的人普遍感到失望。它在阿卡利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报告发表的次日，阿卡利党发表声明拒绝这一报告。阿卡利党宣称，这个报告是一个消灭锡克民族的阴谋。邦重组委员会已经将“锡克从头到脚捆绑起来让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教派集

① 1955 年 SRC 报告，新德里，1956 年，第 146 页。

② 1955 年 SRC 报告，新德里，1956 年，第 258 页。

团去奴役。”^①锡克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抨击这个报告。阿卡利党主席塔拉·辛格称这个报告是“灭亡锡克”判决书。^②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的首席部长称这个报告是敲响“这个社群（锡克社会）的丧钟”。^③吉亚尼·卡塔尔·辛格指出在印度宪法中被认定为“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的 14 种语言中，有 13 种语言已经在各自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了语言邦，惟独没有能够在旁遮普语言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旁遮普语言邦，这是因为人们怀疑锡克的忠诚。^④萨达尔·胡卡姆·辛格 1955 年 12 月 17 日在人民院就邦重组问题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事情从来没有被从价值上进行考虑，在我们的领导人的思想中，也因此在我们的国人的思想中具有潜在的疑虑：认为我们不忠于这个国家，认为我们有邪恶的意图以及认为我们与一些外国势力有联系。……”^⑤塔拉·辛格于 1955 年 10 月 16 日召集了一个所有锡克人政党和组织参加的大会，与会者代表锡克社会的各个阶层，总人数有 13000 多名。大会认为“这个委员会（邦重组委员会）的建议看来就像是最偏激的党派能够希望的那样是一个带有偏见的建议。”^⑥塔拉·辛格在会上说这个委员会的做法对锡克极其不公正。大会要求印度政府保护少数民族，不要考虑邦重组委员会的有关重组印度西北地区带的建议，找出使喜马偕尔邦和哈里亚纳人民完全满意的方法和途径。大会授权阿卡利党主席塔拉·辛格采取恰当的步骤向印度政府传达锡克的观点和情感，代表锡克人与印度政府进行交涉，并且要求他们履行其对锡克的责任。塔拉·辛格则宣布不允许建立旁遮普语言

① 《论坛》，1955 年 10 月 7 日。

② 《政治家》，1955 年 10 月 19 日。

③ P.K. 沙尔马：《印度邦重组的政治方面》，新德里，1969 年，第 205 页。

④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100 页。

⑤ 印度人民院辩论，第 X 卷，第 22 号，1955 年 12 月 17 日，3004—3005 页。

⑥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 年，第 191 页。

邦就是对锡克的歧视,并且威胁要发动一场“斗争”,而印度教徒则在圣社和人民同盟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保护印地语”的运动。这导致旁遮普许多城镇发生骚乱。当然阿卡利党的鼓动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一年后大选即将来临,他们很清楚虽然来自旁遮普南方地区和来自阿姆利则地区的锡克小农或者自耕农大量参加了旁遮普语言邦的鼓动,但是并不能保证在议会选举中他们就支持阿卡利党。事实上,1954年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的中期选举就说明锡克在鼓动中支持阿卡利党并不意味着同时在政治上也支持阿卡利党。除了语言邦外锡克还要求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在经济议题上,在普尔塔普·辛格·凯隆面前,阿卡利党无能为力。

凯隆本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阿卡利党的一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塔拉·辛格等离开国大党后,他仍留在国大党内。50年代初,他在旁遮普国大党内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只不过由于尼赫鲁和阿扎德的干预,萨恰尔才被选为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凯隆作为邦的发展部长和萨恰尔分享权力。同时凯隆继续在邦国大党内议员中和地区一级的国大党组织中增加个人的权力基础。到了1955年国大党内权力平衡终于被打破,凯隆成功地在哈里亚纳地区扩大了他的支持基础,使得在旁遮普语地区得到印度教徒支持的坚定的圣社成员拉拉·贾格特·纳瑞因的力量变得无足轻重^①。萨恰尔内阁没有能够处理好1955年的鼓动,印度教政治家贾格特·纳瑞因在锡克政治鼓动上的异常明显的印度教教派立场,使得凯隆占据政治优势。尽管他像萨恰尔和纳瑞因一样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然而与前两者不同的是,他也反对将喜马偕尔并入旁遮普。为了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和有效地对付阿卡利党的鼓动,经过尼赫鲁的直接干预,1956年1月,凯隆成了旁遮普的首

^① 帕尔·华莱士:《旁遮普邦的政治制度:派系主义研究》(博士论文),加州伯克利,1966年,第217页。

席部长。在他任发展和重建部长期间，凯隆就采取了许多提高乡村生活水平的发展计划。在任首席部长之前，他已经在邦国大党主席位置上呆了 3 年，他让许多来自乡村地区的锡克农场主担任了国大党内的职务。在担任首席部长之后，他为了获得锡克农场主的对他的支持(当然也是间接地对国大党的支持),宣布“我是自兰吉特·辛格大王以来第一个在旁遮普将权力带给贾特的贾特。”宣布他才是锡克利益的真正的代表。他将塔拉·辛格的阿卡利党说成是来自拉瓦尔品第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利用锡克对商业阶级本能的厌恶，获得他们对国大党的支持，因为在贾特心目中，那个地区的商业阶级与以牺牲农场主利益获取金钱的含义是一致的。凯隆担任首席部长直到 1962 年，此时由于国大党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凯隆主持的邦政府所实施的政策措施，旁遮普经济一片繁荣。在经济上，凯隆本人得到了广大锡克的支持和信任。塔拉·辛格在经济上缺乏动员锡克的能力，考虑到与经济利益相比，文化利益在锡克心目中相对较轻的地位，片面地鼓动不可能长期进行下去，他也希望与政府能够达成一定的妥协。^①

1955 年 11 月 23 日。以塔拉·辛格为首的五人代表团与尼赫鲁、阿扎德和 G. B. 潘特进行会晤。与塔拉·辛格一起的锡克成员有吉亚尼·卡塔尔·辛格、胡卡姆·辛格、吉亚尼·辛格·瑞尔瓦拉和巴依乔德·辛格。他们经过会谈没有能够立即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另一个代表旁遮普政府的代表团会晤了尼赫鲁总理，建议为解决语言问题，让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方案扩大到旁遮普，使旁遮普语能够在全邦得到推广。国大党决定在 12 月阿姆利则年会召开之前考虑这一方案。为了对国大党施加影响，阿卡利党也决定同时在阿姆利则举行他们的会议。“大旁遮普”鼓吹者们也

^① 乔伊斯·佩蒂格罗：《抢劫贵族：锡克贾特政治制度研究》，新德里，1978 年，第 90 页。

作出同样的决定。在此期间，所有集团都举行游行示威作为显示民意的方式，以此影响国大党政府的决策。阿卡利党领导的游行声势极为浩大，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巨大的压力下，尼赫鲁准备对锡克作出一些让步。

此前作为锡克领导人之一此时已被尼赫鲁收服的胡卡姆·辛格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既可以满足阿卡利党一些要求，又不用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它表明阿卡利党还是愿意进行妥协的。这个方案也为坚决反对成立语言邦的尼赫鲁所青睐。这个方案便成了 1956 年 1 月尼赫鲁和塔拉·辛格在德里进行会谈的基础，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之后，在 2 月底之前双方达成了一项协定。这就是处理政治和管理问题的地区方案。这个方案本身是一个以圣社为首的将喜马偕尔、旁遮普和帕提亚拉及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合并成为一个大旁遮普邦的主张同阿卡利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主张之间的妥协产物。方案只是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与旁遮普邦合并成为一个新的旁遮普邦，而不将喜马偕尔邦合并进来。根据这个方案：旁遮普和帕提亚拉及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合并成为一个单独的双语邦。有单一的邦长、内阁和立法会议，公共服务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同时为了有助于政府事务的运作，新的旁遮普邦被分成两个地区，一个是印地语地区，一个是旁遮普语地区；对于每一个语言地区将有一个由邦立法会议任命的地区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将包括各个行政区的部长们，但是首席部长除外；14 项有关专门事务的立法将被提交给地区委员会，它也能够向邦政府提交立法方面的建议。由地区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一般将为邦政府和邦立法会议所接受，但是如果遇到意见分歧，将提交给邦长，他的裁决具有最终的效力；此外地区委员会也将处理一般发展计划中的发展与经济计划。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初级和中等教育、农业和家庭工业和小工业、家禽业和渔业、合作社和慈善的及宗教的机构等方面的事务。

在语言方面，印地语和旁遮普语地区的划分，将在邦政府和其他与之有相关利益的人群之间进行协商后完成。印地语和旁遮普语将同时被看作这个邦的官方语言，在行政区层面和更下面各个行政单位中，每一个地区的官方语言将是地方语言。^① 根据这一协定，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在旁遮普语地区是官方语言。为了促进旁遮普语和印地语的发展，旁遮普邦将建立一个单独的机构处理这方面的事务，联邦政府承诺将像鼓励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语言一样鼓励旁遮普语。在其他方面达成谅解的还有：有关表列种姓的法令被修改并将平等地用于印度教和锡克教的表列种姓居民。政府不干涉锡克寺院的内部管理，政府保证在修改有关锡克寺院法的问题上将尊重锡克意见。针对阿卡利党提出的政府对锡克的不公平待遇问题，政府表示对锡克公务人员的明显的不公正行为将会得到它的富有同情心的调查和改正。地区方案原则上是一个政治行政管理方案而不是一个教育方案。在教育上它保留了旁遮普邦和帕提亚拉及东旁遮普土邦联盟合并之前各自地区所实行的方案。地区方案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旁遮普邦教育语言的语言区划分原则扩大到了两个语言区的行政事务管理上。根据这个协定，无论是锡克还是印度教徒，即使在邦立法会议中不占多数地位，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地方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就可以在 14 个项目上实施保持和促进锡克或者印度教徒各方面利益的计划。^② 1955 年 3 月 11 日，在阿卡利党的全体大会上，锡克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接受这个方案。3 月 22 日，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也一致赞成旁遮普邦的重组方案。塔拉·辛格认为这个方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锡克的要求。1956 年 11 月 1 日，一个

^① 普拉麦德·库马尔：《旁遮普危机：背景和趋势》，昌迪加尔，1984 年，第 103—104 页；撒提亚·M. 瑞伊：《旁遮普的分治》，孟买，1965 年，第 274—275 页。

^② 《论坛》，1956 年 3 月 16 日。

由帕提亚拉及锡克土邦联盟和东旁遮普邦组成的新旁遮普邦宣告成立。1957年11月4日，根据印度总统发布的有关旁遮普地方委员会法令，旁遮普被划分为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和说印地语的地区。

旁遮普阿卡利党与印度国大党之所以能够达成一个地区协议，主要原因是：就政府方面而言，第一，阿卡利党在1955年的力量显示使得国大党人相信前者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地方政治势力。尽管许多锡克赞成国大党在旁遮普的经济政策，但是在文化上，国大党对锡克缺乏号召力，它能够对国大党在锡克农民和商人中的支持基础构成威胁。第二，在塔拉·辛格领导下，锡克民众保护传统的锡克文化的意识在不断加强。根据印度邦重组法，印度的15种主要语言中只有旁遮普语没有获得单独的语言邦，而且在争取旁遮普语言邦的过程中，教派矛盾被不断激化，锡克对自己的文化特质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新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而减弱，政府担心强硬的立场会使一个单独的锡克邦的要求会被复活。第三，对于冲突的解决而言，协商政治是国大党的主要政治指导原则，在可能的范围内国大党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阿卡利党也是如此。此外，尽管那些加入国大党后的阿卡利党人很少有离开国大党的，但是在国大党内的锡克对锡克社团的要求也常常持支持态度。^①而就阿卡利党方面而言，首先，阿卡利党方面的要求通过地区协定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其次，阿卡利党领导人很清楚，在国大党邦政府领导下，经济上处于上升势头的贾特锡克对政府的不满并不像他们那样强烈。他们没有必要在政治上冒险。地区方案能够保证阿卡利党的领导人在锡克中得到支持。

阿卡利党锡克领导人认为地区方案可以消除锡克忧虑，阿卡利党在语言邦问题上的努力，虽然未能使政府接受他们成立语言

^① 普拉麦德·库马尔：《旁遮普危机：背景和趋势》，昌迪加尔，1984年，第42页。

邦的要求，但是通过地区方案实际上也同样能够达到促进以旁遮普语为母语的锡克在政治管理和文化教育方面发展的目的。阿卡利党在政治上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未来的阿卡利党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个失去目标的组织将很快就会瓦解，它必须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制定出新的纲领。前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的首席部长吉安·辛格·瑞尔瓦拉此时公开提出，阿卡利党的政治目标既然已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离开政治舞台，专门从事促进锡克的社会、文化、教育及宗教方面发展的活动，同时允许它的成员和支持者加入到民族国家的进步力量中。他开始与国大党领导人谈判让阿卡利党并入国大党的可能性。起初，阿卡利党领导人塔拉·辛格对此坚决反对，但是鉴于乡村锡克日益倾向于支持国大党，他本人最后也决定与国大党谈判进行政治合作。1956年10月2日，在塔拉·辛格主持的阿卡利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认为“就国大党的政治纲领而言，本党认为再一次对国大党和它的领导人寄予信任是值得的，它决定党将完全致力于锡克的宗教、教育、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利益。”^①同时它将积极参加地区方案和这个国家的各种发展计划的实施。塔拉·辛格宣布他永远不会背弃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也称赞塔拉·辛格的勇气和诚意。在1957年的第二次选举中阿卡利党作为国大党的一部分参加了竞选。在帕尔塔普·辛格·凯隆的领导下，国大党赢得了足够的票数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如果新的旁遮普政府能够以合作和谅解的态度认真地实施地区方案，那么对于促进锡克与印度国家的整合而言，它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可惜，国大党的旁遮普政府却没有能够将交到它手中的信任使用好。结果反而使事态逐渐恶化，

^① 阿马尔吉特·S. 纳朗：《民族发展与扭曲》，新德里，1986年，第36页。

促成语言邦的再度提出。

第三节 拯救印地语运动与 语言邦鼓动的再起

1956年11月，新的旁遮普邦成立，根据印度政府的合并原则，原旁遮普省的首席部长继续担任首席部长，于是帕尔塔普·辛格·凯隆继续领导这个新邦。在他的领导下，阿卡利党立法会议员全都加入了国大党。其中吉安·辛格·瑞尔瓦拉和吉亚尼·卡塔尔·辛格还进入了凯隆的内阁。然而国大党与阿卡利党的联盟是短命的。在大选时，没有加入国大党的塔拉·辛格因为没有人同他协商候选人的提名而感到不满，他不顾阿卡利党已经合并入国大党以及它的候选人以国大党的选票竞选的事实，自行提出了15个所谓的“锡克社团候选人”参加竞选，对抗国大党的提名人。然而在选举中没有一个“锡克社团候选人”能够当选，而加入国大党的26个阿卡利党人却都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在大选结束后阿卡利党和国大党在席位分配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除了已经加入国大党的瑞尔瓦拉集团外，阿卡利党被给予25席，为了在一个89人的地方委员会中获得一个更强的地位，阿卡利党要求得到40席。国大党作了一定的让步，将阿卡利党的席位增加到26席，阿卡利党领导人塔拉·辛格仍不满意。^①塔拉·辛格指责国大党歧视锡克，并且进而宣布阿卡利党从没有放弃政治。萨达尔·胡卡姆·辛格也说：“现在说阿卡利党从未打算避开政治这一点是诚实的。”^②

^① 巴尔德夫·拉吉·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227—228页。

^② 《论坛》，1957年3月31日。

然而，凯隆在他的新一届首席部长任期内遇到的严重挑战并不是来自阿卡利党与国大党之间的权力分享上的矛盾，而是来自印度教教派组织。印度教教派组织不仅没有支持地区方案的实施，反而试图从内到外破坏它。此前，圣社就一直拒绝在他们的学校中执行萨恰尔方案，现在认为地区方案比萨恰尔方案还要糟糕。他们更不能容忍地区方案得到实施。凯隆在他的内阁中吸收了两位著名锡克领导人吉安·辛格·瑞尔瓦拉和吉亚尼·卡塔尔·辛格，以及来自哈里亚纳的乡村领导人谢尔·辛格的做法让印度教徒教派势力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印度教社会没有能在凯隆的内阁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权。在国民自愿团和人民同盟的支持下，以圣社成员为核心成立了保护印地语协会。在保护印地语协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发动一场“拯救印地语”的坚持真理运动，他们到处宣扬“印地语在危险中”。这场运动得到了像苏尔拉吉·巴汉和圣社政治家维伦德拉的支持。前者是朱朗达尔的 D. A. V. 学院的院长，后来晋升为旁遮普大学的副校长。后者则是 Pratap 杂志的编辑。保护印地语协会还任命了一位印度教托钵僧斯瓦米·阿特马·南德为这场运动的独裁者。在 1957 年 4 月 30 日，斯瓦米·阿特马·南德在邦政府秘书处前静坐。他提出只有在印度政府满足他们的下述要求后，保护印地语协会才会停止进行保护印地语的鼓动。他们的要求是：政府应该为整个邦制定一个新的方案。孩子接受教育的语言媒介应该完全由家长选择。不应强制教授两种语言以及在任何特别的阶段教授第二种语言；在所有管理层面用印地语取代英语；在行政区级以下的所有政府公文应该是双语的；应该允许使用任何语言递交申请并且使用同样的语言进行答复；在行政区级及其以下部门的官方记录应该是双语的。他威胁政府如果不答应上述要求，政府必将遭遇一场“非暴力”方式的政治运动。圣社的成员和其他组织的队伍开始在不同行政区游行，他们不顾政府禁止游行的禁令，到处为这个运动筹措资金。

这场运动还赢得了原先支持旁遮普语言邦运动的哈里亚纳地区的支持。因为旁遮普语言邦运动领导人曾向他们保证支持在哈里亚纳地区成立一个单独邦的要求。哈里亚纳地区领导反对强制他们的儿童学习旁遮普语，哈里亚纳地区说印地语的印度教徒拒绝了为了整个旁遮普的情感整合而分担语言上的义务。他们认为只要说旁遮普语的人被要求学习印地语，以及只要印地语继续作为这个邦的官方语言，他们就能够在印度和旁遮普只使用印地语，而没有必要学习旁遮普语。^① 印地语协会还使哈里亚纳人民相信，在这个地区方案中，他们的地区利益被忽视，他们将得不到资金上的优先分配。印地语运动反对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作为旁遮普语地区的教育语言和作为印地语地区的第二语言。但是当这个要求失败之后，他们又要求应该允许用天城体字母书写旁遮普语。

与对锡克人鼓动采取坚决镇压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邦内国大党内阁部长们一开始就对这场运动持安抚态度。当时的邦政府主任秘书谢尔·尼科尔·森对新闻界称这些为了改变地区方案而斗争的托钵僧“本质上是好人”。邦政府的财政部长谢尔·莫汗·拉尔在地区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写信给阿特马·南德说“甚至在这个邦的主要是讲旁遮普语的地区，自由使用印地语也是被接受的”并因此请求他们放弃这场坚持真理运动。但是这场运动仍然持续了长达 7 个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本人对“拯救印地语”运动感到遗憾，并且担心它将会导致旁遮普的进一步分裂，但是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②

1957 年 12 月，印地语鼓动之后，凯隆认识到地区方案中语言条款的实施可能使他失去旁遮普语地区和哈里亚纳地区印度教徒

① 《印度斯坦时报》，1960 年 3 月 4 日。

②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邦》，德里，1970 年，第 301 页。

支持友好关系委员会的第二种方案，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锡克领导人吉亚尼·卡塔尔·辛格和吉安·辛格·瑞尔瓦拉。在与党内的各派商量之后，这位首席部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称为统一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天城体印地语和古鲁穆克体旁遮普语在它们各自地区将作为初级阶段义务教育的媒介，第二阶段则强制教授第二语言。^① 这个方案使旁遮普的锡克人感到满意，但是哈里亚纳和旁遮普的印度教徒以及中央国大党领导都不满意，同时这一方案也违背了印度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因此，凯隆的方案遭到了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教徒和印地语集团以及国大党内的达尔巴拉·辛格—亚西—博戈法集团的批评。势态的发展表明国大党无法找到一个令旁遮普三个集团（锡克集团，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教团和旁遮普语区的印度教徒集团）都满意的方案。^② 于是它采取一种拖延政策，对地区方案迟迟不予实施。1960年印度教徒群体各个集团的谈判代表了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暴露了在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和哈里亚纳地区的印度教徒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表面上这两个集团没有利益冲突，因为双方都支持教育语言上最大的自由选择权。^③ 但是，实际上，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认为他们正要变成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的人质。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被强制学习旁遮普语，这样在旁遮普语地区的印度教徒就能够保持印地语作为一个义务教育的语言而在说旁遮普语地区享有特殊地位。^④ 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不愿意改变萨恰尔方案中在印地语地区强制教授旁遮普语的规定，除非旁遮普语在旁遮普语地区得到加强，然而旁遮普语地区的印度教徒反对任何加强旁遮普

① 《印度时报》，1960年7月6日，《政治家》，1960年7月17日，19日。

② 《印度时报》，1960年7月26日。

③ 《论坛》，1960年7月24日。

④ 《政治家》，1960年5月5日。

语的行动。它使得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通过将说印地语的地区与旁遮普彻底分开才能摆脱强制教育旁遮普语的负担。很显然，对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和旁遮普的锡克教徒而言，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利益的。

邦国大党内阁的回避实施地区方案的做法，遭到塔拉·辛格的激烈批评。根据凯隆的声明，即使在旁遮普语地区，印地语的地位也事实上高于旁遮普语。1957年12月之前根本没有根据地区方案建立地区委员会。同时旁遮普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坚实的步骤使旁遮普语成为旁遮普语地区必要的教育媒介。^① 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正如后来阿卡利党的日报《Jathedar》1961年10月所说的：“如果地区方案按照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指导下的中央领导所构想的精神执行，那么旁遮普就不会发生任何麻烦。”^② 1957年5月13日塔拉·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地区方案是锡克和印度政府之间达成的一个协定的结果。那时双方同意萨恰尔方案和帕提亚拉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方案在一个更好的氛围获得之前可以在各自的地区继续执行。让我明确宣布，作为与政府达成协定时一个暂时的措施，我赞同萨恰尔方案，而且我信守这一诺言。”^③ 直到1958年10月之前，阿卡利党的最大的目标就是促使这个方案得到实施。语言邦仅仅是这个地区方案得不到实施时的一个选择。1958年9月16日，塔拉·辛格在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地区方案得不到实施，那么他将被迫重提建立一个旁遮普语省的要求。

1958年10月12日，阿卡利党在阿姆利则召开了一次有关动

①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邦：一场斗争的故事》，第292—231页，德里，1970年。

②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197页。

③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第142页，朱朗达尔，1985年。

议成立旁遮普语省的会议。塔拉·辛格的助手、阿卡利党副主席法特赫·辛格提出了实现旁遮普语言省的计划。他说他们的要求只是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在那儿他们能够发展旁遮普语言和文化并保护他们的宗教。他批评了在地区方案实施上存在的不正常拖延，表示锡克对此已经彻底失望。塔拉·辛格在会上作了同样语调的发言，但他同时提出准备在地区方案没有得到实施和政府违背协定一事上接受中央政府的仲裁。但是中央政府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也没有打算仲裁。

如果说这还不能足以使锡克重提语言邦的话，那么，旁遮普邦国大党政府对锡克寺院管理法的修改使得锡克有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更好理由。出于对阿卡利党的复兴及其对旁遮普语邦的要求的担忧，凯隆和瑞尔瓦拉、吉亚尼·卡塔尔·辛格结成同盟参加 1958 年 11 月 16 日的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选举，与塔拉·辛格竞争，结果以 77 票对 74 票赢得胜利，塔拉·辛格以 3 票之差失去了其长期担任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主席职位。凯隆是通过提出一项在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中容纳帕提亚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代表的修正案获得这一优势的。然而，由于来自国大党之外的锡克的一致反对，1959 年 1 月这个修正案在最终表决时没有得到通过。塔拉·辛格在选举中的失败使得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省的势力大为兴奋，他们认为这是锡克对旁遮普语言省要求的否定。然而，锡克社会将凯隆介入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做法看作是对锡克宗教事务的干涉。因为旁遮普政府提出修改锡克寺院法的做法违背了 1955 年锡克领导人与印度政府达成的谅解原则。于是锡克人保护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热情被再次激发起来。塔拉·辛格宣布锡克将在德里举行一场沉默的游行，并将日期定在 1959 年 3 月 15 日。然而，印度政府在这场游行到来之前就将其投入了监狱。在无人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带有浓厚的锡克文化传统的游行如期进行，此事在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同时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全印宗教会议也通过决议对政府逮捕塔拉·辛格表示极大的不满，并且称这种做法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的。

1959年3月27日，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阿卡利党针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拒绝他们要求仲裁一事，重申了他们自己的立场。1959年4月5日，尼赫鲁总理再次拒绝仲裁的建议，尼赫鲁提出的理由是没有要仲裁的事情。塔拉·辛格宣布他将从1959年4月16日起进行绝食至死行动。在一些政治家的斡旋下，1959年4月11日尼赫鲁邀请塔拉·辛格到德里，向他保证，政府不干涉锡克宗教事务，在修改锡克寺院管理法时事先应得到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认可。此外二人同意任命一个4人委员会，其中两人由旁遮普政府任命，另外两人由塔拉·辛格任命，审查所有被认为是干涉锡克宗教的事情，并且建议采取可能的措施加以补救。双方决定如果在委员会的成员之间产生意见上的分歧，那么将交给邦长。但地区方案的实施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于是塔拉·辛格宣布他决心获得旁遮普语言邦。1959年5月7日，他在卢迪亚纳宣布他将带着这个问题参加1960年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以此表明锡克获得他们的目标的意愿。为了同阿卡利党争夺对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控制权，加入国大党的锡克吉亚尼·辛格·卡塔尔在凯隆支持下成立了一个“Sadh Sangat Board”——一种国大党锡克的共同阵线的组织。1960年1月，三个集团即：阿卡利党、Sadh Bhagat Board 以及与前者有选举同盟的 Desh Baghat Party 准备最后摊牌。就在选举前夕，1959年12月3日，国大党高层领导人决定将孟买邦划分成马哈拉斯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从此在印度所有的邦中只剩下旁遮普邦为惟一一个双语邦，这从另一个方面对阿卡利党的语言邦要求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1960年1月19日，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选举结果揭晓。阿卡利党赢得了总数为139席中的132个席位。受到国大党内阁支

持的 Sadh Sangat Board 只得到 3 席,而 Desh Baghat Board 一席也没有得到。事后塔拉·辛格对新闻界的谈话中强调“尽管政府进行了干预,我们仍然取得了胜利,这表明锡克支持我们对于旁遮普语言省的要求”。^① 1960 年 1 月 24 日,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所有阿卡利党成员在阿卡尔·塔哈特宫举行宣誓仪式,表示要用他们所能够动用的所有资源全心全意地为争取实现旁遮普语省而工作,希望印度国大党高层领导和印度政府认识到锡克社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1960 年 3 月 7 日,塔拉·辛格被选举为阿卡利党的主席。在这次新组建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明确的决议:“旁遮普语言麻烦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在旁遮普语和印地语的基础上将旁遮普一分为二。”^② 同时,阿卡利党决定抵制一个由邦政府任命的 26 人组成的考虑语言问题的委员会。阿卡利党还要求由阿卡利党提名的,根据国大党的选票当选的立法会议议员和人民院议员服从阿卡利党的指示,辞去职务。

5 月 24 日,塔拉·辛格召开了旁遮普语言邦会议,参加者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自由党、人民社会党和统一社会党工作人员及其领导人,潘迪特桑都·拉尔主持了会议的筹备。曾是国大党的著名领导人和印度自由斗争的战士的沙夫德·丁·克其鲁博士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支持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会上所有发言者都一致支持建立语言邦的要求。在与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协商之后,大会宣布 1960 年 5 月 29 日举行从阿姆利则到德里的进军,并且 6 月份要在德里举行一次示威游行。^③

从 1960 年 5 月 20 日,阿卡利党的鼓动日趋高涨的时候起,旁遮普邦政府在首席部长凯隆的指示下,实行对鼓动者严厉镇压政

① 《印度时报》,1960 年 1 月 18,19 日。

② 古尔拉提·凯拉斯·钱德:《阿卡利:过去与现在》,新德里,1974 年,第 169 页。

③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323—324 页。

策，政府使用许多方法折磨和恐吓鼓动者。于是，阿卡利党决定成立一个以塔拉·辛格为首的敢死队。塔拉·辛格在他的讲演中要求锡克人准备进行一场真理斗争，并且准备为之献出生命。^① 为了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凯隆的旁遮普政府根据预防拘留法于 5 月 24 日逮捕了塔拉·辛格，理由是他煽动锡克人反对印度教徒的宗教情绪。^② 同时政府还逮捕了许多阿卡利党领导人。尽管如此，阿卡利党仍然坚持实施它的计划，这导致了过去 10 年来的第二次这种运动。每天有 8 个小队被派往德里，在 Sri Darbar Sahib 建筑外等待政府的逮捕。政府封锁了所有通往金庙的道路，警察逮捕所有从汽车站、火车站以及其他地方前往金庙的锡克，以阻止锡克小分队的坚持真理运动。政府对阿卡利党领导人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阿卡利党的报纸 Prabhat 和《阿卡利》被政府查禁。据称到 1960 年 7 月 25 日，在阿姆利则一地就有 17821 人被捕。^③

这场运动的巨大的声势引起圣社的忧虑。他们害怕政府与锡克再次进行谈判。1960 年 6 月，一个由宗教代表委员会 (Sanatan Dharam Pratinidhi Sabha) 和雅利安代表委员会 (Arya Pratinidhi Sabha) 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面见印度总理，陈述旁遮普语言省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锡克独立邦的一个步骤，因此要求总理加以拒绝。

在塔拉·辛格入狱之前，任命圣法特赫·辛格为锡克“斗争的独裁者”以便当塔拉·辛格无法领导运动时全权领导锡克运动。因此，整个 1960 年的锡克要求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基本是都是由法

① 伊克巴尔·辛格：《阿卡利在旁遮普鼓动的真相》，昌迪加尔，1960 年，第 6 页。

② 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 年，第 250—251 页。

③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146 页。

特赫·辛格领导的。法特赫·辛格与塔拉·辛格浓厚的教派色彩不同，在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他坚持锡克人的要求是一个纯粹的世俗政治要求，而不是什么教派主义的要求，锡克人所要求的旁遮普语言邦同印度其他地区的语言邦要求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是发展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必然要求。法特赫·辛格在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声称“我们不要求一个锡克占多数的地区，我们对（人口）比例并不介意，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由说旁遮普语言的地区组成的旁遮普语言邦，在这样一个地区中锡克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并不重要。”^① 他的这种使语言邦要求世俗化的做法引起其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关注，并逐渐赢得一些政党和集团的同情和支持。

在地区方案达成四年之后，1960年10月2日，旁遮普政府才正式宣布旁遮普语为行政区级的官方语言。但是锡克运动声势未减。大量逮捕坚持真理运动的锡克导致旁遮普政府监狱人满为患。光是供给他们的饮食一项就耗费了政府的大量金钱。由于这个原因，1960年8月15日旁遮普政府首席部长宣布他将释放那些自愿与这场斗争断绝关系的人，但是没有效果。在监狱中警察对锡克实施暴行，引起锡克更大的愤怒。另外，政府为转移乡村锡克的视线，宣布即将举行乡村会议选举。

由于锡克的不妥协态度和政府坚决镇压所导致的锡克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使得整个旁遮普邦局势极具爆炸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社会党主席阿索卡·梅塔在10月30日的声明中警告中央政府，如果不努力寻找出一个和平解决旁遮普语言邦问题的办法，局势将会进一步恶化。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 M.S. 哥瓦尔卡访问了帕提亚拉，对那些宣传旁遮普语不是印度教徒语言的人予

^① KC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与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170页。

以批评，号召印度教徒承认旁遮普语为他们的官方语言。并且说道：“如果语言邦将像印度其余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样，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说旁遮普语的人民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正当要求。”^① 1960年10月，人民同盟领导人也在旁遮普语言及语言邦问题上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他们过去常公开否定旁遮普语为大多数旁遮普印度教徒的母语，同时他们认为旁遮普语“只是一种口语，或者仅仅是一种方言。”

但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始终认为这一要求是教派要求，他对锡克的鼓动极为反感。尼赫鲁在罗德普尔发表讲话，不适当地指责锡克，称锡克社区为“罪犯”社区，骂锡克是“白痴”和“蠢货”，并且要锡克到有旁遮普语言邦的地方去。^② 在1960年10月议会每月一次的例会上他说：“我们将不会有任何旁遮普语言邦，它是一个教派要求，它将被坚决拒绝。”^③ 但他无法回避旁遮普尖锐的语言对立的现实，在独立日讲演中他要求“每一个旁遮普人自己都应该考虑学习印地语和旁遮普语，”^④ 但是不能分裂旁遮普。^⑤ 塔拉·辛格对尼赫鲁的做法针锋相对，他承认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主要动机是“保护锡克宗教和改善锡克的地位。”^⑥ 他对尼赫鲁的这个讲话的反应是“你可以宣布旁遮普语言是全印度的语言，可是那样能够帮助锡克吗？”^⑦

由于政府的坚决镇压政策，鼓动和宪政的手段均告失败。 11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46页。

② 哈尔比尔·辛格：《法特赫·辛格在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上的作用》，引自维林德尔·格罗弗：《印度政治制度》，第4卷，新德里，1989年，第723页。

③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年，第146—148页。

④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197页。

⑤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年，第331页。

⑥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296页。

⑦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296页。

月 1 日,法特赫·辛格宣布为了拯救“披着民主外衣进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已经到了有必要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如果 12 月 18 日之前,政府不答应锡克的语言邦要求,他就于该日在金庙开始绝食以使印度总理接受纯粹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一个语言邦的要求。他在 11 月 2 日给尼赫鲁的信中说:“你已经关闭了所有公正和正义的大门……我无路可走,只有绝食至死以使你能够良心发现。”^① 绝食至死的行动在印度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且不说在印度独立以前圣雄甘地进行的几次绝食,就是独立以后在 50 年代印度著名人物的绝食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法特赫·辛格绝食决定使得吉伊·帕尔卡什·纳兰前往达摩尔萨拉监狱会晤塔拉·辛格,11 月 10 日他又会晤了印度总理,然而尼赫鲁否定了在政府和阿卡利党之间进行妥协和调停的可能性,并且宣称法特赫·辛格可以绝食。

1960 年 12 月 18 日,在大量民众注目下,法特赫在金庙前正式开始绝食斗争,在绝食前他发表了 10 分钟的演讲,他列举在过去 7 个月里旁遮普语言邦鼓动中发生的一切,并且说这些痛苦的经验促使他作出这个巨大的牺牲,他要求锡克在严重的令人愤怒的局势面前保持平静,并且说“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微粒都是我们的,它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损失。”

法特赫·辛格的绝食引起锡克社会的激烈反应,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事件。这使尼赫鲁不得不加以重视,12 月 23 日,在德里举行的一次公共集会上,尼赫鲁呼吁法特赫·辛格放弃绝食并邀请他前往德里进行会谈。在演说中他说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拖延了将旁遮普问题放在适当位置的机会,对此他愿意承担责任。最后他

^① 维林德尔·格罗弗:《印度的政治制度》,第 4 卷,新德里,1989 年,第 723 页。

说：“我郑重地请求法特赫·辛格放弃他的绝食。”对此法特赫·辛格发表了一份愿意修好的声明，“我愿意牢牢握住尼赫鲁先生伸出的友谊和善意之手。”^①

然而旁遮普邦首席部长凯隆同尼赫鲁一样坚决反对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为了消除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可能性，1961年1月4日凯隆将塔拉·辛格从达拉姆撒拉的拘押地释放，表面上是为了让法特赫·辛格能够与他进行协商，实际上是希望消除总理尼赫鲁和法特赫·辛格之间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因为塔拉·辛格的浓厚教派色彩是一向标榜世俗主义的尼赫鲁所不能容忍的。在塔拉·辛格出狱后，那些正建议尼赫鲁接受法特赫·辛格成立一个单一语言邦的提议的人开始感到势单力薄。塔拉·辛格出狱后，法特赫·辛格拒绝和尼赫鲁会谈，而由塔拉·辛格与尼赫鲁会谈。

1961年1月7日，塔拉·辛格与尼赫鲁在巴法那加尔举行了会晤，但是尼赫鲁不接受他的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理由。1月8日，尼赫鲁宣布旁遮普语是整个旁遮普的主要语言，值得在每一个方面加以鼓励。他说，就政府对于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态度而言，不存在对锡克人的任何歧视，他认为这个议题应该从一个合乎理性的角度进行检讨。现在的势态对于锡克社团、对旁遮普、对整个印度都是有害的。^②在他看来，他宣布旁遮普省为旁遮普语言邦宣言满足了关于旁遮普语问题上的大部分要求。^③会谈后，塔拉·辛格向法特赫·辛格发了一份电报，对会谈表示满意，他说语言上的要求已经基本上得到满足，劝他放弃绝食。1961年1月9日，法特赫·辛格放弃了已经长达21天的绝食行动。政府宣布将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48页。

② P.K.沙尔马：《旁遮普语言邦的政治方面》，新德里，1969年，第211页。

③ 凯拉斯·辛格·古尔拉提：《旁遮普的过去和现在》，新德里，1974年，第172页。

所有阿卡利党自愿者——有 30,000 人左右全部释放。

宣布旁遮普省为旁遮普语言邦意味着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为整个旁遮普的邦语言，并赋予它合法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旁遮普印度教徒教派主义者的不满和争议。在 1961 年 6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圣社行动委员会主席和 Vishal Haryana Pradesh Party（大哈里亚纳邦党）的总书记宣布哈里亚纳人民拒绝旁遮普为单一语言邦的决定，并说“让我们在这里严正声明哈里亚纳的人民决不会屈服。”

1961 年 2 月 8 日，法特赫·辛格和尼赫鲁之间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谈。然而由于尼赫鲁坚持锡克的语言邦要求就是教派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了达成任何协定的可能性。谈判的失败，在锡克大众中引起一股失望和沮丧情绪，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人们开始讨论在过去十年内锡克遭受那么多伤害和牺牲的情况下却一无所获，应该如何采取新的步骤。在 1942 年的退出印度运动中整个印度被逮捕的人数不超过 3.1 万人，而锡克在过去的十年中多次进监狱，而这次被关押的人数就超过 5.5 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塔拉·辛格和法特赫·辛格向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提出让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再次绝食，以使总理和他的同事们接受语言邦要求。

1961 年 3 月 17 日，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对总理和印度政府一再否认语言邦要求的合法性感到震惊。决议说在法特赫辛格和总理的前两次会谈中讨论了赞成和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理由，但是在第三次会谈中印度政府却突然宣布拒绝旁遮普语言邦一事感到惊讶。决议最后说“无论如何工作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得出结论，这件事情（绝食至死）与它的后果对整个国家关系如此之大，因此在采取这个步骤（绝食至死）之前，必

须向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讲明阿卡利党的观点。”^① 5月下旬,阿卡利党决定由塔拉·辛格绝食。塔拉·辛格宣布:“我将从8月15日开始绝食直到旁遮普语言邦要求被认可为止。”^② 1961年5月16日,一位著名的印度记者报道说:“在一次谈话中我们使……塔拉·辛格在语言邦问题上袒露他的动机,他强调锡克作为一个特别的社团必须得到保护,他坚持说,撇开他们目前的地位,锡克将逐渐地被主要社团‘吸收’掉,……锡克连同他们明显的外在标记能够作为单独的社团坚持下去,但是只有在他们享有权力并且能够对这些标记的不断支持时才能够做到。”^③

在绝食前一段时间,5月份尼赫鲁与塔拉·辛格又进行了会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除了尼赫鲁本人对1962年选举形势的考虑之外,他还借口塔拉·辛格圆滑不老实,而愿意与法特赫·辛格进行会谈。^④ 因为法特赫·辛格在语言邦问题上教派色彩较淡。关于法特赫·辛格对于语言的强调,塔拉·辛格说:“这位圣人是一位宗教人士,他不是一位政治家,而且可能已经被误解了。”^⑤ 法特赫·辛格和尼赫鲁之间的长时间的会谈也没有任何结果。1961年7月21日,塔拉·辛格在向新闻界的谈话中,仍然表示他准备同意在分裂后的旁遮普地区就旁遮普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虽然他认为这也是对锡克的一种歧视。1961年8月10日总理尼赫鲁向塔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印度的旁遮普:1944—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50页。

② 尼加尔·巴克西斯:《印度的旁遮普:1944—1966》,朱朗达尔,1985年,第151页。

③ 普瑞姆·巴蒂亚:《回顾与展望,阿卡利党面前的选择》,见《印度时报》,1961年5月16日。

④ 德文德尔·帕尔·桑都:《印度政治中的锡克:一个少数民族的研究》,新德里,1992年,第96页。

⑤ 巴尔德夫·辛格·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253页。

拉·辛格写信呼吁他放弃绝食的想法，对此法特赫·辛格代表阿卡利党回信建议在旁遮普语言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在尼赫鲁与阿卡利党人会谈中，印度教社团对尼赫鲁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反对分裂旁遮普。更有人诋毁阿卡利党，暗示阿卡利党正与巴基斯坦结成联盟。阿卡利党对于他们的反对者的不真实的宣传表示愤怒，并且宣布锡克是印度国家的一个有活力的肢体。^①

塔拉·辛格为他的绝食制定了两个目标：其一是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各级政府机构及其他机关对锡克人的歧视行为；其二是获得一个旁遮普语言邦。事前，塔拉·辛格强调了他的决心，“我们将得到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否则我将为之死去。”^②他甚至威胁说要将旁遮普语言邦一事提交联合国。

1961年8月14日，旁遮普政府向这个邦的所有报纸发布政令，禁止刊登与旁遮普语言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新闻和评论。政府对新闻出版的限制以及对锡克镇压措施目的是阻止塔拉·辛格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8月15日，在阿卡尔·塔哈特宫和达尔巴尔·萨西布举行宣誓之后，塔拉·辛格开始绝食。10天后法特赫·辛格会晤尼赫鲁，但是他发现尼赫鲁仅愿意调查锡克人的不满而不是同意一个建立旁遮普语言邦。1961年8月28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宣布即使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旁遮普语省的要求也是一个教派要求。^③然而他保证将任命一个高级权力委员会对歧视锡克人的事件进行调查。“在印度独立以后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是阿卡利党争取获得一个家园或者一个锡克邦的坚定的承诺的结果”^④，阿卡利党领导人没有能够为锡克获得权利的局面从独

^① 阿卡利党决议，转引自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蒂：《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年，第350页。

^② 《发言人》，1961年9月11日。

^③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第103页。

^④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第103页。

立前一直持续到独立之后。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的锡克社团和他们的政治生命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塔拉·辛格在与旁遮普语言邦关系上所言。“现在我自己的生命，至少是我的公众生命都是与这个要求联结在一起，如果我放弃这个要求，或者同意放松它，我将完全不能生存，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① 他声称：“印度教徒得到了印度斯坦，穆斯林获得了巴基斯坦，锡克得到了什么？”^②

在政府与阿卡利党之间进行斡旋，试图达成协议的人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并希望从尼赫鲁 8 月 28 日在议会的声明以及 9 月 17 日对新闻界的声明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满意的保证。塔拉·辛格早在 1961 年 9 月 1 日就已经同意就这个问题任命一个高级权力委员会。1961 年 10 月 1 日，哈尔迪特·辛格·马力克与帕提亚拉的王公会晤了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同日，当自称是总理使者的哈尔迪特·辛格·马立克来到阿姆利则后，塔拉·辛格于当天晚上 7 时放弃了长达 48 天的绝食。人们普遍认为停止绝食是阿卡利党与政府就高级权力委员会事宜达成某种协定的先兆。

10 月 30 日，塔拉·辛格会晤尼赫鲁。次日一个以 S.R. 达斯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成立。然而该调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它的职责范围都使阿卡利领导人感到失望。原先送给塔拉·辛格的名单中的人没有一个被包括在这个委员会之内。^③ 因此阿卡利党人一致决定抵制达斯调查委员会。

1961 年 12 月 23 日，高级权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维伦德拉代表印地语保护协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是《Partap》杂志的编辑、著名的圣社活动家和国大党党员，他声称旁遮普语只是印地语的一种方言，古鲁穆克体仅仅是一种宗教字体，与孟加拉语及

① 《论坛》1958 年 10 月 4 日。

② 《发言人》，XV, No. 27, (1961 年)，第 10 页。

③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367 页。

其他语言是它们各自地区的母语不同，旁遮普语不是印度教徒的母语。人民同盟的主要人物巴尔拉吉·马德豪克，告诉这个委员会，问题的根源是地区方案，“地区委员会”应该被撤消。他声称高级权力委员会不能胜任旁遮普语言问题的调查，这属于专家们的事情。哈里亚纳人民协会主席，后来的联邦政府国务部长谢尔·辛格也参加了会议，他争辩说不存在对锡克的歧视，并且旁遮普语正在被强加给哈里亚纳的人民，这违反他们的意愿。戈帕尔·辛格·达尔迪博士领导的一群民族主义者锡克向达斯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也认为不存在歧视锡克的现象。这个备忘录说：“我们认为在公共服务、政治代表权、社会立法和对商业、工业等方面的资助上，今天的政府对我们完全是慷慨大方的。”^① 苏尔吉特·辛格·马吉西亚就说：“我们没有不满，我们惟一的不满可能就是代表权过多。”^② 达尔迪还说阿卡利党并不代表锡克社团，他们对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他称邦立法会议中的大多数锡克是民族主义者锡克，试图以此证明他的立场是正确的。

达斯委员会于 1962 年 2 月 9 日印度大选前夕向政府提交了报告，提出在下列四个方面，即：(1) 宪法或者法律方面，(2) 政治和社会方面，(3) 公共服务方面，(4) 政府对商业和工业的资助方面，政府对锡克没有任何歧视。^③ 对于阿卡利党的语言邦要求，这个报告将其追溯到锡克阿卡利党领导人于 1946 年提出的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时期，只是由于没有一个锡克人占明确多数的地区，所以没能成功。因此，锡克社会的一部分人一直心怀不满。就民族主义者锡克提出的将古鲁穆克体字母推广到旁遮普全省以推进

① 巴尔德夫·拉吉·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 年，第 143 页。

②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376 页。

③ 《论坛》，1962 年 2 月 10 日。

旁遮普语言的要求而言，这个委员会宣称它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应该有一个语言调查团来做这一工作。关于地区语言方案，达斯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只是被拖延而不是中止，因此没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政府立即接受了这一报告。

在今天看来，所谓对锡克人的歧视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从有关的数据看，锡克人无论在政府职位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在他们传统上占优势的军队中，那时他们所占有的份额远大于锡克人口在这个国家中所占有的比例。然而，民族感情有时并不是具体真实的数字所能够衡量的，就像曾经有民族国家宁可要独立，也不要殖民主义下的繁荣一样。事实上，政府对锡克的文化和宗教的立场在很大的程度上误导了锡克对政府的态度，而这只能是以人的心理感知为依据。

第四节 阿卡利党的分裂与 语言邦问题的世俗化

一、乡村锡克势力的兴起和阿卡利党的分裂

阿卡利党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基本上都处在城市工商业锡克的控制之下，塔拉·辛格本人就是一位来自拉瓦尔品第从事商业活动的锡克家庭。他本人代表的是帕巴斯即非贾特的都市商人和贸易者的利益，他们主要是来自西旁遮普的城市难民。在印巴分治时，他们被迫从巴基斯坦移居印度，作为锡克工商业者他们与印度教徒的工商业种姓之间的利益冲突远比农业中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大，因为在他们到达这片土地上时，商业种姓的印度教徒已牢牢地控制了当地的工商业。因此他们要求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也具有与印度教徒工商业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性质。然

而,经过 10 多年的斗争,当印度其他各邦都已经成了语言邦的时候,旁遮普依然是一个双语邦。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在整个锡克社会中的声誉。在没有其他领导人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们的领导地位尚能支撑,但是到了 50 年代末,随着锡克社会内部另一个有强有力的阶层的兴起,局面便大不一样了,这个阶层就是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的贾特锡克农场主。

印度独立时,由于教派间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主导下的印巴分治,造成了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巨大的难民潮构成了印度旁遮普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首先它造成了锡克人口的大量集中,原先迁居到西旁遮普新垦区的移民和原来一直就居住在西旁遮普及其他地区的锡克大量来到东旁遮普,数量达百万以上,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贾特锡克。在这个数目极大的难民群中,有些人回到了原来祖先居住的村庄,有些人则定居在原来穆斯林留下的村庄的废墟上,以锡克社会和文化传统而论,这种集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印度记者库苏姆·奈尔曾在 1958 年到 1960 年期间遍访印度农村,他笔下的旁遮普与印度其他地区明显不同,难民们艰苦创业,分配土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管井,申请供电,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埋电线杆,架设电线,^① 政府为安置难民发放的贷款直接用于改进农业技术,拖拉机就是那时开始使用的。印巴分治还带来了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变化,锡克和印度教难民留在巴基斯坦的土地有 670 万英亩,而穆斯林留在印度的旁遮普的只有 470 万英亩,^② 东部来的难民可分得的土地比原来少 200 万英亩,因此每户所得的土地比原来的少,分配给难民们的土地一般是按比例减少,一般少 25%, 此前拥有土地数量越多的农户,在新分配的土地中减少的比例也越大,最多甚至减少了 95%, 难民中土地所有者的差别有一

① 库苏姆·奈尔:《贫困的印度农村》,中译本,北京,1963年,第 107—109 页。

② M.S. 兰达瓦:《旁遮普的绿色革命》,新德里,1974 年,第 30—31 页。

定的缩小，封建大地主几乎没有了。难民们分得的土地是整块的，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这里的遗产继承原则是父亲将每一块土地都平均分给自己的每一个儿子。长此以往，土地的零碎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印度政府实行了《土地插花地》方案，旁遮普在全印度领先完成。到 1969 年全部耕地都被调整为一户一块的农田，这主要是因为旁遮普的土地关系简单，出租和抵押的土地较少，调整起来手续比较方便，这和安置难民时形成的土地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土地连成一片的好处很多，特别是用井水灌溉时不用经过别人的土地，出租和抵押地较少，机井的数量在土地调整后迅速增加，土地便于经营和机械化耕作。出租土地的数量大为减少，1947 年有 47.2%，到 1969—1970 年时仅为 19.1%。经过分治冲击的旁遮普人民包括锡克难民，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由于印度国家独立之后一直缺乏粮食，政府在独立初便开展了增产粮食运动。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对农业十分重视，在农业上的投资十分巨大，特别是由于旁遮普有着巨大的农业开发潜力，政府在这里兴修水利，大量投资，旁遮普的历任首席部长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凯隆当首席部长的几年内更是如此，凯隆本人也是一位大农场主，在他的任期内整个旁遮普政府政策都是向农业方面倾斜。50 年代政府通过的两个土地最高限额法和印度教徒继承法对农民也有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政府的其他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农民从政府那儿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因此锡克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到 50 年代末旁遮普邦又从分治后的缺粮邦成了余粮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锡克，特别是贾特锡克对政治的态度。由于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大量锡克尽管在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选举中支持阿卡利党，认同阿卡利党对锡克宗教文化的立场，但是在现实的政治选举中他们支持国大党政府，宗教文化与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界限划得很清楚。与都市锡克相比，对乡村贾特锡克而言，锡克教已经成了一种

比较稳定的文化传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关联紧密，不会轻易被销蚀。在经济上走向繁荣的锡克农场主也要求对政治的参与。由于国大党本身的经济政策有利于锡克农场主的经济的发展，乡村锡克农场主也开始大量加入到国大党之中。从 50 年代初开始，事实上旁遮普的国大党已经为乡村的农场主所控制。但是 1957 年，印度大选之后，国大党发现它的支持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批锡克农场主开始回到阿卡利党的怀抱，于是它调整政策力图巩固它的支持基础。在农业政策上，国家发展会议决定实行以乡村为单位的多功能的农业合作社计划，并且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土地关系的变革。

然而，随着印度政府将经济中心转向重点发展国营工业，政府对农业投资在大量减少。政府为了保持工业品的低成本，首先控制了影响工人工资水平的粮食价格，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粮食批发经营许可证制度，以后又宣布国营粮食公司专营。此外，政府以固定价格强制征购粮食。由于印度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缺粮，粮食的市场价格远高于政府的收购价格，这在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的旁遮普引起的反应，远比印度其他地区强烈，农场主对政府做法很是不满。因此许多来自乡村的著名的锡克领导人离开国大党，有的加入了自由党，更多的人则加入了阿卡利党。因为在宗教上它与阿卡利党是认同的，而且以阿卡利党的实力，是可以与国大党抗衡的。阿卡利党领导人也将政府的政策说成是更大的社团对锡克社团的侵犯，因此也是一种教派政策。^①大量的锡克农场主涌进阿卡利党使得阿卡利党的主要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锡克农民占了主导地位，相应的代表锡克农场主利益的新的领导人也出现了。这就是来自旁遮普南部的法特赫·辛格，这对以塔拉·辛格为首的都市锡克领导人构成了挑战。

^① 阿马尔吉特·S. 纳朗：《民主发展与扭曲》，新德里，1986年。

塔拉·辛格在与尼赫鲁进行语言邦的斗争中，使用锡克的宗教政治符号，他以绝食至死的态度要求尼赫鲁政府答应锡克成立旁遮普语邦的要求，然而，他却忘记了一个真正的锡克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的，锡克传统要求每一个锡克既然已经宣誓要为一个崇高的目的而献身，那么在还没有达到目的前，他就不应背弃他的诺言，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锡克。塔拉·辛格在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无意间冒犯了锡克的传统，并成了这个传统双刃剑的牺牲品。他在与尼赫鲁的谈判中，没有达到最后目的即行停止绝食，不但有违锡克传统，而且连印度教的圣人也不如。这样塔拉·辛格便遭到宗教思想更为浓厚的乡村锡克的唾弃。锡克大众普遍认为在塔拉·辛格的领导下已经输掉了争取旁遮普语言邦的斗争。塔拉·辛格的威望大大下降了，以至于到 1961 年初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竟然有锡克嘲弄他的事情发生。他在没有同政府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协定的情况下，就要求法特赫·辛格停止绝食也引起锡克社会的普遍不满，塔拉·辛格的声望在下降，而作为他的副手的法特赫·辛格的地位和声望则由于他的坚决的绝食行动而上升。

1962 年初的第三次邦议会选举被国大党用来作为在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的一次公民投票。国大党领导人在挑选自己的候选人时，专门挑选那些值得信赖的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人作候选人，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仍留在国大党内但对语言邦并不坚决的前阿卡利党的邦议员都没有被挑选上。阿卡利党同一些反对党结成竞选联盟，然而由于它提出的语言邦要求不能为其他教派群众所接受。结果国大党赢得了 160 席中的 90 席，阿卡利党只赢得 19 个席位。它甚至在说旁遮普语的地区也遭到失败。选举的失败使得阿卡利党士气低落。但是从实际选举情况分析，阿卡利党获得的席位虽少，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并不少，他们获得了总选票的 20.7%。在说旁遮普语的地区他们获得了 150 万以上的锡克人的选票，而国大党只获得了不到 60 万张锡克选票，投国大党的锡克有相当大一

部分是属于表列种姓的锡克，因此有 72% 以上的锡克选民支持阿卡利党的候选人。^① 也就是说，多数锡克还是支持阿卡利党的。

1961 年 11 月初，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副主席拉赫曼·辛格·吉尔和其他人提出不能选举塔拉·辛格为该委员会下任主席，因为塔拉·辛格违背了他的誓言。同月塔拉·辛格和法特赫·辛格被作为锡克教宗教教法权威的五老会召去，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在锡克圣典《古鲁·格兰特·萨西布》面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之后却违背了他们不达目的即绝食至死的誓言。特别是塔拉·辛格，他不仅自己违背誓言，而且此前还说服法特赫·辛格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放弃绝食。最后五老会对塔拉·辛格和法特赫·辛格都进行了宗教处罚。

在 1962 年议会选举中失败之后，塔拉·辛格又一次当选为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的主席，但是只有 74 名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选举。剩下的 86 人中大部分没有参加选举以示对塔拉·辛格的不满。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于 1962 年 7 月 8 日在卢迪亚纳召开一次会议，会上认定塔拉·辛格背弃誓言的行为是造成旁遮普语言省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拉赫曼·辛格·吉尔、吉万·辛格·乌马拉纳加尔、贾格吉特·辛格·高格兰以及谢夫拉尔·贾万都要求塔拉·辛格辞职。这 4 位阿卡利党的重要领导成员都具有乡村背景。前两位还都是塔拉·辛格的助手。他们宣称塔拉·辛格不是乡村锡克的领袖。塔拉·辛格于是将拉赫曼·辛格·吉尔等人开除出党。阿卡利党的副主席，也是塔拉·辛格助手的法特赫·辛格请求两派进行和解但是未能成功。于是法特赫·辛格发表声明反对塔拉·辛格这一决定。同月，他在卢迪亚纳召开会议，另外建立了一个阿卡利党（法特赫·辛格派）。在这次会议上阿卡利党（法特赫·辛格派）通过两个决议赞扬那些为国家以及为了拯救

^①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 年，第 200 页。

锡克社会作出服务和牺牲的人们，一致重申在纯粹的语言基础上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表示要彻底与教派毒瘤断绝关系，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其他社会群体建立全面的合作。

8月1日，法特赫·辛格在德里向新闻界宣布了他的政策和纲领。他说从一开始他的旁遮普语言省的概念和实质就与塔拉·辛格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塔拉·辛格有时过多考虑锡克在这个地区的百分比和地位问题，这是不恰当的，他认为语言邦问题纯粹就是语言问题并且必须如此看待。他又说他始终认为不可能存在一个牺牲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和谐旁遮普语言邦，在没有非锡克人的这样一个邦中对锡克也不会有多大益处。他的谈话增加了印度教报刊对他的支持，这些报刊以前都是抨击塔拉·辛格的政策。

塔拉·辛格开除异己的做法和法特赫·辛格公开提出他与塔拉·辛格的分歧的举动在阿卡利党内形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在1962年8月18日，这两个集团正式摊牌。这天拉赫曼·辛格·吉尔奉命召集了以法特赫·辛格为主席的全体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成员参加的正式会议，后者是在7月22日被选上的。

1964年6月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再次进行选举，结果法特赫·辛格集团又战胜了塔拉·辛格派。塔拉·辛格集团提出的候选人遭到失败，这是对塔拉·辛格的领导权的又一沉重打击。在这个过程中，贾特和非贾特之间的分歧已经在起作用。有学者说“对1964年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分析表明对塔拉·辛格的支持来自都市地区而对法特赫·辛格的支持来自乡村地区。”^①

这样阿卡利党陷入了激烈的内部派别斗争之中，并且分裂成了两个主要的派别：法特赫·辛格集团和塔拉·辛格集团。由于法

^① 巴尔德夫·拉吉·纳雅尔：《旁遮普的少数民族政治》，普林斯顿，1966年，第199页。

特赫集团特别得到了来自绝大多数贾特农民的支持，他这一集团自然就成了阿卡利党的主流集团。事实上随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贾特锡克已经在旁遮普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自然地导致了非贾特种姓的都市锡克领导人在阿卡利党中统治地位的下降。塔拉·辛格集团 1967 年单独参加了第四次印度大选，结果以惨败而告终。1969 年在塔拉·辛格死后，这一个集团终于又并入了法特赫·辛格主流集团之中。从那时起，占主导地位的锡克农民大部分一直支持阿卡利党，他们同样在阿卡利党和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中获得了领导地位。比较而言，贾特的主要兴趣是同旁遮普的绿色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要求。

同样，在阿卡利党的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锡克政治权力上的从都市精英向土地贵族和乡村农民的转移。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和阿卡利党都在贾特锡克的控制之下。戈宾德尔·辛格所作的调查表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中 53.40% 的人属于锡克社会的上层，来自中产阶级的成员占这个组织的 27.18%，较低级的农民和非农民各占 7.77% 和 11.65%，在较低集团中一个相对较高的非农民的比例是由于没有土地的马扎哈比（表列种姓）锡克的存在，在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中一直为他们保留一定数目的代表权。从这个调查来看，戈宾德尔·辛格得出结论：“在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关键职位中较高地位集团的代表权从未少于 75%，这个机构几乎完全处于这个集团的控制之下。”^① 事实确实如此。

二、语言邦问题的世俗化

在法特赫·辛格的领导下阿卡利党有了新的面貌，也有了实现老目标的新方法。他对旁遮普语言邦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比较

^① 戈宾德尔·辛格：“锡克寺院改革运动：参与与适用性的研究”，《旁遮普政治月刊》，阿姆利则，第Ⅶ卷，第2号，1983年7月—12月，第75—76页。转引自《旁遮普危机：分析研究》，第24—25页。

清楚地阐明了旁遮普语言邦的内涵，不给别人留下任何会发生歧义的空间，将语言邦运动同锡克教派问题尽可能地分开。塔拉·辛格则在语言邦问题上，一直将锡克的统治与语言邦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给语言邦斗争抹上浓重的教派色彩。例如，1955年他提出“锡克社会在危险中”的口号；提出卡尔萨社会要么是统治者，要么是叛乱分子；在1955年1月与萨恰尔的会谈中他公开宣称旁遮普语言邦只是一个锡克国家的外衣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很明显地不会得到锡克社会以外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支持，由于印度刚经历了由教派引起的分治，人们对教派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仍心有余悸，塔拉·辛格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印度社会的主流精神，不用教派的方法一样能够维护和促进锡克的利益。因此，塔拉·辛格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法特赫·辛格的领导下，教派主义让位于世俗主义，他将旁遮普语言邦的鼓动完全建立在于世俗的语言文化政治基础上。在语言邦问题上完全避免使用教派色彩的挑衅性言词，他不只向锡克寻求对旁遮普语言邦的支持，而且他向包括锡克在内的整个旁遮普省人民寻求支持。他认为政府的歧视是对所有旁遮普人的歧视，而不是对锡克的歧视，政府反对的旁遮普语是旁遮普人的语言，而不只是锡克人的语言。他声称对政府将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看作是教派要求感到惊讶。他宣布教派人口的百分比与他的旁遮普语言方案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写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想要一个语言的也仅仅是语言的单元，在那里旁遮普的语言和文化是主要的，不论在这样一个单元中是印度教徒占多数还是锡克教徒占多数。”^①他以甘地式的语调说他相信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旁遮普语言邦就像马哈拉斯特拉或者古吉那特人要求的语言邦一样。他强调：“像所有其他邦一样，旁遮普语言邦将是印度联

^① 维林德尔·格罗弗：《印度政治制度》，第4卷，新德里，1989年，第719页。

邦中的一个邦。它将是一个不分宗教、肤色和信仰的所有旁遮普人的邦。”他认为当统治者不是使用民众所使用的语言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便产生了。如果要跨越这条鸿沟，统治者必须使用大众的语言，那就是旁遮普语和古鲁穆克字体。

针对那种认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不利于印度国家安全的说法，他提出作为一个边境邦的旁遮普语言邦对国家的安全将更有帮助。他对那种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是分离主义者图谋的攻击进行反击，要求政府就此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如此，锡克社会愿意承担责任，如果不是，那么诽谤者应该受到惩罚。他以锡克人在民族主义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为根据来证明锡克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指出那些怀疑锡克忠诚的人是完全忘了历史。他们忘记了锡克是作为印度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留在印度的。

法特赫·辛格还进一步提出了在语言邦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民族之间的信任和不信任的问题。^① 在他于 1961 年与尼赫鲁会谈中，当尼赫鲁以如果锡克人得到一个旁遮普语言邦，那么“锡克人在印度的其他邦中得不到容忍”为由拒绝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时，法特赫指责尼赫鲁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教派的做法。他问尼赫鲁“当穆斯林在获得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后都能够生活在印度，为什么锡克在印度联邦内获得一个语言邦后就不能够生活在其他邦中呢？”^② 当尼赫鲁提出拟议中的旁遮普语邦将使印度教徒变成少数教派时，法特赫·辛格要求他不要使问题教派化而应该从语言少数而不是宗教少数上进行思考，使尼赫鲁哑然无语。他的理性世俗观点给尼赫鲁留下了深刻印象，尼赫鲁事后提到法特赫·辛格时说：“他坚信语言邦符合锡克、旁遮普和整个国家的最

① 维林德尔·格罗弗：《印度政治制度》，第 4 卷，新德里，1989 年，第 720 页。

② C.D. 盖伊：《上帝之人》，新德里，1966 年，第 66 页。

大利益。”^① 为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法特赫·辛格走遍大小城镇和乡村，力图消除人们对语言邦的疑虑，向人们解释旁遮普语言邦不是一个锡克邦，而是一个说旁遮普语言的邦，因此它只有在印度教徒的支持下才能成立。他的观点虽然没有能够使得印度教徒组织象圣社和人民同盟的信服，但是他至少在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

第五节 旁遮普语言邦的最后建立

一、旁遮普语言邦要求的强化

1960年以后旁遮普邦政府曾多次命令实施地区方案，然而总是遭到印度教教派组织的坚决抵制。根据1960年印度政府颁布的《官方语言法》的有关条例，1962年10月旁遮普邦政府也曾提出实施地区方案，但是由于印度教教派组织的反对而又一次搁浅，从1962年2月起旁遮普邦高等法院也试图这样做，也同样遭到印度教徒控制的旁遮普市政委员会的坚决反对。^② 令人遗憾的是迟至1965年，地区方案的实施也是有名无实，据报道，当时政府办公室里，仍大量使用英语和乌尔都语。^③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前夕，在拉吉普拉发表演讲，他承认旁遮普邦的主要语言是旁遮普语，并指示凯隆宣布旁遮普语言邦为单一语言邦。^④ 但是旁遮普省既然存在着两种争持不下的语言，在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都不愿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光宣布旁遮普省为旁遮普语言省并不能

① C.D. 盖伊：《上帝之人》，新德里，1966年，第68页。

② 《论坛》，1962年10月11日。

③ 阿托尔·辛格：《地区语言状况》，见《发言人》1965年8月23日。

④ P.C. 约西（主编）：《旁遮普语言邦：一个专题研讨会》，新德里（没有年份标记），第69页。

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加上凯隆本身官司缠身，自身都难保，根本无法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而尼赫鲁本人自 1962 年身体与声望俱衰，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期待他的后任来解决这一问题。

1965 年 1 月 18 日，在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新一届选举中，法特赫·辛格集团赢得了 90 席，塔拉·辛格集团只得到了 45 席。1965 年 5 月，塔拉·辛格派在卢迪亚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由旁遮普立法会议中的反对党领袖古拉姆·辛格提出的，并由塔拉·辛格派的阿卡利党主席吉亚尼·普品德尔·辛格副属的议案。这份议案中宣布锡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意识到他们在一个自由印度的政治命运；印度联邦的法律、司法程序和行政活动极其不利于锡克。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要求在联邦之内有一个民族自决的地位。8 月 2 日在卢迪亚纳举行纪念哈里·辛格诞辰大会上，塔拉·辛格指责国大党在获得印度后忘记了它对锡克所作的庄严承诺。他指出好斗的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出现是对印度所有少数民族的威胁，特别是对与印度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锡克教的威胁。他提到了锡克不歧视别人的传统。他提出一个思想，即锡克教反对财富在个体手中的集中以及对任何生产手段的浪费。最后他说锡克在自由印度的阳光下有一片呼吸自由空气空间的要求是一个合法的要求。他宣称，不能让神和历史所建立起来的东西被印度的新统治者毁掉。他要求“给予锡克人在印度联邦内一个自决的地位。并且要求任命一个国际仲裁团对此进行调查”。^①塔拉·辛格的讲话表明，他已公开提出了在印度联邦内为锡克人建立一个自治邦的要求。这是印度独立后，塔拉·辛格长期以来一直追求保护锡克地位的政治目标的首次明确表述，也是印度政府长期没有满足锡克社会建立旁遮普语言邦要求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法特赫·辛格一派仍然坚持要求成立语言邦的

^①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蒂：《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02—406 页。

立场。1964年,法特赫·辛格在兰姆普拉帕尔明确表示不能让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进入冷藏箱,10月18日,他在阿姆利则宣布:“为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①1965年4月29日,法特赫·辛格的阿卡利党召开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锡克人大会,500名不同锡克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特赫·辛格坚持在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上的严格的语言立场。因为这样印度政府才愿意谈判。但是对于语言的基础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锡克宗教文化内容不能使用。相反它能够得到更好地利用,法特赫·辛格在一个场合说“一个旁遮普语言邦要求并不是建立在教派基础上的,我们的观点是:当印度的其他邦得以在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时,我们的要求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对于旁遮普没有这样做就是对旁遮普人民的歧视。”^②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在不给旁遮普语言邦上的歧视,整体上不是针对“旁遮普人民的”而是针对锡克的,“没有给旁遮普语任何地位,是因为锡克说这种语言,如果没有一个锡克将旁遮普语视作母语,那么印度的统治者将没有理由反对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③因此“旁遮普人”这个词比此前一直被大量使用的“锡克”一词更受欢迎,更引人注意。^④

1965年8月5日,法特赫集团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继续要求在纯粹的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决议指出不成立旁遮普语言邦就是对整个旁遮普人民的歧视。决议

① 维伦德尔·格罗弗:《印度政治制度》,第4卷,新德里,1989年,第727页。

② 保罗·R.布拉斯:《北印度的语言宗教和政治》,德里,1975年,第325—326页。

③ 保罗·R.布拉斯:《北印度的语言宗教和政治》,德里,1975年,第325—326页。

④ 库马尔·普拉迪普:“印度联邦中的地方主义的教派方面:阿卡利党政治中的趋向研究”,《印度政治学月刊》,Vol. Ⅷ, Nos.1和2,1979年4月—8月,111页。

同时强调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应和睦相处。法特赫·辛格由阿卡利党(法特赫·辛格派)授权面见印度新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向他提出成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必要性。^①面对锡克政党的要求和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央政府感到有必要与法特赫·辛格会谈,解决问题。8月7日和8日,法特赫·辛格与总理夏斯特里和内政部长南达举行了会谈,但会晤没有结果。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明白表示整个问题已经得到了邦重组委员会和尼赫鲁的考虑。政府认为为了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利益,旁遮普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夏斯特里明白地告诉法特赫·辛格,“旁遮普语言邦不是他夏斯特里递给他(法特赫)的金盘子中的一个苹果。”^②

1965年8月17日,法特赫·辛格在阿卡尔·塔哈特当着2.5万民众的面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除非旁遮普语言邦在25天内建立起来,否则他将于9月10日起在金庙绝食,如果在经过15天的绝食之后他还活着,那么在第16天他将自焚而死。^③在对锡克民众的讲话中,他叙述了他同国大党领导人的会谈和他对国大党人的失望。这个宣言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有100多人响应法塔赫·辛格的绝食行动,将自己的名字列入阿卡利党的自愿牺牲者名单上。法特赫的决定一旦在不久举行的阿卡利党全体会议上得到批准,必将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二、印巴战争、旁遮普问题委员会与语言邦的建立

就在法特赫·辛格绝食之际,1965年9月,印度与它的邻邦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巴战争的爆发给旁遮普语

① 达力普·辛格:《旁遮普政治的活力》,新德里,1981年,第30页。

② 乌尔查兰·辛格·巴吉瓦:《旁遮普政治五十年,1920-1970年》,昌迪加尔,1979年,第20页。

③ 伊克巴尔·纳兰(主编)《印度的邦政治》,米鲁特,1965年,第65页。

言邦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新的转机。旁遮普邦地处印巴边界，不仅是印度的粮食基地，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是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进入恒河流域的必经之路，又是北上连接印控克什米尔的重要战略通道。锡克团队一向以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著称于世。旁遮普的锡克人是印度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锡克人倒向巴基斯坦，让巴基斯坦控制了旁遮普，那么，印占克什米尔也将很快会处于巴基斯坦军队的威胁之下。锡克人的人心向背对整个印巴战争的结局虽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争的进程。在这个时候，法特赫在语言邦问题上以绝食相威胁，显然让政府感到十分为难。

当时许多政治家和政党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呼吁法特赫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绝食行动，因为印度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于是也要求法特赫·辛格暂停绝食。在这种情况下，法特赫·辛格于 9 月 9 日作出了推迟绝食的决定，并且号召旁遮普人特别是全体锡克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决定得到了所有印度人的赞赏。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印度总统沙尔瓦帕里·拉达克里希南高度赞扬法特赫·辛格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说这位圣人的要求会得到满意的解决。在三个星期印巴战争中，整个锡克再一次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完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而是给了印度政府的战争努力以最大的支持。尽管巴基斯坦广播电台保证巴基斯坦政府支持锡克人的建立一个锡克家园的要求，对此锡克社会根本没有加以理会。

锡克人对国家大义的遵从，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使那些宣称锡克是民族分离义者的言论不攻自破。印度政府认识到旁遮普问题的久拖不决终究不是办法。战争一结束，印度政府就宣布任命一个由英迪拉·甘地和 Y. B. 恰范以及马哈维亚·提亚吉三人组成的内阁小组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以人民院议长萨达尔·胡卡姆·辛格为主席的包括联邦两院的所有政党的 22 名议员组成

的议会顾问委员会考虑旁遮普语言邦事宜。议会委员会被要求在 1966 年 3 月中旬递交报告。这个顾问委员会在整个工作期间收到了大约 1000 份个人和组织的陈述书以及大量的口头证词和许多建议。^①

在联邦内政部长南达宣布重新考虑旁遮普问题之后，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派别给印度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雅利安代表大会的工作委员会在 1965 年 10 月 3 日的会议上警告所有各方说，破坏目前的结构是危险的，在地区方案上的任何变革都将受到尽可能的抵制，因为这将使这个边境邦进一步瓦解并且削弱它的力量。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印度教组织成立了一个艾克塔委员会。印度各地反对分裂旁遮普的力量也开始在印度联邦院国会议员中进行游说。来自印地语地带各省的立法议员们 10 月 17 日在罗托克集会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旁遮普人民同盟总书记雅哥亚·达特·沙尔马则表示要为阻止旁遮普语言邦的成立而绝食。

就旁遮普地方政府的立场而言，此时担任旁遮普邦首席部长的国大党人拉姆·克瑞善也反对分裂旁遮普。他在 1965 年 10 月 21 日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表示邦政府反对任何分裂旁遮普邦的行为。此时担任联邦内阁总理的夏斯特里，也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意图维持尼赫鲁生前采取的立场。他对锡克人的要求采取能拖则拖的办法。而当时担任联邦宣传与广播部长的英迪拉·甘地则主张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她多次要求与夏斯特里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每次都被拒绝^②。尽管以英迪拉为首的的内阁委员会赞成在语言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旁遮普的边界。但是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成立旁遮普语言邦仍然前途渺茫。然而一个偶然的机

^① 伊克巴尔·纳兰(主编)《印度的邦政治》，米鲁特，1965 年，第 243 页。

^②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施美华等译)，北京，1992 年，第 87—88 页。

会却促成了旁遮普语言邦的最后成立。1966年1月11日夏斯特里在塔什干与巴基斯坦签订协议后,心脏病突然发作逝世,经过一番权谋之争,英迪拉·甘地得到了国大党总书记卡马拉季的支持,战胜了老资格的国大党政治家莫拉尔吉·德赛,于1966年1月20日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印度的总理。这种变化有助于旁遮普语言邦的解决。

在国大党内,为了解决旁遮普语言邦问题,国大党内也成立了一个由卡马拉季、德巴尔和南达组成的小组委员会。1966年3月9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在现存的旁遮普邦中建立一个以旁遮普语为邦语言的旁遮普语言邦,为此,敦促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①对于这个决定,国大党内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莫拉尔吉·德赛、比柏·帕特内克和拉姆·苏巴海·辛格博士就反对这一决定,他们坚持认为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是一个教派要求。但是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说服国大党大多数人支持他的立场,他争辩说当其他邦的人民已经在享受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邦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之时,怎么能够拒绝给予旁遮普人这个已成为国家的原则的福利呢。^②看到锡克在印巴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国防部长 Y.B.恰范支持卡马拉季。他从旁遮普的战略重要性方面考虑,支持成立旁遮普语言邦,他说:“由于旁遮普的地理位置,不能拖延在旁遮普语言邦要求上的决定。”^③得到卡马拉季支持的总理英迪拉·甘地于是坚持她的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现在我们现在必须加以执行。”^④

国大党之所以最后决定同意锡克人的要求成立旁遮普语言

① P.C.约西(主编)《旁遮普语言邦:一次专题讨论会》,新德里,无年代标记,第82页。

②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308页。

③ 《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1966年3月10日。

④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308页。

邦，关键在于旁遮普邦内部各社会集团已经在维持这个邦现状上出现根本的分歧。国大党工作委员通过的建立一个说旁遮普语言邦的决定既受到了锡克人的欢迎也受到了说印地语的哈里亚纳和喜马偕尔邦人民的欢迎。同时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印度大多数政党和集团的拥护。只有旁遮普的印度人民同盟批评国大党的政策，认为这是“对国家统一和整合力量的一个打击。”^① 印度教的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为了反对成立语言邦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纵火、抢劫以及其他暴力活动。但是大多数印度教徒都默认了这一决定。法特赫·辛格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满意。他希望拟议中的旁遮普能够继续保持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和谐。他说：“我明确地反对塔拉·辛格对一个独立的锡克国家或者锡克的自决地位的要求，我们要求的一直是作为印度的一部分的旁遮普语言邦，印度是我的国家，对我而言，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怎能离开自己的家？”^② 塔拉·辛格对这个决定的评论却是：“我的关于锡克自决的政治地位的观点没有改变，政府应该公平地建立一个锡克人占多数的地区。”^③ 但是他只代表极少数锡克激进派的观点，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

促使印度政府最后作出建立旁遮普语言邦决定的重要因素中，除了锡克人的坚决斗争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其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逐渐兴起的哈里亚纳地区的争取建立哈里亚纳邦的运动。哈里亚纳邦运动本身几乎是同旁遮普语言邦运动同步发展起来的。哈里亚纳语言邦运动在两个方面影响旁遮普语言邦运动。一个方面是反对将哈里亚纳同其他邦合并，以及争取哈里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当时旁遮普邦的领导

① P.C.约西：《旁遮普语言邦：一次专题讨论会》，新德里，无年代标记，第 86 页。

②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49 页。

③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29 页。

人曾希望将哈里亚纳地区和北方邦的西部地区合并在一起，成立新邦。但是这遭到北方邦的坚决反对，它担心这将削弱北方邦在印度政治和印度议会中的优势地位。由于国大党不愿意分裂北方邦，哈里亚纳地区的领导人因此担心成立旁遮普语言邦后将会把哈里亚纳地区并入到邻近的邦中。地区方案公布后，它没有了这个顾虑。但在旁遮普省内，哈里亚纳地区与锡克人占多数的旁遮普语区相比，经济上比较落后一些，他们要求邦政府能够给予更多投资，要求更大的经济发展，旁遮普语地区统治印地语地区的局面使得它要求建立独立的邦。首席部长普尔塔普·辛格·凯隆在哈里亚纳各行政区国大党组织中巩固其势力的努力导致了一些地区特别是古尔岗、海沙尔和罗赫塔克地区的重要的政治家离开国大党。1961年4月，在一直是哈里亚纳地方感情的中心罗赫塔克，一批哈里亚纳政治家建立了一个名为哈里亚纳人民协会（HLS）的组织，并且成立伊始即投身于1961年的大选。在竞选宣传中它与圣社联手在竞选运动中反对在哈里亚纳的各个学校实施旁遮普语，要求推动印地语的发展，反对旁遮普政府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对于哈里亚纳地区的歧视。^①哈里亚纳人民协会在罗赫塔克地区参与竞争的8个席位中，共赢得了3个席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地区的24.4%的选票。^②

另一个方面是哈里亚纳地区不愿承担作为双语邦一部分的推广旁遮普语言义务。反对强制实施教授旁遮普语的呼声不断高涨。^③这种反对旁遮普语的后果就是强调在朱朗达尔地区的说旁

^① 保罗·R·布拉斯：《北印度的语言宗教和政治》，德里，1975年，第331页，引自《选举法报告》第24，378—384，391—394，396—397，404—414，416页。

^② 克雷格·巴克斯特：《印度的地区选举趋向：一个研究工具》，纽约，1969年，第88页。

^③ 《政治家》，1960年6月30日，《论坛》1961年1月14日，也见印度政府《旁遮普语言邦委员会报告》新德里，1966年，第7，17，43页。

遮普语言的印度教徒——他们害怕在真正的旁遮普语言邦中遭到锡克的统治——和哈里亚纳的说印地语的印度教徒之间的利益差别，后者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占据人口的多数，不害怕锡克的统治，他们更愿意看到在一个更小也更和睦的邦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权。到了 1965 年，在哈里亚纳的政治领导人，甚至该地区的圣社成员中间都存在着普遍的分裂旁遮普的情绪。议会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哈里亚纳的代表们反对与旁遮普语区建立一个单一的语言邦，他们甚至对于地区方案中的将古鲁穆克体的旁遮普语作为第二语言强加给他们都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哈里亚纳的圣社成员斩钉截铁地宣布来自朱朗达尔行政区的说印地语的人们在这个议题上并不代表哈里亚纳人民的观点。从呈递到委员会面前的证据表明……现在积极反对成立一个说旁遮普语言的邦的是来自旁遮普语地区的一部分人。”^①

其二，反对旁遮普语的诸组织和集团在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中逐步分化，在语言邦的较量中一部分态度趋缓，甚至暧昧。政府中的“来自旁遮普语地区的那一部分人”显然包括锡克阿卡利党的政治对手人民同盟，以及构成人民同盟的主要干部成分的国民志愿团。然而人民同盟与阿卡利党相比，在动员印度教社区反对成立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它显然不具备阿卡利党动员锡克社区要求成立旁遮普语言邦那样的能力。无论在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鼓动者的内部对于旁遮普语言邦的态度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但是在印度教徒的内部这种分歧更为严重。旁遮普语言邦的锡克支持者们只是在策略上有分歧——是通过国大党还是通过阿卡利党进行运作，是加强语言邦要求中的宗教诉求还是语言基础世俗政治诉求的问题。然而在试图巩固并统一印度教徒的意见上，人民同盟和国民志愿团面临更为严重的分歧，在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和都

^① 印度政府，《旁遮普语言邦委员会报告》，新德里，1966 年，第 7 页。

市的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之间，在那些主要与印度教文化利益相关的和那些主要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印度教徒之间，在印度教徒的利益上那些只有地方眼光的和那些具有更大视野的印度教徒之间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到 1966 年，人民同盟和国民志愿团，加上圣社，不断地反对分裂旁遮普，然而人民同盟和圣社在反对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进行动员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个限制力就是哈里亚纳地区的建设一个单独的哈里亚纳邦的情绪。国民志愿团和人民同盟，及圣社一直主要是由来自说旁遮普语的地区特别是来自印度独立后的阿姆利则、朱朗达尔和卢迪亚纳地区的重要城市中的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组织起来的。无论如何，这些组织在哈里亚纳的城镇甚至乡村地区都有支持者。实际上自 1952 年以来的历届大选中，人民同盟在哈里亚纳的得票率都高于旁遮普语地区。^① 随着哈里亚纳运动力量的增强，圣社成员开始在哈里亚纳相互攻击，人民同盟候选人发现在哈里亚纳地区赞成成立一个哈里亚纳语言省的立场比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立场更能获得选民的支持。^② 而印度教文化与政治利益上的分歧也使许多圣社成员与国民志愿团及人民同盟之间产生矛盾。在许多圣社成员关注不惜代价地以印地语媒介向印度教徒灌输印度教徒价值观，以保护天城体的印地语时，国民志愿团和人民同盟政党领导人更关注保持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的主导地位。为了印度教徒的政治权力，国民志愿团和印度人民同盟打算在印地语与旁遮普语的斗争中进行妥协。他们甚至愿意承认旁遮普语为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圣社成员拒绝承认旁遮普的分邦有任何语言上的理由。无论怎样，人民同盟最后接受了旁遮普邦的重组，接受了旁遮普语言邦的

① 克雷格·巴格斯特：《人民同盟，一个印度政党的传记》，费城，1969 附录 2。

② 克雷格·巴格斯特：《人民同盟，一个印度政党的传记》，费城，1969 年，第 225 页。

重组是建立在语言而不是一个教派要求的基础上的说法。^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旁遮普邦的重组变得不可避免时，人民同盟的领导人迅速采取了一个宽容的立场，一个能够在改组后的旁遮普邦的每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印度教徒赢得分享权力的机会的立场。巴尔拉吉·马德豪克在 1966 年人民同盟的主席致词中号召党员们接受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旁遮普语言邦的重组，并且明确表示他反对“阿卡利党和圣社成员中的对重组不满的极端分子。”^② 在 1966 年 4 月，马德豪克和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哥瓦尔卡在旁遮普旅行，要求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承认旁遮普语为合法的语言，古鲁穆克体是印度教徒要接受的恰当的字体。此外，马德豪克还明确表示“人民同盟认为锡克是印度教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③

最后，旁遮普语言邦建立还同英迪拉·甘地本人在语言邦上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英迪拉·甘地本人很早即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对国大党的语言邦政策也十分熟悉，1959 年她就任国大党主席不久，即产生了要求将孟买邦分成马拉特语邦和古吉拉特语邦两个语言邦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当时的孟买曾引发起大规模的骚乱。当时就有一部分国大党领导人坚决反对将孟买分割成说马拉特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说古吉拉特语的古吉拉特邦，但是英迪拉·甘地坚持支持孟买地方分邦的要求。她在劝说尼赫鲁划定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语言邦的决策中起过主要作用。在这之后，旁遮普语成为印度官方 14 种语言中惟一没有语言邦的官方语言。1949 年通过的印度宪法规定 15 年后，印地语将完全取代英语作为全国惟一通用官方语言，1965 年 1 月 16 日是用印地语取

① 克雷格·巴格斯特：《人民同盟，一个印度政党的传记》，费城，1969 年，第 255 页。

② 克雷格·巴格斯特：《人民同盟，一个印度政党的传记》，费城，1969 年，第 255 页。

③ 《印度斯坦时报》1966 年 4 月 4 日，转引自克雷格书，第 256 页。

代英语的最后期限。当时通过这条宪法条款的时候，南方各邦就不是十分情愿。他们对在自己地区推广印地语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一直把印地语看作是北方的语言，将印地语的推广看作是北方各邦对国家其他地方的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形式，同时也担心政府有计划地取消英语，会加强北方各邦在中央政府中的统治权，而把国内的其他部分降低到一种相对的附属地位。尼赫鲁本人在世时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南方各邦普遍存在的这种忧虑心理。所以他在 1959 年首先就提出只要印度任何地区需要英语作为一种共同的官方语言，就可允许其在印度继续存在。附带说一句，尼赫鲁本人讲起乌尔都语来很熟练，但印地语说得却不怎么好。他还因为对印地语作品的善意批评而遭到印地文报纸的长时间的批评。^①他在公开场合讲演，更多的是用英语，或者首先使用

^①见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第 521 页：1933 年尼赫鲁在访问贝拿勒斯期间，一个小的印地文学团体请其讲演，“我批评了印地文著作中惯用的那种复杂而华丽的语言，它们充满了难懂的梵文，矫揉造作，并且墨守古代形式。我大胆建议放弃这种写给特种对象看的宫廷式文体，印地文作家应该有意识地为群众写作，并且了解群众的语言。与群众的接触会给语言以新的生命和纯朴，而作家本身也会得到群众的感情方面的力量，从而写出更好的作品。我还建议说，如果印地文作家更加注意西方的思想和文学，他们会从那里而得到很大的益处，同时翻译欧洲语言的古典作品，以及关于现代思想的注释也是需要做的工作。我还说到也许现代的孟加拉语、古甲拉特语和马拉地语在这些问题方面要比现代的印地语前进一些，而近年来，孟加拉语的著作确实要比印地语多些。”这些谈话经过印地语报纸发表后，印地语报纸“对我猛烈攻击，责难我竟敢批评印地语，而且把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马拉特语对比时，使印地语相形见绌。他们称我为无识者，——我在那个特殊问题上也确实如此，——使用很多更刻薄的话来压制我，我没有时间来参加这种争论，听说它继续了好几个月，一直到我重新入狱为止。这件事对我是一种启发，它说明了印地文人和新闻记者们的过度敏感，以及他们拒绝正视一个对他们抱有善良愿望的人所提出的稍微坦率一些的批评。自卑感显然在那里作祟，自我批评根本不存在，批评的标准也很低。一个作者和他的批评者往往伤和气，彼此指责个人的动机。整个观点是狭隘偏激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新闻记者和作者似乎是为他们彼此和为一个小圈子而写作，忽视了广大群众和他们的利益。”

英语。但是他没有为英语作为官方通用语的继续存在提请议会作出必要的法律修改，也许他认为到宪法正式生效后再修改也来得及。但是尼赫鲁没能活到那一天，在 1964 年就去世了。来自狂热的印地语之乡——北方邦的夏斯特里当上了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夏斯特里与尼赫鲁的态度不同，由于他本人来自印地语邦，起初在推广印地语方面很是积极，他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示用印地语取代英语的法律必须按时生效。随着宪法规定的印地语正式取代英语的日期日益临近，南方各邦逐渐骚动起来，1965 年 1 月南方的讲泰米尔语的马德拉斯邦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狂热的民众高呼“打倒印地语”、“印地语是毒药”等口号，焚毁了政府建筑物，撬断铁路轨道，切断对外交通。军警与民众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并有人为此自焚而死。各行各业停止了营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宣称要把“共和国日”变成“丧日”。同时反对印地语的运动还迅速蔓延到迈索尔，安得拉邦，喀拉拉邦等南部各邦和西孟加拉等非印地语邦。抵制印地语的群众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中央联邦政府内阁中担任印度粮食部长的苏布拉马尼亚姆和石油化工部国务部长阿格拉桑，——他们都是讲泰米尔语的南方人——认为保护自己政治前途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辞呈，他们要求夏斯特里修改宪法，作为解决语言争论的一种办法，另外至少还有 3 名内阁成员站在他们一边。夏斯特里对南方在印地语问题爆发出来的强烈的怒气以及自己政府内部在语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团结感到异常震惊。然而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本人即来自印地语的中心，尽管他在几次全国新闻讲话中都追述尼赫鲁的保证，并保证严格履行尼赫鲁的承诺，然而并不能得到南方各邦的信任。在关键时刻，身为政府宣传与广播部长的英迪拉·甘地前往马德拉斯，抚慰当地民众的愤怒情绪，并且再次向马德拉斯民众重复了尼赫鲁 1959 年的讲话，并暗示为了在文字和精神上严格执行尼赫鲁的保证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得到政府的考虑。1965 年 2 月，印度所有邦

的领导人和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执行三语方案，以促进这个国家的团结和促进这个国家的人民之间更自由的交往。1965年6月2日国大党中央执委员通过决议，一致决定修改《官方语言法》，让印地语和英语一样继续作为官方语言，才平息了这场语言纷争。有了语言邦的非印地语各省对印地语的态度尚且如此坚定，更何况一直没有成立语言邦的旁遮普锡克。政府非印地语各省态度都这样退让，那么在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再次拒绝很难说得过去，英迪拉·甘地就主张满足锡克人的要求成立旁遮普语言邦。尽管她多次要求同夏斯特里进行会谈，都遭拒绝，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不断寻求党内外团体和政府内部的支持，并且最终得到令其满意的结果。1966年3月18日，印度政府的议会委员会递交了报告，“这个邦绝大多数的人民现在支持在语言基础上对这个邦进行重组。”^① 建议：“在1957年地区委员会法令第一个方案中的旁遮普语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单一的语言邦。”^② 将旁遮普省的山区并入喜马偕尔省，南部哈里亚纳地区组建成一个哈里亚纳邦。1966年3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接受议会委员会的建议。联邦内政部长古尔扎里·拉尔·南达于4月23日成立一个以J.C.沙阿为主席，M.M.菲力普和S.杜特为委员的三人委员会。1966年5月31日，沙阿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它的报告，国大党议会党团在经过一些修改之后作为旁遮普重组法案在人民院提出，分别于9月7日得到议会通过，于9月18日得到总统批准。1966年11月1日，一个以旁遮普语为邦语言的旁遮普语言邦终于出现在印度西北边境的版图上。

从整合政治的角度，我们从长期的语言邦运动历史进程中能

① 保罗·R.布拉斯：《北印度的语言宗教和政治》，德里，1975年，第192页。

② 《论坛》，1966年3月19日。

够看到什么呢？在锡克要求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中，明显地存在三股政治和社会力量；这三股力量是：以阿卡利党为主的要求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力量；以人民同盟，圣社等为首的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力量；以国大党为首的在中央政府和旁遮普执政的世俗政治力量。阿卡利党的建立语言邦的要求，是它为了保护锡克人利益的一种尝试方式，这种尝试方式既是对独立前锡克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利益保护的继续，又是对印度分治时锡克遭受的惨重灾难的反思的结果。其间阿卡利党经历了领导层的交替变换，终于实现了建立一个旁遮普语言邦的愿望，语言邦的建立是锡克保存自己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锡克能够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管理的最佳途径。按语言建邦是国大党在印度邦际行政区划上的最重要的依据，阿卡利党的建立锡克语言邦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旁遮普，语言和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语言同行政管理的划分联系在一起时，语言、宗教和政治三个因素就混在一起，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对处于边境的锡克教派主义的戒备和疑忌心理使得旁遮普语言邦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这种心理一方面来自于对独立前锡克作为一支较为活跃的地方政治力量的戒备。这种地方政治力量极力主张本社会与印度教社会的区别明显的独特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曾提出一个独立的锡克邦而产生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锡克政治走向的担忧；另一方面来自于尼赫鲁本人雄心勃勃的国家整合计划。整体上说，独立后印度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策。在语言邦问题上，对同属印度教文化地区的语言邦要求尚能够接受，而对处于少数地位的非印度教文化的地区就坚决拒绝。并且将少数民族的要求都扣上教派的或者地方主义乃至分离主义的帽子。他以印度教文化的有色眼镜看待印度地方上存在的不同文化（或者亚文化）差异，造成少数民族与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整合上的认知差异，和少数民族与

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这是包括旁遮普在内的印度东北和西北地区在国家整合中长期处于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生活在旁遮普的反对旁遮普语言邦的印度教徒而言，由于独立前印度教徒的宗教复兴主义组织圣社是一个具有比较强烈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组织，在教派的斗争殃及语言时，它并没有接受旁遮普地区特别是旁遮普语区除了锡克说旁遮普语外，还有大量的印度教徒说旁遮普语这一现实，反而在独立后的人口调查中，出于教派利益的考虑，要求大量印度教徒否认旁遮普语为其母语的现实，将印地语作为母语填入他们的人口调查表中，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旁遮普语地区锡克对印度教势力可能将这个社区完全融入印度教社会中的恐惧，处于强势地位的印度教社会的政治教派组织既然能够出于教派利益的考虑连自己的母语都会否认，那么，它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种做法只能加剧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存在于语言上的教派冲突。反过来又使得处于尴尬地位的旁遮普语区的印度教徒加强其印地语的要求。在旁遮普省中本来就明显地存在着以哈里亚纳地区为主的讲印地语的地区和存在于旁遮普省北部的讲旁遮普语的地区。旁遮普语地区的印度教徒加强印地语地位的要求只能加重本来就讲印地语的哈里亚纳地区为一个双语邦的存在承担的语言义务。长此以往，导致哈里亚纳地区的印度教徒的社会组织和政治领导人，认为本地区印度教徒与讲旁遮普语地区的印度教徒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之本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希望独立出来建立一个单独的哈里亚纳语言邦，这种建立哈里亚纳语言邦的要求在 50 年代即已存在，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强大，为最后重组旁遮普语言邦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

旁遮普的国大党，在重组前一直是旁遮普第一大党，也是旁遮普政府的执政党。与人民同盟和阿卡利党这两个只向本教派社区寻求支持不同的是，在旁遮普重组之前和重组之后一直是一个跨

教派的政党，能够在教派之间构建一种联系的桥梁。在该地区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哈里亚纳地区的印度教徒清楚地认识到分治符合双方利益之前，在语言和教派问题上，在教派对立的旁遮普邦中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凝聚力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国大党作为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政党，在语言邦问题上邦国大党内部也反映出社会各主要部分的意见，分成了各个不同的集团，教派主义的锡克要求在旁遮普语地区以旁遮普语作为惟一的官方语言，教派主义的印度教徒则实际上希望将旁遮普语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锡克社区语言，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世俗主义领导人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则在这两派要求之间极力进行调和，从萨恰尔方案到地区方案，从地区方案到统一方案，到尼赫鲁干脆宣布旁遮普省就是旁遮普语言省，在各派意见之间进行折衷，力求使各个派别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满意度。在哈里亚纳邦反对在印地语地区强制教授旁遮普语之前，萨恰尔方案很符合国大党的心意，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方案。如果旁遮普本身就是一个双语国家，那么这个方案肯定会被接受，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印地语为全国通用语的国家内，它只会使旁遮普哈里亚纳的印度教徒和旁遮普锡克教徒认识到生活在同一个邦内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国大党政府在教派斗争中逐渐后退，最后终于同意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表面上看起来，它认识到了各派意见已经是截然有别，只有在语言基础上重组旁遮普才是惟一出路，但是这种长期伴有教派之争的语言邦斗争必然会有其长远的不良后果。与其是在不断压力下逐步退让，不如尽占先机，在独立后尽早履行曾经对锡克许下的让锡克在印度联邦之内有一个家园的承诺。这样，一方面既能表现出中央政府对已经受到分治伤害的锡克同情与关心和对锡克民族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视，抑制乃至消除锡克内部出现的教派极端主义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使锡克社会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有特殊性的群体，真正感受到自己确实受到尊重，没有因为自己

曾经有过独立的要求而在印度联邦之内有一种被疏离的感觉，并乐意于真正作为这个新生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印度政府的整合发展政策，逐渐融入到这个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而让锡克经过长期斗争最后才让他们获得语言邦，必然造成这样的后果：其一，使旁遮普的教派势力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锡克社会对本民族的特殊性的一面更加强调，更加敏感，语言邦的成立只会导致教派之间语言地位的转换，在新成立的语言邦内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教徒也会提出加强印地语的要求，使得语言问题并不能因为语言邦的成立而得到解决，反而会因教派间的矛盾长期化。其二，在锡克方面会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一方面本民族在这个社会中受到一定的歧视，尽管这种歧视无法用具体的数字进行表达，但是存在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种感觉并不会因为实际上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锡克利用教派的手段和世俗的手段，采用各种方式通过长期的斗争获得语言邦的历史，又给锡克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使他们最终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强调自己与其他社会的区别，坚持斗争最终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民族国家现代发展过程中总会不断有新的矛盾出现，这种新的矛盾，有时会更加激烈，善于利用有效的历史因子的锡克自然不会放过，在新因素的刺激下，从而有可能产生出更加激烈的斗争形式。这样必然会对中央政府的整合发展政策构成新的挑战。

当然就要求语言邦的阿卡利党方面而言，也存在着问题。由于其领导人塔拉·辛格长期以来在追求一个合理的民族保护和地区发展中，追求一种偏激的文化要求，对造成中央对旁遮普语言邦要求的不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塔拉·辛格等早期的锡克领导人多是来自西旁遮普的都市工商业者，他们在印度分治后进入印度与印度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强烈，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要求特别迫切，因而体现在语言邦的要求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这与占锡克主体的贾特锡克不同，锡克教在后者身上体现为宗教

与文化传统的有机统一，而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谋取利益的工具。只是在法特赫·辛格的领导下，明确了建立语言邦只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调整，没有宗教考虑。并且通过对旁遮普的各个社会集团进行不断地宣传和解释，才使人们能够理解这种要求的合理性。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共同作用，语言邦的要求终于被接受。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不能不看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中央政府来说，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而且不是在指导思想有了彻底改变的结果，自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第三章 印度的政经危机与 阿兰德普尔决议

语言邦的建立既没有解决由来已久的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地位之争，它仍然是一个影响重组后印度旁遮普邦政治发展的一个内容，而印度独立后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所引起的政治方面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迟缓与不平衡，造成了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对政治权力和稀缺经济资源的争夺成为新时期印度社会各个集团斗争中一个显见的亮点。在旁遮普兴起和发展繁荣的绿色革命使得旁遮普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出现的超出文化发展范畴的新矛盾成为引人关注的对象。而锡克阿卡利党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阿兰德普尔——萨希布决议正是对这些新矛盾进行审视，并作出的反应。这份极富争议的决议影响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期的旁遮普政治。本章将研究导致这一颇具争议性的决议产生的诸多背景因素，并对这一决议本身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印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整合力所遇到的新挑战。

第一节 印度政局的变化与 英迪拉的政治方式

印度国大党本来就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政党，在它的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它能够最大限度

地团结起全国人民，投入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但是，经过独立后 20 年多的发展，印度的政治态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开始影响全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使印度的政治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

作为独立初期印度最大的政党国大党方面的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尼赫鲁之后的国大党缺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领袖，形成党内全国性领袖的欠缺。在尼赫鲁当政的十多年间，随着同他一道参加独立运动并具有同等声望的政治家相继去世，尼赫鲁的个人权力迅速上升，并逐渐集国大党的组织领导权和中央政府的政治领导权于一身。在尼赫鲁任总理期间，在中央政府内阁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连那些所谓政治基础牢靠的高级成员，在发表意见前，也要看尼赫鲁的脸色行事，几乎没有人愿意发表同尼赫鲁直接抵触的意见，没有尼赫鲁的同意，任何重要的议案都不会得到通过，任何重要的问题也都得不到解决，尼赫鲁本人所拥有的权力之大，以至于反对党的议员讽刺说议院都成了尼赫鲁的私人会客厅。在组织人事方面，无论地方各邦的领导人，还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都是经尼赫鲁提拔起来的，缺乏自己的政治基础，只能在尼赫鲁的支持下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这些人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自然也完全取决于尼赫鲁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一方面国大党内缺乏培养具有全国声望的领导人的氛围，另一方面尼赫鲁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也没有认真着手对后备全国性领导人的培养，以至于在尼赫鲁死后，在推举全国性领导人问题上，国大党内出现无人继的现象，拉尔·夏斯特里和英迪拉·甘地的当选都是党内派别斗争的产物。其二，国大党组织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党内派系斗争和分裂趋向严重。一方面，独立后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虽然政党众多，但是在独立初十多年中印度政坛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在中央和地方都是国大党的一党民主制的局面。由于国大党一直是中央和地方许多邦的执政党，党的大部分领导

人都有机会加入各级政府，获得一官半职，有才干的党员也都愿意进入政府任职，不愿去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的清贫工作。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国大党领导人疏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会议也很少开，或者即使开也是流于形式，党成了在中央政府中执政的尼赫鲁的应声虫，党的声望受到极大的影响。党员的发展也同选举联系在一起，常常在选举前突击发展党员。党的组织工作逐渐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党内人才缺乏，尤其缺乏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干部。党的纪律松弛，国大党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日益减少，在议会中的席位随之下降，尽管后来国大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出台了相应的组织措施——卡马拉季计划加以弥补，让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一部分高级官员辞职，专门从事组织工作，但也未能挽救国大党组织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另一方面，国大党内部各派之间因为独立后民族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实施后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出现了新的矛盾，代表各地方利益和集团利益的政治家纷纷出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地方政治基础的政治家。而地方邦的国大党要维持自己的声望，就必须满足当地利益的要求，否则它就无法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这样也出现了国大党地方化的倾向，出现了一批虽然在全国名气有限在地方上却颇有实力的领袖人物。尼赫鲁执政末期，在中央政府和国大党内的辛迪加派的政治家就是典型。1964年4月尼赫鲁去世后，国大党各个邦首席部长在挑选夏斯特里和以及后来的英迪拉·甘地为总理一事上表现出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这些领袖人物的政治影响力是同当地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所代表的利益不一定与国大党全国利益相一致，地方各邦与中央的矛盾反映在国大党内部就是国大党组织上的分裂。

表现在非国大党各政治组织方面，就是这些非国大党组织的力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的所作所为必须从全局着眼，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要照顾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往往会顾此失彼。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多有不便，而反对党，

更多的是地方性的政党，他们能够灵活地反应地方利益团体和政治集团的愿望，政策更为灵活。同时，由于它们不是执政党，对于国大党实施的各项政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尽可以夸大评说，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国大党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又确有许多让人诟病的地方。这样他们逐渐赢得了地方民众的支持。左派的印度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最为明显，尽管它在印度独立后政治上屡遭印度政府的限制，也同国大党及其他政党一样，内部矛盾不断，并经历了组织上的分裂，但是它经过努力，成为第一个打破国大党在邦一级的政权垄断局面，赢得邦政治管理权的政党。印度的右派政党和一些地方政党，印度人民同盟，自由党，社会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等也在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以印度人民同盟为例，它是原印度教大会的副主席阿马·普拉萨德·穆克吉于 1951 年 10 月成立的，由于它坚决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教派主义政治立场，赢得大批具有教派思想的印度教徒的支持，很快就成了四个全国性的政党之一。一部分国大党人因为党内矛盾而离开国大党或建立新党，或加入原有的地方政党，一方面加强了反对党的力量，一方面削弱国大党一党执政的能力。国大党保持政治上一致和稳定的能力减弱了，而反对党却利用国大党力量下降的机会，结成联盟反对国大党，力图在人民院议员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增强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这样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出现的政治格局是：国大党占据着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它的群众基础日益缩小；共产党从左面，保守势力和教派势力从右面对国大党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1962 年印度第三次大选的结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国大党已不能很好地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同时它也开始逐渐丧失作为一个容纳和保护新政治集团利益的政党而发挥凝聚作用的能力。1967 年印度第四次大选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新的政治态势，国大党在印度北部 8 个大邦中失去了控制权，创下一大记录。人们如果

在印度河——恒河平原上旅行，就可以发现从加尔各答到阿姆利则没有一寸国土处于国大党的控制之下。在人民院中国大党也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国大党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是印度现代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一党统治中央和多数邦局面的结束。

国大党一党民主制政治局面的结束促成了印度国大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政治策略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党内派系斗争日益尖锐化，并且导致国大党的第一次全面分裂。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之所以能当上总理，就已经是派系斗争的产物，他去世之后，政治资历极浅的英迪拉·甘地被辛迪加派作为排挤政治对手的工具扶上了总理宝座。然而，她不甘心做他们手中的驯服的工具，巧妙地利用国大党内部激进派与元老派的斗争，不断扩充个人的势力，迅速摆脱元老派的控制，努力效仿她的父亲，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这自然会遭到各主要政治集团的反对。正如 1969 年 10 月 28 日，国大党主席尼贾林加帕写给英迪拉的措辞激烈的信中所说的，“你似乎已经将对你的忠诚与否看作是对我党和对国家忠诚与否的标准。”^① 由于党内激烈斗争的结果，1969 年国大党分裂成国大党(执政派)和国大党(组织派)。国大党(执政派)的组织力量同未分裂前的国大党相比，约失去了 40%。^② 国大党的分裂使得它作为一支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国大党(执政派)在各邦的力量也大大削弱。在地区的和种姓的追随者中有政治基础的著名派系领袖，出于对他们在国大党内分得的席位数量的不满，纷纷宣布退党。国大党被党内纷争和派系纷争弄得焦头烂额，根

^①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施美华等译)，第 121 页，北京，1992 年。

^② 弗朗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文版，孙培钧等译)，第 493 页，北京，1989 年。

本不能捍卫它所制定的各项政策，自然也无法提出一项可以改正过去错误政策的新战略。与过去相比，国大党（执政派）更加依赖在民族民主运动中赢得的、现已日渐减少的政治资本，也更加依赖英迪拉·甘地对群众所具有的号召力——这位领袖因为有着与尼赫鲁的血亲关系，因而与那段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其二，在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情况下，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迎接党内各集团各地方派系及非国大党的挑战，光靠与尼赫鲁血亲关系这一魅力光环，肯定维持不了多久，而国大党旧的调和一致的政治风格已不适应新的形势。^① 因此英迪拉·甘地在国大党的政策纲领上，将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奉为圭臬，执行一种具有强烈机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为了捞权和执政不择手段，建立了一套英迪拉·甘地为中心的政治制度。

首先，在政府内部，她起初在与包括辛迪加派集团在内的党内派别斗争中，不断进行内阁改组，排除那些敢于对抗她的政治人物和小集团，像莫拉尔吉·德塞，内政部长南达等人。她将中央政府重要的行政部门，以及警察和情报部门都置于她一人控制之下。她在 1971 年大选中，通过提出激进的口号，撇开国大党的组织，实施直接向选民发出竞选诉求，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她使国大党内所有当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取得席卷人民院的胜利完全是“沾了甘地夫人的光”。她是国大党必不可少的人物，同时也是惟一位能够拥有超越地方、宗教和种姓界限的追随者的政治领导人。她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支持，她不需要从各邦党组织的意见一致中吸取力量。^② 她利用选举的胜利不断削弱邦一级

^① 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文版，孙培钧等译），第 492 页，北京，1989 年。

^② 弗朗辛·R·弗兰克尔：《1947—1977 年的印度的政治经济》（孙培钧等译），德里，1978 年，第 460 页。

党魁的地位，削弱他们在邦的政治机构中的个人控制权。这种做法不能改善国大党的组织基础，反而使国大党的组织基础越来越薄弱，只会使各个邦的国大党领导人越来越依靠英迪拉·甘地的影响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

其次，英迪拉在与国大党内辛迪加派的权力冲突和分裂国大党的斗争中，利用党内少壮派控制的社会主义行动论坛将她与辛迪加派的权力斗争定性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主张社会主义、主张变革，主张在党内充分实行民主和讨论者为一方，与主张维持现状、主张贪图安逸、不主张在党内开展充分讨论”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是“对于国大党的目标和它本身进行活动的方法所持的两种观点两种态度间的斗争。”^① 为了弥补国大党分裂后组织领导力量上的薄弱，她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保证要支持的不是党，而是支持符合于她个人领导的政策。她重新恢复了在国大党各级组织中已基本上名存实亡的青年国大党，并建立独立的全国学生联盟，以便于在大专院校开展政治工作。青年国大党作为英迪拉组织上的助手，其潜力是相当巨大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年国大党除了在少数几个邦仍有活动外，在其他邦中早就停止了活动。新的青年国大党组织以特别委员会的形式来建立，由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新任命的全国青年咨询委员会来提名。被他们吸收来建立邦一级组织的各邦召集人，大都是国大党的新党员，之所以吸收他们从事党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忠于甘地夫人，把她作为新的社会主义信仰的化身，他们保证要直接支持的不是党，而是“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同事”。青年国大党活动的中心是城镇。青年国大党在建立初期曾经一度变得激进化，但是很快就成了英迪拉的忠实的政治工具。在紧急状态期间，

^① 弗朗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490—491页。

青年国大党在甘地夫人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推动下,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组织。他于 1975 年 12 月当选为青年国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利用自己的影响让自己的亲信成了这个党的主席,他还对这个组织的各个部门实行大改组,撤掉了许多青年激进分子的领导职务,桑贾伊凭借他在国大党内担任的这一惟一职务,把青年国大党变成了与正规的国大党平行的组织和实现他个人权力的工具。这个组织宣称它在 1976 年 1 月到 1977 年 1 月的一年中,在 15 到 35 岁的年龄段的国民中,吸收了 500 万以上的党员。在 6 千个区内成立了青年国大党组织,(人选全部由上面指定),其力量一度令人望而生畏。新成立的印度全国学生联盟在全国大专院校中建立全国学生联盟的支部,吸收青年学生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青年国大党和学生联盟成了重建国大党的邦一级和县一级组织的主要政治力量。此外,在选举中国大党(执政派)各组织还试图从社会中吸收代表不足的社会集团如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少数民族、落后的种姓和部落以及穷人进入国大党组织和国大党议会党团,尽管最终没有成功。

由于印度宪法和国大党制度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特色,因此这个新的政治进程不需要进行重要的结构变革。一个新的政治集权统治的模式可以通过动用以前的蛰伏着的制度权力利用党内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进行运作。^①这正是甘地夫人所做的。也因为她能够将权力集中于她的手中,能够直接向选民发出呼吁,从而为国大党赢得大量选票。到 1971 年底人们将甘地夫人称作“印度的女皇”和“萨克蒂的化身”,等等。她像女皇一样,除了是国大党不可缺少的领导人之外,也是所有合法权利的源

^① 斯坦利·A.科恰奈克:《甘地夫人的金字塔:新国大党》,引自亨利·C.哈特:《英迪拉·甘地的印度:一个政治制度的重新评价》,科罗拉多,1976年,第95页。

泉和国家的象征。^① 她像杜尔伽一样，甘地夫人运用巨大的权力摧毁她的无论是保守的反对派还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对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甘地夫人既缺乏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没有组织能力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政党改革，而这却是她所保证履行的通过和平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诺言所必不可少的。

在缺少一个新的政治构想的情况下，国大党采取的经济政策与其过去 20 年来所作的那样没有根本差别。即使在 1971 年选举前夕提出“消灭贫困”的口号时，甘地夫人告诉她政府中的同事、党的官员和各级组织，说她不相信教条主义的政治，只相信用她自己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获得社会主义的目标。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对这个目标的嘲弄。1972 年 6 月在德里召开的国大党议员的秘密会议上，她嘲笑那些在她与保守的国大党领导人斗争时是她盟友的激进主义者，仅仅因为他们要求这个党更加忠实地履行竞选宣言中的诺言，特别是有关土地和都市财产最高限额的诺言。她的这种做法势必导致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根本无助于印度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这也必然导致她一度建立起来的政治声望的消褪，同时她本人的集权政策也招致越来越多的党内外政治家的反对，以至于在她的声望达到第一个高峰之后不久即开始出现领导危机。

1972 年到 1973 年，无疑是印度独立以来经济上最糟的时期。除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及收容孟加拉难民所付出的巨额费用外，印度于 1972 年还遇到了普遍的旱灾，灾情严重且受灾面广，不同程度地影响近 1 亿 8 千万人的生活，政府在匆忙中组织起来的救济事业，雇用了 9 百多万人，还有好几百万人完全陷于赤贫状态。在古吉拉特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些地方连饮水都供应不上，千百万人只能每天向私人慈善机构举办的免费伙房乞食，旱灾引起水力

^① 阿马尔吉特·S. 纳朗：《民主制度的发展与扭曲》，新德里，1986 年，第 85 页。

发电不足，使钢铁、肥料、水泥和棉纱产量纷纷严重下降，1972 年到 1973 年物价上涨了 22%。另一方面，在她执政时期，官员的政治标准令人痛心地进行降低，各级领导包括最高领导人令人惊愕地腐败，大肆滥用职权，行政效率迅速下降。而英迪拉内阁中的两个高级部长卷入其中的数目巨大的非法选举集资案所引出的问题，以及她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的马鲁蒂轿车案使得英迪拉的个人声誉严重受损。大多数人相信，尽管英迪拉本人没有什么贪污舞弊行为，但她并不反对同贪污分子妥协，假如符合她的政治目的，她还包庇他们。^①

由于经济危机和印度公众对中央及邦政府许多部长廉洁性的日益怀疑，到 1973 年底，人们中间对这种政治领导产生了一种蔑视情绪，而这种情绪又使各级官僚更加腐败和顽固，反过来又在广大人民中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并且产生了一种一般公众无视当局的情绪。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不断，根据圣雄甘地非暴力精神建立起来的国家，现在充满了一种新的暴力精神。^② 面对这种状况，英迪拉·甘地显得出奇的无能，她能够适应战争和经济危机，却不适应长期领导的现实主义，表现在她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以争取民众的选票，另一方面却又从大企业手中接受大量捐款，以用于选举。最后，面对 1974 年 6 月全国性的反对英迪拉·甘地让其下台的 JP 运动，她只有宣布这个国家处于“内部紧急状态”。将所有与她不合作的反对派政党的领导人都投入监狱，紧急状态的实施导致印度独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民主进程的中断。紧急状态期间国大党执政派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口号：“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就

^① 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03 页。

^② 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04 页。

是英迪拉”。这期间中央政府所使用的各种加强集权政治手段给印度的民主政治进程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且对旁遮普的政治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第二节 政治变动对地方邦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影响

一、印度联邦制的中央集权性特点

1950年印度制定了第一部联邦宪法，但是从印度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这部法律却是英帝国统治下宪政体制发展的继续。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所有权力都在英印总督一人之手，直到独立没有实行过联邦制。20世纪初，印度各政党的领导人才开始对印度的中央与省的关系进行讨论。1916年当时印度两大政治组织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在勒克瑙达成协议，他们一致同意将来印度独立之后将实行联邦制度，而不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协议中可就联邦中央与各省在立法、财政和行政等问题实行分权提出一些措施。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印度各土邦王公和穆斯林联盟组织的代表都表示支持在印度实行联邦制。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印度实行省自治，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一定程度分权的联邦制度。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度向中央集权方向发展，尽管中央仍具有压倒优势的权力。到1946年独立前印度国大党努力说服穆斯林联盟不脱离印度时，通过的政体构想也是松散的民主制度。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的制宪会议面临两种选择，或制定联邦宪法或制定中央集权法律。但当时印度面临的是几百个土邦与数个省混杂在一起的分裂局面，土邦不愿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内失去各自的权力，只同意在国防、交通和外交问题上放弃

部分权力，况且省自治也实行了一段时间。印度政府在这一形势下，选择了联邦制。1949年11月，印度宪法规定，印度为一联邦，是一个具有议会制政府的“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

印度虽然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由于有着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无论是以前的莫卧儿帝国还是以后的英国，他们所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制度，所以印度联邦的权力中心在联邦中央政府，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联邦的法律上。与美国，瑞士等联邦制国家不同，印度只有一部宪法，各邦无权制定宪法，也无权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印度联邦议会有权设立新邦，有权变更各邦的面积，边界和名称。联邦议会规定国家国防、军事、外交、外贸交通、邮政等稳定国计民生的最重要事项，在邦和联邦与邦共享的部分权力上，只是一些较为次要的权力。我们可以从政府间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立法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三个重要方面进行分析。联邦宪法在立法、行政和财政方面，通过将联邦宪法中的第七表第一附表《联邦职权表》，第二附表《各邦职权表》和《联邦与各邦兼有之职权表》，对联邦，各组成邦和联邦与各组成邦的共享权力作出了明确的划分。表面上看法律条文相当明晰，如果我们对这三个方面稍加剖析，就可以发现印度的联邦制所蕴含的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在许多方面与单一制国家有着许多相近之处。

在立法关系方面，联邦的立法权高于各邦的立法权，联邦有权将原属于各邦的权力收归中央，尽管联邦与各邦之间就立法权分得很清楚，但是印度宪法第二百四十九条明文规定，“若联邦院经出席表决议员 2/3 多数决议，宣布为国家权利，国会宜应或必须就决议中所指定各邦职权表列举之任何事项制定法律时，在决议有效期间，国会为全印领土或其任何部分制定有关该事项之法律，应属合法。”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这一条款将原属于

地方各邦的权力转给联邦政府。当中央和地方邦在某一项目上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发生相互抵触时，各地方邦要对该法律进行修改，或将其废除，以服从联邦政府法律。有的事项既列入第一表又列入第二表，那么联邦的法律或政策居优先和主导地位。印度宪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印度宪法，联邦没有权利为各邦制定法律，但是“倘两个或以上的邦认为宜由国会以法律规定时，经各该邦议会各院通过如上之决议后，国会依此而通过对该事项之立法，应属合法，如此通过之立法得适用于各该邦，并得适用于以后经邦议会或其两院通过决议通过该立法之各邦。”一旦出现例外情况，联邦议会则可以代替邦议会制定某些法律。这在印度宪法第二百五十条第一款中说得很清楚，“国会在紧急宣布施行时，应有权为全印领土或其任何部分制定有关各邦职权表所列举之任何事项之法律”。如果邦立法机构失灵，总统可以宣布赋予联邦议会为邦立法的权力，有些法案由邦政府提请总统考虑，这些法案只有经总统同意才能生效，当然总统对这些法律既可以表示同意也可以表示不同意，有些法案得不到总统的批准便不能向邦议会提出。此外，印度宪法中就联邦职权表、各邦职权表和联邦与各邦兼有之职权表中没有列入的项目，印度宪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国会就共同职权表及各邦职权表所未列之任何事项，单独享有制定法律之权。”各邦对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在行政关系方面，印度宪法详细地制定了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应在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行使职权的规定，因此不存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冲突的问题。从联邦宪法就联邦和中央的行政权力的划分上，中央的权力也居于主导地位，地方各邦也被降为附属地位。正如一位法国著名法学家所说的，“印度联邦当局在美国无可比拟的条件下，享有广泛的特权，可以在各邦发生特殊情况时进行干预，以维护秩序和和平，当一个邦认为难以控制或者在发生危及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威胁而要终止公民的基本自由时，曾经大

大利用这些条款。”^① 宪法规定，各邦行使行政权力的前提是应遵守联邦议会通过的法律和适用于该邦的现行法令法规，不应侵犯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印度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明确规定，“各邦行政权的行使，不得妨害或损及联邦之行政权，及联邦对各邦给予印度政府认为必须指示之行政权。”联邦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向各邦下达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指示，如果邦政府违反上述法律和指示，联邦政府可以宣布该邦处于紧急状态，也可以派遣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进入该邦强制实施这些法律。联邦政府有权宣布具有全国意义或者军事意义的交通工具，铁路，公路，水道为国道，并对其保养及发展实施国家行政权，地方各邦无权阻止。在这些设施的保养方面，中央政府可以与各邦协商给予各邦一定的款项，如果协商不成，则由最高法院的法官加以裁定。总统在征得一邦政府的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授权地方政府付托该邦政府或其官员有关联邦行政权所及之任何事项之职权。”国会可以制定法律，规定地方各邦官员及其机构行使有关职权，“国会制定适用于各邦之法律得对一邦或其官员及机构授予权力及职责，或核准权力及职责之授予，纵令该邦对此事项无权制定法律”，其费用由中央和地方协商拨付给地方，如果协商不成，则由最高法院法官裁决。邦长在征得联邦政府同意后，同样可以委托联邦政府及其官员或有关机构对本邦权限内的事项行使职权。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中央政府可以给各邦发布行政命令，也可以由总统接管各邦除邦议会和高等法院实施的权力以外的一切权力，对邦际之间纠纷的调查和建议，对于诸邦间的共同利益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协调和行动等，总统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设置一个委员会，并规定这个委员会的职务，组织和运作程序，而“有关任何邦际河流或河谷之利用，分配及管制而发生之纠纷与诉讼之审判，”宪法二百六十二条明确规

^① 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定由国会立法加以规定，而且对上述纠纷，国会还可以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独享这一权力，排除最高法院或其他任何法院的管辖权。

在司法行政权方面，印度实行的是单一的司法体制，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对联邦及各邦之公法行为，记录与司法程序，应予以完全之信任。”也就是说印度境内任何地区的民事法庭发布或通过的最终判决和通告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联邦有权在各邦设立有院本部的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无论是邦一级的高等法院，还是下一级的法院，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最高法院管辖。在各邦工作的高等法院法官的任命和调动，也都由联邦政府决定。

在行政人事权力方面，印度实行的是单一的公务员制度，尽管有邦公务员和联邦公务员的区别，在各邦工作的公务员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邦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和邦的首脑，由总统任命，他的薪俸，津贴和休假都由联邦政府决定。邦议会的选举及选举委员会也由联邦政府决定。邦议会的选举应在总统任命的选举委员会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联邦有权对各邦账目进行审核，联邦可以在得到邦同意的情况下，将一邦的警察管辖权扩大到外邦。中央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各个邦的政治。

在财政关系方面，由于财政是政府活动的基础，决定各级政府实现法定职权的能力和水平，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实际权力的晴雨表，财政关系是建立在财政体系上面的，印度的财政体系也是集权型的。根据印度宪法，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财政独立，开支分开独立核算，宪法对联邦和邦的收入来源，税收的项目和分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列入中央政府税收的主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税收项目，如农业税以外的所得税，关税(包括出口税)和烟草和其他货物在印度出产和制造税，公司税，个人与分司资产(耕地除外)之资本价值税；公司之资本税。关于耕地以外的财产的遗产税和继承税。由铁路，海路或空中载运货物或旅客的终点税，铁路车票与运费税，印花税以外对证券交易与期货市场业务的其他税，有关汇

票、支票、期票、货单、信用保证书,保险单,股份移转证,公司债券,代理状与收据的印花税率,报纸买卖与其他刊载广告税。另外联邦政府出于中央财政的需要,可以对一些税目,额外加征一些税收,这些税收年得为联邦政府独享。联邦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还在 1959 年将原先邦有资格参与分配的公司税,归属到社团税中,对此邦政府是无权参与分配的,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邦的财政收入。在联邦还有权设列三个表中都没有列入的新税目。

而列入邦政府税收的主要项目有土地税(包括土地税估价与征收,土地册籍的维持,为征税目的的测量,与权利的登记及税收的让渡)。农业所得税,耕地的继承税和地产税,土地与建筑税,受到国会法律限制的矿权税,在邦内制造或生产的酒类,鸦片,印度麻和其他麻醉剂,为消费使用和出售目的而进入某一地区的货物入口税,电力消费和出售税,报纸以外其他货物的出售或购买税,报纸所刊载广告以外的广告税。由公路或内河航线所承运的货物与旅客税,公路车辆税,动物和船只税,通行税,职业工艺与雇佣税,人头税,奢侈税,等等。

印度宪法在联邦与各邦兼有的职权表中规定,下列各税:(1)除耕地以外有关财产的继承税;(2)除耕地外,有关财产的地产税;(3)由铁路,海路,或空中载运货物或旅客的终点税;(4)铁路费与运费的税;(5)印花以外对股票交易及期货市场业务的其他税;(6)报纸买卖与其刊载广告税,由联邦政府划归给各邦政府。农业税以外的各种所得税,按法律规定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各邦之间进行分配。另外由联邦政府征收除药用和化妆配制品以外的货物税,其中一部分由议会以法律确定的原则拨付给各邦。对西孟加拉,比哈尔,阿萨姆,奥里萨等邦,中央政府每年按规定从印度统一基金中拨付税收补贴,以代替本应划归这些邦的黄麻,及黄麻制品的出口税留成。对于联邦政府认为需要帮助的邦,中央政府每年从印度统一基金中拨付一定的补助款项,其数目以法律加以规定,

各邦可以不同，对表列部族聚居的地区，这种拨款给予特别的照顾，以增加他们的福利，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印度宪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由国会以法律规定，以补助国会所决定需要补助之诸邦之收入之款项，每年应自印度统一基金中支付，对于不同的邦，得确定不同的款额。但自印度统一基金中得以资本及多次款额拨付某邦作为补助，以应该邦经印度政府核准而实行为促进“表列部落”的福利，及提高“表列区域”行政使与该邦其他区域水准一致的发展计划所必须的费用。从联邦政府及各邦所享税源及联邦对各邦财政税收的拨付来看，联邦政府掌握和控制了对财政税收而言最具重要性的项目，而邦政府有权征收的税收种类虽然名目众多，但是每个税项征收所得极为有限。各邦根据自己所获得的征税权获得的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邦政府的日常支出，更谈不上用于邦内的发展项目，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以财政收入分享和补助资金拨付的形式对邦财政加以支持。这样邦在财政上的独立性的缺乏，为联邦政府干预各邦的事务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改革联邦政府与各邦关系的提出

独立初期 10 多年内，印度虽然许多党派参加政治选举，但是都没有能够撼动国大党在全国及至所有邦的领导地位，印度的民主事实上就成了一党民主制的天下，在联邦政府和所有地方各邦政府都由国大党在执政，偶然在一两个邦出现异党执政也无碍大局，国大党也能与之和睦相处。在这种情况下，联邦与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重视，相反中央的政令可以在地方上得到很好地贯彻，集权制的联邦给人一种全国上下一心的感觉，有助于印度政府集中所有可能动用的资源，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发展计划，有利于协调地区之间和地方政府间的不平衡。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国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内各个地方政党在新的形势面前，都在寻求自己的发展机会。国大党作为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政党，无力包容各个互有矛盾的集团，国大党内出

现分裂，国大党外原先就存在的各个党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之国大党的发展战略造成的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上多次危机的出现，人们对国大党的信心下降，国大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地方政党势力迅速崛起，到 1967 年全国大选时，国大党一下子在北部 8 个邦中失去了执政地位，地方力量在全国各地执政的邦中取得了半壁江山。由于地方政党与国大党的发展战略的差异，以及双方为了争夺地方上执政的权力，于是国大党中央便利用自己在联邦中央政府执政的优势，利用印度联邦宪法的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千方百计刁难非国大党执政的地方各邦。例如，在政治上利用邦长控制各邦的立法会议，借口邦内形势混乱，执政的党派得不到多数支持，解散各邦的政府，实施总统治理。让总统不签署地方政府提请批准的议案，在财政上减少对这些非国大党治理的邦的发展资金分配和物资调配，使得非国大党执政的各个邦中出现种种困难的局面。于是各个邦提出了改革中央和地方各邦关系的要求。

1957 年国大党在喀拉拉邦大选中首次败给印度共产党，1967 年国大党在北部 8 个邦选举中失利，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泰米尔纳杜邦执政，国大会议党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执政，阿卡利党联合印度人民同盟和印共(马)也首次在旁遮普语言邦获得执政机会等等。1969 年中期选举后，国大党的选举力量由于党内分裂再次受到削弱，地方政党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邦和印共参与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及德罗维达进步同盟提出了改变联邦结构的要求。最先在地方执政的，也是对中央执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联邦力量干预异党一事上感受最深的印度共产党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激进，它要求对中央和各邦的关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它同时希望以此来获得非国大党执政的各个邦的潜在盟友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些地方政党执政伊始即尝到了中央过大的财权力对自己邦的影

响。1969年，印度共产党（马）通过了一份党章，要求实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它要求将宪法中《中央和地方兼有之职权表》中列入的所有项目都交给地方各邦，中央政府每年征收的财政收入的75%都交给地方邦，所有集中管理的农业，工业，教育，社会和福利事业都交由地方各邦进行管理，此外，印共（马）还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让地方各邦控制全印的公务系统，特别是中央的行政机构和警察，把全印的中央保安部队，工业保安部队和中央后备警察和边境保安部队都交由地方各邦控制。印共（马）的改革中央与地方邦关系的呼声得到了非国大党执政的地方各邦的赞同。随着1975年6月26日，英迪拉·甘地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各政党更进一步尝到了过分集权的联邦体制的滋味，中央政府独揽了一切权力，既中止了宪法的联邦制条款，又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证，中央政府获得了通过议会或通过总统法令为各邦立法的权力，并有权下令各邦官员执行这些法律。在反对党议员或者被捕或者抵制会议的情况下，1976年7月，议会通过使紧急状态的宣布不受法院干预的《宪法（第三十九次）修正案》，11月，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控制的印度联邦议会通过了有59项内容的《宪法（第四十二次）修正案》，这两个修正案使议会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为扩大，而其他原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中心——法院，行政部门，各个地方邦——则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宪法第四十二次修正案提出，联邦议会高于一切的新的制宪理论，改变了印度独立时建立政治秩序的根本基础，它为依法剥夺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拒不给予不听话的官员以担任任何职务的保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它无限制地加强了中央对各邦反对党政府的强制力。大大地削弱了法院的权力，从它们的管辖权中排除了与担任公职人员（包括行政部门和印度警察部门人员）有关的问题，并授权联邦议会在联邦一级和邦一级建立行政法庭，以解决税务纠纷，外汇和进出口，工业和劳工纠纷，土地改革，城市财产最高限额，以及与粮食和

其他必需品的生产收购供应和分配等有关的问题。同时最高法院行使基本权力的权限也被限制于考虑中央法令的有效性（对邦制定的法令只能在高等法院提出异议），并规定至少需要 2/3 多数才能宣布法令无效，此外还授权议会规定，尽管人民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及政治自由和财产权，但“预防和禁止反国家活动”的法令，“或预防成立反国家结社或禁止反国家活动”的法令，不得宣布为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还规定将人民院和邦立法会议的任期从 5 年延长到 6 年，规定总统必须根据内阁会议的意见行事，并且授权印度政府动用驻扎在印度的任何一个邦的中央军队以应付治安受到破坏的局势，而不需要有关邦政府的批准和监督。实际上，紧急状态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在禁止许多反对党的活动后，也开始扫除反对党执政的政府，例如 1976 年 1 月中央政府以马德拉斯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政府贪污腐化盛行而将其解散了，1976 年 3 月，又以古吉拉特邦的内政治暴乱有增无已为由，解散了由国大党（组织派）、人民同盟、社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四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宣布对该邦实行总统治理。紧急状态期间，除了与英迪拉·甘地合作的印共（马）执政的地方政府未受多大影响外，其他地方性政党执政的邦政府都大受影响。这必然促使各地方政党对印度的联邦制度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改革联邦与各邦的方案，这其中也必然包括曾在旁遮普执政的阿卡利党。

第三节 语言邦中的政治问题与政治运作

阿卡利党经过近 20 年的斗争终于在 1966 年获得了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语言邦同时也是一个锡克人占多数的邦，锡克人占重组后旁遮普总人口的 60.22%，印度教徒则占

总人口的 37.54%，而根据 1951 年和 1961 年的人口统计，在重组前的旁遮普邦中印度教徒占邦人口的比重分别是 62.3% 和 63.7%。在重组后的旁遮普中，就人群集团的分布状况而言，也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锡克主要集中在除豪西亚尔普尔行政区之外的乡村地区，而印度教徒则多集中在旁遮普的各个城镇地区，仅在豪西亚尔普尔行政区乡村中占有多数。在旁遮普的 12 个行政区中，印度教徒占多数的行政区只有三个即豪西亚尔普尔 (59.26%)、朱朗达尔 (53.91%) 和古尔达斯普尔 (48.02%)。锡克大量集中在巴廷达、阿姆利则、卢迪亚纳、桑格鲁尔、费罗兹普尔以及卡普尔萨拉的乡村地区，那里的锡克人口所占的百分比从 70.80% 到 89.29% 不等。就人群的职业分布状况看，1971 年人口统计表明 69.37% 的锡克集中在乡村地区，并且主要是农业耕作者，66.39% 的印度教徒生活在城市，主要从事商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职业。^①

在新邦的建立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阿卡利党作出回答。首先是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方式问题，其次是一个有可能成为执政党的主要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再次是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and 经济现代发展问题，语言邦建立过程的矛盾。

一、语言邦构建方式上的矛盾

在将原来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三，说旁遮普语的地区组成旁遮普语言邦，将说印地语的南部地区组成为哈里亚纳邦，原旁遮普东部山麓说印地语的部分合并喜马偕尔邦的过程中，阿卡利党对政府的一些举措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抗议。这种不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语言邦的语言统计依据。划分语言邦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语言的人口统计数据，语言统计数据越准确，那么语

^① 哈尔品德尔·考尔：《印度农业发展的政治后果》，新德里，1988年，第 12 页。

言邦的划分自然也越有说服力。这个问题上政府决定采用的数据是 1961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而阿卡利党则希望政府使用 1891 年到 1931 年间的旁遮普人口调查数据。那么这两个数据在反映旁遮普语言区分布上哪一个更准确呢？首先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就 1891 年至 1931 年旁遮普的统计数据而言，由于当时尽管已经在印度教教派组织和锡克教教派组织之间为旁遮普语和印地语的关系问题进行的长期争吵，但是由于在旁遮普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教派间的冲突更为激烈。印度教教派组织在语言问题上用印地语取代乌尔都语的呼声更高，尽管在英印旁遮普省，伊斯兰教徒占多数，他们坚持用乌尔都语为官方语言，所以直到印度独立，印度教徒的这一愿望也未能实现。旁遮普官方语言是英语和乌尔都语，既不是印地语，也不是旁遮普语，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在语言方面较以后的统计更准确地反映出说旁遮普语的人数。不过拿这一数据作为 1966 年语言邦的划分依据并不可靠，因为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个 1947 年的印巴分治问题。印巴分治导致旁遮普被一分为二，并出现了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及伊斯兰教徒跨越边界的人口大流动。这样印度的旁遮普便经历了一个语言人群的重组过程，因此阿卡利党提出的要求自然不能被接受。那么，1961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又如何呢？这个数据也不准确，这是因为独立以后由于伊斯兰教徒在旁遮普人口中已是屈指可数，教派间关于语言的斗争根本就只存在于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为了反对锡克教徒建立语言邦的要求，包括圣社和印度人民同盟在内的印度教的教派文化组织和政治组织，在每次人口统计中都号召说旁遮普语的印度教徒将印地语列为他们的母语，而且确实许多教派意识很浓的印度教徒都这样做了。而 1961 年的人口统计正值阿卡利党掀起又一次语言邦斗争高潮时期，尽管此间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还曾到旁遮普要求印度教徒将旁遮普语看作他们的母语，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因此，这次统计实际上也无法

反映居民的真正语言状况，但无论怎样它的准确度好歹也比分治前的数据强一些。这样按照 1961 年的人口统计标准就将一部分说旁遮普语的地区排除在旁遮普语言邦之外，或是划给了哈里亚纳邦或者划给了喜马偕尔邦。锡克阿卡利党领导人认为这样一个旁遮普语言邦并不完整。在他们以后的要求中，他们也提出了这一条。其次，在原旁遮普邦的首府昌迪加尔归属问题上也出现分歧。在印度分治之前，旁遮普省的首府是历史名城拉合尔，印巴分治后这个城市被划给了巴基斯坦，于是印度联邦政府决定在旷野上新建一座城市，作为东旁遮普的首府，这座由著名的法国设计师设计的美丽的城市就是昌迪加尔。它是独立后印度城市建设中的一部杰作，哈里亚纳邦与旁遮普邦都希望拥有这座城市。负责旁遮普邦分邦事宜的邦重组委员会起初决定将它划给哈里亚纳邦，作为该邦的首府，他们的理由是在这个城市里有 70% 左右的人口是印度教徒。阿卡利党在这个问题上毫不相让，它坚持这个城市是为旁遮普省而设计的，它是旁遮普语区的一部分，而旁遮普语言邦是旁遮普这一名称的合法继承者，这个城市自然应归旁遮普语言邦所有。当然锡克阿卡利党争抢这一城市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旁遮普地区除了昌迪加尔外，其他城市都很小，很难担负起推动邦工商业发展的重担。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英迪拉决定昌迪加尔不归任何一邦所有，而划归中央作为中央直辖区，同时又用作两邦共同的首府。此举在当时被说成是“精明的一步棋”。^①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久拖不决，两个邦总不可能永远共用一个首府，而且中央政府控制了这座城市，也就控制了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收益，哪个邦也不会长期坐视不管。再次，根据邦重组法，两个邦将共同拥有一个高等法院、邦电力委员会、旁遮普住房公司和其他这种类

^① 因 德 尔 · 马 尔 豪 特 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施美华等译），第 99 页，北京，1992 年。

型的联合在一起工作的机构。这种两邦共管的项目总计有 52 个。这些项目实际上还是旁遮普划分为两个语言区的地区管理方案上遗留下来的，联邦政府通过共管项目，可使说旁遮普语的锡克占多数的旁遮普语言邦与说印地语的哈里亚纳邦紧紧地连在一起，让他们之间在这些项目上相互掣肘，出现矛盾后让中央来解决问题，无形之中加强了中央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邦政府的权力，有着如此众多共管项目的邦确实不能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语言邦而只是一种类似的准邦。最后，更使锡克感到不满的是通过分邦，中央政府乘机接管了博卡拉、比阿斯大坝综合工程。由此，控制了新旁遮普语言邦中所有的电力资源和河水资源。电力资源是发展工商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它同水资源一道也是旁遮普发展灌溉农业所必须的。旁遮普缺乏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中央政府控制了电力，就控制了旁遮普惟一较多的工业能源，旁遮普的农业基本上都是灌溉农业，政府控制了水资源，实际上就控制了旁遮普农业发展的命脉。锡克政党则希望作为这些工程所在地的新旁遮普政府能够控制这些项目。而中央政府通过控制这些资源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拉贾斯坦和新德里的分配，有效地影响这些邦的政治，加强自己的影响。事实证明国大党执政的中央政府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些问题，法特赫·辛格领导的阿卡利党指责政府通过将说旁遮普语的法特哈巴德、西尔沙、培哈拉、古尔哈、沙哈巴德和安巴拉萨德尔、乌姆塔西尔和达尔豪西的一部分排除在旁遮普语言邦之外，通过夺走旁遮普邦的博卡拉大坝控制权，通过保持在旁遮普和哈里亚纳之间的共同纽带而建立一个地域较小的、权力也大受限制的旁遮普邦。^① 卡普尔·辛格在人民院反对重组法案，他还重提了国大党和它的领导人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对锡克民族所许下

^① 达力普·辛格：《旁遮普政治的活力》，新德里，1981年，第32页。

的诺言,以及迟至 1946 年 7 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锡克有权得到特别的考虑那句话:“我认为锡克在北部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结构中也能够享受自由的光辉这一点上没有错。”^① 卡普尔·辛格赞成组建一个更大的旁遮普语言邦,不管锡克人口在其中所占比例如何。同时他又要求这个邦与中央有特殊的关系,并且有一个特别的内部的法典,一个锡克人家园。^② 法特赫·辛格要求“给予这个邦同其他各邦一样的权利,以及给予旁遮普语言同其他语言邦中的主导语言同样的地位。”^③ 塔拉·辛格集团则通过焚烧一份重组法表示他们的不满。他将这部法律说成是政府奴役锡克人的又一举措。并且宣布锡克不接受与哈里亚纳有 52 条共同纽带的“毫无生机的旁遮普邦”^④。

1966 年 11 月 10 日,法特赫·辛格召集了一次包括印度共产党、自由党、共和党和人民社会党在内的许多政党参加的会议,会上代表们保证完全支持为反对废除共同纽带和将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将昌迪加尔以及水源和能源的控制权交给旁遮普邦而进行政治鼓动。人民同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法特赫·辛格宣布他将派锡克小队从金庙去昌迪加尔就这些要求向政府施加压力。1966 年 12 月 17 日,在金庙阿卡尔·塔哈特举行的许多人参加的锡克祈祷会上,法特赫·辛格公开宣布他在要求中央接受锡克的要求上,已经无计可施,最后决定从 1966 年 12 月 17 日起开始绝食,如果 10 天后他还活着,就在 12 月 27 日自戕以使得统治者的良心受到

① J·S·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第 205 页,剑桥,1990 年。

②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49—450 页。

③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57 页。

④ 德文德尔·帕尔·桑都:《印度政治中的锡克:一个少数民族的研究》,新德里,1992 年,第 107 页。

感动。^① 12月17日上午法特赫·辛格在金庙前如期举行宣誓仪式后便开始绝食。他宣布：“我要明确地宣布只有在政府接受了下列要求之后我的自杀计划才会终止，这些要求包括：（1）废除共同纽带，（2）将中央政府控制的昌迪加尔和大坝工程归还给旁遮普，（3）将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划归旁遮普。”^②

当时在旁遮普邦执政的国大党政府反对阿卡利党的这个要求，他们认为法特赫·辛格的做法完全是得寸进尺。邦政府认为中央政府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首席部长吉亚尼·古尔穆克·辛格和印度国防部长斯瓦兰·辛格认为政府有必要发表一个印度政府不准备接受法特赫·辛格的“无理”要求，或者屈服于他的威胁的联合宣言。在这位圣人宣布绝食后，为了抑制锡克鼓动的浪潮，旁遮普邦政府逮捕了 1000 多位重要的锡克人物。邦政府还在圣诞节这一天命令军队在阿姆利则大街上巡逻，宣布在这个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实行戒严。

1966年12月27日，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两个首席部长根据印度总理的分邦原则，达成一份分邦协议进行了新邦组建。同日，总理特使胡卡姆·辛格从新德里乘专机抵达阿姆利则，面见法特赫·辛格。胡卡姆·辛格同法特赫·辛格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密谈之后，胡卡姆·辛格向集会的人群发表讲话，在昌迪加尔的归属问题上，他一方面宣布英迪拉·甘地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仲裁，一方面他又向集会的人群保证政府没有理由不将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在阿卡利党关于一部分说旁遮普语的地区被划在旁遮普邦之外的问题，他宣布中央政府将就此事任命一个委员会让他们在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第 160 页，1985 年。

^②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 年，第 457 页。

进行调查之后提出建议。^① 在胡卡姆·辛格讲话之后，法特赫从胡卡姆·辛格手中接过一杯果汁，终止了绝食，表示同意中央政府的这一决定。

然而，1967年1月8日，英迪拉·甘地在人民院断然否认给过这位圣人什么保证，尽管她已经同意对此进行仲裁。事实是阿卡利党的鼓动开始就没有多少响应，大多数锡克都认为旁遮普语言邦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民众对这一鼓动并不热心。甚至重要的阿卡利党领导人都不服从法特赫·辛格的计划。据报道，这位圣人曾经要求在邦议会和人民院的阿卡利党的议员们辞职，但是相当大部分议员却坚决反对这位圣人的决定。^② 这位圣人本人不得不中止他在昌迪加尔问题上的绝食行动，并将整个问题交给甘地夫人。

虽然胡卡姆·辛格已经就这些问题向锡克做了保证，但是甘地夫人一直没有做，1967年大选执政的阿卡利党领导人也没有坚持。1969年旁遮普中期选举之后，阿卡利党的联合政府执政不久，这个问题又突显了出来。一方面，锡克政治家们一直对中央政府迟迟不作裁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成了阿卡利党内和政党间的进行派别斗争的一个题目。阿卡利党人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因为没有能在内阁中得到一个职位而对法特赫·辛格表示不满，而已在新邦中失去执政机会的邦国大党希望插手此事，动摇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的联合内阁，并且削弱法特赫·辛格的政治影响，他们指责法特赫·辛格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放弃绝食的做法，不是真正的锡克所为，他们希望像削弱塔拉·辛格的影响一样，让法特赫·辛格丢尽颜面。于是，他们挑动达尔善·辛格·费鲁曼为昌迪加尔的归属进行绝食斗争。费鲁曼是旁遮普阿卡利党

①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年，第459页。

② 《论坛报》，1967年1月2日。

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这个邦自由党的前主席，是一位具有较高声望的领导人。费鲁曼宣布从 1969 年 8 月 15 日起进行绝食，直到印度政府宣布将昌迪加尔划给旁遮普为止。他要表明一个真正的古鲁的锡克是具有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精神。费鲁曼也宣称虽然这个国家是自由的，但是锡克社区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1969 年 8 月 12 日，达尔善·辛格·费罗曼被逮捕。在狱中他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开始绝食，随着时间的流逝，费罗曼的绝食行动成为整个旁遮普邦乃至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吁都恳请他停止绝食，等待中央的决定。英迪拉·甘地也写信给他表示：“正在寻找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你的绝食行为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和酷烈性。”^①但是费罗曼拒绝了所有的呼吁，宣布坚决遵守自己的誓言。在给总理的回信中，他说：“无论何时，当一个锡克在他的古鲁前面提出一个誓言后，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锡克，他就应该履行他的誓言。”^②

为了应付这一局势，一方面阿卡利党的总书记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抨击国大党利用费罗曼的绝食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一方面，为了从乔汉等人手中夺过运动的领导权，他表示：“阿卡利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昌迪加尔和其他说旁遮普语言的地区划归旁遮普。”^③1969 年 8 月 25 日，法特赫·辛格写信给印度总理要求她早日作出决定。1969 年 9 月 23 日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又一次呼吁开展一场斗争。据此法特赫·辛格于 9 月 24 日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 7 人委员会，并且在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

^①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第 163 页。

^②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第 163 页。

^③ 尼加尔·巴克西斯·辛格：《印度的旁遮普（1947—1966）》，朱朗达尔，1985 年，第 162 页。

寻求所有政党的合作。这个呼吁导致了 9 月 28 日由邦内 7 个政党组成的所有政党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这个邦除了国大党议员之外的大约 60 名属于不同政党的议员在新德里的总理官邸前进行了 24 小时的静坐，要求将昌迪加尔和其他说旁遮普语言的地区划归旁遮普。在静坐结束后，他们向总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他们重提旁遮普语言邦建立的背景以及胡卡姆·辛格作出的保证，正是他的保证使法特赫·辛格放弃了他的自杀决定。据报道，法特赫·辛格在 1969 年 10 月 9 日的所有政党行动委员会上也提出要绝食自戕，但是行动委员会要求他等待，因为发动任何鼓动的责任是由他们共同承担的。10 月 17 日在旁遮普人的大型集会上行动委员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表明他们渴望获得昌迪加尔的意愿。据估计大约有 30 到 50 万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事后他们将请愿书递给了昌迪加尔联邦直辖区的首席专员。

1969 年 10 月 27 日，达尔善·辛格·费罗曼在进行了长达 74 天的绝食后死去。费罗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做法在锡克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在激进的锡克青年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费鲁曼被锡克人看作是真正的锡克，锡克的斗争情绪一下子被激发了起来。费鲁曼之死也使锡克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既是锡克宗教僧侣又是阿卡利党政治领袖的法特赫·辛格的威望大受影响。这位阿卡利党领导人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曾几次宣布绝食之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每次都在没有明确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即告收场。面对锡克社会无形的压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声誉，法特赫·辛格于 1969 年 11 月 24 日也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印度国庆节绝食，如果昌迪加尔不给旁遮普，他将于 2 月 1 日自杀。这得到了阿卡利党和旁遮普的除国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旁遮普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印度政府觉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最后联邦国防部长 Y.B. 恰范宣布联邦政府将在 1970 年的年度财政预算会议之前就昌迪加尔及其相关争议作出决定。1970 年 1 月 29 日，英迪拉·

甘地总理宣布她的裁决：将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同时将旁遮普省费罗兹普尔行政区的费兹尔卡县的一部分和阿布哈尔（都是重要的产棉区）交给哈里亚纳；通过在拉贾斯坦边界划出一条走廊经过穆克塔沙尔县的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将其与哈里亚纳与费兹尔卡连接起来；中央政府拨给哈里亚纳 1 亿卢比用于建设新首府；政府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旁遮普邦的其他领土要求。这个裁决将在 5 年后即 1975 年 1 月起生效。^① 以人民同盟的领导人巴尔德夫·普拉克什为主席的全旁遮普政党行动委员会一方面批评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又要求法特赫·辛格放弃绝食，因为昌迪加尔毕竟被判给了旁遮普。1970 年的 1 月 30 日法特赫·辛格中止了绝食。阿卡利党行动委员会于 1 月 30 日通过决议欢迎将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但是又对将费兹尔卡的说旁遮普语言的地区划归哈里亚纳表示愤怒。将费兹尔卡和阿布哈尔与昌迪加尔议题联系在一起，是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内务部长贾格吉万·拉姆的计策，他认为由于这些地区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将它们交给哈里亚纳，将在旁遮普邦立法议会中使得印度教徒的席位减少两席。^② 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又在客观上具有教派色彩，同时又不符合语言邦的划分原则。由于昌迪加尔并没有在 1975 年如期移交给旁遮普邦，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锡克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旁遮普语与印地语的语言关系问题

按照语言邦的建立原则，旁遮普语言邦内的官方语言应该是旁遮普语，在它与中央及其他各邦往来中则使用印地语和英语。但是在旁遮普这个问题又有一定的变化。旁遮普语言邦建立后，坚持推进印地语事业的教派组织圣社依然存在，并且坚持原有的

^①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二卷，德里，1977 年，第 315 页。

^② I.K. 古吉拉尔：《后果》，《研讨》杂志，1984 年 2 月 17 页，转引自米斯拉的《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第 112 页。

立场。在旁遮普省一直支持印地语为主导语言的政党人民同盟也是旁遮普的第三大党。起初人民同盟为了与阿卡利党分享政权，它的强硬立场曾有所变化，然而由于它的支持基础是印度教徒，它在语言问题上的立场受到圣社的抨击后，便又转向强硬。人民同盟在与阿卡利党刚一联合执政，希望以一种和谐一致的精神开始新邦的运作时，圣社成员很快就批评人民同盟没有为印地语的推广做任何事情，其他印度教教派主义者也抨击人民同盟领导人，指责他们背叛了印度教徒的事业。这迫使人民同盟的领导人要求给予印地语以与旁遮普邦重组前一样的地位。这让阿卡利党难以接受，毕竟，阿卡利党领导语言邦斗争的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目的就是维护旁遮普语的地位。于是围绕语言问题，旁遮普的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联合政府决定将此事交给阿卡利党最高领导人法特赫·辛格与人民同盟最高领导人亚加雅·杜特·沙尔马，让他们就旁遮普语与印地语的地位问题达成一个协议。拉赫曼·辛格·吉尔内阁已经通过了一个官方语言方案，使旁遮普语成为行政区级的用于管理的惟一语言。于是在语言问题上的争论从管理层面转到了教育媒介上。

1969 年中期选举后，阿卡利党与人民同盟就语言问题达成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五点内容：即尽管旁遮普被看作单一的语言邦，但是对于促进印地语发展的现有的保护将继续进行；私人开办的学校将继续教授印地语和旁遮普语两种语言，旁遮普语将是第一必修语言（从 4 年级起），英语是第三必修语言（从 6 年级起）^① 在政府的资金分配上不得歧视任何这样的学校；作为国语（National Language），印地语将取代英语作为联系语言；本联合阵线将同包括一个锡克人国家要求在内的任何分裂主义倾向作斗

^① 《印度时报》，1969 年 9 月 18 日。

争。^①然而，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之间的这种语言问题上的和谐很快由于阿卡利党内的某些强大的集团以及印度教教派组织方面的原因而烟消云散。人民同盟与阿卡利党达成协议后不久，圣社领导人贾甘·纳特·库沙尔就在阿姆利则的拯救印地语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个协定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旁遮普邦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说印地语的，教育媒介的选择权应该扩大到所有的学校而不仅仅局限于私立学校。^②

1969年7月2日，阿卡利党联合人民同盟执政的新内阁决定废除萨恰尔方案及帕提亚纳和东旁遮普土邦联盟的方案。实行被称为三语言方案的全印方案。以旁遮普语为第一必修语言。这一决定遭到了印度教徒领导人和圣社报刊的拒绝。在重组了的旁遮普，人民同盟为使印地语成为旁遮普的第二语言以及在自由地选择印地语和旁遮普语为教育媒介的问题上不停地进行斗争。虽然首席部长古尔兰姆·辛格允诺人民同盟的使用印地语为教育媒介的要求。但是阿卡利党的激进派反对这一要求。塔拉·辛格派则要求首席部长古尔兰姆·辛格在语言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因此在阿卡利党同人民同盟联合执政时期，语言上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三、变动政治环境中的旁遮普政治运作方式

新的旁遮普语言邦建立后，旁遮普政坛上活跃的政党数量依然没有多少变化，主要政党仍然是国大党，阿卡利党，人民同盟，印度共产党，还有自由党等小党，在政治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无党派人士，不过各个政党的政治分量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各个政党的运作方式也随之出现大的变化。而印度政局整体上的变化在旁遮普

^① 伊克巴尔·纳瑞因(主编)《印度的邦政治》，米鲁特，1976年，第276—277页。

^② 《印度时报》，1969年9月18日，转引自库马尔·普拉麦德的《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第68页注45。

也得到了最清晰的反映。

国大党依然是旁遮普惟一能够得到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支持的跨教派的政党，而且它在重组后的历次选举中所得的选票也是最多的(除 1977 年紧急状态后的那次选举外)。1952 年国大党在旁遮普的第一次选举中得票率为 31.3%，是国大党参选各邦中得票率最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国大党在独立前并非英印旁遮普的主要政党，那时候旁遮普统一党才是旁遮普最大的政党。但是这 31.3% 的得票率在旁遮普邦中也是最高的。其他几次的得票率分别是：1957 年，48.6%；1962 年，45.7%；1967 年，35.5%；1972 年 42.8%。但是国大党获得的邦议会席数量却发生了变化，其从 1952 到 1972 年历次邦议会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数及占邦议会议席总数的百分比分别是，1952 年，60 席，54.54%；1957 年，71 席，82.56%；1962 年，49 席，56.98%；1967 年，48 席，46.15%；1969 年，38 席，36.54%；1972 年，66 席，63.54%。重组之前国大党得到的席位数都在一半以上，1957 年国大党得到的席位数最高，高达 82.56% 不过那是因为阿卡利党合并入了国大党。但是 1967 年和 1969 年国大党都没有过半数。而 1972 年过半数可以说与“英迪拉旋风”有很大的关系。在 1967 年邦重组前，国大党内部虽然也有派别斗争，但是它能牢固地掌握邦的政权，还是比较遵守它所信奉的一些政治原则。但是重组后国大党为了掌握邦政权，开始使用其他手段。1967 年大选后，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联合执政，国大党为了推翻这个政府，同阿卡利党内的派别联合，挑动费鲁曼绝食，一方面降低法特赫·辛格因领导锡克胜利地获得旁遮普语言邦而获得的政治声望，另一方面给执政的联合政府难堪。又唆使阿卡利党内哄，古尔兰姆·辛格倒台后，它支持阿卡利党内的拉赫曼·辛格·吉尔派别组阁，国大党邦议会的领导人吉亚·辛格·瑞尔瓦拉曾试图说服国大党中央高层领导同意让旁遮普的国大党与拉赫曼·辛格·吉尔集团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执

政。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在邦国大党内遭到他的新对手宰尔·辛格的反对，国大党高层也不打算长期支持吉尔政府，只是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1969年中期选举国大党仍未能执政，阿卡利党政府和人民同盟继续联合执政，但是由于这两个政党之间因语言问题特别是政治权力分配问题仍有矛盾，国大党则不失时机地插上一脚，所以这个联合政府并不稳定。到1971年6月，这个邦不得不实行总统治理。在1972年3月全印大选中，国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此时正值印巴战争结束，英迪拉·甘地声望达到最高点，就像在其他邦一样，国大党在旁遮普邦议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在旁遮普邦议会总数为104席的议席中一下子赢得了66席。与它结成联盟的印共也获得了10席。阿卡利党的席位大减。但是选票数减少有限，它获得的席位基本上是人民同盟的损失。人民同盟获得了5%的选票，却没有得到一个席位。阿卡利党的锡克农民基础并未受到触动。锡克表列种姓和落后种姓，像都市印度教徒和印度教徒哈里真一样，主要支持国大党。因此当吉亚尼·宰尔·辛格于1972年3月15日被选为邦国大党议会党团主席并成为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时，他并没有得到锡克农场主多少支持，尽管将近60%的国大党立法会议议员是锡克。^①

作为邦的首席部长，吉亚尼·宰尔·辛格当政时间比较长，从1972年一直到1977年印度大选后邦政府被人民党解散。在他任旁遮普首席部长期间，在中央得到英迪拉·甘地的完全支持，在邦的一切大政方针方面，他对英迪拉·甘地言听计从。在邦国大党内，他使用各种手腕牢牢地控制了国大党。在邦政治方面，他有效

^① J.S. 格瑞纳尔：《旁遮普的锡克人》，剑桥1990年，第209页，至于投票模式的变化见M.S. 达米：《旁遮普的国大党的正在变化中的支持基础，1952—1980年》，旁遮普政治科学杂志，古鲁纳拉克·德夫大学，阿姆利则，1984年，Vol. 8, No. 1，第65—97页。

地利用锡克的宗教情结为国大党赢得支持。宰尔·辛格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木匠家庭的锡克，不是贾特锡克。由于在旁遮普邦长期从事政治活动，他对锡克阿卡利党教派政治非常清楚。他本人对锡克宗教经典非常熟悉，并且知道怎样利用这笔财富，为国大党的政治行为服务。在他执政期间，旁遮普的锡克宗教之风大盛。他设立了古鲁戈宾德·辛格和古鲁纳拉克基金，并且由邦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在他的提议下，邦政府机构的许多活动常常以举行一个锡克教仪式作为开始。政府建设了许多公路，用道路网将重要的锡克寺院连接起来。各邦政府还将建成的阿兰德普尔·萨希布至达姆达马萨希布的道路命名为古鲁纳拉克大道，以纪念这位锡克教创始人曾经在这条道路上所作的旅行。宰尔·辛格的做法赢得了锡克社会的赞赏，在古鲁纳拉克大道开通之后，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在达姆达马授给吉亚尼·宰尔·辛格一件荣誉之袍，作为他对为锡克社会所作的服务的奖赏。在 1977 年大选失败后，他继续控制邦国大党，并培植锡克僧侣在阿卡利党内部制造分裂，培植宾德兰瓦拉作为国大党的政治工具，进一步激起了旁遮普的宗教教派风潮。这将在以后章节中得到详细论述。宰尔·辛格这样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阻止阿卡利党利用宗教进行政治鼓动，另一方面为国大党赢得锡克社会的支持。然而这也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邦国大党人大量利用锡克教，它使得旁遮普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这样就使得阿卡利党为了赢得锡克社会的支持，很快放弃了一度淡化其宗教色彩的做法，提出更激进的宗教政治口号，激发出这个民族更强烈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欲望。

阿卡利党的地位在邦重组后发生的很大的变化。在重组之前，阿卡利党一直是邦的第二大政党，赢得的选票也居第二位。它在独立后历次选举中赢得的选票数百分比分别是：1952 年，24.0%；1962 年，20.7%；1967 年，24.7%（其中塔拉·辛格派为 4.2%，法特赫·辛格派为 20.5%）；1969 年，29.5%；1972 年，

27.7%（其中，1957 年因并入国大党，成为国大党的一部分，没有单独参选）。它赢得的席位数和占邦议会席位的百分比分别是：1952 年 31 席，占总席位数的 28.18%；1962 年为 19 席，占总席位数的 22.09%；1967 年为 26 席，占总席位数的 25.00%；1969 年为 43 席，占总席位数的 41.35%；1972 年为 24 席，占总席位数的 23.08%。除了在 1969 年超过国大党位居席位第一外，其他所有时候都在国大党之后。但是，与重组前不同的是，阿卡利党虽然在席位上从未超过半数，但是却能够同人民同盟和印共等小党结成竞选联盟，利用国大党席位大量减少的机会，组成联合政府，尝尝当执政党的滋味。

但是阿卡利党成了执政党之后，内部派别斗争更加尖锐，没有能够把握机会处理好同人民同盟及印度教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 1967 年大选中，阿卡利党的两个集团即法特赫·辛格领导的阿卡利党和塔拉·辛格领导的阿卡利党仍未能联合起来，他们各自参选，提出各自的竞选口号，塔拉·辛格集团提出的口号比较激进，他们提出要在印度联邦内建立一个锡克人自己的家园，或者叫锡克斯坦；国家应给予旁遮普类似印度宪法给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那样的权力和地位；在锡克人口占一定比重的其他邦中，通过恰当的宪政安排，在议会、行政、法庭和警察等机构给他们一定数量的保留席位和职位。^①塔拉·辛格派希望通过摆出激进的姿态能够赢得锡克社会更多的支持，同时削弱法特赫·辛格集团的力量。法特赫·辛格集团在其竞选宣言中则侧重强调教派的和睦，没有特别提出锡克人的任何不满。^②法特赫·辛格集团同左派

^① 《1967年阿卡利党—塔拉辛格集团的竞选宣言》，阿姆利则，1967年，第7—8页。

^② A.S. 纳朗：《旁遮普协定和选举：回顾与展望》，新德里，1986年，第65—66页。

政党特别是印度共产党在九点纲领的基础上一起参加竞选。这九点纲领包括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粮食的国营贸易和银行的国有化，政府援助和外贸，以及限制垄断等等方面的内容。^① 选举结果表明锡克民众更赞成法特赫·辛格派阿卡利党的观点，他们获得了 24 席，获得的选票数为 20.5%，支持塔拉·辛格派的甚少，他们只获得 4 席，选票数为 4.2%。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过半数，在竞选前没有联合起来的各个政党开始寻求政治联合。阿卡利党法特赫·辛格派同印度共产党，印共(马)，人民同盟以及独立派人士联合，于 1967 年 3 月 8 日组成了一个古尔兰姆·辛格为首的多党联合内阁。^② 他们在坎那纳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我们支持旁遮普人民不分种姓和信仰的、不分派别的和睦和亲善，并且保证采取政治经济措施加强这个新建立的邦，我们决心反对所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和所有有损于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行为”。^③ 共同纲领中还包括免除 5 英亩以下土地的税收，在都市地区进行税收减免等。联合政府的执政纲领实际上是所有参加内阁的政党间妥协的产物。^④ 联合政府之所以能够组成，法特赫·辛格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这个联盟中人民同盟占有仅次于阿卡利党的份额，对联合内阁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虽然人民同盟致力于推进印度教徒的利益，与阿卡利党有一定的对立，但是它也希望分享政权，它的领导人认为通过掌握政权更便于实现他们的目标。^⑤ 在阿卡利党与人民同盟的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发生了一股国大党议员背叛国大党支持阿卡利党的风潮，这股风潮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大党势力衰弱，新崛起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新的政治组合中反应的一个

① 阿卡利党，《法特赫·辛格提出的竞选宣言》，阿姆利则，1967 年，第 1—7 页。

② 达力普·辛格：《旁遮普政治的活力》，新德里，1981 年，第 93 页。

③ 《论坛》，1967 年 3 月 2 日。

④ 《爱国者》，1967 年 3 月 4 日。

⑤ 达力普·辛格：《旁遮普政治的活力》，新德里，1981 年，第 93 页。

组成部分。地方国大党在邦立法会议中的议席从 48 席骤减到 28 席，倒戈者大多属于贾特锡克农民种姓，^① 由于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支持，在阿卡利党的组成和政治联盟上有更大的变化。人民同盟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同意向农场主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一起作为一个集团而工作。^② 旁遮普人民欢迎这个新的趋势，他们认为：“邦内整合对于教派和睦而言是一个好的现象。”^③ 阿卡利党和人民同盟两党的联合以一种和谐一致的精神开始，然而这种和谐的气氛很快受到了圣社成员的破坏。他们批评人民同盟没有为推进印地语作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强烈抨击人民同盟领导人，说他们背叛了印度教徒的事业。这迫使人民同盟的领导人要求给予印地语与旁遮普邦重组之前一样的地位。邦政府决定将此事交由法特赫·辛格和亚加雅·杜特·沙尔马，让他们就旁遮普语和印地语的地位问题达成一个协议。

阿卡利党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分裂。法特赫·辛格领导的阿卡利党的副主席哈尔查兰·辛格·胡迪亚纳在组阁中曾极力争取成为首席部长，结果连一个部长席位都没有得到。于是他与法特赫·辛格之间出现不和。在野的国大党立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进行倒阁。国大党在邦议会内对联合内阁提出了不信任的动议，得到了阿卡利党领导人哈尔查兰·辛格·胡迪亚纳和哈扎拉·辛格·吉尔的支持。这个不信任案被阿卡利党击败。胡迪亚纳和哈扎拉·辛格·吉尔因为违反党的纪律被停职。于是哈尔查兰·辛格·胡迪亚纳成立了一个自任主席的阿卡利党。人们通常称它为胡迪亚纳阿卡利

① M.S. 达米：《旁遮普国大党的变化中的支持基础》，《旁遮普政治科学杂志》，Vol. VII, No. I, 90 页，1984 年 1-6 月号。

② 伊克巴尔·纳瑞因（主编）：《印度的邦政治》，277 页，米鲁特，1976 年。

③ H. 哈尔特曼：《印度的政党》，米鲁特，1971 年，第 212 页。

党集团。在 1967 年 11 月,法特赫·辛格的助手,也是邦灌溉能源和教育部长拉赫曼·辛格·吉尔带领 16 位邦议会议员倒阁,这 16 人中有 7 人来自法特赫·辛格的阿卡利党,一人来自塔拉·辛格的阿卡利党,其余来自其他政党。哈尔查兰·辛格·胡迪亚纳是其中之一。倒阁者宣称:“目前的联合阵线政府对人民的利益以及这个邦的成长和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① 因此要求政府辞职。拉赫曼·辛格·吉尔的倒阁行为,导致了 1967 年 11 月 22 日联合阵线政府倒台。三天后,拉赫曼·辛格·吉尔在吉尔·辛格·瑞尔瓦拉领导的国大党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少数内阁,他还得到胡迪亚纳和塔拉·辛格集团的支持。两个阿卡利党的派别对拉赫曼·辛格·吉尔的支持被认为是法特赫·辛格集团与人民同盟结盟的结果。但是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内阁,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之事不断,在摇摇摆摆地执政 9 个月之后,1968 年 8 月 23 日这届政府也终于垮台,邦长宣布实行总统治理,直到新一轮选举。

在 1969 年 2 月旁遮普邦的中期选举中,阿卡利党同人民同盟结盟,并且同印共(马)就竞选席位的调整达成了良好的协议。阿卡利党与其他小党如印度共和党以及统一社会党也达成了席位调整的协议。不过这次印度共产党离开了阿卡利党。^② 国大党仍旧独立参选。在选举中阿卡利党赢得了 43 席,成了第一大党,仍没有超过议会席位的半数。阿卡利党获得的选票数也增加到 29.5%。国大党退居第二位,为 38 席,但是它的得票率仍然高出阿卡利党近 10 个百分点。人民同盟获得 8 席,由阿卡利党支持的两位独立派候选人也获得了竞选的胜利。立法会议中席位为 104 席。这次阿卡利党法特赫集团的古尔兰姆·辛格再次与人民同盟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147 页注 83。

^② J.C. 阿南德:《旁遮普的中期选举》,《政治科学评论》 Vol. 10, No. 1&2, 1971 年 1—6 月号,第 12—14 页。

及其他政党和独立派人士组成联合内阁。人民同盟的领导人在寻求印地语作为旁遮普的民族联系语言上的一些问题得到澄清之后，同意加入内阁。阿卡利党与人民同盟一起就语言问题达成了一个包含有五点内容的协定，然而由于国大党内和人民同盟和圣社内激进主义派别的反对，这个协定未能落实，人民同盟与阿卡党不时发生争吵，内阁也不稳定。

1972年大选中，阿卡利党人在英迪拉旋风面前也败下阵来，虽然它得到的选票数减少有限，但是在议会中的席位大为减少。国大党人再次赢得在旁遮普邦执政的机会。于是阿卡利党总结自己在执政期间的得失并且考虑今后的行动纲领。于是有了阿兰德普尔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得到全体阿卡利党员大会的批准。阿卡利党内部法特赫·辛格在此期间去世，朗格瓦尔成了阿卡利党的主席。英迪拉旋风没有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演变成一场反对腐败政治的“纳拉扬运动”。到1974年最后几个月，“纳拉扬运动”变成了要求甘地夫人下台，击败国大党的运动，由共同繁荣运动的领导人，人民同盟，国大党（组织派）和印度人民党，社会党，阿卡利党组成的拥有20名成员的全国协调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纳拉扬的长远目标，即争取在“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的根本改革，最后实现全面革命”。他们还决定组织规模巨大的民众向议会进军运动，把进攻中央政府作为斗争的中心。随后运动扩展到全国许多邦。1975年6月24日，阿卡利党参加了由五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其他四党是人民同盟，社会党，国大党组织派和印度人民党），对1971年英·甘地夫人当选员的活法性讼争结果问题，他们利用最高法院驳回她要求无条件延期执行判决的请求的决定，坚持认为甘地夫人在选举中“舞弊罪名仍然存在”，他们宣称“政治的原则和民主的惯例”要求甘地夫人离职下台。如果总理拒绝辞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开展全国性的运动，包括不合作运动来要求她辞职。”1975年

6月25日,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在新德里召开的大规模集会上宣布,各反对党准备开展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要求甘地夫人辞职,他号召军队,警察和政府雇员不要服从任何非法的命令,要保护宪法,他要求学生离开课堂;他还呼吁所有他的支持者不同政府合作,拒绝缴纳任何赋税,同一天由国大党(组织派),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社会党和阿卡利党组成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建立了以莫拉尔吉德赛为首的人民斗争委员会,负责于6月29日组织全国性的斗争,包括在各邦首府,各税区和各地段中心组织集会。同时人民斗争委员会还决定在新德里组成大约一百人一组的许多志愿队,违抗警方的禁令在总理住宅周围举行示威,每天在她的住宅门前行军前进,要求她辞职。反对党号召的不合作运动的结果是全国的公共秩序一片混乱。于是在1975年6月26日,甘地夫人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中止正常的法律秩序。甘地夫人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强中央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剥夺了其他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机构如法院,总统,邦议会等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紧急状态实施后,全国许多政党领导人都被逮捕入狱时,阿卡利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鉴于她自己与自认为的与旁遮普邦的锡克领导人的关系,以及锡克政党的要求,英迪拉·甘地希望与阿卡利党人达成某种妥协,就像她与印共之间达成的妥协一样。政府向大卡尔萨协会提和其他一些锡克社会文化组织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提出了愿意就锡克人的一些突出的要求进行谈判,作为达成协定的第一步,英迪拉·甘地原则上同意了阿卡利党主席莫汉·辛格·图尔提出的三个要求。^①在紧急状态前夕,她同阿卡

^① 贾斯帕尔·辛格教授,DGMC的一位成员在接受哈尔曼迪尔·考尔的采访中,阿卡利党在这位总理面前提出了下列要求:在紧急状态期间不逮捕任何一个锡克人;任何锡克寺院的财产都不被置于土地最高限额法的控制之下;制定一个全印锡克寺院法。见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11页。

利党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阿卡利党有 21 名代表出席，包括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古尔查兰·图赫拉和德里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总书记贾萨达尔·桑托克·辛格。在这个会议上阿卡利党同意支持甘地夫人，这也就间接地意味着支持甘地夫人实施紧急状态法案。会议之后，图赫拉前往阿姆利则，桑托克·辛格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阿卡利党支持国大党政府。

然而，在阿姆利则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图赫拉同英·甘地合作的建议遭到激烈的反对，阿卡利党大多数领导人认为这有损于阿卡利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声誉和形象，工作委员会否决了原先支持英·甘地夫人的决定。这使桑托克·辛格很愤怒，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宣布德里的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仍然支持国大党，结果他被阿卡利党开除出党。在 6 月 30 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卡利党决定反对“国大党的法西斯倾向。”^① 7 月 9 日他们发动了一场“拯救民主制度”的斗争。1975 年 7 月 26 日，阿卡利党在其主席莫汉·辛格·图尔的领导下，在金庙发动了反对紧急状态的斗争。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英迪拉宣布举行议会大选，结束紧急状态为止。据阿卡利党的统计，在紧急状态期间因触犯各种法律被逮捕的阿卡利党的成员有 4 万多人。阿卡利党还将恢复民主的斗争上升为锡克人的神圣宗教使命的一部分，利用宗教的方式同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政府进行斗争。他们进行的这种斗争方式还得到了其他政党的称赞。作为对桑托克·辛格的报答，甘地夫人后来通过一项特别的法令让他当上了德里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印度总理对锡克宗教事务这种干涉，在 80 年代锡克的真理斗争期间，构成了阿卡利党在宗教上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一个重要部分。在 19 个月的紧急状态之后，具有历史意义的 1977 年的议会选举中，阿卡利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在联邦人民院中获得

^① A.S. 纳朗：《苏特里季上空的风暴》，新德里，1983 年，第 192 页。

了分给这个邦的 13 个席位中的 12 个。在邦议会也获得了 58 个席位。阿卡利党不仅在邦内与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还参加了中央的联邦政府，其中一个成了中央的一名部长。人民以选票对阿卡利党为恢复这个国家民主进程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1977 年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是在 1977 年 3 月印度大选前由五个反对甘地夫人独裁统治的小党组成的。由于缺乏共同的纲领政策，再加上各派系领袖的政治野心，故他们取得在联邦的执政权组成联合内阁政府后不久，人民党内部即出现分裂的迹象，派系和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使得党内根本不团结，人民党国会议员纷纷脱党，而由各党派组成的内阁成员亦相继辞职，联合政府难以有效的运作。人民党的内争迫使担任总理职位的德赛于 1979 年 7 月辞职，而由退出人民党的查兰·辛格组阁。其间，印度的派系政治更为明显，辛格的联合内阁很快倒台。政治的不稳使印度存在的一些危机更为突出，其中以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德赛政府虽然提出了第六个五年计划，但进口油价的上升，使计划的实施愈加困难。德赛政府曾形容其年度预算是一项摇摆的计划，显示此一计划不过是纸面文章。联合政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经济难题，一个是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率，另一个为煤的缺乏造成的钢铁、水泥与肥料的不足。煤钢两种原材料缺乏导致工业生产的恶性循环，使得印度的工业增长自 1979 年 4 月后即大幅下降，许多工业发生减产甚至短时间停业的现象。由于联合政府无力抑制通货膨胀，加速了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增加了工业的不稳。德赛政府曾对任何增加通货膨胀的措施加以辩论，但直到他下台之前仍不得要领。辛格就任总理后，曾将通货膨胀列为必须解决的优先问题。但并未提出任何实际可行的措施来遏制物价的上涨。飘摇不定的内阁一方面迫使查兰·辛格更关心保护总理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未能给辛格政府以相当的时日来执行经济计划。除了经济的困境外，人民党联合政府面临印度人口的增加，社区协调的缺乏，宗

教语言劳工等各类型的不稳，以及分离主义倾向等问题。由于特殊的宗教与社会结构，认同危机一直是印度政治发展中的一项问题。许多印度人视本身为某一团体的成员，而不向国家认同，人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使其无法面对上述问题。而许多危机更在组成联合内阁的权力分配过程中，变得具体化，人民党在竞选时承诺以民主对抗甘地夫人的独裁，但人民党无法解决上述包括认同在内的危机，无法为印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良好的政治制度才是确保长期民主的重要因素。然而人民党根本做不到，查兰·辛格的内阁也很快倒台。最后由总统宣布提前进行大选，结束人民党混乱的政治治理时期。

阿卡利党的执政满足了他们的期盼已久的参与政权的欲望，使得他们尝到了握有权力的好处，进而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另一个方面，1969 年中期选举之前的两届阿卡利党为主体的联合内阁在不到 19 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垮台，1969 年中期选举之后组成的阿卡利党与其他政党联合内阁在两年时间内又有三次变动，没有能够坚持干满一届，最后又以总统治理而告终。这种变动既有阿卡利党内部的传统派系斗争的原因，更与国大党不断地与阿卡利党内的派别联手为阿卡利党制造困难，以及中央通过邦长和其他途径干涉旁遮普内政有关。这迫使阿卡利党领导人重新考虑政治形势，产生了新的想法。阿卡利党认识到尽管成立了旁遮普语言邦，并且在这个邦内锡克人口占 60% 的多数地位，尽管自己是锡克社会的主要政治代表，自己却没有能够单独执政。而是必须同对手——人民同盟以及印度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执政。由于各政党的相互间的利益差别极大，因此只能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共同分享政权，阻止旁遮普国大党执政。在组成政府之后各政党之间势必会在如何为自己这一派谋求更大权力问题上争吵不已，从而造成政府动荡不安和无所作为。在台下的国大党自然不安居于反对党的地位，而千方百计地利用阿卡利党内部的矛盾

和阿卡利党与它执政盟友之间的不和，挑起他们之间的冲突。在中央执政的国大党则利用中央所掌握的巨大权力，以有利于国大党的方式实行总统治理。从而加剧了这个邦政局的不稳。阿卡利党感到很受压抑，由此提出重新调整中央和邦之间关系的要求。他们需要有更大的权力，要求给邦更大的自治权。由于邦的权力是在中央和邦之间根据联邦宪法进行划分的，他们的政治目标开始转向中央和邦之间的关系上。

第四节 绿色革命与旁遮普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一、印度经济发展战略与旁遮普的绿色革命

印度独立时，印度的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印度的经济活动完全围绕宗主国的经济轴心在转动。经济上十分落后，农业上，生产停滞，粮食生产根本不能满足这个农业大国人民的基本所需，饥荒频发，以至于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工业上，虽然号称位列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依然缺乏一个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大量的生产资料需要进口。印度政府尽管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但是却对发展自己的经济充满了信心。他们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印度主要是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计划，以求得农业的发展，在工业方面逐步实施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农业土地改革没有得到彻底执行，旧的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只是在原来的农业土地关系较为松散的地区农业才得到了发展。而工业方面，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巨额财政收入，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但是这种国有工业体系效率低下，根本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经

过 20 多年发展，农业和工业发展依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矛盾尖锐。

旁遮普作为印度的一个邦，它的发展也自然受到联邦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在农业方面，旁遮普的土地改革也十分有限，1950 年颁布的保护佃农权利法案，1952 年给佃农土地所有权的法案，1953 年规定土地最高限额的法案及 1955 年补充法案都没有多少成效。但是与印度其他地区相比，旁遮普的土地关系还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原因就是旁遮普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进行土地整理时，基本上确立了村社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度，大地主不是很多，拥有的土地数量也不是很大。加之印巴分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流动，政府用穆斯林遗留在东巴的土地安置难民时，由于土地数量不足，在他们中间有意识地缩小了土地拥有的差距，政府按比例给予他们土地，原来拥有土地最多的人在安置中得到的数量甚至减少了 95%。独立后的印度旁遮普省也是一个缺粮邦，殖民政府开发的大量运河殖民地基本上都留给了西巴。由于旁遮普具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潜力，于是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旁遮普投入大量资金，兴修灌渠大坝等种种大型水利设施，十多年中一直没有间断，加上旁遮普勤劳的人民，生产恢复很快，很快甩掉了缺粮邦的帽子，又变成了余粮邦。

就全印而言，十几年的土地改革、乡村发展以及合作社运动都没有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落后的农业不适应工业和其他部分发展需要的矛盾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失衡。粮食不足一直是印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它像慢性顽症一直折磨着印度。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粮食危机诱发了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粮食危机还招致印度在外交上的屈辱。它迫使印度政府暂时中断了它的五年计划，实行应急的年度计划。在世界银行和美国专家的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农业发展新战略，即实行以高产的杂交种子和化肥使用为中心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首先涉及到粮食生产。

而发展绿色革命基础最好的邦是旁遮普邦。当阿卡利党在 1967 年宣布他们将使旁遮普成为“一个模范省”，成为“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羡慕的对象”时，绿色革命早已于 1965 年拉开了序幕。旁遮普语言邦成立的前 5 年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惊人，随后在政府的扶持下，绿色革命在旁遮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由于下列原因，旁遮普成了印度绿色革命最成功的地方。第一，印巴分治降低了旁遮普的阶级差别。印巴分治导致旁遮普的人口迁徙，使得旁遮普经济结构产生震荡，政府实行的比例土地分配制有助于降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差别。第二，在制度改革上，旁遮普独立以后实行的废除中间人制度、租佃改革、土地最高限额法和土地整理等等政策，有助于旁遮普成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地区。独立后的 30 英亩土地最高限额法和合作农业使得大量农民自己经营土地，不在地地主几乎消失。在政府的政策刺激下，农民愿意将自己的积累投于拖拉机、管井和现代耕作技术上，并开始注重家畜和家禽的饲养和改良。旁遮普的土地整理，到 1969 年时已经全部完成，它是印度各个邦中实行得最彻底的地区。土地整理使得农民能够更加经济地经营自己的土地。第三，在现代农业的发展基础准备上，50 年代起印度政府为了发展旁遮普农业就已经在旁遮普建立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如博卡拉大坝工程。旁遮普政府还将“生产更多粮食”的工程扩展到合作、森林、兽医、灌溉、电力公共工程等部门。道路也得到修建，在 1969 年到 1970 年，有近 2000 公里的道路被建立起来，比“一五”计划时期建设道路的总和还要多。大部分村庄都与主要的道路相连，也因此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旁遮普的农业科研机构的建立也有助于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推广和改良种子的使用。第四，就人力资源条件而言，旁遮普的农民具有良好体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马尔科姆·达林曾称赞：“吃苦耐劳、精于农业，强健的体魄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在新

的环境中贾特锡克达到了印度其他任何人种都达不到的地步。”^① 对于贾特农民的事业精神和他们的特质，他说道：“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难以找到比他们更好的耕作者、殖民者、移民和士兵。”^② 第五，就政府和社会的领导结构而言，这个邦的管理者大多来自农民阶层(贾特锡克)，具有乡村背景，在独立后的旁遮普的大多数首席部长都是如此，如凯隆、巴德尔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都积极推动农业的发展。此外，还有旁遮普海外侨民汇回国内的大量资金，以及政府发展农业的优惠信贷与合作发展机构，农业机械等等有利于旁遮普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

绿色革命结果首先是导致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使得市场剩余大为增加。在旁遮普整个农业生产的指数从 1950—1951 年的 1% 上升到 1978—1979 年的 5.23%，而同期印度全国只有 2.35%。^③ 在 1966 年旁遮普生产粮食 330 万吨，到了 1976—1977 年达到 921 万吨(10 年间增长 3 倍)，旁遮普向国家贡献的粮食由 1974—1975 年占国家收购总量的 25.6% 上升到 1978—1979 年的 50%，到 80 年代，联邦政府从旁遮普获得的大米和小麦分别占其收购总量的 56% 和 63%。^④ 旁遮普由独立初的缺粮邦再度变成了印度的粮仓和“面包篮”。

绿色革命使得旁遮普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使得旁遮普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绿色革命使得旁遮普的各个阶层都得到了好处，然而这些利益主要为大中型农场主分享。受益者大部分是锡克教徒。1971 年旁遮普有 8 百万以上的锡克，构成了这个邦人口的 60% 多一点。锡克人口 70% 生

① 马尔科姆·达林：《繁荣和债务中的旁遮普农民》，孟买，1947 年，第 19 页。

② 马尔科姆·达林：《繁荣和债务中的旁遮普农民》，孟买，1947 年，第 36 页。

③ 库马尔·普拉麦德：《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昌迪加尔，1984 年，第 50 页注 33。

④ 阿马尔吉特·库马尔等：《旁遮普故事》，新德里，1984 年，第 138 页。

活在乡村。在旁遮普的锡克人近 65% 属于耕作种姓，而科特里、阿努拉、婆罗门和拉吉普特锡克只构成锡克人口的 5% 左右。旁遮普的农业增长对于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在 1970 年代日益减少的佃农和日益增长的农业劳工中，拥有土地超过 10 英亩以上的富裕的和中等的土地所有者（其人数占整个土地所有者的 23%），耕作的土地数量占耕地总量的近 65%。拥有土地达 5—10 英亩的农民构成土地所有者人数的 20% 左右，耕种大约 20% 的土地。而近 57% 的农民只拥有耕地的 15%。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与大部分的贫苦的农民并存。农业雇工大多来自外邦，这是绿色革命后旁遮普农村结构上的特点。农民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困农民，都关心市场价格。农业生产已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市场网络，导致了农场主们要求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例如，更好的市场便利，有保证的市场，有利可图的价格和更多的更容易得到的信贷，这些将确保剩余农产品的稳定和增长。在这个时期，阿卡利党提出了诸如降低电力费用和化肥价格，增加补贴等要求，反映了占领导地位的贾特锡克的利益。

然而农业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总是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从 70 年代中期起，旁遮普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1970—1971 年到 1973—1974 年农业的年增长率为 19.97%，1973—1974 年到 1976—1977 年为 6.28%，在 1977—1978 年，1978—1979 年，1979—1980 年和 1980—1981 年，其增长率分别为 9.5%、2.4%、7.4% 和 11.6%。^① 在净耕作面积和耕作密度上也存在限制。这些需要另一次技术上的突破，如培育具有更短的成熟周期的作物品种，改进轮作制度，季节之间高峰时期的机械化的经济利用，更多的使用化肥，在土壤改良上、水源管理上大量的投资等等，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还有自从

^① 库马尔·普拉麦德：《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昌迪加尔，1984 年，第 54 页。

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后，农业投入的成本猛增，农产品的价格却没有相应的变动，农业投资的回报率大大降低。

而印度政府的政策使得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没有得到增加，通常情况下，如果按照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印度的粮食长期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稍有一些自然灾害，粮食供应更加紧张，粮食价格马上就要陡升上去，这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本来对于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旁遮普而言，应该是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市场环境。然而，由于下列原因旁遮普的农业生产者不仅没有能得到超额利润，就是一部分正常的利润也因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而转到了政府手中。(1)土地改革不彻底，大量贫苦的农民无法购买粮食，工业发展的缓慢，城市中大量的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城市贫民也无钱购买足够的粮食。(2)印度政府实行国营粮食贸易和产粮区制度，禁止粮食自由流通，通过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平价粮食分配系统控制粮食的价格，减少因价格波动对居民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在城市中较低的粮食价格供应降低工厂劳动力的成本，可以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有利于工业资本家，将本来属于农业资本家的利润转移到了工业资本家手中。(3)国家在粮食生产和供给方面也存在问题，当国内粮价稍高时，即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国内粮食过低时，政府虽然提出并实施以保护价收购农业生产者的粮食，但是由于国家资金有限，粮食储备设施不足，无法收购农场主手中的粮食，而农场主所需的生产资料都要用现金从市场上购买，资金紧张，只有低价卖给大粮商，从而失失了一部分利润。

这种情况便导致了旁遮普邦内因绿色革命积累起来的剩余资本不愿继续投资在农业上，他们寻求在邦内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投资。可能的途径就是投资于商业和工业。富裕的锡克农民已经对农产品贸易建立了初步的控制，但是要进入工业生产和一般贸易领域就意味着要与印度教徒商人，锡克商人和现有的工业家进行竞争。这时旁遮普的精英们才猛然发现这个邦的经济结构上，存

在巨大的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三、旁遮普工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欠缺

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英国当局开发旁遮普的目的是将这个邦变成帝国农业产品的原料供应地和英国人的商品市场，英国人虽然在旁遮普进行大量的投资，开发修建各种运河灌渠，建立了好几个大规模的殖民地，并将大量的居民移往新的殖民地，促进了旁遮普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旁遮普与世界粮食市场的联系比它与印度的联系还要密切。但是与英国殖民政府在农业上的大量投资相比，他们在工业上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旁遮普本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比较慢，它在工业发展上不仅受到来自英国工业资本家的竞争，还受到发展稍早的印度本地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除了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外，在旁遮普几乎见不到现代工业的踪影。因此，在独立之前，旁遮普工业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印度其他地方相比就已显得十分落后。印巴分治之后，原旁遮普省的主要产粮区和工业稍有发展的地区都划给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印度的旁遮普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工业发展规模极为有限，结构也不平衡，小工业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旁遮普是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邦，然而它的工业与工业发达的邦相比，远远地落在后面。旁遮普工业收入只占邦财政收入的 12%，而马哈拉斯特拉达到 26%，整个印度为 16%。农业占了旁遮普邦总收入的近 60%。^① 由于经济缺乏多元化，因此农业成了该邦日益增长的人口主要职业。^② 62.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再就工业结构而言，小工业居主导地位，大中型工业企业缺乏。据 1970—1971 年统计数据，小工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61.75%，大中型工业占 38.25%，1973—1974 年前者占 59.07%，

^① A.S. 纳朗：《苏特里季上空的风暴》，新德里，1983 年，第 22 页。

^② 哈尔品德尔·考尔：《印度农业发展的政治后果》，新德里，1988 年，第 68 页。

后者占 40.93%。1978—1979 年大中型工业的比重为 48.56%。仍不到一半。大多数工业企业都是小型企业，就生产规模、资金和雇佣工人数都十分有限。

就邦内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而论，旁遮普的工业部门不生产这个邦的发达的农业所需要的重要产品，它没有能够满足来自农业部门对拖拉机和化肥的需求。这个邦迟至 1974 年才开始创建第一家拖拉机厂。拖拉机和化肥大量依赖外邦供应。尽管大中型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有所增长，但是在旁遮普小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主要相对集中在卢迪亚纳、阿姆利则和朱朗达尔等几个城市，小工业主要为棉毛纺织、内衣织造、自行车部件、农机具、体育用品、再轧钢和轧棉机。这些部门的产值在整个小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1973—1974 年的 78.12% 上升到 1978—1979 年的 90%。^① 旁遮普工业生产的另一个特征是这些小工业依靠从外邦获得原材料。与旁遮普之外其他邦同样工业相比，这些工业缺乏与本邦大中型工业及其辅助工业的联系。这使旁遮普的这些小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建立在旁遮普邦丰富农业产品基础上的工业明显缺乏。根据印度旁遮普政府 1982—1983 年度的计划数据，甘蔗被转换成糖的比率全印平均转化率为 33%，旁遮普只有 13%，旁遮普棉花产量占这个国家的 20%，而所有这些棉花中只有 15% 是在这个邦加工的。^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旁遮普仍然有 70% 的棉花和 60% 的糖浆出口到其他邦而不是在本邦加工。^③

人们在谈到旁遮普工业发展的落后原因时，通常认为主要是

① 普拉麦德·库马尔等：《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乡村和工业发展研究中心，昌迪加尔，1984 年，第 52—56 页。

② 《旁遮普政府年度计划，1982—1983 年》，92 页，162 页转引自普拉麦德·库马尔等：《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昌迪加尔，1984 年，第 60 页。

③ A.S. 纳朗：《民主、发展和扭曲》，新德里，1986 年，第 180 页。

旁遮普邦地处敏感的印巴边界，一旦爆发战争，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缺乏工业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缺乏煤铁等矿产资源。以及这个邦由于政治上鼓动不断，教派关系紧张，缺乏安定的环境等等因素。然而这些都不是阻碍工业生产发展的根本因素。举例说，矿产的存在虽然能够有力地促进工业发展，但是它不能够保证工业就能发展。印度中央邦、奥里萨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工业并不发达。而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虽然矿产资源不怎么丰富，却没有阻止其工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旁遮普工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应该从中央对旁遮普的经济发展的思想或者战略中寻找。事实上，中央政府对旁遮普的政策如同英国政府对旁遮普的政策一样，是让旁遮普成为为印度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原料基地，同时将它作为这个邦之外生产的工业产品的市场。印度国家有意识地发展公共部门推动经济工业化，但是在国有企业的布局上旁遮普被严重忽略了，中央给旁遮普用于工业发展的财政援助一直被忽视。到 1975 年，在中央投资中旁遮普所占的份额，只有 1%。表现在中央在旁遮普的投资项目上，在 1980 年代，中央在旁遮普共实施了 19 个中央的项目，而在马哈拉施特拉为 197 个，古吉拉特为 146 个，北方邦为 109 个。^① 由于印度是一个具有高度中央集权性质的联邦，中央掌控绝大部分财政资源，因此在考虑旁遮普的经济发展时，联邦的经济战略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现有的政治模式下，中央对邦经济发展拥有巨大的控制权。它有权解散邦政府，负责批准发展项目，建立国营企业，调节市场运作，制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在使用这些权力时，中央总是忽视旁遮普邦。它通过严格的企业许可证政策，使得整个工业布局的重点建立在北方的印地语地区。而其他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许可证的数量和机会，相比之下就少得多。由于得不到工业发展项目，

^① 哈尔品德尔·考尔：《印度农业发展的政治后果》，新德里，1988 年，第 68 页。

旁遮普通过绿色革命积累的资金被政府大量用于其他邦。政府在旁遮普开办的银行没有在邦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它从这个邦吸走的资金比中央政府拨给这个邦的还要多。中央政府通过它本身所具有的财政优势和巨额的发展资金，使得地方邦政府在开办大的发展项目时，只有事先得到中央的支持，才能够得到它的资金援助。没有中央的支持许多工程项目甚至根本无法得到贷款。因此在旁遮普扭曲的经济发展和工业落后的基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在于政策领域。旁遮普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前景取决于印度政府如何保证放弃它的保持旁遮普为主要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地，并且当做印度其他地区生产的工业品市场的既定战略。而对于旁遮普地区新兴的地方政治力量而言，要求地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要求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求邦更大的自主发展权。

第五节 世俗主义观念淡化和锡克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

一、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局限性

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宗教观念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生生死死，没有一样不带有宗教印记的。这种情况在政治生活中也自然毫不例外。印度国大党最杰出的领袖圣雄甘地就主张宗教和政治相结合，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很形象地说过“没有人能够脱离宗教而生存，有些人自夸他们的理智，说他们跟宗教不相干，这正像一个人说他呼吸，可是没有鼻子”^①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425页。

教派政治在印度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印度独立前即已存在，教派政治的结果不仅导致甘地本人命丧于狂烈的印度教徒之手，而且也导致了这个国家独立即告分裂的悲剧。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尼赫鲁一直对宗教政治深恶痛绝，他对宗教持一种鄙视的态度。他认为用现世的观点来衡量，宗教只会妨碍一个民族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进步，信仰宗教的人对自己的解放比对社会的利益更为关心，他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有组织的宗教常常变成一种特权，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反对改革，反对进步的反动势力。”^① 对于宗教改变现代社会的作用，尼赫鲁更引用了 1727 年英国伦敦的一位主教给美国南部奴隶主的一封信：“基督教和福音并不改变财产，也并不改变任何属于民事关系方面的义务，在这些方面对人而言，没有什么改变，基督教给我们的自由是从罪恶和魔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人的贪求、情欲中解脱，至于人们的地位，不管是以前被控制的还是自由的，并不因为受了洗礼，变成基督教徒而有所改变。”尼赫鲁认为，今天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肯这样赤裸裸地表白，可是它对于财产对于现行的社会制度上的作用基本上却是一样的。^②

印度独立以后，奉行一种世俗主义的政治思想，将世俗主义作为立国的目标。1949 年 11 月通过的印度宪法明文规定，要将印度建成一个“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印度的主要政党如国大党，共产党等都把世俗主义作为党的旗帜。所谓世俗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国家对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既不歧视任何宗教，也不将任何宗教立为国教，实行政教分离，国家的政治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 425—428 页。

^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 428 页。

与法律不受宗教的影响。印度宪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宗教不影响任何现行法律的施行，也不影响政府制定任何法律；在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完全由国家维持的任何教育机构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其二，提倡宗教和解精神，宪法第五十一条(甲)第五款规定，“促进在全体印度人民中间超越宗教、语言和地区派别差别的和谐的兄弟般的友爱精神。其三，保护少数教派集团的利益。基于这种思想，印度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削弱教派主义对印度政治的影响。例如在选举中利用教派旗帜进行宣传的，可以向选举法庭进行控诉。20世纪70年代印度实行紧急状态法期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联邦政府还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新的宪法前言庄严地表示要将印度建成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民主共和国。”

然而书面上法律规定与日常的现实生活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因为法律的颁布就会消除长期以来教派政治一直在印度社会中所发挥的影响。1919年，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改革第一次将印度的教派政治合法化之后，刺激了各宗教团体争权夺利的斗争，教派政治成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统治的终结而废除，有着一定历史年代的政治特质不可能以一部法律加以消除。许多教派政党如印度教大会，全印穆斯林联盟，国民自愿团，阿卡利党等都是那个时候建立和壮大起来的，教派主义的宣传鼓动方法也是这一时期锻炼出来的，一些教派政党还以本教派的利益代言人自居，为了取得竞选的胜利，一些非教派政党也取悦占本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的教派，他们在考虑地区候选人时，教派背景也是列入他们考虑范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独立后一大批在英国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政党依然活跃在印度的政坛上，并且还有新的教派性政党产生，如1951年建立的印度人民同盟。这些组织利用印度宪法有关公民传教自由和信教自由以及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机构的权利，鼓

吹宗教利益高于一切，极积从事布教传教活动，并不可避免地向政治领域渗透，如印度人民同盟的主要干部都来自国民自愿团，这些教派政党和组织的存在对印度政府宣传的世俗主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印度社会中非教派政党教派化现象也时隐时现，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教派斗争为自己谋利很是常见。以国大党为例，它“尽管高声推崇世俗主义，但是当适合于它的战略时，它便与教派组织结盟，无论它是旁遮普的阿卡利党还是卡尔那塔克的穆斯林联盟。”^①早在 1957 年，国大党为了推翻喀拉拉邦出现的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就放弃了国大党所一直主张的宗教与政治相分离，反对与教派交往的原则，与天主教徒和印度教派的“拿亚”集团联合起来，谴责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在中央政府解散这一地方政府后举行的选举中，为了进一步击败印度共产党，国大党进一步放弃原则与穆斯林联盟结成竞选联盟，引起举国震惊。

二、国际宗教复兴主义的抬头及其在印度的表现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印度的宗教势力有所抬头，在政治中教派政治的色彩又一次变浓。在国外，70 年代在国际上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时代。许多国家中伊斯兰教力量上升，教徒人数和清真寺数目大增，在许多原世俗化较快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家也出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内，每到礼拜的时候，从清真寺的尖塔上即传来高亢嘹亮的宣礼声，一些商店，工厂，银行和学校的活动都要停下来，让人们参加礼拜。在文化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主动追求传统的东西，抵制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如音乐，电影，电视等节目，各种伊斯兰出版物受到青睐，广播、电视中的伊斯兰节目数量增多，各类宗教团体和组织不断涌现，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

^①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 年，第 130 页。

的，他们广泛开展宣教活动，举行伊斯兰教的艺术建筑和科技展览，背诵和书写古兰经比赛等等。一些国家中除了鼓励传统的清真寺教育外，还在各类学校中增设伊斯兰课程，就连世俗化开展得最早，也是最多的土耳其也在其 1982 年新宪法中规定：“中小学有义务进行伊斯兰教教育。”伊斯兰化的盛行在人们的服装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二战后一段时期内，人们将穿西服看作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西式服装大行其道，土耳其，伊朗政府还明确规定把传统服装改成西式服装，并规定妇女不得戴面纱，然而到 70 年代，许多穆斯林国家中，恢复传统服装成为一种时尚，男人戴头巾，蓄胡须，女人也穿上了不暴露身体任何部分的长袍，并蒙上面纱。而且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往往城市里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和大学的青年学生对恢复传统服装最为积极，最为热心。

在经济领域，是伊斯兰银行的兴起。与西方的银行制度不同，这种银行是在借贷和投资时没有利息往来，而采取其他一些变通的手法，如盈亏分担制，加价借贷制，手续费等，这些银行很快不仅出现在西亚中东和北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而且还传到了欧洲，东南亚等地。有的伊斯兰国家甚至还提出了按伊斯兰经济原则对现行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经济制度”，如征收天课税（扎卡特）建立符合教法的财产继承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

在法律上。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伊斯兰国家大多采用西方式的世俗法律，有些国家则在很小的范围内保留着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有的国家则完全取消了伊斯兰教。70 年代随着伊斯兰教力量的上升，很多国家中要求恢复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苏丹、埃及、伊朗等全面或部分的实行伊斯兰法。在政府行为上，有的国家在推行某项政策时，也往往要依靠伊斯兰教法权威的支持，如突尼斯吸引西方游客的海滨旅游区计划和埃及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时都得到宗教机构的论证。由于伊斯兰教本身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宗教，对许多

穆斯林来说教法的复兴便是政治与宗教的重新结合，7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的复兴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影响就是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化或者伊斯兰政治化。特别是在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大毛拉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伊斯兰革命，迫使伊朗国王巴列维流亡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朗取得了政权。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

同样，在旁遮普附近的巴基斯坦，尽管是以宗教立国的，但是在50—60年代与美国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上深受美国的影响，世俗化也在逐渐发展。政治斗争主要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之间进行，前者要求进行全面的伊斯兰化，而后者则主张政教分离，经过长期较量，原教旨主义派别逐渐占据上风，70年代，总理阿里·布托的世俗化倾向受到以伊斯兰促进会为首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猛烈抨击。1977年，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后，积极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在全国推行“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吸收原最大的反对派伊斯兰促进会成立了国家伊斯兰顾问委员会，在全国全面实施伊斯兰法，恢复伊斯兰教的扎卡特税，废除银行利息，以阿拉伯语取代原来的英语为国家的第一外语，在广播中增加伊斯兰节目，他甚至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不得穿西服，打领带，而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强调伊斯兰教的复兴，推动巴基斯坦成为伊斯兰国家。^①

就印度而言，虽然印巴分治后，穆斯林的人数只占全印人口的13%左右，但由于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穆斯林总人口的绝对数很大。独立后教派主义的穆斯林联盟仍在活动，在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兴起后，印度的伊斯兰教组织为了反抗印度教徒的歧视和迫害，维护穆斯林的利益，也跟着进行复兴伊斯兰教的宣传，

^① G. W. 乔杜里：《巴基斯坦从军人政治到文职统治》，爱塞克斯，1988年，第36页。

并吸引受迫害的印度教中的低种姓加入伊斯兰教。在沙阿·巴诺事件后，印度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势力加速发展。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的发展，遭到印度教教派组织的反击。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北方邦、比哈尔、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安得拉、泰米尔纳杜、阿萨姆和古吉拉特等邦都发生了许多教派骚乱。印度教的复兴运动在印度独立以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国民自愿团的领袖哥瓦尔卡等人的努力下，政治上的教派组织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的前身）于 1951 年初成立。1964 年他们又在孟买成立了世界印度教大会，宣传印度教文化。1966 年 11 月人民同盟在德里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宰牛运动。到了 1981 年由于大批泰米尔纳德邦的贱民大批改信伊斯兰教，形成声势浩大的浪潮。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领袖高声叫嚷印度教处于危急之中，号召印度教徒行动起来，捍卫印度教，矛头直指伊斯兰教。

此外，由于国大党政府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失误，没有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经济上危机不断，缓慢的增长率在国际上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印度式的增长”。就连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目的都达不到，根本不可能达到很快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则做得更差，发展不仅未能带来阶级间经济差距的缩小，相反社会阶层间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贫困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对旧的发展战略已逐步失去信心，新的战略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的主要阶层中出现了一种依赖宗教作为精神寄托的倾向。

反映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首先是浓厚教派色彩的政党经过新的整合后又一次出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这个党就是印度人民党(BJP)。也就是今天在印度中央执政的政党。这个政党成立于 1980 年 4 月初，是由原人民同盟主席阿比·瓦杰帕依脱离人民党后建立起来的。这个党的标志是一朵荷花。印度人民同盟本来在 60 年代以来教派主义曾有所收敛，当时它曾修改了对印地语的

政策，把过去提出的以印地语代替英语，以梵文为学校必修课目的口号改成为发展印地语作为联系语言，以争取印度南部的非印地语群众，该党还注意改善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不发表或少发表反对穆斯林的言论，缓和它在印度化理论上的立场，印度人民同盟主席瓦杰帕依在第五次大选前曾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提出，“印度化的意思是让对宗教、种姓、地区和语言及教义的狭隘忠诚服从于印度国家的忠诚。”在 1971 年第五次大选后，为了减少这个政党的“上等印度教徒种姓政党的色彩”，便在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工作委员会中增加了一名贱民和一名穆斯林作为委员，并且在这之前更把印度“印度教化”的思想目标变为“印度化”的目标，以免刺激包括锡克教在内的其他小教派的信徒。在第六次大选前人民同盟还在某些邦提出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兄弟”的口号，以图赢得穆斯林的支持。印度人民党成立之后抨击英迪拉·甘地没有能够实现建立强大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诺言，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提出本党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反对日益增长的王朝专政的挑战，党的纲领是“民族主义”，民主，非教派主义，以甘地的政治经济权力分散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但是从思想意识上说它并没有割断与人民同盟的联系，它在成立之初就力图证明它不是人民同盟的复活，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为此它提出了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的口号，在行动上积极改变它的教派主义倾向，但是并不彻底。它的所有的干部来源，绝大多数仍来源于印度国民志愿团，它在政治活动中也不时利用教派组织和教派口号。印度人民党成立之后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组织，党内组织纪律严明，领导有方，力量发展很快，到 80 年代末它就成了国大党的真正的政治对手。

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也在不断地打宗教牌。在 1972 年的大选中她采用了具有宗教含义的图案——母牛和小牛——作为竞选标记，以增加当选议员的可能性，由于母牛在印度教中是圣物，用它作标志，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也是她后来遭到起诉的一个

方面。在其后的地方邦的选举中更是不断地运用宗教因素。这一点在旁遮普显得特别明显。

二、新一代锡克教派主义领导人及组织的出现

就锡克教而言，它本身除了吸收了贾特锡克的文化特质外，在宗教理论上两大来源，一个是印度教的虔诚派，另一个就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除了锡克教的师尊制度和许多宗教思想来自苏菲派外，伊斯兰教的宗教与政治合一的思想对锡克教有着深刻的影响，锡克教同伊斯兰教一样，除了是一种精神信仰外，它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一种文化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从锡克教五世古鲁开始，锡克教与政治的关系就密不可分。近代以来旁遮普的锡克人不断地强调自身的民族特性，并与印度教的教派组织和穆斯林教派组织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终于迫使英国殖民政府认可了锡克的宗教要求。在独立以后，成立旁遮普语言邦的斗争上，文化传统保护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锡克教派组织与印度教教派组织尖锐的对立必然使得锡克人对自己的民族特性的保存时刻持警惕态度。

60 年代中期以后，作为绿色革命开展得最好的邦，旁遮普成了印度最富庶的地区，现代化的光环照耀着旁遮普。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农业机械的大量运用，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意味着更深刻的社会变化。现代化使得交通、通讯和学校教育等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不仅使整个旁遮普进一步连成一体，也使得锡克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交往，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现代教育的普及使得人口的识字率大大增加，文盲人数在迅速减少，有助于现代的文化迅速地传入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古鲁穆克体旁遮普语和印地语的报纸杂志的发行量成倍增长，广播和电视使人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尽知天下大事。外部世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强烈地冲击着宁静而传统的乡村社会。锡克前往海外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大多去了美国、英

国、法国、阿拉伯海湾国家和东南亚,在那里或是经商,或是做工或是留学,这些青年首先接受西方影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又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旁遮普,锡克青年的宗教观念开始淡薄,他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抽烟,喝酒,听西方的流行音乐,不再蓄胡须,留长发,带“五 K”,更少读锡克经典,他们不遵守锡克教的清规戒律,用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些都属于违背教规的行为。这给锡克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展使锡克原教旨主义者感到不安和震惊。虽说旁遮普锡克是印度较开明的族体,能够敏于接受外来的文化,但是在锡克教内以部分圣人为代表的正统的锡克教派势力,在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感到惊慌失措。对于胡子和头发的态度能够典型地反应这些锡克僧侣的心态。早在 60 年代的后期,金庙圣人就不断地批评剃光了胡子、剪去头发的锡克青年,谴责他们违反了锡克教的“五 K”准则。70 年代后期,更多的锡克青年不遵守锡克传统,喜欢现代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观察家文中所说的:“剃光胡子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锡克圣人们感到愤怒,年长的锡克和阿卡利党主体也表示失望。毕竟后者的影响是建立在锡克的传统上。^①如果这种传统逐渐地消亡了,那么以锡克的宗教文化为基础的阿卡利党的权威也必然下降。

另一方面,印度实施的混合型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并没有给印度带来预想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缓慢,不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机器的采用,人口的大量增加,许多人被赶出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沦为农业工人,两极分化严重,失业率上升,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处于迷惘与苦闷之中。阿卡利党人却没有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政策,提出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措施,他们的主张缺乏对

^① 《经济政治周刊》,1978 年 10 月 7 日,第 1697 页。

青年人的吸引力。因此导致了一部分人产生了对锡克传统的依恋和回归，由此为锡克的宗教复兴主义提供了可以滋生的空间。事实上，当锡克人从电视上看到、从报纸上读到、从广播中听到有关阿亚图拉·霍梅尼以及伊朗革命的消息时，一些具有野心的人也在说“他们能够做的，我们也能够做到。”^① 在这种具有野心的人中，贾奈尔·辛格便是最突出的一个。

在阿卡利党和人民党执政时代，代表锡克原教旨主义的宾德兰瓦拉开始崭露头角。他的崛起跟宰尔·辛格时期的国大党邦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在 1972 年国大党取得了旁遮普邦政治选举的胜利之后，国大党邦政府表现得比阿卡利党对锡克教还要热心。宰尔·辛格为了削弱阿卡利党对社会的控制，发起了一场宗教运动，“将宗教之帆从阿卡利党的船上夺走，证明除了对世俗主义的承诺外，同样能够证明是一个比他们更加虔诚的锡克”^②。大规模地组织宗教法会，公共职能部门开始工作之前，进行祈祷，从阿兰德普尔到帕提亚拉的道路被重新命名为古鲁戈宾德·辛格大道。一队据说是古鲁戈宾德马厩中的马匹后代被带到这个大道上游行，虔诚的居民们将它们排泄物奉为圣物带回家中。一个新的城镇以这个古鲁的儿子名字命名为萨希德·阿吉特·辛格·纳加尔等等。宰尔·辛格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自然使得他在锡克中大受欢迎。但正如一句印度俗语所说“他想骑在过去的肩上，过去将他数百次地摔在地上。”^③ 旁遮普的锡克和印度教徒，包括宰尔·辛格本人将为此付出代价。1977 年 3 月选举中失去政权之后，宰尔·辛格比他在当首席部长时更加具有宗教的狂热性。这不仅是

① 罗宾·杰弗里：《印度发生了什么》，伦敦，1994 年，第 130 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23 页。

③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24 页。

因为他失去了权力，而且还因为人民党政府任命了古尔迪亚尔·辛格调查团来调查他任首席部长期间的所作所为。宰尔·辛格知道他无法通过国大党对此进行反击。甘地夫人正受到人民党政府对她的指控，根本无法给他提供保护。国大党组织内部各派正处于激烈的斗争中。由于实行紧急状态，国大党在公众之中已经失去了良好的形象。宰尔·辛格也不愿自己就这样担着罪名，就此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他曾面见人民党的总理，也是原来的国大党的莫拉尔吉·德赛，请他帮助他摆脱这场官司，但是遭到德赛的拒绝。

在宰尔·辛格处于为难之际，甘地夫人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建议他利用锡克圣人向阿卡利党政府进行挑战，或者至少使阿卡利党政府感到难堪。圣人是旁遮普乡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桑贾伊·甘地的妻子莫尼卡就是属于非贾特的锡克教徒。他和宰尔·辛格，特别是后者，都知道凯隆在首席部长任期内是如何挑起阿卡利党领导人，同时也是锡克僧侣的法特赫·辛格与塔拉·辛格之间的矛盾。此时英迪拉·甘地也因为沙阿委员会对她在紧急状态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调查而极力寻找机会对付这个政府。宰尔·辛格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后来的旁遮普邦国大党首席部长达尔巴拉·辛格一起选择了两位圣人，最后由桑贾伊·甘地决定其中一位作为他们对付阿卡利党的宗教工具。桑贾伊最后选中了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拉。这位圣人是锡克教众多派别中最具有清教徒色彩的丹达米·塔克沙派的领袖，该派别在农村贾特锡克中有许多支持者。为了培植这位锡克僧侣，提高他在锡克社会的知名度，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宰尔·辛格等人向他提供了许多可能的资助。据桑贾伊·甘地的朋友，人民院议员卡马尔·纳特后来回忆说，为了培养他，“我们不时地给他

钱，但是我们从没有想到他会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① 宰尔·辛格一直与宾德兰瓦拉保持着密切联系。

1978年10月，阿卡利党的卢迪亚纳会议之后，宰尔·辛格感到利用宾德兰瓦拉反对阿卡利党的时机已经来到。通过桑贾伊·甘地的朋友古尔·比尔·巴库（前阿卡利党首席部长、已故的法官古尔纳姆·辛格的儿子）向这位圣人的候选人提供资金参加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以便打破阿卡利党在这个社会宗教事务上的统治地位，并将反对阿卡利党的政治战争打到了阿卡利党的内部。虽然在竞选中宾德兰瓦拉提出的候选人中只有4人当选，但是国大党（英）却因此赢得了宾德兰瓦拉的好感。

在讲述宾德兰瓦拉以后的活动之前，有必要将他的背景作一介绍。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拉，1947年来自于旁遮普南部莫嘎区的一个名叫若代的村庄，一个并不富裕的锡克农民家庭，是锡克乔金德尔·辛格的7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由于无力供养他的生活，宾德兰瓦拉的父母便在他受过5年正规教育之后，于1965年将他送到锡克圣人古尔巴昌·辛格那里学习锡克宗教经典，做一名锡克僧侣。贾奈尔·辛格以死记硬背弥补他的正规教育的不足。他记忆极好，很快就能够在讲道时引用锡克经典。在1977年8月3日，卡塔尔·辛格（他继承了圣古尔巴昌·辛格的位置）去世之后，35岁的贾奈尔·辛格便成了主持僧，并且按照惯例在名字的后面加上了宾德兰瓦拉这个称号。宾德兰瓦拉本人富有个人魅力、善于表演，平常头上总是带着蓝色的头巾，手里拿着一支钢箭，常让人联想起十世古鲁戈宾德·辛格。他这种行头这对于有文化的无所事事的、富于幻想又追求浪漫的锡克青年而言，是颇具吸引力的。贾奈尔·辛格在成为乔克梅塔的寺院领导人之后不久，就成了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危机》，新德里，1984年，第31页。

锡克原教旨主义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带着自己的武装卫队在乡村到处巡游，劝导锡克青年回到由古鲁戈宾德·辛格开创的卡尔萨的传统中：不剃胡子、不剪发、不吸烟、不喝酒、不吸毒。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为数以百计的锡克青年男女举行洗礼。他传教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所有的锡克都应该按照古鲁戈宾德·辛格吩咐的那样，成为一个携带武器的人。除了传统的剑以外，他劝他的追随者们携带现代化的武器，像步枪和手枪等等。他本人就总是佩带着一支带有皮套的左轮手枪和一副装满子弹的背带。

1978年4月，由于在正统的锡克教徒和尼兰卡里教团^①之间流血冲突中所持的强硬态度，宾德兰瓦拉在旁遮普第一次广为人知。尼兰卡里教团自称是锡克教徒，但是却不为锡克社会所承认。他们与正统的锡克的主要差别是后者只承认10位师尊和《古鲁格兰特·萨西布》的权威，而尼兰卡里教派承认师尊的传承。他们崇拜一位活着的古鲁，还有两本属于本教派的圣典，正统的锡克认为那是对他们的十位古鲁和《阿迪·格兰特·萨西布》的亵渎。1973年11月，金庙的阿卡尔·塔哈特宫锡克僧侣发布宗教敕令宣布尼兰卡里派为叛教者。在1978年4月13日，正统锡克与尼兰卡里

^①尼兰卡里派的创始人是白沙瓦的达雅尔·达斯，他因为反对锡克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新使用婆罗门的仪式、偶像崇拜和到圣河朝圣以及对活的圣人的崇拜等等发起一场宗教运动。他强调古鲁纳拉克的神的无形性（尼兰卡里），这一教派因此被称为尼兰卡里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雅尔·达斯本人却被抬高到锡克古鲁的地位，在他死后，他的草鞋成了崇拜的对象。尼兰卡里派在拉瓦尔品第建立了自己的寺院。达雅尔·达斯去世之后，依次是达巴拉·辛格（Darbara Singh）（1970年）、拉坦·辛格（1909）、古尔迪特·辛格和哈拉·辛格担任领导。1984年首领是曼·辛格·尼兰卡里，阿姆利则的一位实习眼科医生。这个派别的人数一度增加很快，后来迅速减少，许多人又回到了印度教或者锡克教中。在1930年，以布托·辛格为首的一派从尼兰卡里派别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比现在的尼兰卡里派更有势力的教团。虽然被判处为 *nakli*，但是布托·辛格的儿子阿维托尔·辛格获得了非常多的追随者。并且为这个教派编辑了两部著作：*Avtar Bani* 和 *Yug Purush*。正统的锡克教徒强烈地反对这两本书中的某些章节，认为它们是给锡克教古鲁们和格兰特·萨西布抹黑。

派发生的冲突中,有 13 个正统锡克和 3 个尼兰卡里派教徒死去,有 30 多人受伤住院。其中就有宾德兰瓦拉派的追随者。宾德兰瓦拉本人在冲突时不在现场。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在警察到达现场控制了局势之后,才赶到现场。^①锡克社会对这一冲突极为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尼兰卡里教派对他们的嘲弄。当一位阿卡利党人为旁遮普的首席部长时,这 13 个人被杀事件被认为是一场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当时的阿卡利党的首席部长巴德尔极其冷静地处理了这起事件。他停止了一些警官的职务,并且逮捕了尼兰卡里教派的领导人古尔巴昌·辛格。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平息锡克社会的愤怒。连阿卡尔·塔哈特主持僧发布的宗教赦令也没有能够平息锡克社会的愤怒。于是宾得兰瓦拉开始呼吁对尼兰卡里派教徒进行报复。在事件发生两天后的葬礼上,他公开警告说:“他将不允许这些人无谓地死去。”并且将在这次冲突中死去的人称为“殉道者”。^②

三、达尔·卡尔萨组织的建立

在锡克与尼兰卡里派教团于 4 月 13 日发生冲突之后。一些锡克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军事组织与他们所称为的“尼兰卡里派的对锡克教的攻击”作斗争。^③当时在野的国大党认为可以利用锡克激进分子搞垮阿卡利党与人民党的联盟。在桑贾伊·甘地的吩咐下,在宰尔·辛格的资助下,一些激进的锡克青年成立了达尔·卡尔萨(卡尔萨党)。这个组织 1978 年 8 月 6 日的第一次会议在昌迪加尔的阿柔马旅馆召开,宰尔·辛格的支持者为他们支付了费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32 页。

② 《论坛》,1978 年 4 月 16 日。

③ 萨廷达尔·辛格:《卡利斯坦:一个学术研究》,1982 年,新德里,第 131 页。

用。^① 这个组织的名字也是精心策划的。^② 为了处理这个组织的事务成立了一个五人最高委员会会议，以哈尔西姆兰·辛格为主席，其他成员包括贾金德拉·辛格、哈尔巴江·辛格·那朗格瓦尔，萨特兰姆·辛格和贾斯万特·辛格。会议同时决定这个组织为一个非正式的组织，不保存任何成员名单、选举资金和捐款人的情况。它的积极分子有 600 人左右。在昌迪加尔、古尔达斯普尔和莫哈里有三个支部。^③

昌迪加尔旁遮普大学的旁遮普语系主任 V.N. 提瓦里教授在这件事上帮助了宰尔·辛格。哈尔西姆兰·辛格是提瓦里教授的助手。他在旁遮普大学工作的同时一直介入卡利斯坦的活动。提瓦里本人曾经写过一本书，为甘地夫人在紧急状态时期的过火行为辩护，后来他因此被甘地夫人任命为联邦院议员。他从未隐瞒他插手达尔·卡尔萨的建立。他告诉库尔迪普·纳雅尔，他和宰尔·辛格希望使阿卡利党难堪。^④ 不过《论坛》在它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宰尔·辛格。报纸用五段话总结了达尔卡尔萨的宣言，提到它的年轻的创建者“对没有能够为锡克获得一个荣誉位置的阿卡利党中

①哈里曼迪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第 130 页，德里，1990 年。

② 萨廷达尔的卡利斯坦一书中认为是在 1734 年成立的，当时 12 个锡克米斯尔之间相互内战发生分裂。在阿卡尔·塔哈特宫的贾萨达尔纳瓦布卡波尔·辛格召集了米斯尔的首领们，让他们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反对莫卧儿以及其他独裁者。这个阵线后来成了兰吉特·辛格的军队并被受洗为达尔·卡尔萨。历史上的德尔·卡尔萨是于 1748 年 3 月 29 日成立的，它将将近 65 个锡克武装团体组织起来共同与莫卧儿帝国和阿富汗入侵者作战。51 年后锡克人在兰吉特·辛格的领导下，占领拉合尔，统治旁遮普直到 1849 年英国殖民者吞并旁遮普。哈里·兰姆·古普塔：《锡克历史》，II，德里，1980 年，第 194 页。

③ 萨廷达尔·辛格：《卡利斯坦：一项学术研究》，新德里，1982 年，第 131—135 页。

④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33 页。

各个派别领导人感到彻底失望。”^① 当贾格吉特·乔汉去加拿大，接着又发行卡利斯坦护照和邮票，他的卡利斯坦运动有了影响时，达尔·卡尔萨决定加入他的行列。

1981年3月20日这个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哈尔希姆兰·辛格在阿兰达普尔·萨西布领导了一个60人的示威游行。提出成立卡利斯坦的要求。并向人们展示了所谓的卡利斯坦的旗帜和卡利斯坦的地图。一位达尔卡尔萨的领导人宣布：“在我们得到一个主权的卡利斯坦之前，我们决不停止斗争。”^② 1981年9月29日，宾德兰瓦拉被捕后，贾金德拉·辛格劫持了一架飞机去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哈尔西姆兰·辛格只是在1982年1月他的行动威胁到国大党首席部长达尔巴拉·辛格的安全才在莫哈里被逮捕。但是此时这个组织并没有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

此外，持极端立场的锡克组织巴巴卡尔萨也于1978年成立，是阿克汉德·科尔坦尼集团的政治分支。后者由1978年4月13日与尼兰卡里派冲突中死去的富贾·辛格的妻子阿马尔吉特·考尔领导。她的丈夫原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巴巴卡尔萨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在加拿大有分支机构。它认为巴基斯坦是锡克的自然的和文化上的邻居，并且相信除非获得一个单独的锡克国家，锡克就无法保持他们的纯洁性。^③

除了1943年就已经存在的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与宾德兰瓦拉一派紧密合作外。这些锡克激进主义派别都是各自为战，互不统属的。例如阿马尔吉特·考尔尽管祈祷让尼兰卡里教徒和印度教徒都被杀死，以表示她对“印度教徒的新德里”没有禁止尼兰卡里

① 《今日印度》，1982年5月31日，《经济政治周刊》，1984年1月7日，论坛，1978年8月15日。

② 萨廷达尔·辛格：《卡利斯坦，一个学术研究》，新德里，1982年，第133页。

③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97页

派的愤怒，但是她却从未与宾德兰瓦拉派联手。有的激进组织后来甚至转向支持由朗格瓦尔领导的阿卡利党温和派。

第六节 从巴特那决议到阿兰德普尔决议

语言邦建立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语言地位得不到很好地解决，语言邦建立后阿卡利党与国大党、人民同盟和印度共产党在分享邦政治权力上的产生政治矛盾，以及绿色革命发展后旁遮普地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矛盾，印度各地教派组织的大量涌现，必然会在阿卡利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纲领中留下痕迹。

当新的旁遮普语言邦建立时，阿卡利党尚处于分裂状态，法特赫·辛格和塔拉·辛格派的阿卡利党相互对立，互不为谋。法特赫·辛格集团的政治力量较塔拉·辛格派的力量大得多，并且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这个国家的世俗主义结构的新领导。因此，他的影响和追随人数在阿卡利党内不断增加。但是在 1965 年的 SGPC 的选举也表明塔拉·辛格派的偏激思想在锡克社会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法特赫·辛格多次呼吁阿卡利党两派能够团结起来，这一愿望终于在 1967 年 11 月 22 日塔拉·辛格去世后，卡普尔·辛格领导塔拉·辛格派时，在 1968 年 10 月 8 日巴特那会议上得到实现。为了包容塔拉·辛格集团，卡普尔·辛格成了合并以后的阿卡利党副主席。然而这只是组织上的简单合并，没有能够达到思想上的一致，这两个派别思想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例如，在旁遮普语言邦的重组问题上，法特赫·辛格坚持严格的按照语言原则重新划分旁遮普的边界。但是卡普尔·辛格这一派坚持他们的语言邦要求只是为了达到建立一个锡克占多数的邦，在那里锡克的传统和

意识能够得到保持。^① 而这个激进的派别中，又产生出一个更加极端的派别，这个派别的主要人物是贾格吉特·乔汉，他在失去邦的财政部长的职位之后，去了英国，并与巴基斯坦大使进行接触，意图将锡克问题提交联合国。^② 1971年10月11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半页广告，鼓吹建立一个锡克国家。之后他便去了巴基斯坦锡克创始人纳那克的诞生地，但他并没有得到锡克的支持，阿卡利党的英国支部和印度的阿卡利党都有谴责他的声明，并把他开除出党。

1968年9月28至29日，全印阿卡利党会议在巴特那召开，法特赫·辛格强烈地批评联邦政府，指责他们干涉邦政府的工作，要求给各个邦以更大的自治。^③ 他说：“(邦)政府应该被给予更多的权力和给予更大程度的自治。”就像美国那样，邦长不应该由中央任命而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④ 会上阿卡利党通过决议，主张更大程度的邦自治。^⑤ 巴特那决议说道：阿卡利党强烈地感觉到在过去20年中，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考虑中央与邦的关系，非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已经在这个国家的许多邦中产生，执政的国大党中央政府常常滥用宪法破坏非国大党政府，并利用它的权力为本党利益服务，因此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必要对印度宪法进行重新考虑，在邦与中央的关系上作出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⑥ 决议进一步声明：阿卡利党要求印度

①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2卷，德里，1977年，第311页。

② 马杜·苏丹·米斯拉：《印度的地方主义政治》，新德里，1988年，第112页。

③ D.C. 帕瓦特：《我当邦长的岁月》，德里，1974年，第90页。

④ 《论坛》，1968年9月29日。

⑤ S.A.H. 哈楷(主编)：《民主多元主义与民族国家建设》，新德里，1984年，第261页。

⑥ 《发言人》周刊，1978年3月13日，这里引自 A.S. 纳朗的《苏特里季上空的风暴》，新德里，1983年，第214页。

宪法应该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基础之上，而且各邦应享有更大的自治地位，阿卡利党认为中央政府对各邦事务的干涉和它在邦政府机构运作上所设置的障碍，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是有害的，有鉴于此，本次会议要求中央政府应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它也呼吁各个邦政府提出保护和保卫它们的权利，以使这个国家能够在联邦制的结构中得以顺利的运作。”^①

对于更大程度邦自治权的要求，其他政党包括印共（马）和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也都提出过，而且他们的要求也十分激进。阿卡利党只是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而已，不过因为阿卡利党是教派政治组织，它的要求就给人以教派要求的印象。

1971年阿卡利党在人民院选举的竞选纲领中，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示它要求给各个邦以更大的权利和自由，以使各个邦能够根据它的具体环境和需要为推进它的经济而工作。^②它呼吁“这个国家的宪法要作根本性修改。”为了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目标的实现，印度要有一个“真正的联邦框架”。^③阿卡利党在1972年邦立法会议竞选中又一次表达它的要求，而且极力避免让人联想起锡克教派要求的可能性。1972年12月，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任命以苏尔吉特·辛格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为该党的未来制定一个“政策纲领”。这个由12名锡克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一份内容详尽的纲领草案，这个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在1973年10月，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上被接受。这个会议是在阿兰德普尔召开的，因此这个决议又被称作阿兰德普尔决议。但是，决议没有公

① 阿吉特·辛格·萨尔哈迪：《旁遮普语言邦》，德里，1970年，第466页。

② 哈里斯·K. 普里，第263页。

③ 《阿卡利党竞选宣言》，第3—4页，阿姆利则，1971年。

布，当时的主要报刊对此没有任何报道。^① 因此后来当这个决议被重新提起时，阿卡利党内部各派对原始文件的内容便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这个所谓的阿兰德普尔决议便有了多个不同的版本。多种文本产生的原因可能的是 1973 年 10 月阿卡利党在阿兰德普尔召开会议时，讨论了复兴党的命运的各种可能性。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有些人起草了关于给旁遮普更大的自治和关于锡克的“民族性”(nationhood) 建议。然而会议没有正式形成一个文件。

1978 年 10 月阿卡利党在卢迪亚纳举行了第 17 次全印阿卡利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主席古尔查兰·辛格·图赫拉强调有必要重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并且明确地向所有人表示“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他认为印度像苏联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multinational society)。有许多“民族(Nation)、组成民族(Nationalities)、少数民族(Minorities)”生活在其中。事情的关键是让各组成单元有分离的权利、分享政治主权，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利。^② 他的演讲后来被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以《联邦政体》之名发表，这是除了 1968 年巴特那会议决议和 1973 年阿兰德普尔决议之后的又一次谈论锡克是一个有明确的独立的个性民族的证据。除了要求更大的自治权以外，提议印度联邦整体以苏联为模式，并要求为少数族(minorities)和各组成民族(nationalities) 的利益和文化得到特别的保护。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阿卡利党通过了十四个决议。后来被统称为阿兰德普尔决议。这也是阿卡利党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纲领。

^① 罗宾·杰弗里：《印度发生了什么》，伦敦，1994 年，第 227 页，注 21 对于论坛和今日印度杂志在 1973 年 10 月和 11 月的彻底检查表明对此事没有任何报道。

^② 古尔查兰·图赫拉：《联邦整体：自治的问题，它的含义，必要性和架构》，第 10 页。阿姆利则，1970 年。

阿兰德普尔决议阐明了阿卡利党的性质，“阿卡利党是锡克民族希望和愿望的体现，并因此完全有权利作为它的代表。”党的主张是“建立在伟大的古鲁纳拉克三项教导之上的：以神名冥思，劳动尊严和分享这个劳动果实。”

这个决议首先提出为了使锡克人具有宗教热情，使他们对锡克的宗教传统感到自豪，如此阿卡利党要执行一系列计划，包括重申宗教思想的神圣性，出版宗教著作，培养称职的优秀宗教人才，进行大规模洗礼，特别是激发起锡克知识阶层的热情。征收宗教“十一”捐，改进锡克寺院管理以及寺院资金的使用。它甚至希望将全世界所有的锡克寺院都置于某种形式的管理之下。

在政治目标上，阿卡利党提出要确立“卡尔萨的主导地位”，说“阿卡利党的基本政策就是通过创建一个恰当的环境和政治结构以寻求实现卡尔萨的这个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阿卡利党决心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首先要让所有被有意识地排除在旁遮普之外说旁遮普语的地区都与旁遮普邦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行政区，那里锡克的利益和锡克教将得到特别保护。其次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中央的权力限制在国防、外交、货币和交通领域，所有其他部门将交给各邦自行管理，他们有全权为了管理的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立法。锡克和其他生活在旁遮普之外的宗教少数民族将得到恰当的保护。还说阿卡利党将致力于“在真正的联邦的原则上重新修改印度宪法，让所有各邦在中央有一样的代表权。”阿卡利党坚决反对任何对中央和邦政府中的锡克（或者甚至别的人）的歧视，阿卡利党也将致力于保持在所有国防部门中锡克的传统地位。这个社团将特别关注锡克军人的需要。

在经济上，阿卡利党认为印度经济主要依靠农业，但是经济力量的杠杆仍然掌握在大商人、资本家和垄断者手中，独立后的 26 年中，经济增长的真正利益已经被这些人获得。政治权力也被这些阶级掌握并且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需要。在农业方面，决议提出，

阿卡利党将着手通过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推进绿色革命的深入发展。它也将努力确保所有乡村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提高。特别是贫困的和中等阶级的农民以及无土地劳工。为此，它计划做下列工作：实行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最高限额的立法必须修改，每个家庭 30 标准英亩的土地最高限额必须实施，给土地的实际耕作者以财产权。超出的土地将在没有土地的佃农和贫苦的农民中间分配。而政府所有荒废的可以耕种的土地将在没有土地的阶级中特别是表列种姓和部落中分配。在分配这样的土地时，哈里真和无地劳工的利益将得到特别注意。阿卡利党也将考虑通过允许佃农抵押以获得贷款，但禁止表列种姓、部落和落后阶级抵押已经分配给他们的土地。阿卡利党将为农业的现代化而工作，也将努力使中等阶级和贫困的农民通过不同的机构寻求贷款和获得投入成为可能。阿卡利党将努力寻求适当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样的价格将在耕作季节前定下来并且只有邦政府有权制定这样的价格，在全国实行单一的粮食区制度等等。对于工业，阿卡利党的主张是所有的关键工业都将被置于公共部门的控制之下。它认为应该对基本的消费品工业立即实行国有化以稳定消费品的价格，将贫苦的消费者从工业家和中间人的剥削中拯救出来。公共部门的工业必须考虑消除不同邦之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应该在乡村地区有计划地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以缓解在都市地区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应该通过使工人在管理中有发言权和在工业家和工人之间利益分享而使工业管理民主化。^①

阿兰德普尔决议是新的历史时期阿卡利党的奋斗纲领，它全面地阐述了阿卡利党在各个方面的政策。作为一个具有教派色彩和强烈的文化自我保护取向的政党，阿卡利党在宗教上的目标并

^① 吉亚尼·阿吉米尔·辛格：《阿卡利党的新政策纲要》，阿姆利则，转引自库马尔·普拉麦德的《旁遮普危机，背景与趋势》，昌迪加尔，1984年，附录4。

不令人感到奇怪。这个时期由于无论是阿卡利党还是国大党都使用宗教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旁遮普的锡克宗教情绪得到培植，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宗教氛围。作为一个锡克社会群体的政党阿卡利党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能落后于其他政党，制定出详细的宗教发展计划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且通过发展锡克教可以在资金、人力资源和宗教心理利用上增加阿卡利党的力量。在整个阿兰德普尔决议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还是阿卡利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张。在这个决议中，阿卡利党明确地提出锡克的所谓卡尔萨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联邦体制，给予各个邦更大的自治权，以及将除了国防、外交、货币和交通的全部权力交给各邦的要求。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印度政治的变迁，印度的具有浓烈的中央集权色彩的联邦中央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各个邦的权力进一步减少，中央通过经济支持、总统治理等等手段削弱各个邦的权力，使之听命于中央，国大党的各个邦的首席部长职位成了英迪拉·甘地奖赏忠诚者的一笔财富，而非国大党邦政府则被中央通过各种渠道予以封杀。阿卡利党执政的政府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们在有了邦执政的经历后，更是要求给予邦更大的自治权，前面提到在巴特那决议和阿兰德普尔决议中的阿卡利党的自治要求正式写入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几乎成了所有阿卡利党领导人的一致看法。70 年代中期，M. S. 达米就邦自治问题访问了 10 位阿卡利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几乎全都赞成给各邦更多的权利，有两个领导人在邦自治的问题上持温和观点，大部分主张把中央权力限制在少数领域，剩下的两个人则明白地要求一个锡克人家园—印度联邦之内的某种自治的锡克邦。两位温和派领导人观点是：“目前，邦不能够独立地工作，在发展和财政方面应该给予邦更多的权力。有关中央的权力范围方面，我并不苛求。它可以有比四个项目更多的权力，但是麻烦的是中央甚至干预和决定已经划归邦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在旁遮普没有一个大工业。

我们的要求不是要求一个自治邦,而仅仅是给邦更多的权利。”应该给予各邦更多的经济和财政权力。这个要求的合理性在于大部分中央的干预将会被消除。各个邦将独立的工作,他们将用不着事事都要跑到德里去请示。”在自治问题上,大部分阿卡利党领导人的共同的观点是:“印度的邦处于一个市政单位的地位上,而中央想夺取任何已经属于邦拥有的权力。在目前这个政治构架下,邦自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中央的允许,邦内的任何项目都得不到授权。”一些阿卡利党领导人则直接从民族和教派的角度提出邦自治的要求。一位著名的阿卡利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我们只为旁遮普要求更多的权利,这与其他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一个民族(nation)在中央和邦印度教徒都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中央没有发言权,我所要求的是一部单独的旁遮普宪法,——有权发放护照和货币等,像兰吉特国王统治时期一样,中央将只有外交、国防和交通权。”^①但是在阿兰德普尔决议中最有争议的是“卡尔萨的统治”。阿卡利党的不同派别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多数派解释为邦自治,但也有两种极端主义解释,一个解释是卡尔萨的统治意味着仅仅由锡克人在旁遮普行使政治权力。另一个解释说它意味着印度联邦之外的一个单独的主权锡克国家。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因此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单独的国家(state)。这两种解释都受到占人口40%的印度教徒的谴责。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锡克也拒绝接受它。

对于锡克征兵问题也是阿兰德普尔决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以来,当兵一直是旁遮普的贾特农民的一个重要就业门路,而贾特中绝大部分是锡克。锡克士兵在英印军队中的数目最高曾达60%,在独立时尚有30%以上。虽然

^① M.S. 达米:《政党与邦自治问题—阿卡利党个案研究》,收在 K.R. 博姆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邦自治》,米鲁特,1977年,第157—158页。

锡克的人口从来就没有超过印度总人口的 2%。印度政府力图削减锡克在军队中的数目,1974 年 3 月 14 日,国防部长贾格吉万·拉姆在人民院宣布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各个不同的邦征兵基础,对旁遮普、喜马偕尔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征兵数额要降低,因为以前从这些邦的征兵的数额远高于他们的人口比例。^① 以上宣布引起旁遮普人的不满。旁遮普的 8 位立法会议员于 1974 年 4 月 8 日向总理提出备忘录,要求她“继续目前的征兵制度。”^② 在经济上的目标也同阿卡利党的组成基础相一致。它要求粮食自由流通,合理的价格以及低廉的农业投入无不反映了作为农业经营者的愿望。它谈论工业管理的民主化,和在工业与工人分享利润的计划,但是在农业方面却没有使用同样的标准。例如不提让贫穷的博哈里(种姓名)和北方邦的工人——他们在旁遮普的农庄上干活,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分享商品农业利润问题。它要求在乡村地区进行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的有计划的努力,以及让信用机构,特别是国家银行,以固定存款利率在乡村地区投资。最后它决定阿卡利党尽力“为工业工人固定以生活需要为基础的工资。”但是对于农业工人它的目标则是“重新评价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并且在必要时进行必要的提高。”^③ 这表明了阿卡利党的阶级局限性。

从本章的分析我们看到从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阿卡利党和中央的关系是从缓和逐渐走向矛盾的加深。出现新的矛盾是自然的,因为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地方利益要求中央考虑会发生很多新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央能够及时地作出调整。然而,在 60 年代中期印度中央领导层发生了交替,以甘地夫人为代表的影响力日

① 兰吉特·罗伊:《军事种姓的神话》,《星期日》,1974 年 8 月 18 日。

② 库什万特·辛格:《锡克历史》,第 2 卷,第 320 页。

③ 戈帕尔·辛格:《旁遮普危机的社会经济基础》,第 44 页。

益减退的国大党领导人为了保证和维持政治权力，实行了政治实用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缺乏对地方利益和要求的考虑，中央控制的权力越多越好。英迪拉对地方的干预增多，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新兴地方势力也要求进一分享政权，以便进一步发展自己。当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可能寻找新的战略，特别是利用宗教感情，阿卡利党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巴特那决议走向阿兰德普尔决议的。

第四章 旁遮普危机的爆发与民主进程的恢复

锡克在成立旁遮普语言邦之后，一方面因为语言邦成立过程及六七十年代由于印度发展战略导致有旁遮普特点的矛盾出现，促使锡克阿卡利党提出了以《阿兰德普尔决议》为中心内容的代表锡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要求的纲领性文件。这与其他政党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锡克组织之所以最后与中央政府出现尖锐的矛盾，并导致印度国家整合发展过程中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出现并非一个纲领就能触发的。这其中还有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现实因素。本章将讨论在教派主义的兴起、阿卡利党为实现其政治要求的鼓动以及这种鼓动由于在中央政府执政的国大党英·甘地政府利用锡克极端派打击温和派的政策和行动而导致的鼓动升级和危机的最终爆发，以及拉·甘地政府调整政策对旁遮普危机的政治解决和经济政策导致局势缓和等等问题。

第一节 政经发展与国家整合力的下降

一、政治整合能力的衰退

英迪拉·甘地提出了恢复印度法律和秩序的口号赢得了 1980 年全国大选。在随后举行的邦议会选举中，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也取得了胜利，在 16 个地方邦赢得执政机会。然而从选举结果来

看，印度民众的选票分散化倾向更为明显。包括国大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获得了一定的选票。民众对国大党的支持在下降，举例说在人民院的议会选举中，在印地语心脏地区的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原本国大党得票较多的邦中，也是以不过半数的最多票取胜的，国大党在这三个邦中的得票率分别为 36.5%，36.4% 和 29.2%，查兰·辛格的民众党则将对小农所有者阶级和对落后种姓的呼吁融为一体，夺走了国大党的选票，它在上述三个邦中得票率分别为 29%，17%，34%。在邦议会选举中更是明显，在泰米尔纳德邦，全印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取得了胜利，在旁遮普邦，国大党险胜阿卡利党。

由于派系纠纷，因在地方邦选举中勉强获得多数而赢得执政机会的国大党没能长期执政。1981 年 12 月 28 日，在喀拉拉邦执政的以国大党(英)为首的八党联合政府，在 79 天后即告解散，由总统治理。1982 年 3 月 18 日，国大党执政的阿萨姆邦国大党政府没能阻止通过不信任动议，只得辞职。就是在国大党占稳定多数的邦中，国大党成员们也不能同心同德，而是争权夺利，纷争不已。英迪拉·甘地无法通过党的组织纪律对党员进行约束。1977 年英·甘地在政治上失势之后，为了重新获得政权，赢得支持，桑贾伊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势力招入国大党内，使他们走在一起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纲领而是权力。加上 1980 年英迪拉·甘地再度执政后，用人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否在 1977 年忠于她，于是一大批只知弄权而不会理政的人被委以重任。他们上台后拼命地弄钱，引起公愤。当有人批评印度官员腐败时，她竟说：“腐败是国际现象”。英·甘地论功行赏，满足不了众多的野心家，这使得邦政府处于政局不稳状态。麻烦的国大党内部地方实力派抬头，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在党内组织反对派，不服英·甘地指派的邦首席部长的领导。安德拉邦一年半时间内更换了三名首席部长。邦内也是纷争不断，有的首席部长为照顾各派势力，竟然组成了一个有五六十名

部长的邦政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党内分歧使国大党的反抗者成功地将首席部长赶下台。1982年1月12日，甘地夫人的最重要的支持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安图莱，因为搞权钱交易辞去了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的职务。北方的比哈尔邦国大党反抗者与首席部长米什拉大唱对台戏。前者称后者为腐朽的独裁者。东部的奥里萨邦，首席部长遭到削弱，拉贾斯坦邦也好不到那里。在喀拉拉邦，哈里亚纳邦和喜马偕尔邦也危机重重。

由于党内派系矛盾，国大党在1980年号召力达到一个高峰后，又开始走上下坡路。1982年《今日印度》杂志在印度15个大城市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对甘地夫人表示满意的是57%，1981年6月时为59%，不满意的为36%，1981年6月时为34%，不置可否的为7%。国内形势认为不好的为67%，1981年6月为64%，认为好的为22%，1981年6月为23%。不置可否的为11%。

1982年5月，喜马偕尔，哈里亚纳，西孟加拉及喀拉拉邦四个邦的选举中，国大党(英)未能获得明显的多数，这次失败是英迪拉通过1980年大选重新执政以来最为严重一次挫折。选举结果是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占议会294席中的238席，仍占绝对势。国大党(英)由29席增加到43席。喀拉拉邦，印共(马)的左翼阵线落后于国大党的联合民主阵线14席。在哈里亚纳邦，共有议席90个，国大党(英)36席，印度人民党6席，民众党31席，人民党1席，贾格吉凡·拉姆的国大党3席，独立人士12席。反对党议席加起来超过国大党(英)。在喜马偕尔邦国大党(英)占31席，印度人民党29席，人民党2席。独立人士6席。英·甘地本来想通过选举而在除西孟加拉邦以外的三个邦内建立牢靠的国大党政府的目的没有达到。在1982—1983年的选举中，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取得了胜利，在喀拉拉邦，国大党依靠与教派和种姓的联合才勉强战胜的印共(马)，赢得了选举的胜利。1983年1

月,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在安德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的选举中遭到失败,这两个邦都是国大党的传统据点。在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也遭到失败。反对党利用了地区性的和语言上的问题。原外长瓦吉帕依认为选举结果是对“贪污,独裁主义,物价高涨和失业投反对票。”1984年5月20日印度十四个邦举行补缺选举,最后结果是,总共竞选的24个席位中,国大党(英)得9席,印度人民党得到3席,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得到2席,剩下席位由各反对党分享。国大党(英)在印地语地区失利。印地语选区包括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和哈里亚纳等在内的6个邦,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影响很大,在每次大选中都起着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英·甘地历来十分重视这个地区的选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竞选基地。这次补缺选举中国大党所得9个席位中,在印地语地区仅得4席,特别是在讲印地语最多的北方邦,两个席位分别输给了民众党和莫尼卡的桑贾伊论坛。在上次补缺选举中,国大党(英)在7席中失去5席,接连败北,在印地语的另一个重要邦比哈尔邦,国大党(英)得到2席,但是主要不是靠威望而是靠人民党内部的争吵,无法同它竞争取得的。地方党势力仍在增强,各邦地方党在发展,它们打着维护本邦利益,本地区宗教的旗号,很得人心,在补缺选举中,10个地方小党共得11席,在喀拉拉邦,地方小党取得3席,再次反映地方势力的兴起。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成绩较好。在补缺选举中得到3席,是反对党中得票最多的。它在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都击败了国大党(英)。

在获得人民院的选举胜后后,英迪拉一直希望能够在联邦院获得 $2/3$ 的多数,这样她就能达到长期以来的修改联邦宪法加强中央集权愿望,由于民主制对个人的决策牵制太多,她一直存有修改印度联邦宪法实行总统制的打算。但是在联邦院的两次选举中,她都没有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1982年3月的联邦院改选中,国大党在联邦院只获得123席,与前次相比,还在南部的安得

拉邦失去 1 席。1984 年 3 月 30 日的联邦院选举中，英迪拉·甘地又只差几席又未能获得 2/3 多数。国大党只赢得了联邦院 244 席中的 152 席。这样她也无法通过修改宪法的方法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在经济上,印度仍没有摆脱“印度式的增长模式”,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却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基本需要。在 1960 年代后期和 1970 年代早期,甘地夫人的经济政策是限制私人部门而鼓励公共部门的成长,并限制外资进入印度市场。但在紧急状态统治时期,她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采取诸如减低个人赋税率,准许较多的私人投资等自由化政策,使印度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得到了企业界的首肯,到 1980 年,大选揭晓、甘地夫人获胜后,商界以为将会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并相信新政府会刺激工业成长,并使印度动摇不定的经济得以复苏,印度股市因此上扬。然而,甘地夫人的内阁和她领导下的国大党控制的一些邦的首席部长是印度独立 33 年以来最脆弱的。甘地夫人执政 10 个月后(1980 年 10 月),印度经济并没有改观,食糖价格上涨,商店内物品常常缺货,通货膨胀依然,商品的批发价格在这段时间内上涨的 27% 以上,甚至路边摊上的茶也上涨了 66%,只有在她竞选时作了保证的洋葱价格有所下降。工业生产下降了 5%,电力不足的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新德里都时常停电。1981 年,印度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农业取得了较好收成,粮食产量大约保持在 1980 年的 1.3 亿吨水平,1981 年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为 7%。工业生产增长为 8.6%,钢铁,煤,发电量,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有了很大增长,常年亏损的国营企业也有一定的盈余。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是印度仍未能维持粮食自给,重要工业产品和能源的短缺还很严重,通货膨胀难以抑制,国营企业要进一步改善经营还很困难。零售市场上人民的日常必需品还在不断涨价。国民生产总值为 1477 亿美元。1982 年是英迪拉提出的“生产年”,偏偏生产形势令人失

望,由于雨季来得迟,南旱北涝,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 1 千多万吨,依靠有 1800 万吨储备粮,和进口的 350 万吨小麦,粮食供应才不成问题。1982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为 6%,增长速度下降,国民生产总值为 1520 亿美元。三年内,外汇储备连年下降,1980 年为 68 亿 5 千 8 百万美元,1981 年 44 亿 6 千 1 百万美元,1982 年度为只有 42 亿美元。外债则高达 179 亿 4 千万美元。外贸出现大量赤字,达到 66 亿 2 千万美元。税收低于预算指标,生产设备利用率低。在主要的经济门类中,印度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收成时好时坏。印度国营企业 1982 年时总投资为 2400 亿卢比,而 1981—1982 年只盈利 45 亿卢比。政府在整顿国营企业的同时,把希望放在私营企业上,采取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对私营企业放宽许可证的发放,放宽进口限制,有选择地放松银根和鼓励出口等。然而由于需求不振,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工业增长速度反而放慢,印度经济依然处于衰退之中。

二、接班人之争与国大党的进一步分裂

英迪拉虽然在 1980 年的全国大选和随后进行的邦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是英迪拉却没有力量实施尼赫鲁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 1977 年大选失败以后,国大党内对英迪拉一片指责之声,导致 1978 年 11 月国大党再次分裂,最后英迪拉建立了自己的国大党(英),作为个人权力的工具,排除了党内对她领导权的批评。但是这样一个国大党缺乏一个健全的政治组织,英迪拉也没有办法实行党内选举制度,来对国大党进行彻底的改组,党内的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在党的社会经济发展纲领上根本无法统一,他们只是因为英迪拉领导下能够掌权才涌入到这个党内的。

在印度政党四分五裂,地方势力兴起的情况下,甘地夫人培养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的做法更加剧了党内的分裂情绪。英迪拉·甘地认为只有尼赫鲁家族能够跨越印度的教派、种姓、地区及语言的障碍,成为体现印度民族主义的惟一领导者。她首先培养自己

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为接班人,桑贾伊·甘地是在紧急状态期间崭露头角,成为青年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英迪拉·甘地下野后,他到处招兵买马,壮大国大党队伍,为英迪拉的重新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英迪拉的中央政府,内阁各部和各个邦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在人民院中有 1/3 的国大党议员是桑贾伊一派的。1980 年 6 月 13 日,英迪拉任命桑贾伊为国大党主席,可是就在同月 23 日,桑贾伊即因驾机失事身亡,这对她打击很大。于是她又安排自己的长子拉吉夫·甘地为政治助手和既定的接班人。1981 年 6 月 14 日,拉吉夫·甘地当选为议会议员。作为英·甘地的接班人,他虽无党政官职,在内部参与了英·甘地在党政方面的所有重大决策,总管英迪拉的内外政策。所有党政大事的请示汇报,所有党政要员见英·甘地,都得通过拉吉夫,他还作为英·甘地的“钦差大臣”常去全国各地视察工作,会见群众,了解情况,扩大影响,树立威信。由于他所处的实际地位,拉吉夫在德里可以随时召见部长汇报工作,下达指示,在外地,他可以随意批评各邦首席部长和各级官员。得罪了拉吉夫就等于丢官,中央的部长舒克拉和拉贾斯坦邦首席部长巴哈蒂亚就因此丢官。对外他代表英·甘地会见外国访印代表团,并曾单独或随英·甘地总理出访英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另外英·甘地还让拉吉夫负责 1982 年 11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筹备工作,以锻炼他的组织才能。1983 年英迪拉正式任命他为党的总书记,主管党的事务,成为仅次于英迪拉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拉吉夫入党不过三年,即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掌握一切大权。他为了早日上台接班,开始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他把青年国大党作为自己的基础,把大批亲信安插到各地党政机关监督工作,国大党历来组织涣散,派别林立,拉吉夫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加剧派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斗争。

英迪拉急切地培养拉吉夫为自己的接班人做法,引起党内的

普遍不满，并引起了党内矛盾的激化和英甘地的家庭破裂。拉吉夫成为太子后，迅速排挤了桑贾伊的亲信，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要么是有经验的文官，要么是一些学理工出身的人，像阿伦·尼赫鲁，M.L. 福特达和 R.K. 达万，西达特·雷迪等人都是拉吉夫的亲信。他们同时还分别担任英迪拉·甘地的政治和行政秘书。

桑贾伊的亲信们由于上台后捞钱心切，把柄太多，很为反对党所诟病。最典型的莫过桑贾伊的得力干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席部长安图莱，他与走私集团相勾结，被反对党抓住把柄，英迪拉也保他不住，只得让他辞职了事。英迪拉也越来越感到这帮捧她上台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转而依靠一批文官。对此桑贾伊的这帮兄弟自然满腹牢骚，曾担任桑贾伊助手的阿克巴尔·艾哈迈德就曾对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说过，桑贾伊的老部下中有 99% 的人无人理睬，甚至连桑贾伊也成了党内被遗忘的人。于是他们逐渐团结到桑贾伊的妻子莫尼卡周围。莫尼卡是旁遮普邦锡克族人，很有政治才干，她和桑贾伊领导的青年国大党对英迪拉重新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桑贾伊去世后她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继承桑贾伊的地位，但遭到甘地夫人的坚决拒绝，婆媳之间逐渐产生矛盾。1980 年 10 月莫尼卡在比哈尔邦率数千人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政府颁布的一条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法令。抗议者手持标语和横幅，高呼反对总理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贡甘纳特·米什拉的口号。1982 年 3 月 27 日，莫尼卡应邀参加了阿克巴尔·艾哈迈德在北方邦的勒克瑙举行“桑贾伊五点纲领论坛”大会。大会将莫尼卡像摆在中间，甘地夫人像摆在左边，桑贾伊像摆在右边，根本没有提拉吉夫。这意味着桑贾伊一派要脱离国大党（英）自立门户。甘地夫人对此反应强烈。她勒令停了阿克巴尔·艾哈迈德的党籍，并将莫尼卡赶出家门。她写给莫尼卡的信中暗示莫尼卡的出身与她家配不上。为了败坏莫尼卡的声誉，英甘地指责莫尼卡

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为国民志愿团服务，是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的特务。英迪拉·甘地将莫尼卡逐出家门的做法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在印度传统上寡妇宜养不宜弃。英迪拉的做法比较冲动，有损自己的形象，一位印度记者就说过，“以前人们将英迪拉树为印度伟大的母亲，今天人们更觉得她像一个婆婆。”

莫尼卡在离开家庭之后公开向英迪拉挑战，指责英迪拉独裁专制，指责国大党已变成一个贪污腐化和走私的党，在教派纷争的旁遮普她指出教派矛盾是英迪拉的国大党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的。在比哈尔邦，她攻击国大党限制新闻自由，在安得拉邦，她攻击英·甘地“不论英·甘地对她的二十点计划讲些什么，实际上她只有一个计划，即把她的长子弄上台”。在 1982 年 8、9 月间，莫尼卡成立了“桑贾伊思想论坛”后不久，该论坛的三位重要人物，阿克巴尔·艾哈迈德，卡尔普纳特·松卡尔，以及 J.N. 米什拉就被政府以谋杀罪逮捕。

1983 年 1 月，莫尼卡和“桑贾伊思想论坛”与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结成竞选联盟，与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展开邦议员的竞选较量，将自 1955 年以来一直在该邦执政的国大党击败。莫尼卡还将名义上为莫尼卡的母亲阿姆什特瓦尔·阿兰德所有的，实际上是由桑贾伊在紧急状态时期创立的《太阳报》杂志卖给了有国民志愿团背景的人，这笔交易使甘地夫人很狼狈。英迪拉·甘地婆媳之间不和导致的更大影响是英迪拉丧失了桑贾伊的支持者。桑贾伊的小兄弟大多是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即便不公开支持莫尼卡，也会以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桑贾伊派的议员也会利用在人民院中占有国大党（英）1/3 的席位发挥不利于英迪拉·甘地的影响。

除了接班人之争造成的国大党分裂外，国大党内部因为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也发生分裂。国大党本身在变化，新一代政治家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国大党，他们对党的控制不断加强，这一代国大党党员没有参加过过去的政治活动，也不是群众运动的产物，这一代

人有自己的文化和时代气质，这种情况已经在新一代国大党人和传统国大党人之间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情况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致有一些传统国大党人已脱离这个母体，1982年12月30日，有2千5百多名刚退出国大党（英）的人成立一个名为全国国大党的政党，该党领导人拉力图·巴伊·阿达尼为党的主席。不久卡尔纳提克国大党人成立了革命战斗党，古吉拉特邦的一部分国大党人参加了民族大会党，在安得拉邦，也是同样。在泰米尔纳杜邦，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加入了泰卢固之乡党。而在国大党力量不断衰退的同时，反对党的力量却在不断的增长，他们之间经过不断磨合后也有不断联合的趋势。1983年8月、9月反对党先后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右翼印度人民党和以农村为基地的人民党）和全国统一阵线（人民党，国大党[S派]民主社会党和民族大会党）组成，准备在1984年大选中与国大党英派再争高下。

三、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人口压力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面对的另一重要问题。本来印度是最早提倡家庭计划生育的国家，但是自1950年以来20年内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有时甚至高达40‰。特别是印度农村，由于医疗条件差，婴儿死亡率高，加之印度政府一直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一对夫妇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连续生育，直到至少有两个儿子，起码一个儿子能成活以赡养双亲。在宗教上印度人还有必须生儿子的传统，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种姓义务，一方面是传宗接代，另一方面是自己死后才能升天。由于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平均初婚年龄早，早婚意味着早育，多育，密育。印度的高生育率还同宗教信仰有关，印度教教义说，上天创造男子，就是为了繁殖子孙，上天创造女子，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在婚礼上，来宾们常向新娘道喜道：“愿你是十个儿子的母亲，你丈夫还会喜欢第十一个。”孩子是神给的，凡人不能干涉。1976年紧急状态时期，在桑贾伊的支持下，英·甘地实施了严厉的人口政策，以经济惩

罚和设立绝育营为主要手段，实行强制绝育，全国绝育人数达 700 万。由于强制绝育手术实施不当，造成不少人死亡和或者落下后遗症，结果激起民众反感，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在 1977 年至 1979 年间，“繁荣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理论抬头，政府无所作为。甘地夫人在竞选时，曾放弃以往节育的主张，但印度每年要诞生 1 千 3 百万婴儿，相当于一个澳洲人口，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对于印度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980 年英迪拉·甘地重新组阁，她为了解决印度经济的困境，继续推行家庭计划与节育政策。把控制人口作为“国民运动”的一部分，号召国内统一认识，把收效甚微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开展起来，然而作用并不大。人口增长的速度太快，经济的缓慢增长的成果基本上为人口的增长所吞噬。据 1981 年的人口统计，在 1971 年到 1981 年这十年间，印度人口总数增长了 1/4，已达到 6 亿 8 千 2 百万。而 1980 年以前印度生产年增长率仅为 3.5%，就是在 1980—1985 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也只有 5%—6%。以农业为例，农业产值一直是印度国民总产值的最大来源。在工农业净产值中约占 65%。在 1950—1951 年到 1983—1984 年度这 30 多年中，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 3%，其产值从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增加了 1.31 倍。人口增长过快还影响社会体制，在乡村内部，它不仅造成了土地的零星分割，而且强化了阶级结构。无地者和穷人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使原有的体制和结构更具刚性，更不平等，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损害更大。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是巨大的压力，尽管采取了控制人口的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每年增加的人数庞大，使政府的发展计划始终紧迫艰难。印度耕地面积总量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只有 3.8 亩，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一定的资源总量下，人口增长越快，则人均资源减少的速度也越快。高增长率使整个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十分缓慢，国家经济底子薄，拿不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大批适龄劳动人口受不到应有

的教育。人均耕地偏少和工业落后，经济增长不快，第二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刚兴起，没有能力消化城市本身增长的人口和更不用说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农民的就业。1981年印度登记的城市失业人口为1830万，1982年为2050万，由于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总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失业现象极为严重。

一方面失业人口太多，另一方面在业工人的工资极低，难以养家糊口。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尽管英迪拉·甘地早就提出了“消灭贫穷”的口号，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党政官员贪污腐化，把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据印度报纸说，印度仍有3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工人罢工不断。1982年，孟买纺织工人大罢工坚持了11个月，在印度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也常有所闻。社会秩序恶化，犯罪增加。由于贫穷和失业现象严重，也导致印度各地治安越来越恶化，凶杀，抢劫，偷窃和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上升，新德里每月刑事案件即高达上千起。特别是许多大案在新德里发生，如1982年9、10月份连续发生的三起爆炸，死伤多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本是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从70年代末以来，他们也加入了罢工和反政府的行列。1982年8月，孟买警察为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游行。1982年8月18日，孟买市两万二千名警察部队几乎全部参加叛乱，他们得到一批已罢工7个多月的纺织工人的支持。邦警察联合会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增加薪金和生活津贴。中央的邦的后备警察部队接管了这个城市。这是印度治安人员15年来第5次走上街头造政府的反。警察曾于1974年、1977年、1979年和1980年采取过抗议行动，政府成立了一个警察委员会研究警察们的要求，但是该委员会的提议从未得到执行。印度孟买公会等发动总罢工支持警察罢工。警察是国家统治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起来发起游行和暴乱，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第二节 教派主义的勃兴和地方势力的增强

一、教派主义势力的成长与政府的退让

随着社会政治道德的败坏和经济问题的恶化，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印度的宗教矛盾也随之恶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正在兴起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宗教复兴主义势力，国民自愿团，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大会是推动这场运动发展的主要力量。国民志愿团和印度人民党明白地表现其宗教复兴的主张，这与以前印度人民同盟在 70 年代发生的政策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去世后，国大党以及现在的国大党（英）没有作过有组织的努力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另一个原因是，包括国大党在内的非宗教政党也不那么卖力地对原教旨主义和部族主义作斗争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分散它们对选举的注意力。这一方面，他们自己有时也在煽动种族和部族情绪。借此捞取选票。印度教的宗教复兴主义势力用“印度教明天将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用“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将实现伊斯兰革命”和锡克原教旨主义者则以“在旁遮普建立卡利斯坦国”等口号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支持基础。各种宗教内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加剧，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不久即在莫拉达巴达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印穆冲突。她上台的 10 个月内，不同种族宗教和表列种姓之间发生的较大的冲突就有 400 多次。光是 1980 年 1—7 月份就有 5724 名贱民受到迫害，不少贱民不堪忍受压迫和歧视，纷纷改信伊斯兰教，反过来又加剧了印度教教派与伊斯兰教派间的矛盾。1982 年 5 月，印度西部巴罗达发生了印穆教派冲突。1982 年 10 月 6 日，印度密拉特发生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尽管原教旨主义势力增强了，但是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

有效的行动加以控制，也没有采取行动动员知识界的力量进行反教派主义的宣传。政治家们甚至为了政治利益，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莫拉达巴德发生大规模的印穆教派冲突事件后，英迪拉·甘地甚至也没有去那里视察。与她在不当政的 33 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无论哪里出事，她都要去视察，而在政治人物中只有她这么做。如今即便是反对党议员指责政府像对待苍蝇一样对待穆斯林和贱民，她也不放在心上。

1980 年 2 月 15 日，英迪拉·甘地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全文，其中有要将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和政教分离的决心作为一个信仰问题对待的话，但是她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很注意印度教徒的选票，为此她对印度教徒激进分子做出了许多友好的表示，以致不少印度报纸都讲她与名声不好的国民志愿团相互勾搭。在 1983 年国大党的孟买会议上没有像过去那样激烈谴责国民志愿团煽动宗教情绪，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一个国内的教派斗争，对印度教徒在康普尔和戈达搞的两次集会，国大党领导人也应邀参加出席。印度报纸认为，这是英迪拉·甘地偷偷地讨好印度教徒。英迪拉的做法也助长了教派主义分子的气焰。

二、中央和地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1980 年英迪拉重新上台后，独裁作风进一步发展，她不惜以超越宪法的手段削弱各个邦的权力，巩固中央集权并增强自己的权力。在本党执政的邦，她亲自点名封将，派心腹去担任邦的首席部长和邦长，压制党内的反对派和地方势力，在选举中，她也亲自上阵，甚至一手包办，使地方邦处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无权地位。在反对党或者地方小党执政的邦，她滥用总统和邦长的职权，或是寻机在邦内发动倒戈，必欲搞垮邦政府取而代之。1980 年，非国大党执政泰米尔纳杜邦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土改修正案，如果获得通过邦政府将可以获得大约十万英亩的土地，有效地改善邦贫苦农民的地位，该议案上报印度总统请求批准，然而中央在拖

了两年之后才通知邦政府总统不予批准。同样是这个邦 1983 年发生了旱灾，大米供应紧张，邦首席部长几次向中央请求紧急援助，并为此进行了一天的绝食斗争，最后中央政府才在四月份给这个邦拨了 5 千吨大米，而同样遭受旱灾的由国大党(英)执政的喀拉拉邦，人口比泰米尔纳杜邦少得多，但是却能每月从联邦政府得到 9.5 万吨的大米供应，维持定量供应。

南方几个邦对北方讲印地语的几个邦本来就有心理上的隔膜，怀疑甚至仇视。最南面的泰米尔纳杜邦很早就由地方党执政。安得拉邦的地方政党泰卢固之乡党也只是成立半年多，他们的政治要求是：让泰卢固人自己治理自己。卡纳塔克邦的卡纳塔克革命党是原国大党主席乌尔斯的人马，也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加上查谟·克什米尔、西孟加拉、特里普拉邦、旁遮普邦都是如此。他们对英迪拉肆意扩大中央权力的做法更是不满。

1983 年 3 月 19 日，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及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四个邦的首席部长，根据卡尔纳提克邦首席部长赫格德的倡议，在班加罗尔开会组成南方首席部长委员会，简称“南方委员会”，研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四个邦分别由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安纳德拉维达联盟和达罗维达联盟执政。赫格德曾向由英·甘地执政的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克鲁纳卡兰发出邀请，但克鲁纳卡兰遵英迪拉·甘地之命托辞婉拒。因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南方反对党的首席部长一次聚会，也是反对党执政的邦政府试图同中央进行分庭抗礼的一次联合行动。

在这次会议中，南方委员会讨论了印度中央和地方关系中涉及的立法、行政和财政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并重点讨论了财政问题，最后达成 11 点意见。会议向各邦及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各邦在这个委员会中都有足够的代表权，该委员会具有法律权力。根据各邦过去 35 年的经验就财政方面的问题检查中央和邦的关系，提出宪法修正案，或制定其他法令以求在中央和邦之间更

平等地分配资源，要求农产品价格由邦政府与农民协商参考生产成本，地方生产率水平，必要的鼓励和市场动向等因素作出决定，要求中央在市场下跌时给予必要的补贴，应给农民以充分的机会自己出售或出口产品，避免中间商大量盈利。中央应通过其银行渠道给邦或公司社团进行市场活动和收购农产品以必要的贷款。各邦应以同样条件分享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信贷机构或国家的贷款，中央应补偿各邦代表中央履行职责所消耗的开支。同时会议要求修改宪法，重新确定中央和邦之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对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和第二百五十七条重新研究，具体来说，他们要求给予邦议会制定具有法律规定的职权而无需总统（中央）批准的法令。四邦首席部长称开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自己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而不必邀请中央充当仲裁或调停人。二是在有关中央和邦的关系问题上向联邦政府共同派出代表进行协商。与会首席部长均表明他们成立的委员会毫无政治意义，也非结伙与中央对抗。南方委员会的提议在印度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已告老还乡的印度前总统桑吉瓦·雷迪也在卸任后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向新德里发出呼吁，要求英·甘地停止当婆婆的做法，称分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他还主张分权的做法一直向下延伸到乡村评议会一级，他希望有更多的邦效仿南方委员会。

南方各邦联合起来要求重新检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非国大党执政的邦中也得到热烈响应。由国民会议党执政的查谟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法鲁克宣布要召开北方地区的首席部长会议，讨论本地区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英迪拉·甘地国大党对该委员会的成立忧心忡忡，国大党总书记斯蒂芬称南方委员会是一个超越宪法的危险行动，它怂恿地方主义倾向的抬头，摆开了南北对抗的阵势，英迪拉·甘地为防止连锁反应，变被动为主动，匆忙于 3 月 14 日在议会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一个由已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兰吉特·辛格·萨卡里亚为首的委

员会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行调查，就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出报告。甘地夫人此举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所谓的萨卡里亚委员会也是独角戏。几乎各反对党和各邦，包括南方委员会都对这一决议表示欢迎，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相信英迪拉·甘地会听取这个委员会的建议改变当婆婆的做法，但它反映了要扭转不正常的中央和邦的关系的要求已经成了全国成为各政党甚至包括英迪拉国大党执政的各邦首席部长的一致呼声。

1983年5月18日，14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和四名非国大党的首席部长，在安得拉邦新任首席部长N.T.拉马拉奥的召集下，在该邦的维贾亚瓦达举行了一次会议，颇引人注目。会议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剥夺邦的权利，成立财政委员会，扩大由中央任命的研究中央与邦关系的委员会，指责中央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维持全国的团结等。这次会议传给人们的消息是，由各地方实力派组成的许多地方性政党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执政的国大党。会议还决定了以后两次会议的地点，一是在旁遮普，一是在克什米尔，在这两次会议上，反对党一致谴责中央权力过大，财政分配不公，不尊重各邦的利益，会议对协调反对党的行动，加强合作有很大作用。

这样在1983年至1984年间，多达14至16个反对党参加了四次聚会，目的在于重新建立一个反对党联合阵线，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尽管是一个难题，但他们在中央和各邦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一致。1983年10月，斯利那加第三次聚会通过的主要的“一致性文件”，阐述了按联邦制重新分配权力的必要性，文件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要求修改宪法，削弱或废除中央政府的如下权力，即解散邦政府和邦议会，任命邦长，对各邦权力范围内的事务有立法权，不经邦政府同意在各邦驻扎警察部队，对给予各邦的财政拨款随意干预等。到1984年第八届人民院选举在即，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再次预告，甘地夫人的国大党(英)或是要遭到重大挫折，或是败北。鉴于此，甘地夫人再次努力颠覆各反对党邦政府，以便

控制行政机构,搞掉安得拉邦首席部长 N.T.拉马拉奥的企图,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但是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由于邦长贾格莫罕的默许和合作,国大党(英)搞垮了国民会议党的法鲁克·阿布杜拉政府。这种做法当然更激起了各地方邦特别是反对党执政的邦要求重新界定中央和联邦各组成邦之间的各方面的关系。

在一些邦进行和平活动要求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时候,在印度东北几个邦中则出现了用武力要求扩大地方经济政治自治权的斗争。始于 1979 年下半年的阿萨姆邦驱赶外族人斗争日益高涨,外族人一部分来自孟加拉,一部分来自尼泊尔,其他很大一部分来自印度其他邦。据估计,该邦 1900 万人口中,本地人和外籍人各占一半。而外籍人中,孟加拉国移民达四五百万人,印度一些报纸则称外地人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全阿萨姆学生会和全阿萨姆群众斗争会是驱赶外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的领导组织。阿萨姆经济上比较落后,但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也有印度十分需要的石油矿藏。中央政府把该邦当作原料基地,不肯扶持当地工业的发展,石油产量占全国的 1/5,原油大部分都拿到比哈尔邦去炼,邦从中收入极少。茶叶产量占全国的 50%,它盛产的茶叶大部分到加尔各答去加工。大量利润流入中间商手中。木材工业则为比尔拉财团控制,森林被大片毁坏,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本地人文化不高,技术水平低,在争夺新的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的竞争中,不是外来人的对手。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懂英语的孟加拉人即被引入,到生产更多粮食运动时期,又有大批孟加拉人来定居。途经该邦的铁路上的雇员里只有 10%是当地人。756 个茶园中,只有十多个是属于本地人的。阿萨姆是印度三大黄麻产地之一,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25%左右,但该邦只有一家黄麻工厂。该邦 91%的人口从事农业,但粮食远不能自给,每天要从其他邦进口 6000 吨。当地人生活水平在全国之下,年人均收入 852 卢比,全国平均为 1278 卢比。并且不久前还是全国出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邦。

虽然与中央达成过有关政策协议，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本地人经济恶化，在他们心中萌生了一种将来有一天外来人会反客为主的恐惧情绪。因此他们提出并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驱赶外来人的运动。

在那加兰邦，费佐领导的全那加兰共产党，要求成立独立的拉加兰，在曼尼普尔邦，占人口多数的梅泰人，成立了梅泰民族阵线，孔莱帕克人民革命军和比什瓦尔·辛格的人民解放军也发动了驱赶外来非部族人的战争，战争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宗教色彩，该邦人民十分贫困，失业现象很严重，非梅泰人控制了批发和零售业，当地只产大米和蔬菜，只得受垄断剥削。梅泰人占当地人口的 2/3，但在平原上只有 7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他民族人，占人口的 1/3，却占有 8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梅泰人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执政的却是其他族人。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地方工农业得不到政府投资，生产长期停滞，广大人民找不到工作，农村贫民和城市贫民生活困难，连女儿也嫁不起。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在米佐拉姆邦，拉尔登加的米佐民族阵线是一个成立很久的民族主义组织，他们也发动了驱赶非米佐人的斗争。在特里普拉邦，以兰哈尔为首的驱逐外来人运动也十分猛烈，在这里的外来人主要是孟加拉人和尼泊尔人，邦内经济上严重不平等，邦内无论工业和商业都掌握在非部落人手中，外来人看不起当地的文化，想以自己的文化取而代之，这使部落人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他们要求部落自治，要求官方承认部落人语言，归还非法转让的部落人土地，为部落人保留公职。1982 年 9 月 18 日，印度特里普拉邦部落民族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政府，该邦的部落民族一直要求增加自治权，削弱 120 万非部落民的统治权。

在属于中央辖区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出现了部落复活主义，全阿鲁纳恰尔学生会要求中央政府撤消贸易许可证，不向外来人分配土地，迁走流入的难民，有效制止和核查外国人流入。当地人经

济落后，生活贫困，遭受外来人剥削和政治歧视，又有历史上遗留下的宗教文化和归属上的矛盾。印度东北各邦，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通过一条不足 25 公里的长廊与印度相连，由于德里和加尔各答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连同这种地理位置所造成的与世隔绝感更加强烈。东北地区的骚乱问题是甘地夫人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对整个印度来说，邦自治的问题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议题。^①

第三节 阿卡利党的分裂与 1980 年印度选举

一、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和阿卡利党的分裂

1979 年 3 月，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终于宣布举行新一轮选举，自从 1965 年以来该委员会一直没有举行过选举。在我们这个有着众多宗教的世界中，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和它的选举可能是最独特的。他们的选举是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进行的（1925 年印度政府法）。在旧旁遮普地区的每一个成年锡克都有权在 140 个选区中的任意一个选区登记参加选举。对于一个想获得政治权力的锡克而言，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是一个重要的踏脚石。虽然在理论上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只是一个锡克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但是事实上，它也处理与政治有关的事务。一位记者就说过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几乎就是一位平行的首席部长。”^② 此时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控制了旁遮普、哈里亚纳、喜马偕尔和昌迪加尔的 700 多所锡克寺

^① 《亚洲周刊》，1980 年 4 月 11 日，记者苏尔蒂塞尼“印度东北部地区暴乱四起”。

^② 《今日印度》，1979 年 3 月 1—15 日。

院和寺庙，年预算额达到近 600 万美元。^①至于这次选举在旁遮普政治上的重要性，引用一位通常能够得到确切的消息的《论坛》分析家话说，“可以认为即将来临的选举将决定未来 10 年间锡克的政治事业。”为了在选举中获得优势，每个锡克社会的派别“正极力将自己凸现出来，说自己与目前的领导相比，是锡克利益的更好的保护者。”^②

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不仅受到锡克社会各个派别的关注，也受到力图影响锡克政治的政党和个人的关注。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的战略是力图推翻阿卡利党和人民党的联合政府。为此她的支持者们希望鼓励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锡克集团来破坏阿卡利党与由都市印度教徒支持的政党之间的同盟。^③

这次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还是第一次在阿卡利党执政期间举行的。过去阿卡利党常常利用在野的地位，指责国大党损害锡克的利益和干涉锡克的宗教。在这次竞选中它不再有这种便利。在竞选中，有锡克政治三驾马车之称的阿卡利党的巴德尔·辛格与古尔查兰·辛格·图赫拉（自从 1973 年以来一直是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和贾格德夫·辛格·塔尔万迪（阿卡利党的主席）为首的三个主要的政治派别为争夺候选人的提名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最后三方妥协，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家乡地区提出最多的候选人。^④除了阿卡利党外，还有一些别的派别参加竞选。他们曾试图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是因目标各异而未能实现。这些派别有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和他支持卡利斯坦的国民会议，在选举中他们宣称要为一个锡克邦而斗争；宾德兰瓦拉，他发誓要

① 《论坛》，1978 年 4 月 17 日。

② 《论坛》，1978 年 4 月 17 日。

③ 《论坛》，1978 年 5 月 1 日。

④ 《论坛》，1979 年 3 月 19 日。

纯洁锡克教的宗教信仰；巴巴桑托·辛格，尼夯锡克集团的领导人；桑托克·辛格，他是德里的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还有以宰尔·辛格为顾问的国大党中的各个锡克派别等等。^①

选举的结果是，阿卡利党赢得了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中 140 席中的 133 席，获得了 65% 的选票，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不过在这次选举中 6 百万有资格进行选举的人中只有 370 万参加了登记，登记的选举人中也只有大约 2/3 的选民参加了选举。^② 巴德尔对选举结果非常满意，他乐观地宣布选举结果代表了“狂热主义的力量的失败”并且表明锡克对“温和的世俗主义和教派和睦的支持。”他抨击国大党和极端主义力量之间建立的神圣同盟。^③ 然而通过选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阿卡利党由于内部派系分裂力量受到削弱。尽管它拥有执政的优势，但是反对派仍然获得了 1/3 以上的选票。^④

在各个非阿卡利党派别中，宾德兰瓦拉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最令人瞩目。在选举中，宾德兰瓦拉一下子提出了 40 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尽管最终只赢得 4 个席位。他的亲密助手，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主席和宾德兰瓦拉宗教导师的儿子阿姆利克·辛格，被阿卡利党内阁部长吉万·辛格·乌马拉纳加尔所击败。但宾德兰瓦拉的四个追随者的胜利表明他的宗教激进主义思想对许多锡克有一定的号召力。他的助手阿姆利克虽然输给了乌马拉纳加尔，但是这是一场巴德尔和图赫拉都不得不投入巨大力量进行的实力接近的竞争。《论坛》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宾德兰瓦拉在卢迪亚纳对 10000 名听众发表讲演的消息。标题是《宾德兰瓦拉：一个席卷大众选票的

① 《论坛》，1979 年 3 月 24 日，1979 年 2 月 25 日，3 月 28 日。

② 《论坛》，1979 年 4 月 16 日。

③ 《论坛》，1979 年 4 月 3 日。

④ 《论坛》，1979 年 4 月 3 日 16 日。

人》，^① 这篇文章声称没有一个阿卡利党领导人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宾德兰瓦拉在卢迪亚纳的集会上抨击政治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用锡克的原教旨主义精神鼓动民众。他向集会者表示他无法向他的候选人提供汽车或者金钱援助，因为他既不是一个部长也不是一个鸦片走私者。他还说这里进行竞选和集会的人要求政治家记住和发誓回到更古老更纯洁的生活方式上。对于有文化的、失业的锡克青年而言，这种鼓动是激动人心的，也是浪漫的；对于正统的锡克而言，这是一种安慰：曾经有过的事情是美好的。^② 这表明宾德兰瓦拉已经能够控制民众的情绪。人们注意到在这次选举中宾德兰瓦拉的竞选得到了国大党的支持。有关报纸报道说在阿姆利克的竞选海报中有甘地夫人的画像。^③

二、1980 年的选举与教派反应

1979 年 7、8 月间，在联邦中央政府执政的人民党联合政府的垮台导致阿卡利党内部分裂的表面化，属于温和派的巴德尔·辛格支持莫拉尔吉·德赛，而属于比较强硬派别的领导人像图赫拉和塔尔万迪则支持查兰·辛格，但是后者担任政府总理没有几天就因为贾格吉凡·拉姆的倒阁行为而下台。印度总统桑吉瓦·雷迪于是宣布由查兰·辛格担任看守内阁的总理，并于 1980 年 1 月举行大选。

在举行大选前夕，桑贾伊曾与阿卡利党进行了数次接触，试探双方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阿卡利党领导人巴拉万特·辛格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处于人民院少数地位的查兰·辛格辞职之后，当时印度总统曾经一度考虑提名苏尔吉特·辛格·巴尔纳拉（阿卡利党领导人朗格瓦尔的助手）为看守内阁的总理，甘地夫人在给总统的信

① 《印度发生了什么？》140 页。

② 《论坛》，1979 年 3 月 26 日，27 日。

③ 《论坛》，1979 年 3 月 29 日，4 月 2 日。

中表示同意。^① 桑贾伊提议国大党支持巴尔纳那为看守内阁的总理，条件是阿卡利党与国大党在 1980 年的人民院选举中结成竞选联盟。他说在旁遮普阿卡利党是“我们的长兄”，而国大党则是“幼弟”。^② 巴尔万特表示如果阿卡利党在所有的锡克候选人的提名上有最后发言权，阿卡利党并不反对这样的安排。巴拉万特这一提议遭到桑贾伊的拒绝，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让阿卡利党拥有了在具有锡克身份的候选人问题上的否决权；桑贾伊坚持国大党内也有大量的不能被忽略的“民族主义者”锡克。巴德尔则并不反对与国大党结盟。在宣布举行人民院中期选举那天，他在新德里的旁遮普会馆告诉库尔迪普·纳雅尔如果不损害阿卡利党的利益，阿卡利党并不介意与国大党讨论选举安排。^③

最后阿卡利党与国大党没有能够就选举问题达成任何谅解。在 1980 年的人民院的选举中，国大党赢得了分给旁遮普的人民院 13 个议席中的 12 个。大量的锡克投票支持国大党。阿卡利党因为内部严重分裂在选举中失败。在这次选举中，宾德兰瓦拉为国大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以报答国大党对他参加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选举上的支持。但是在政治上锡克还未对他怎样注意，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有点宗教声誉的圣人而已。因此，尽管他后来被英迪拉任命为印度政府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的古尔迪亚尔·辛格·迪隆进行助选，结果还是失败了。当 1979 年甘地夫人为 P.S. 宾德尔的妻子在古尔达斯普尔竞选发表演说时，宾德兰瓦拉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是在 1982 年库尔迪普向宾德兰瓦拉提起这件事

^① 贾纳丹塔库尔：《英迪拉·甘地和他的权术》（张涵译），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200 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36 页。

^③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36 页。

时,这位圣人坚持说“我只为我自己的人竞选。”^①

1980年2月27日,在桑贾伊的怂恿下,英迪拉·甘地举行内阁部长会议,认为她的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后,九个非国大党执政的邦(北方邦,比哈尔邦,泰米尔纳德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斯特拉邦,旁遮普邦,奥里萨邦和古吉拉特邦)政府再也不能反映民意了。紧接着甘地夫人宣布这九个邦实施总统治理,重新举行邦议会选举。只有特里普拉邦,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这三个共产党人控制的邦,甘地夫人无权解散他们,因为他们在全国选举中在自己的邦内取得了胜利。甘地夫人的做法遭到各邦的反对,作为被解除权力的九个首席部长之一,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普拉卡什·辛格·巴德尔说,解散邦议会是不民主的,不合宪法的,也是走向独裁的第一步。但是,甘地夫人这样做也是有先例的,人民党于1977年上台后,也是以同样理由解散国大党执政的各个邦政府的,当时甘地夫人曾对人民党这一做法是否合乎宪法提出异议,但是最高法院维持了人民党政府的决定。这次邦议会选举中阿卡利党得到37席,国大党得到了63席,又一次表明大量的锡克投向了国大党一边。

这次选举的结果使阿卡利党又一次成了在野党,在阿卡利党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反思。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明显的:不仅印度教徒没有支持他们,而且锡克也没有成为支持他们的一个牢固的整体。阿卡利党领导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在与人民党的联合政府时期的“世俗的”形象破坏了他们与锡克社会的等同关系,后者认为阿卡利党并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情。阿卡利党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在锡克社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形象,他们必须拉拢锡克。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36页。

他们必须依靠传统的将政治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斗争策略。^① 作为在野党，它又一次将以前曾提出的决议作为鼓动的纲领。

第四节 朝野政治派别间的倾轧与 旁遮普矛盾的激化

一、国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行政官僚体制的腐败

1980年5月，旁遮普邦议会选举再次形成了国大党当政、阿卡利党在野的局面。然而，国大党的胜利也没有因此给这个邦带来和平与发展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大党在旁遮普邦议会中只占微弱的多数，无力控制这个邦的政治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旁遮普印度国大党内部存在着宰尔·辛格和达尔巴拉·辛格之间尖锐的派系斗争。达尔巴拉·辛格自从进入国大党之后就一直不服从曾是阿卡利党人的宰尔·辛格的领导。宰尔·辛格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1916年5月生于旁遮普邦，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反对同英国人勾结的旁遮普土邦统治者的活动，并于1938年在他的故乡法里德科特被捕。印度在1947年独立，与巴基斯坦分治时，他创建了法里德科特这个小自治邦，1948年，他在当时包括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喜马偕尔邦在内的邦政府任部长，也是整个邦的国大党主席，1956年进入印度议会上院，一直到1962年。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他辞去了在旁遮普邦政府内所担任的职务。他在1972年和1977年任旁遮普邦政府首席部长并兼任邦农业合作社的主任。他和达尔巴拉·辛格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大党在1980年的选举胜利后权力的分配而加剧。宰尔·辛格在英甘地内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37页。

阁中担任内政部长，但是他仍不忘干涉旁遮普邦内的事务，为自己的帮派谋取利益。

虽然达尔巴拉·辛格是一位公认的世俗主义者，但是他在与宰尔·辛格的权力斗争中大量撤换官员以维护本派系利益的方式的一些做法，反而给人留下了他是一个强烈的教派主义者的印象。在宰尔·辛格任旁遮普邦首席部长期间，曾经大量提拔锡克教徒，有大批的锡克人在旁遮普邦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1977年阿卡利党执政后，这种局面继续得以维持。宰尔·辛格的做法引起一些高级印度教徒的不满。可是达尔巴拉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上台伊始，就撤换了许多担任高级职务的锡克而代之以印度教徒。他的秘书长 I.S. 普里，他的警察总监比尔巴尔·纳特，他的主任秘书泰金德尔·坎纳，都是印度教徒。在他主持的邦政府内 17 个重要职位中只有 6 个职位由锡克担任。^①这其中除了工业部领导人为 G.P.S. 萨赫外，所有重要的部门的领导都是印度教徒官员。他对一般的公务人员也大量撤换。例如巴德尔内阁时期任秘书长的属于印度管理机构的最高级的官员 K.S. 纳朗在 1982 年被达尔巴拉随便地搁置在财务专员（发展）的位置上。达尔巴拉撤换的标准并不是按照能力而是根据自己派系政治的需要。大量撤换锡克官员的做法，使得达尔巴拉自然地成为锡克社会精英分子和锡克社会的各个阶层所疏远。他的极富有争议的做法也显然给予锡克政党和锡克极端分子一个政府公开歧视锡克的很好的证据。达尔巴拉这种明显地偏向印度教徒的做法甚至连忠于国大党的锡克都感到不满。在锡克中享有很高声誉的前帕提亚拉王公的后代、国大党议员阿马林德尔·辛格就因此向英迪拉抱怨：“占人口大多数

^① 即内务秘书苏克比尔·辛格·贝蒂，卫生秘书哈尔迪亚尔·辛格，教育秘书曼莫汗·辛格，财务专员（发展）帕拉马吉特，合作部秘书阿基特·辛格·查萨和公共工程部的秘书 MS 吉尔。

的社会群体在最高职位上应该有一些代表权。如果以这种方式疏远了锡克,我们在旁遮普又如何能够立足?”^①

达尔巴拉这种随意撤换政府官员的做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政府的频繁变更容易产生这样一批人,即随时调整自己站在势力强大的一边并侵害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身处弱势者。为了适应政治变化,他们同所有的派别都保持联系,并且总能够见风使舵,他们的立场适应环境的需要。随着每一届政府的更迭而导致的公务员的大变动使得原来民主国家所固有的公务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和政治中立性遭到极大的破坏。按照规定,国家公务员只忠诚于国家而不忠诚于任何政党。他们在民主国家中稳定存在保证这个国家行政机构日常事务上的正常运转。然而,旁遮普邦发生公务人员同政务部长一同更迭的新管理文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务员不再对国家保持忠诚而是对某一个政党甚至某一个政治派别保持忠诚,这样在公务员之间因为对政党和派别的忠诚不同而发生分裂,同时他们与执政的政治家无原则的合作的结果使得他们成为政治家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权力被每个人都看作是谁都可以从中分一块的蛋糕,公职被视为每个试图拥有它的人的战利品,而根本无需考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务。当政客们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狂热支持者报以难以被证明是正当的公职任命作为犒劳的时候,政治腐败就在侵蚀着国家的机体。一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将权威赋予那些优秀的人才,以建立功德和奖赏勤劳。当政治派系人物在获得升迁方面比优秀的公职人员更占优先权时候,不仅后者会受到伤害,而且也剥夺了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当公职不公正地分配到那些有学识素养的人身上时,他们就不会成为有用之材,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才。

^① 哈里曼德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3页。

结果旁遮普的局势就如前《论坛》报驻德里分部的主任所说的那样：“在邦的政治领导人和它的行政管理机器之间没有任何融洽之处。双方之间都相互猜忌。结果政府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靠政治家的主观愿望和希望而不考虑具体的环境保证。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家们在忙于捞钱或者与他们的著名的对手们算账时，行政官员们则屈服于任何政治事情并且卑躬地做任何肮脏的工作以赢得当权者的欢心。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腐败和混乱的管理以及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简言之，颓废、堕落和政治上的淫乱放荡，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政治—管理上的乱伦的话，以前的莫卧儿时代的政治似乎正要统治整个印度。它已经吞没了旁遮普。”^①

早在 1981 年就有人提醒英迪拉·甘地注意宰尔·辛格和达尔巴拉·辛格之间的分裂对旁遮普的局势具有的负面影响。他们提请她注意除非这两个人之间能够和解，否则旁遮普的局势将会更加恶化。对甘地夫人而言，如果她愿意采取行动，那么她是能够做到的。然而这位夫人自己的驾驭手下人的政策一贯就是分而治之，只有达尔巴拉和宰尔·辛格之间相互争斗，她才能够享有控制住他们的能力。因此，她并不介意他们之间的争斗，她只注意她自己能否享有绝对的权威。

为了消除宰尔·辛格和达尔巴拉之间的分歧，在乔杜里·达尔善·辛格和特里罗阍·辛格·里亚斯蒂的多次撮合下，这两个对立的派别曾于 1982 年 4 月 24 日以在宰尔·辛格的议会办公室一起共进午餐的方式表示和解。^②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消除他们对彼此的行动和动机的疑虑，特别是达尔巴拉，他与宰尔·辛格相比，还不能尽得甘地夫人的欢心。

当恐怖主义活动在这个邦一出现，达尔巴拉·辛格就知道古尔

① 哈里曼德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3页。

② 哈里曼德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4页。

那姆·辛格、赛瓦·辛格和瓦德哈瓦·辛格是谋杀案的幕后人物。但是他却没有逮捕他们，因为他很快认识到保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存在是他自己的一个必要的政治生存手段，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动荡局势，会使甘地夫人不会中途换马。在被政府悬赏 5 万卢比捉拿的赛瓦·辛格被国防警察萨夫德尔·辛格捕获后，在首席部长本人的干预下，又被释放。^①

1981 年，宰尔·辛格提议与阿卡利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解决旁遮普问题。阿卡利党那时正在威胁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发动一场运动。但是，宰尔·辛格的目的并不纯：“这个计划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这涉及到将达尔巴拉·辛格排除在外。阿卡利党为了急于表明他们对旁遮普的福利而不是权力更感兴趣，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国大党的首席部长，自然，达尔巴拉·辛格除外。帕提亚拉王公的后代和国大党的议员阿马尔林德尔·辛格，是首席部长的首选人物……起初，这对宰尔·辛格有吸引力，因为阿马尔林德是由他提拔的，并且同拉吉夫·甘地的关系十分密切。”^②但是达尔巴拉辛格自然不会让这个计划得逞。

二、阿卡利党内诸派别及锡克极端派别的鼓动和宾德兰瓦拉影响的扩大

阿卡利党在 1980 年大选失败后，内部派别之争更加激烈。在 1980 年 3 月阿卡利党的主席选举中，党内诸派别之间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的相互仇恨竟然达到了金庙主持僧要求警察予以保护的的地步。^③同年 8 月 20 日，阿卡利党正式分裂成两个集团。前阿卡利党主席塔尔万迪被驱逐出阿卡利党，于是他便带着自己的一部分

① 哈里曼德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 年，第 135 页。

② 《印度探索》，1982 年 10 月号转引自哈里曼迪尔·考尔的《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第 136 页。

③ 《印度时报》，1980 年 3 月 1 日。

人另建阿卡利党(塔尔万迪派)由巴德尔、图赫拉等人控制的阿卡利党主要集团选举锡克的宗教圣人哈尔钱德·辛格·朗格瓦尔(1934—1985年)为主席。^① 阿卡利的分裂以及以宾德兰瓦拉为代表的锡克极端主义势力的存在使得阿卡利的政治鼓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色彩。

每一个在野党通常都使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手段以期达到重掌权力目的, 阿卡利党也不例外。它在 1980 年 5 月下台后, 便又捡起了它惯用的鼓动手段, 一方面使执政的国大党难堪, 一方面保持阿卡利党对锡克社会的吸引力, 不至于被人遗忘。作为一个以贾特农民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它主要代表从绿色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富裕贾特农民的利益。而富裕的贾特农民在旁遮普的社会中属于少数。为了保护和推进他们的利益, 阿卡利党必须将所有的锡克都发动起来才有力量。与非贾特锡克一样, 贾特锡克内部也存在阶级矛盾。因此它无法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议题将他们动员起来。如果不将宗教与政治混合在一起, 那么阿卡利党就更不能向表列种姓的手工业者和广大无地的农民提出政治诉求。尽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 旁遮普的农业利润已经大为下降, 中央政府不在旁遮普建立和发展工业的问题也已经十分突出, 但是这些问题只能在会议桌上提出来, 如果用它在公共讲坛上动员群众会显得苍白无力。在 1980 年 12 月, 阿卡利党已经发现围绕给农民更多条件的政治鼓动“没有激起多少热情。”^② 整个锡克以往的鼓动也有力地表明文化的诉求能够比建立在宪政或者经济上的要求更能唤起众多锡克的响应。因此, 阿卡利党又拿起了教派武器。

阿卡利党要求的基本核心是 1978 年阿兰德普尔决议中所提到的内容, 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同时由于极端主义势力的

① 《论坛》, 1980 年 8 月 21 日。

② 《论坛》, 1980 年 12 月 20 日。

日益壮大，不得不带有更浓的教派色彩。1980年4月12日锡克激进分子贾格吉特·辛格·乔汉的支持者，卡利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巴尔比尔·辛格宣布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卡利斯坦委员会，6月16日，乔汉的支持者在阿姆利则的金庙宣布成立卡利斯坦国，乔汉自称是这个“纯锡克国家的总统。”它的组织者宣称，这个宣言同时在美国、西德、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发表。到8月份，在加拿大印制的卡利斯坦国邮票和货币也传到了印度国内。^①

为了与极端主义势力争夺锡克的支持，阿卡利党内各个对立集团竞相换上激进的面孔。在1981年2月阿卡利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阿卡利党主席哈尔查兰·辛格·朗格瓦尔重申阿兰德普尔决议的实施是这个党的长期目标。^②作为回应，塔尔万迪集团的一个主要人物宣称既然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他们必须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主权邦。^③在同年3月在大卡尔萨大会资助下召开的、所有主要的锡克政治领导人都参加的全印锡克教育会议上，美籍锡克教徒，也是华盛地区纳那克基金会主席甘加·辛格·狄龙提醒与会者“锡克仍然为正在为要求我们的主体性和民族性的合法权利得到承认而斗争。”^④他警告与会者即使是允许对锡克真正传统和信仰的哪怕只是最轻微的偏离，“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将会几乎不能够认出我们信仰的面孔。”^⑤他号召建立一个主权的锡克邦，并且要为锡克民族在联合国寻求一个准会员国的地位。1981年3月狄龙出任昌迪加尔锡克教育协会的会长。

在4月份举行的锡克寺院中央管理委员会（SGPC）上，一个宣称锡克是单独的民族并且要求阿兰德普尔决议得到实施的决议被

① 《论坛》，1980年6月17日，9月2日。

② 《发言人》，1981年2月23日。

③ 《发言人》，1981年2月23日。

④ 《发言人》，1981年3月23日、30日。

⑤ 《发言人》，1981年3月23日、30日。

通过。然而，随着这个决议所带来的幸福愉快感消退，这个锡克教育会议的组织者，大卡尔萨协会就极力使自己与一个独立的锡克国家的要求脱离干系。几个星期之后，阿卡利党的主席宣称他的党关于锡克是一个民族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上的概念。而塔尔万迪也代表自己的一派发表声明，宣称它并不赞成建立一个单独的锡克国家，而是要求在印度联邦内建立一个 *Desh Punjab* 或旁遮普国家，为表明它对这个要求的承诺，塔尔万迪集团在德里举行了一个由锡克自愿者参加的小型文明不服从运动，破坏禁止在议会外进行公共集会的禁令。阿卡利党某些领导人的变化不定的立场，甚至连他们的支持者都感到困惑。在对塔尔万迪集团的宣言进行评论时，一位评论家写道：“起初他们支持卡利斯坦的要求，那意味着一个印度联邦之外的独立国家，……当他们发现这个要求很少有人支持时，塔尔万迪派就说它要求在印度联邦内的一个‘旁遮普国家’ (*desh punjab*)，……但是没有人去探究‘旁遮普国家’究竟是什么，它的边界以及它的宪政地位如何。现在这个派别又在坚持阿兰德普尔决议应该得到实施。”^①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难理解，这本身就是锡克政治中的政治投机性的具体体现。

锡克激进分子却继续进行着具有锡克教职工原教旨主义色彩的鼓动。1981年5月，全印锡克学生联盟(AISSF)在宾德兰瓦拉的亲信阿姆利克·辛格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禁止在阿姆利则城区内出售烟草的运动。该组织还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1981年5月30日前禁止在阿姆利则城内禁止出售烟草和禁止吸烟，否则政府将不得不面对一场示威游行。印度教徒商人们反对锡克学生联盟的做法。在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举行游行之前，5月29日圣社和一些印度教徒组织在阿姆利则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支持出售烟草的游行，大约有万人参加，其中一些人带着剑。5月31日，在宾

^① 《发言人》，拜萨克节刊，1981年。

德兰瓦拉的鼓动下,约有 2 万名来自乡村地区近乎全都武装起来的锡克在这个城市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府禁止出售烟草和禁止吸烟。^① 游行队伍中喊出了反对印度教徒的口号。在随后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中,有 10 多人死去。作为从根本上将锡克与印度教徒区分开的手段,这个议题是理想的。印度教徒知道锡克教徒摒弃烟草,锡克知道印度教徒吸烟。在过去,这几乎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但是当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宾德兰瓦拉等人鼓动之下涌上了街头时,教派之间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

1981 年 6 月 2 日,阿姆利则的高级专员举行了一次由所有的警察,宗教和社会团体以及商业组织参加的会议,讨论禁止出售烟草和吸烟的问题。^② 然而,没有任何结果。

在这种浓烈的宗教氛围中,锡克政党阿卡利党的要求也更多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1981 年 7 月 26 日,世界锡克大会在阿姆利则召开,阿卡利党主席哈尔钱德·辛格·朗格瓦尔在会上说:“锡克将诉诸直接行动。”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包括重新获得“包含在‘卡尔萨统治’(Raj Karega Khalsa)之中的光荣的过去。”^③ 他提出了 45 条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要求宣布阿姆利则为圣城和命名一辆最高级别的火车为“金庙快车”。然而,他解释说:“锡克是一个民族(nation)的申明并不意味着锡克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大会授权朗格瓦尔开始真理斗争,9 月 7 日阿卡利党在新德里举行了一场大约有 10 万人参加的游行。整个游行是和平的有秩序的。^④

^① 《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1 年 6 月 11 日,《主流》1981 年 8 月 18 日,第 19—23 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40 页。

^③ 《印度国际评论》,1981 年 8 月 1 日。

^④ 《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1 年 8 月 6 日,9 月 17 日,《论坛》,1981 年 9 月 8 日,1981 年 9 月 7 日。

9月8日阿卡利向印度政府递交了有45条要求的备忘录。

然而阿卡利党的声势很快被宾德兰瓦拉发动的暴力行为所掩盖。9月9日时年82岁的旁遮普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贾格特·纳瑞因遭到锡克极端分子枪杀。拉拉·贾格特·纳瑞因是旁遮普圣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50年代初旁遮普首席部长萨恰尔内阁的部长，与凯隆竞争过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职位，具有强烈的印度教教派情绪。尽管他1977年一度为人民党—阿卡利党的候选人竞选，但是到1978年公开反对阿卡利党。1978年4月13日，正统的锡克与尼兰卡里派教徒发生冲突时，他就在尼兰卡里派的集会现场，并且在法庭上为尼兰卡里派辩护。1980年阿卡利党失败之后，他的发行量极大的报纸《印度消息报》上说温和的阿卡利党比极端主义分子更加危险，但在卡利斯坦极端分子势力兴起后，他又不断地通过他的报纸谴责卡利斯坦的主要人物，指出他们的要求是反国家的、是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支持的。他的好斗姿态自然遭到锡克极端分子的仇恨，正如他的儿子拉莫斯·钱德所说：“杀死我父亲的主要动机可能是消灭一个卡利斯坦的最坚决的反对者。”^①

拉拉·贾格特·纳瑞因的被谋杀是即将吞并旁遮普的恐怖主义浪潮的开始。没有一个阿卡利党人出席贾格特·纳瑞因的葬礼。当地的印度教徒对此事的反应也具有强烈的敌意。参加葬礼的一些人向路过的锡克行人投掷石块，高呼反对锡克的口号：“围裤、手镯和匕首滚回巴基斯坦去吧！”（裤子、手镯和匕首是锡克“五K”中的三K，其余两K是梳子和发辫）并且试图纵火焚烧Ajit报纸所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40页。

在的大楼。^① 达尔巴拉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件予以重视，尽管此时政府可以采取强硬的措施扑灭刚刚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如此，因为达尔巴拉和宰尔·辛格在逮捕宾德兰瓦拉一事上的纷争反而使得旁遮普的这位锡克原教旨主义者势力更加强大。

作为锡克原教旨主义者，宾德兰瓦拉对教派斗争中的暴力并不陌生，在 1978 年 4 月 13 日他的追随者就卷入了与尼兰卡里派的暴力冲突事件中。他本人也因此第一次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在拉拉·贾格特·纳瑞因谋杀案之前，宾德兰瓦拉就曾卷入尼兰卡里派领导人巴巴古尔巴昌·辛格的谋杀案中。事情发生后，他躲进了阿姆利则供奉古鲁纳拉克的寺庙中（此时尚不是金庙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宰尔·辛格拯救了他。宰尔·辛格坚持宾德兰瓦拉与这位尼兰卡里派教团领袖的谋杀案无关。虽然宾德兰瓦拉的名字已经出现在警察的第一情况报告中，也出现在这位内政部长的卷宗中。^② 国大党就是要扶植宾德兰瓦拉作为反对阿卡利党的一颗棋子，宾德兰瓦拉此时与国大党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例如，在 1980 年 8 月，宾德兰瓦拉还赞扬新的国大党政府的首席部长达尔巴拉·辛格不像阿卡利党的政治家那样口是心非，而是“严格地遵循了锡克教的准则”。^③ 到 1981 年 9 月当宾德兰瓦拉变得太富有争议时，宰尔·辛格才断绝了与宾德兰瓦拉的联系。^④

在拉拉·贾格特·纳瑞因被杀之后，印度教徒强烈指控宾德兰瓦拉犯有谋杀罪，认为他参与了这桩谋杀案，因为宾德兰瓦拉曾在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41 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37 页。

③ 《论坛》，1980 年 8 月 19 日。

④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43 页。

某些场合说过他将给那些杀死贾格特·纳瑞因的人宗教荣誉。

印度中央政府警察部门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决定以谋杀、意图谋杀和阴谋谋杀以及非法持有武器罪名逮捕宾德兰瓦拉。^① 此时宾德兰瓦拉本人尚在哈里亚纳邦的昌都卡兰锡克寺院，他是在全印广播电台的地区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一消息的。^② 9月13日，达尔巴拉·辛格会晤了哈里亚纳的首席部长巴建拉尔，希望就逮捕宾德兰瓦拉一事得到他的协助。但是宰尔·辛格早已指示巴建拉尔，让这位锡克圣人离开哈里亚纳。宰尔·辛格借此机会要给达尔巴拉制造麻烦。当警官曼格特到达昌都卡兰时，这位圣人已经逃回乔克梅塔。为了发泄受挫的感情，曼格特的人烧了圣宾德兰瓦拉的汽车。被焚的汽车里有一些写有圣诗的书籍。曼格特的人还毒打了宾德兰瓦拉的一些追随者。达尔巴拉·辛格手下的警察们的亵渎神圣的行为使得他成了宾德兰瓦拉仇恨的对象。这也给了宾德兰瓦拉另一个反对警察和政府的理由。^③ 他公开宣称决不宽恕旁遮普警方对锡克教祖师的无礼行为。

在宾德兰瓦拉逃回到他的总部乔克梅塔数日后，旁遮普警方要求他投降。宾德兰瓦拉利用这个机会向他的追随者们和世界表明他能够在自己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内向政府投降。^④ 旁遮普警方竟然允许他这样做。在9月19日夜他前往离梅塔·乔克50公里外的金庙的圣池进行沐浴，并在同一天夜间返回。而且这竟然是由一部警车载着他去的。尽管他们有拘捕他的证件。邦政府甚至对新德里发布的没收宾德兰瓦拉武器的命令置若罔闻。“旁遮普的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有关的人员交出武器。或者因为没有

① 萨廷达尔·辛格：《卡利斯坦：一个学术研究》，新德里，1982年，第107页。

②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7页。

③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7页。

④ 《论坛》，1981年9月14日，1981年9月15日。

做到这一点而吊销他们的武器执照。”^① 看起来,达尔巴拉·辛格现在成了宾德兰瓦拉的教父。^② 结果大量的锡克信徒涌向了乔克·梅塔,阻止他们的圣人被捕。宾德兰瓦拉希望被公众所知,而政府却成全了他。他极力使他被捕的场景让人想起独立以前国大党人被警察逮捕之前大量的人群聚集的场景。^③ 9月20日,宾德兰瓦拉向政府投降,在场的锡克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有数名锡克被打死。^④

在乔克梅塔逮捕宾德兰瓦拉的时候,阿卡利党三巨头巴除德尔外,图赫拉和朗格瓦尔都在现场。但是在逮捕现场发表激烈地反政府演说的却是支持甘地夫人的德里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桑托克·辛格。他说:“旁遮普政府逮捕宾德兰瓦拉的决定是对锡克宗教的一个直接的攻击。虽然在我们自己中间是有派系之分,我们也可能属于不同的政党,但是我们的宗教只有一个,为了我们的宗教,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我警告(旁遮普)政府在逮捕宾德兰瓦拉之前,应将他的名字从指控他的谋杀案的名单上划去。否则,两千万锡克的愤怒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印度将被它的火焰吞没。”^⑤ 桑托克·辛格是在宰尔·辛格鼓动下来到现场的,宰尔·辛格告诉他,这样就可以赢得锡克的支持。但是在他去了阿姆利则后,宰尔·辛格又在甘地夫人面前指责他,使得这位一度可以自由出入总理官邸的锡克从此遭到英甘地的冷落,此后直到1981年12月21日他被人暗杀都没有能再见到英迪拉。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42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42页。

③ 《论坛》,1981年9月21日。

④ 《论坛》,1981年9月21日。

⑤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8页注20。

宾德兰瓦拉的被捕使得他在许多锡克的眼中成了英雄，在印度教徒的报纸攻击他是锡克沙文主义的主要代表后是更是如此。由于意识到宾德兰瓦拉的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的巨大的影响力，阿卡利党于是要求政府释放他。他们认为将来可以用他来作为胁迫政府接受他们要求的工具。

达尔巴拉很快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成千上万的锡克一旦真的为宗教原因鼓动起来，可不是达尔巴拉本人所能应付得了的，于是他极力缓和这种紧张局势。他的同僚特里罗阡·辛格·里亚斯蒂建议他释放宾德兰瓦拉。“你没有反对他的起码证据。你不能仅凭没有根据的指控或者道听途说就逮捕一位重要的宗教领导人。”^①于是达尔巴拉派里亚斯蒂和哈尔般斯·辛格去会晤在费罗兹普尔监狱中的圣人宾德兰瓦拉，后者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达尔巴拉应惩罚所有那些焚烧了他的汽车和含有圣诗的小册子的警察官员们。当“草拟的协定”的条款送给达尔巴拉辛格时，达尔巴拉宣称：“不是我命令逮捕他的，叫我如何释放他，这个命令是由德里下达的。”^②但是在里亚斯蒂面前，总理拒绝承认是她下的逮捕令。中央政府本身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10月15日，警察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宾德兰瓦拉被无罪释放。

在这起逮捕事件中，宾德兰瓦拉巧妙地利用势态的发展，利用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使锡克各个政治派别都向他靠拢，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锡克大众中的声望。他被捕的结果使得“他的影响比是一个自由人时还要大。”^③到这一年底，长期以粗暴闻名的旁遮普警察局已经开始温驯地写信给宾德兰瓦拉“请求一旦在他的总部附近发现任何要逮捕的罪犯，就将他

①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8页。

②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39页。

③ 《论坛》，1981年9月29日，11月6日。

们交给警察局。”宾德兰瓦拉则肆无忌惮地回信说,为了保持安全,警察可以将他们的枪支交给他的寺院。在其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没有一个旁遮普的派系在进行活动之前不预先考虑宾得兰瓦拉的反应。

三、阿卡利党与政府的谈判以及鼓动的再度升级

阿卡利党的不断鼓动和旁遮普社会的动荡引起了印度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印度各个政党和组织要求政府与阿卡利党进行谈判解决问题。在国外的锡克人也十分关注旁遮普锡克人的地位,纷纷要求印度政府满足锡克人的正当要求。英迪拉本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在她的任期内安排了许多重大的国际活动,希望提高她本人和印度的国际声望。国内的动荡局势自然对她这种做法有影响。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形象的考虑,从 1982 年 10 月起至 1984 年 5 月止中央政府和阿卡利党之间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1981 年 9 月 21 日,甘地夫人邀请阿卡利党人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阿卡利党人对这个会谈是比较认真的,在 10 月份,他们内部经过研究之后,将原来的 45 条要求减少到 15 条。而且所提的问题也比较务实。主要要求是河水的重新分配;将昌迪加尔并入旁遮普,同时反对将旁遮普的阿布哈尔和费罗兹普尔交给哈里亚纳;制定一个全印锡克寺院法;实现在卢迪亚纳通过的阿兰德普尔决议的有关要求,事实上是要求中央考虑调整中央和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其他地方政党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河水问题上,政府在 1968 年和 1977 年以及 1981 年的裁决都没有考虑到旁遮普的正当利益,而偏向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锡克政党也曾向高等法院起诉,旁遮普邦国大党政府根据英甘地的指示又撤消了起诉。阿卡利党要求政府考虑旁遮普的正当利益,然而政府拒绝考虑。在 1982 年 4 月,总理宣布将立即建设拉维河上的赛因大坝和连接苏特里季河和朱木拿河的运河。她选择这样的时间是有很好的理由的,5 月 19 日哈里亚纳将举行邦议

会选举，这个时候开工可以为国大党争取到选票。然而，4月份是北印度地区热季开始来临的时候，每一滴水都是珍贵的，人们都希望有来自印度洋的西风雨，可是又都知道不到6月末是不会有的。“因为水而导致的争吵常常导致谋杀。”几乎与为了女人而争吵一样平常。”^①

4月6日，甘地夫人为连接苏特里季—朱木拿河的运河开工举行奠基时，阿卡利党决定发起鼓动。甘地夫人1981年的裁决规定的实施时间是两年之后，但是她没有等到1983年。阿卡利党政治家们认为，一场基于河水的反对中央政府的鼓动将会激起人民的感情，因为它是一个“旁遮普”的要求，而不是一个“锡克”的要求。对于像巴德尔这样的政治家，他们看到在都市印度教徒和像他自己这样的繁荣的贾特锡克农民之间建立一个有机的联系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有效途径。中央政府“窃取”旁遮普的水资源的行为肯定会将人民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裂。^②于是阿卡利党决定“为了保卫旁遮普的利益作出最大的牺牲。”^③阿卡利党在离嘎纳尔6公里的地方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并且号召人民阻止政府开挖这条运河。阿卡利党力图使人们相信这条运河的修建将导致旁遮普大量的土地干旱缺水。印度共产党（马）也加入了这场鼓动。这场鼓动持续了十多天，但是在锡克中间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应。一方面开挖运河的地方离人口稠密的地区很远，那里没有锡克寺院可以鼓动人们的宗教情绪。另一方面也没有人相信这个运河开通后旁遮普的土地就真的会干裂。

在这种对峙的气氛下，宗教鼓动进一步升级。1982年4月2日宾德兰瓦拉应德里的 Dharm Prachar 委员会的邀请，到德里进

① 帕尔卡什·坦东：《旁遮普世纪：1857—1947年》，德里，1961年，第42页。

② 罗宾·杰弗里：《印度发生了什么？》，伦敦，1994年，第161页。

③ 《印度国际评论》，1982年4月17日。

行为期 12 天的访问，宾德拉瓦拉带着他的武装卫队，在德里参加了大约 50 个活动，并且发表反对有关政府对锡克暴行的煽动性演说。他的武装卫队则荷枪实弹，炫耀武力。在旁遮普，炎热的 4 月 26 日早上，人们在阿姆利则的一所印度教寺院中发现两颗血淋淋的母牛头。^① 结果阿姆利则引起的一场教派骚乱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政府实行了 24 小时的宵禁。作为报复，成包的香烟被投进锡克寺院，骚乱一直扩展到旁遮普的 20 余个城镇。达尔卡尔萨声称这件事情是他们干的。他们这样做是对政府没有能够在阿姆利则禁止售卖烟草进行的报复。但是根据后来国大党的资料，这件事情还与当时的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有关。1983 年 3 月 6 日，国大党（英）议会党团举行了一次会议，事后写下一份名为《国大党立法会议成员所认为的旁遮普达尔巴拉政府乱政备忘录》，该备忘录称“为了转移人们对于政府未能逮捕罪犯以及未能保护人民不受逍遥法外的极端主义分子对他们生命威胁的注意力，首席部长设法亵渎在阿姆利则的一个印度教寺院（1982 年 4 月 25—26 日）。应首席部长之请，在莫哈里酝酿了一个阴谋……从莫哈里砍下的两颗牛头被放在一个箱子里，……被带到阿姆利则并被偷偷地扔在印度教寺院附近或者扔在寺院之内。”^② 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卢迪亚纳、帕提亚拉和末嘎，桑格鲁尔和其他一些城市，从而煽动起狂热的宗教情绪。达尔巴拉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破坏阿卡利党的温和派和旁遮普邦国大党内的宰尔·辛格派的政治联合的可能性，因为宰尔·辛格派一直力劝甘地夫人向阿卡利党作出让步，让阿卡利党作为国大党的政治伙伴加入邦国大党内阁，如这种情

① 《今日印度》，1982 年 5 月 31 日。

② 古林德尔·辛格，一位被指控的恐怖主义者，1985 年 5 月 10 日，被警察局拷打之下，承认他与达尔巴拉·辛格和以及桑托克·辛格·兰德哈瓦之间的联系，人们指控他为达尔巴拉利用来亵渎旁遮普的印度教寺院，和攻击阿姆利则的前 PCC(I) 的主席，R. L. 巴蒂雅。引自哈里曼迪尔·考尔的《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第 135 页注 14。

况发生，不受锡克欢迎的达尔巴拉必定会下台。而教派骚乱的存在会使国大党无法与阿卡利党合作。无论如何，国大党在表面上是绝对不会收起世俗主义这面旗帜的。

在巴廷达马克哈的教派骚乱中，印度教徒焚毁了 15 部锡克圣典《古鲁格兰特·萨西布》，一些锡克寺院也遭到印度教徒的亵渎。开始于贾格特·纳瑞因的谋杀事件的恐怖主义浪潮进一步升级。锡克极端主义打击的目标大多是印度教徒和尼兰卡里派教徒，但是许多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极端分子的锡克也被杀害。警察的反应则是疯狂的报复。为此许多无辜的锡克受到警察的伤害。在暴力事件发生后，公民自由权利人民联盟派一个以 V.M. 塔康德为主席的调查团调查警察对锡克的过火行为。调查团在报告中毫不迟疑地说警察就像一支进行报复的野蛮力量。他们甚至将一些逃亡者的房屋付之一炬，毁坏家具、衣物以及他们能够发现的任何东西。甚至逃亡者的亲戚也遭到骚扰和监禁。居民们为恐惧所折磨。^① 同时调查团也不得不抨击那些视触犯法律实行暴力为荣耀的极端主义分子。那些被指控犯有邪恶罪行的人在出逃之后被他们所在的村庄誉为英雄，他们的家属亲戚被誉为 SAROPAS。在朱朗达尔调查团看到那些被指控犯有谋杀、暴力以及类似罪行的人的照片受到“尊重”。调查团注意到，温和的锡克领导人或者不愿意或者害怕抨击极端主义分子的暴行。当印度教徒受到骚扰甚至被谋杀时，阿卡利党的领导人没有出来说话。

锡克与印度教徒领导人之间互不信任，印度教徒领导人怀疑阿卡利党正在为一个锡克的自治邦而工作。这个时刻的斗争或者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失去了他们在巴基斯坦所拥有的一切之后，印度教徒害怕出现一个因自治的锡克邦产生而使得他们又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55 页。

一次被迫迁徙的前景。印度教徒极少参加阿卡利党组织的阻止开挖运河的鼓动。此外，无论阿卡利党怎样解释，阿兰德普尔决议仍然被印度教徒看作是建立“卡利斯坦”的基石。^①

阿卡利党批评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对付“犯法者”，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共产党也是如此。作为辩护，邦政府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秘密”资料，其中“在北方邦、比哈尔和西孟加拉暴力盛行，甚至像卡尔那提克和安得拉这样的邦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东北部各邦了，相比之下，旁遮普还是印度最和平的邦，”^② 政府洋洋自得的态度加剧了紧张的局势。

1982年6月，两个阿卡利党派别宣布他们将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镇压政策”。但与此同时阿卡利党主流派仍然向甘地夫人作出了一个和解的姿态，他们拒绝反对党的要求，支持英迪拉提出的国大党候选人，也是印度联邦政府内政部长宰尔·辛格竞选印度总统。巴德尔害怕斗争可能会使印度教徒离他们而去。他使阿卡利党相信没有代表印度教徒的印度人民党的支持，阿卡利党是无法上台执政的。朗格瓦尔对鼓动也不太热心，在旁遮普发生的一切使阿卡利党感到窘迫。如果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接纳他们，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回去对锡克社会有个交待，那么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激进派的塔尔万迪和苏克金德尔·辛格反对这些温和派。他们将这场斗争看着是推动阿卡利党分裂的一个机会。苏克金德尔还有一笔账要同巴德尔算，后者在1979年将他赶出了内阁。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主席图赫拉站在激进派一边。他经常从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冲突中渔利。他热衷于这场斗争，因为他希望保住他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55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56页。

的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如果斗争开始谁也不会想到要换掉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阿卡利党的高级领导层 7 月 26 日在法特加尔开会之前，阿卡利党总书记拉金德尔·辛格·巴提亚说服朗格瓦尔不要进行这场斗争。巴提亚一直与拉吉夫·甘地进行接触并且认为国大党可能同意与阿卡利党分享政权，将阿卡利党看作是一位合作伙伴。巴提亚与朗格瓦尔争辩说一场斗争只能意味着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当巴提亚告诉他政府打算接受阿卡利党的要求，将水的问题提交最高法院，并且想办法将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的消息时，朗格瓦尔允诺如果巴德尔同意，他愿意无限期地推迟这场斗争。巴提亚于是又会晤了巴德尔，后者欣然同意。但是在 7 月 26 日阿卡利党两派举行的会议上，温和派居少数。这次会议决定在 8 月 3 日举行坚持真理斗争。激进派为了安抚巴德尔，称巴德尔将是在这场斗争第一个接受逮捕的人。这使一直希望成为阿卡利党第一号人物的巴德尔也感到满意。

达尔巴拉·辛格不希望阿卡利党开始鼓动斗争，他害怕那将使他们重新得到力量。他于是派人给宾德兰瓦拉送信让他早日开展一个宗教斗争，盖过阿卡利党的鼓动声势。宾德兰瓦拉现在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原教旨主义力量。宾德兰瓦拉反对阿卡利党的领导人，他们控制了阿卡利党和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达尔巴拉·辛格的要求使他很满意。为给予他足够的理由，在 7 月 19 日，政府以涉嫌非法武装和对圣尼兰卡里派教徒的攻击的罪名逮捕了宾德兰瓦拉的心腹，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主席阿姆利克·辛格。逮捕时间的选择上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国大党内部达尔巴拉与宰尔·辛格的派系斗争有关。一位印度记者写道，“他们之间的宿怨是目前困难形势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① 尽管 1982 年 7 月，宰尔·辛格离

^① 《主流》，1982 年 5 月 22 日。

开了内政部长的职位成了印度的总统，但是他和他在旁遮普的支持者们仍然热衷于将达尔巴拉·辛格从旁遮普邦首席部长的位置上赶下去。前国大党议员阿马林德尔·辛格回忆说：“我们尽全力将他搞下去。”^① 宰尔·辛格派与阿卡利党的一个派别结成联盟是有可能的，他们的议员们一致投票支持宰尔·辛格竞选总统就是某种联盟的征兆。^②

为了保护自己，达尔巴拉·辛格通过逮捕阿姆利克·辛格而狠狠地插了一个马蜂窝，根据阿马林德尔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在旁遮普有某种程度的受控制着的不稳定因素发生，甘地夫人就不可能中途换马。”^③ 当被捕的消息传到宾德兰瓦拉那儿时，这位愤怒的圣人和他的追随者们从他们的乔克梅塔的总部匆忙赶到阿姆利则，举行全副武装的示威游行违抗政府的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宾德兰瓦拉宣布组织自愿团每天都去警察局接受逮捕直到阿姆利克和其他人被释放出来为止。宾德兰瓦拉还宣称整个锡克社会正在受到威胁和束缚。在整个社会受到宾德兰瓦拉所谓的“政府的压迫”的时候，阿卡利党人是没有与宰尔·辛格派在旁遮普组成新政府的可能性的。

当1982年8月3日，阿卡利党人开始宣布对政府的真理斗争，要求宾德兰瓦拉将他的斗争并入以朗格瓦尔为首的真理斗争中时，他欣然同意。宾德兰瓦拉答应的原因很简单，加入阿卡利党的斗争，他可以利用阿卡利党的威望增加自己的影响，并取代自称为甘地信徒的朗格瓦尔的政治地位。因为当他和朗格瓦尔一起为参加斗争的贾萨自愿者祈祷时，他的政治地位无形之中就被抬高到与朗格瓦尔平起平坐的地位。而这也正是他宾德兰瓦拉宣传锡

① 《锡克评论》，1984年9月号，第54页。

② 《印度国际评论》，1982年8月28日，《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2年7月5日。

③ 《锡克评论》，1984年9月，第54页。

克原教旨主义最好的时刻。

从此阿卡利党的贾萨队伍的派遣以及他们随后的被捕成了每日都发生的事情，此举在地方锡克中产生了更多的同情。据报道，到了 9 月底，大约有两万锡克鼓动者被捕，^① 9 月 11 日，一辆载有被捕的锡克鼓动者的汽车与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 30 多人死亡。^② 阿卡利党领导人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杀死锡克人的企图。10 月 11 日，在新德里，捧着这些死者骨灰的游行队伍试图向议会进军，又有 4 人被杀。阿卡利党领导人说，这是一个和平的游行，而根据警察的说法，锡克青年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说。“他们的出鞘的剑和匕首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③ 对虔诚的信徒而言，政府对锡克的敌意变得日益明显。锡克人中政治上的不满日益扩展开来。

四、亚运会前后的会谈及亚运会期间对锡克的政策后果

尽管阿卡利党不断地进行鼓动，但是阿卡利党和政府的接触一直没有中断。面对即将来临的亚运会，政府要重开谈判。10 月 15 日迪瓦里节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阿卡利党人。在 10 月 25 日英·甘地委托老资格的国大党锡克斯瓦兰·辛格与阿卡利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

斯瓦拉·辛格与阿卡利党逐条地讨论了他们的要求。他说服他们接受由全印广播公司的朱朗达尔转播站转播在金庙进行的 KIRTAN，而不是由金庙自己进行宗教广播。阿卡利党人收回了命名一列火车为金庙快车的要求。昌迪加尔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认为这所城市理所当然地要划归旁遮普。至于费兹尔卡和阿布哈尔，阿卡利党人说两个地区说旁遮普语的人占多数。

① 《发言人》，1982 年 9 月 27 日。

② 《印度国际评论》，1982 年 9 月 18 日。

③ 《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2 年 10 月 21 日，《今日印度》，1982 年 11 月 15 日。

但是阿卡利党和斯瓦兰·辛格都同意将由一个领土委员会裁定旁遮普和哈里亚纳基于语言标准划分领土的要求。河水分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阿卡利党表示他们愿意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不反对组成一个专家组帮助最高法院进行裁决。^①

阿兰德普尔决议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斯瓦兰·辛格告诉阿卡利党人他所能够与他们讨论的只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阿卡利党人强调阿兰德普尔决议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们介意的是向所有的邦分权，而不仅仅是给旁遮普，他们希望让更多的项目置于地方邦的控制之下。对这个决议中有争议的部分，阿卡利党建议让所有政党代表组成的议会党团进行审查。然而斯瓦兰·辛格告诉他们，在这样一个所有政党组成的议会委员会中，每一个政党的代表权将与其在议会中的力量成比例对应，国大党将自然成为这个委员会中的多数，他们何不将其交给甘地夫人任命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并作出裁决呢？阿卡利党接受了这个建议。整个会谈非常成功。

在此期间，斯瓦兰·辛格也会晤了宾德兰瓦拉。宾德兰瓦拉强调的重点是阿兰德普尔决议的实施，他对阿卡利党同意的各点并不感到满意，但是他表示赞同。此时他的力量还太弱，如果他们反过来谴责他，他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他希望赢得时间，将跟随在阿卡利党后面的人夺过来。事实上斯瓦兰·辛格的访问等于将他与温和的阿卡利党人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上，这本身就有助于他的声誉特别是政治声誉的提高。

在与阿卡利党的会谈中，斯瓦兰·辛格以及英迪拉·甘地身边的人一直不断地向甘地夫人报告所有的谈判的细节。她接受了这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61页。

个协定并且对他的艰苦努力表示赞赏。^① 然而她告诉他，她要先将这个协定交给由帕拉纳布·穆克吉，文卡塔拉曼、纳拉西姆哈·拉奥和 P.C. 赛提组成的内阁小组委员会审查。斯瓦兰·辛格向这个内阁小组委员会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方案内容。内阁小组委员会表示接受。

然而，甘地夫人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要求对整个协议进行彻底修改，事实上是拒绝这个协议。那个时候记者们写到甘地夫人“退缩了”，她“将斯瓦兰·辛格降低到了一个信使的地步”。斯瓦兰·辛格十分不满，后来告诉库尔迪普·纳雅尔，“他发誓再也不介入会谈了。”^② 从此他置身局外，英迪拉后来反复邀请他进行斡旋，都被他拒绝。甘地夫人可能对斯瓦兰·辛格的成功会谈感到不安。在 1977 年她下台之后，斯瓦兰·辛格没有为甘地夫人辩护。她认为斯瓦兰·辛格背叛了她。^③ 如果他因为这次成功的谈判获得了信任，那么在旁遮普的她的忠诚者将作何反应？^④

在德里召开亚洲运动会前夕又有一次接近达成协定的机会，11 月 4 日谈判遭到失败的阿卡利党宣布他们将“骚扰”亚运会，但是后来又宣布只在德里举行一场游行。一直关心自己国际形象的甘地夫人对此感到焦虑。虽然阿卡利党只是强调他们的游行仅仅是象征性的。但是政府不愿意他们有任何机会，因为在运动会期间，来自全亚洲的数以百计的运动员将来到德里，数百万的电视观众也将盯着这个地方。在拉·甘地的劝导下，政府匆忙要求与阿卡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 年，第 62 页。

② 今日印度，1982 年 11 月 30 日，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第 63 页。

③ 贾纳丹·塔库尔：《印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11 页。

④ 罗宾·杰弗里：《印度发生了什么？》伦敦，1994 年，第 155 页。

利党重新进行谈判，这次代表英甘地与阿卡利党进行谈判的是来自帕提亚拉的 M.A. 辛格。到了 11 月 18 日双方又达成了一份协议，就待英迪拉的批准。然而与阿卡利党达成协议的消息被人泄露给了哈里亚纳的首席部长巴拉建尔和拉贾斯坦邦的首席部长，由于涉及到旁遮普与这两个邦的水资源分享问题，于是他们立即作出反应，要求政府在与阿卡利党人签署协议前先将有关内容通报给他们，英·甘地担心作出单方面的让步将会遭到失去支持的后果，于是单方面退出会谈。从根本上说，英迪拉对达成协议也不太感兴趣。她关心的只是如何让亚运会完满地召开。因为这对于她的接班人拉吉夫·甘地很重要，她希望让她自己的缺乏经验的儿子利用这个机会来证实他的才干和勇气。她将从建造基础设施到运动会结束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他，她决心要看到拉吉夫完满地完成这个任务。^① 她已经 65 岁了，让拉吉夫早日顺利地接班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为了保证亚洲运动会的成功她不得不与阿卡利党进行谈判。但是当最后需要对谈判结果拍板时，她考虑到对锡克的让步会引起印度教徒的不满，不利于未来的选举，因此决定就此止步。

甘地夫人将哈里亚纳邦的首席部长巴建拉尔召到新德里，问他能不能保证不让锡克骚扰亚运会，当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断然停止了与阿卡利党的谈判。巴建拉尔原是从人民党倒戈而来的，是甘地夫人让他当上首席部长的。他将这看作是向甘地夫人表示“忠诚”极好的机会，同时也是对锡克进行“算账”的机会。^② 他宣称不让一个阿卡利党人越过哈里亚纳进入德里。从德里返回

^①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 299 页。

^②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 301 页。

后，他对他的官员们说他的政府的未来命运就系于成功地阻止恐怖分子在亚运会上发动的骚乱。至于如何阻止则是他们的事。这事实上是给本来就粗野蛮横、飞扬跋扈的警察松开了手脚。警察宣称无法分辨哪一个是锡克，哪一个是恐怖分子，所以对所有前往德里的锡克都进行搜查。^①许多高级锡克官员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其中包括退休空军上将阿琼·辛格，（他是前印度空军司令，1971年在达卡接受投降的将军），中将贾格吉特·辛格·阿努拉、少将 J.S. 布拉尔和萨巴格·辛格以及旁遮普和哈里亚纳两邦的高级法院的法官等。他们即使亮出自己的证件也没有用。所有的行李都被彻底搜查。甚至斯瓦兰·辛格也被拦截，尽管他向警察亮出了他的身份。国大党锡克议员们也不例外，国大党议员阿马尔吉特·考尔在议会中央大厅诉说她和她的丈夫在哈里亚纳受到的侮辱时，泪流满面。

亚运会是和平地举行了，但是许多锡克不会忘记他们在这个运动会期间所受到的侮辱。从那时起他们对政府的疏远心理进一步增强。锡克人感到政府现在反对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他们。^②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都不会忘记，因为这是第一次仅仅因为他们是锡克就受到无端的怀疑。锡克人感到受了侮辱，从哈里亚纳进入德里的任何一个印度教徒都没有被碰一下，即使是形式上的也没有。政府没有表示任何歉意，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执政党的官员们发表谴责声明。^③极少有印度教徒对此加以反对。新闻报刊也没有报道任何这类事件。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5年,第66页。

^②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66页。

^③ 库尔迪普·纳雅尔,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66页。

亚运会期间发生的对待锡克人的事件，给宾德兰瓦拉提供了鼓动反对政府的又一确凿的理由。他利用这种不满煽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也引起人们对极端分子的同情。一部分原来忠于政府的锡克因此加入了宾德兰瓦拉的行列中。原印军退役少将 J.S. 布拉尔和萨巴格·辛格就是典型的事例。1985 年已经成为在华盛顿特区活动的新世界锡克组织的总书记布拉尔回忆说，警察将他拦截下来进行搜查，他的军人身份证没有任何用处，“他们说‘我们不在乎这些证件。’这是极其侮辱人的，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都气得发疯了。”^①到 1982 年底，布拉尔开始为阿卡利党工作，并且成了宾德兰瓦拉的一个崇拜者和得力的干将。布拉尔将宾德兰瓦拉看作是“一个锡克的拯救者”。^②

四、走向极端的竞争之途

1982 年底，阿卡利党与国大党的谈判破裂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使得极端派得到越来越多锡克的同情和支持，而温和的阿卡利派别的支持基础越来越薄弱。温和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83 年 5 月，在阿兰达普尔·萨西布的自愿者营地，极端主义者高呼要求建立卡利斯坦，这个原来被认为是沙文主义的口号，现在得到了众多的响应。

甘地夫人对阿卡利党的态度是拒不让步，并且要搞垮这个政党，因此即使有让步的机会也不给。1983 年 2 月 27 日，甘地夫人在新德里的邦格拉萨西布锡克寺院向集会的人群宣布中央政府正式接受阿卡利党过去两年来一直鼓动的宗教要求。全印广播电台将传播来自金庙的宗教祷文(kirtan)，议会将通过一部全印锡克寺院法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锡克寺院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在乘坐印

^① 《政治家》，1985 年 4 月 1 日。

^② 《印度国际评论》，1983 年 1 月 1 日。塔夫里安·辛格：《旁遮普的故事》，新德里，1984 年，第 50 页。

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时，政府允许锡克携带不超过 9 英寸长的短剑。在金庙周围出售烟草和肉类的商店将被迁出。^① 但是甘地夫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邀请阿卡利党的最高领导人参加。事实上甘地夫人之所以这样宣布，部分是对新德里的非贾特锡克在刚刚结束的德里地方选举中支持国大党的一个回报，同时也力图破坏德里的锡克寺院委员会（DGMC）与以阿姆利则为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SGPC）之间的关系。另外，这也是一个帮助她在旁遮普的支持者的一个策略。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甘地夫人此举“剥夺了阿卡利党领导人一个能够获得（锡克社会）信任的机会。”^② 这个举动事实上暗示：“如果锡克拒绝阿卡利党政治家，那么国大党会照看锡克的利益”。^③ 然而，从长远看来，破坏从事合法活动的政治家权威不一定会加强国大党的影响，在旁遮普，它只会使得锡克青年更明显地转向选择暴力。真正睿智的政治家是会允许阿卡利党政治家得到一些机会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的。而国大党这种做法只会迫使阿卡利党去寻求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

这样，为了政治上的生存，阿卡利党温和派也逐渐走向激进之途，与宾德兰瓦拉争夺对锡克社会的影响力。“当一个人有充足的理由不公开说话支持处于激昂状态的人民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安全，不与人民唱反调是慎重的，甚至是必要的。……与狼一起嚎叫则更明智。”^④ 1982 年 12 月 23 日，阿卡利党在阿姆利则组织了一次复员军人的会议，会上宣誓支持阿兰德普尔决议。

1983 年 4 月 4 日，阿卡利党宣布它将阻碍所有的交通，作为迫使政府接受阿兰德普尔决议的运动的一个部分。在这一天发生

① 《印度国际评论》，1983 年 3 月 5 日。

② 《印度国际评论》，1983 年 3 月 19 日。

③ 罗宾·杰弗里：《印度发生了什么？》伦敦，1994 年，第 165 页。

④ （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改革出版社，1998 年，第 131 页。

的暴力事件中,有 20 名锡克人被政府武装警察枪杀。除了 1982 年 8 月汽车和火车相撞的事故之外,这是 1978 年 4 月尼兰卡里派和正统锡克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以来最大的日死亡记录。^① 4 月 4 日事件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开端。虽然阿卡利党宣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运动中已经有 100 多名锡克死去,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惨烈的。警察宣称游行示威者是全副武装的,扔了一些土制的炸弹,纵火并且从锡克寺院向外射击。^② 而游行示威者宣称,这纯粹是警察的镇压行为,是又一起对“和平的鼓动者”犯下的暴行,进一步证明锡克是二等公民。作为反击,阿卡利党宣布组织 10 万阿卡利,作为与政府进行一场决定性的真理斗争的敢死队。^③ 在 1983 年 6 月和 8 月,阿卡利党又先后举行了阻止铁路运输和停止工作运动。1983 年 9 月,持极端主义立场的全印锡克学生联盟在阿姆利则举行年会,所有重要的锡克政治家都参加了这一会议,这个年会向政府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贾格德夫·辛格·塔尔万迪在会议上发言时,甚至建议阿卡利党应该在旁遮普建立一个平行的政府,开始征税。^④ 此时旁遮普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政局,于是在 1983 年 10 月,根据印度总统令,旁遮普邦立法会议被解散,实行总统治理。

到了 1984 年初,旁遮普的气氛已经极为紧张,一个强有力的阿卡利党的宣传运动,和日益增长的恐怖活动,已经使许多锡克和印度教徒处于攻击之下。1984 年 2 月 8 日,阿卡利党实行旁遮普停工运动,印度教徒防卫组织反过来在 2 月 14 日举行停工运动(bandh)。2 月 14 日,印度教徒暴民在阿姆利则的 56 个地点集会。在每一处暴民都有组织地洗劫锡克商店、住宅和宗教寺院。

① 《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3 年 4 月 7 日,1983 年 4 月 14 日。

② 《海外印度斯坦时报》,1983 年 4 月 7 日,4 月 14 日。

③ 《发言人》,1983 年 4 月 25 日。

④ 《发言人》,1983 年 9 月 26 日。

在普特力加尔集会的暴民冲到当地的火车站，打破了放在那儿的金庙的复制品。并且在阿姆利则城的奠基人四世古鲁兰姆·达斯的画像上便溺，亵渎锡克宗教。而宾德兰瓦拉以及其他锡克极端分子则进行报复。

邻近旁遮普的哈里亚纳印度教徒贾特用拖拉机载人在这个邦的各个地方集会，发动反锡克骚乱。骚乱的鼓动者不是别人而是该邦的首席部长巴建拉尔，他在法里达巴德发表煽动性讲演，宣称，印度教徒的耐心就要用完，报复临近了。印度教徒暴民将锡克从汽车、火车、和他们的住所中拖出，削去他们的头发，殴打他们和烧他们的胡子。一些无辜的锡克甚至被私刑处死。反对锡克的暴乱持续了 3 天之久。而该邦的警察对此无动于衷，任凭锡克接受印度教徒的“教训”。《论坛》的一份报告说：“这个决定不可能只是巴建拉尔一个人作出的。”^① 整个政治形势是如此的恶化以至于主干线上的交通都被迫中断。

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骚乱中，国大党人推动这个邦的暴力升级的面目又一次显露出来。在阿姆利则，警察主管曼因逮捕了 30 名带头进行骚乱的分子后，来自旁遮普的一位国大党议员要求他立即放人。因为所有这 30 个人都是国大党的工作人员。曼因拒绝了这位议员的无礼要求。他召集了一次地区和睦会议，印度人民党(BJP)的巴尔德夫·普拉卡什，印度国大党(英)的赛瓦·拉姆和人民党的穆巴拉克·辛格，阿卡利党的巴汗·辛格等重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巴尔德夫·辛格博士激烈地抨击了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重申：“我们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必须停止这样的暴力行为。”心怀鬼胎的赛瓦·拉姆立即退出会议，只是在他的同伴告诉他“没有人谴责国大党，你走出会场行为无形之中表明你对此负

^①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 年，第 151 页。

有责任”时他才返回会场。^①次日这位警察主管被这个邦的两位国大党的领导人，前人民院议长古尔迪亚尔·辛格·迪隆和 R.L. 巴蒂亚召到巡回法庭。他们有礼貌地告诉他：“我们理解你正计划逮捕更多的人。请别这样，我们党正被暴露。”^②同一天赛瓦·拉姆赶往德里恼怒地大喊大叫，说他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并且除非将这位警察主管调走，否则他将永远不再访问旁遮普。结果这位议员如愿以偿。^③

1984年1月，阿卡利党发起了一场新的政治鼓动，早在1983年该党已经散发了一份名为“你欠公正”传单，其中说：“印度是一块多语言、多民族的土地，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一个像锡克这样的极小的少数民族，有着天生的预感……担心在压倒优势的印度教徒的海洋中他们将会失去他们的主体性，他们的疑惧因为印度宪法第二十五条武断地将他们界定为印度教徒而增加了。”^④印度宪法第二十五条是有关给印度全体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其中第二款注释(2)，将锡克教、耆那教和佛教都列入印度教的范畴。为了从政治上重新巩固自己，阿卡利党人提出了修改宪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注释(2)的要求。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阿卡利党提出新的要求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达成一个协定的看法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将这场运动的控制权从宾德兰瓦拉手中夺过来。^⑤

巴德尔·辛格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要求，巴尔万特

①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51页。

② 哈里曼迪尔·考尔：《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德里，1990年，第151页。

③ 附带提一下，1984年2月阿贾伊帕尔·辛格·曼因于1984年2月被调离旁遮普，并且在1985年1月4日被解雇。解雇的原因是根据印度宪法第311条第2款第3部分不用进行调查和指出任何理由即可解雇公务人员。

④ 《发言人》，1983年8月1日。

⑤ 《阿姆利则上空的蓝星》，第122页。

保持沉默，巴尔纳拉支持巴德尔。阿卡利党征询前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高等法院大法官 R.S. 纳努拉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宪法二十五条不存在任何模糊性。“因为在宪法第二十五条 (2)(b) 中, Hindu/Hindus 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古尔德夫·辛格法官也劝他们不要提出这个要求。他认为这是政府为阿卡利党人设立的一个陷阱, 以使他们孤立于反对党。但是当朗格瓦尔告诉他们图赫拉得到拉吉夫·甘地支持进行这样一个修改的保证时, 他们才又聚拢到一起。然而结果证明巴德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当他们焚烧宪法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反对党的支持。尽管政府后来宣布同意准备对它进行修改, 但是显然政府已经达到了毁损阿卡利党形象的目的, 特别是使阿卡利党的形象在反对党一落千丈。否则很难理解政府为什么不在阿卡利党进行鼓动前的 2 月 26 日进行这样的宣布, 反而要严密封锁去德里的道路。2 月 27 日, 巴德尔在德里一所锡克寺院前焚烧了印度宪法, 图赫拉和巴尔纳拉则在昌迪加尔以撕碎宪法文本的方式表示抗议。许多的阿卡利党人以他们的领导人为榜样, 都被政府逮捕监禁。3 月 30 日, 内政部长赛提才在议会宣布政府愿意修改宪法。甘地夫人表示政府准备“与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的锡克社团的代表和法律专家进行磋商, 以必要的修正案的方式消除锡克的这些疑虑”。^① 1984 年 5 月 11 日, 政府释放了所有与焚烧宪法鼓动有关的阿卡利党人, 并邀请锡克寺院中央管理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其考虑。其间阿卡利党人提出了制定单独的锡克人法的思想。但是他们与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还是以前的老问题。表面上, 这次政府是作出了让步, 特别是在旁遮普的昌迪加尔问题上。甘地夫人不再坚持她在 1970 年作出的用旁遮普的费兹尔卡和阿布哈尔两个行政区换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新德里,1984年,第84页。

取昌迪加尔的决定。只要将阿布哈尔城交给哈里亚纳即可。但是甘地夫人却要求在这个协定实施前，阿卡利党人方面需征得宾德兰瓦拉的同意，虽然她早已知道阿卡利党人与宾德兰瓦拉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政治取向。特别是在 1983 年 12 月之后，朗格瓦尔的阿卡利党已与宾德兰瓦拉反目为仇。在组织上朗格瓦尔成立了青年阿卡利党对付已经与宾德兰瓦拉结盟的全印锡克学生联盟。甘地夫人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她要通过此举向反对党和全国表明，旁遮普局势动荡的原因，责任在阿卡利党而不在国大党政府，让阿卡利党人承担所有责任，从而达到彻底击垮阿卡利党的目的。

在阿卡利党人不断进行鼓动的升级却又一无所得的时候，宾德兰瓦拉却不停地鼓吹通过暴力途径解决问题。他以颇具煽动性的言词打动锡克：“印度教徒正试图奴役我们，在新德里的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下，反对锡克人的暴行与日俱增，锡克人从未感到受到如此侮辱，甚至即使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国人统治时期也没有这样，对这种不公正，锡克能够忍受多长时间？”^①他又说：“显然，对所有的锡克而言——无论是生活在城市的，还是生活在乡村的——我们都是奴隶，并且想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自由，为此，武装你们自己，准备进行一场战争并且等待命令”，对于锡克要做什么，他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确，“我早已命令每个村庄推出由三个年轻人组成的一个小组，每人一支左轮枪，一辆摩托车。”“为了报复对锡克人的犯罪，需要建立摩托队。”^②而邦政府的做法无疑为宾德兰瓦拉的暴力宣传提供了养料。

1983 年 2 月发生的对锡克的暴力事件，以及警察对无辜锡克的暴行，更加助长了宾德兰瓦拉的暴力活动，1983 年 4 月 25 日歹徒在金庙枪杀了旁遮普的副总监察长、锡克教徒阿夫托尔·辛格。

① 库尔迪普·纳雅尔和库什万特·辛格：《旁遮普的悲剧》，第 73 页。

② 印度政府，关于旁遮普鼓动的白皮书，新德里，1984 年 7 月。

阿特瓦尔。从 1983 年 9 月起以不加区别的杀害印度教徒为特征的极端主义恐怖活动开始，恐怖主义者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在旁遮普的印度教徒中制造恐怖气氛，并使之从旁遮普大批迁出。如果这样的暴力行为引起对在旁遮普之外的锡克的报复的话，那只能导致锡克人从印度其他地方迁入旁遮普，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旁遮普成为一个真正的锡克邦。1983 年 10 月 5 日，6 位无辜的印度教徒乘客被锡克暴徒杀害，6 日政府对这个邦实行总统治理。但是情况并未好转，随总统治理而来到旁遮普的中央警察力量开始搜查武器和搜捕持枪歹徒。到 10 月底，他们仅在阿姆利则一地就进行了 300 多次突袭。但是伴随警察的每一次袭击而来的暴行，似乎只是肯定了一直流传的锡克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出生地也是奴隶的模糊的说法。^①从 10 月初到 11 月中旬，据报道有 4000 多锡克被捕。尽管如此，也无济于事，旁遮普的局势毫无改观。在总统治理体制下，邦长以及他的顾问们没有任何权力，事事得听从中央的吩咐，联邦内政部特别为旁遮普邦事务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英迪拉本人也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使得邦政府疲于应付。骚乱同样表明印度教徒在有组织地与锡克激进分子相互残杀。在 1982 年底，在帕提亚那成立了印度教徒自我防卫协会，到 1984 年 2 月，这个组织的支部已经在旁遮普许多城镇积极从事反对锡克的活动。^②

就是在宾德兰瓦拉不断进行暴力活动的情况下，国大党也还不断地派人与之接触，无形抬高这位极端主义分子的声望。可是到了 1984 年初这样的计划极有讽刺意味的一面终于表现出来。对于英迪拉·甘地向他发出的要他到新德里会商解决旁遮普问题的邀请，根本不屑一顾。宾德兰瓦拉狂妄地对一位记者说道：“他

① 《论坛》，1983 年 11 月 11 日。

② 《印度国际评论》，1984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1984 年 3 月 4—10 日。

们要我去德里，但是我拒绝了。让一个男人去见一个女人（指英迪拉）是不合适的，她应该来见我。”^① 宾德兰瓦拉还在金庙阿卡尔·塔哈特宫自设法庭，接受锡克民众的申诉，他通过电话给警察下达命令。阿姆利则的金庙俨然变成了另一个政府，一个宗教政体的政府。所谓养虎遗患，不过如此。

五、蓝星行动与英迪拉被刺

在旁遮普的政治事件中，英迪拉·甘地为了本党的狭隘利益目的，淋漓尽致地玩弄她的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对阿卡利党的温和派极尽打击之能事，拒绝与那些同执政党持相同看法的反对党合作解决旁遮普问题，发动一场反击恐怖主义的运动。另一方面，英迪拉又派人与宾德兰瓦拉进行接触，实际上给他以鼓励。她对宾德兰瓦拉的迁就和人为的拔高，导致以宾德兰瓦拉为首的极端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声势，以致最后发展到了连政府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手段进行控制的地步。当阿卡利党领导人朗格瓦尔宣布于 1984 年 6 月 3 日——锡克五世古鲁阿琼·辛格的忌日——进行停止粮食外运的鼓动时，英迪拉·甘地已经别无选择，不得不在旁遮普采取武力行动。

1984 年 6 月 2 日，英迪拉命令军队对锡克的圣地金庙实施代号为“蓝星行动”的军事行动，并向整个旁遮普派出 6 个步兵师，实行“蔷薇行动”，肃清旁遮普全境的恐怖分子。其中金庙是政府军进攻的重点，首先他们将阿卡利党所有领导人抓住监禁起来。但是经过几天激战政府军才最后攻占了金庙，击毙了宾德兰瓦拉和数百名锡克教徒。在那次攻击中，政府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有 83 名军队士兵被打死。然而，激烈的战斗也对金庙建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6 月 29 日，中央政府让旁遮普邦邦长辞职，加强对旁遮普邦的控制，整顿秩序。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84 年 5 月，第 33 页。

1984年7月10日,印度政府发布了旁遮普危机的白皮书,替军队在6月5日和6日进攻锡克教在阿姆利则的圣庙金庙辩护。白皮书追述了锡克教徒占少数的旁遮普邦内自从1981年来发生动乱的根源。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在1981年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印度放弃了将其作为旁遮普危机的替罪羊的做法。印度总统宣布旁遮普邦为受恐怖分子影响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有效期半年。1984年7月23日,印度政府宣布在三个司法区各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总统在该地区法令计划中具体规定的犯法行为。报告说,该法庭将用于促进审判治安部队逮捕和恐怖分子。这项总统法令包括武器法、炸药法,印度铁路法,破坏公共财产法,和其他法规中的有选择的犯法行为。在行政上,1984年7月19日,英迪拉·甘地重组内阁,让原外交部长纳拉西姆哈·拉奥出任内政部长,而原内政部长普拉卡什·昌德·塞蒂改任内阁不管部长。

印度政府进攻金庙并在旁遮普实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在锡克中引起很强烈的反响。长期以来英迪拉政府一直向广大锡克保证,政府决不进入金庙。就在这次行动之前,为了迷惑宾德兰瓦拉,也没有在舆论上造声势让广大锡克理解政府不得已而对金庙动武的苦衷。政府突然对这所锡克心目中的圣殿进行武装进攻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锡克人极为愤怒,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宗教反抗情绪。并且因为下列原因锡克与印度国家进一步疏远了。

首先,政府在对旁遮普进行军事行动时,也发起宣传攻势。通过政府控制的印度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锡克的神殿进行侮辱。政府广播电台声称极端分子在金庙中藏有最先进的武器,政府暗示报刊用通栏标题大幅刊登消息,说金庙内藏有大麻和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大量的妓女等等,事后又用极小号字体在报刊的中缝不起眼的地方刊登所谓的更正。这进一步亵渎了锡克对金庙的庄严神圣的感情。政府大肆报道锡克对国家的所谓的破坏行为,使得

整个印度教社会都认为该给锡克一个教训。其次，当阿卡利党和中央锡克寺院管理委员会要求政府将金庙移交时，政府坚持在金庙中留驻一部分军队。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政府却突然宣布让锡克尼奔派的巴巴桑托·辛格带着他的人进驻金庙，雇人重建被毁坏的阿卡尔·塔哈特宫。大多数人对此极为反感，因为根据锡克教传统，这些宫殿都是由锡克自愿参加劳动修建的。政府为了保证巴巴桑托·辛格合法性，还召开了所谓的锡克大议会，向参加这个会议的群众支付酬金，政府的拙劣做法更引起锡克社会的不满。锡克教教会发布宗教敕令，宣布将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和英迪拉内阁中地位最高的锡克人布塔·辛格开除出教。政府军在实行“蔷薇行动”中对广大的乡村锡克的暴行，也引起锡克的愤怒。政府军纪律败坏，将许多无辜的锡克青年抓入监狱，任意毒打，大肆勒索。有关人士回忆说，这个时候旁遮普从 14 岁到 30 多岁的年轻一代锡克几乎都消失了，他们要么被关押，要么作为“抵抗者”被杀死。虽然这其中肯定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旁遮普的军事恐怖确实让人触目惊心的。最后，就是对从军中逃出要保卫金庙的锡克士兵的态度。政府袭击金庙，在军队中引起锡克官兵的愤怒，许多地方锡克士兵闹事甚至发动兵变，最严重的兵变是在比哈尔邦的拉姆加赫锡克团队。在那里指挥官 S.C. 普利被打死。但 10 万锡克士兵中，参加哗变的不到三千人。^① 政府声称要对这些锡克士兵予以严惩，但是锡克社会特别是锡克高级将领都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对他们从轻处理，因为锡克的保卫宗教的情绪与政府在锡克军人中实行的宗教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政府没有做好解释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但他们的请求遭到政府拒绝。通过这次行动锡克与印度社会之间进一步疏远了。当印度教徒在

^①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中文版，施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328 页。

为肃清极端分子而欢呼，在阿姆利则大量慰劳军队时，一些锡克心中对英·甘地的仇恨急剧上升。

在国内其他地方，政府军袭击金庙的事件发生后，阿卡利党新德里党部的领导人，要求党员在表达对军队进攻金庙的极大痛苦时要克制，他们号召进行非暴力抗议。6月17日，新德里等地发生了锡克反对政府进攻金庙的行动，进行祈祷以示抗议。孟买和印度中部的锡克人也举行了抗议活动。北印度的许多锡克居民举行了和平示威。印度全国最高文学奖获得者库什万特·辛格，把获得的奖章退还给了总统宰尔·辛格，抗议军队毫无必要的褻渎金庙。在海外，1984年6月10日，在温哥华的15000多名锡克教徒举行示威游行。6月11日有2000多名锡克在纽约游行。1984年6月13日，自行宣布的卡利斯坦锡克共和国在伦敦建立总部，发行象征性货币和护照，并发誓向印度总理英·甘地报复。自命为总统的乔汉博士是一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医生。他承认在金庙袭击前，他只代表了住在国外的锡克人中很少的人。但是现在，“整个锡克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的要求是，不成立卡利斯坦决不罢休，不要求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是叛徒。”他也承认，没有任何政府承认他的“象征性”的货币。他还宣布了6名流亡内阁的成员：国防部长温达德·辛格·帕马尔，商业部长普莱尔·辛格，工业部长塔尔洛克·辛格，贸易部长达尔尚·辛格·赛尼，教育部长普里塔姆·辛格，体育部长希拉·辛格。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公开宣布要对英迪拉一家采取恐怖行动，并悬赏10万英镑要英迪拉的首级。

在旁遮普，起初由于自己的领袖死去而陷于混乱的锡克好斗分子并没有因为军队的行动而瓦解，相反他们不顾军警的镇压，又在乡村重新组织起来。6月24日，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再次发生暴乱。锡克极端分子还在7月5日、8月24日分别劫持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劫机者要求印度政府释放自6月军事行动以来政府逮捕的锡克人。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宗教，而不是为了赏

金, 1984 年 10 月 31 日, 英迪拉身边的两名锡克卫兵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枪杀了英迪拉。在作出这种举国震惊的暴行后, 本特·辛格对前来捉捕他的军警举起了双手:“我完成了使命, 现在随你们的便吧。”^①

英迪拉·甘地遇刺以后, 在印度各地出现了针对锡克的暴力浪潮。从新德里蔓延到哈里亚纳、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拉贾斯坦邦、马哈拉斯特拉邦以及西孟加拉邦, 印度教徒甚至对已经被开除出锡克教的宰尔·辛格总统进行了袭击。印度首都新德里遭遇到它自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谋杀、纵火和抢劫。据官方统计, 将近 2500 人(其中大部分是锡克教徒)被杀害, 其中许多人是被活活的烧死。有 5 万锡克人逃离本邦到旁遮普邦寻求避难, 还有 5 万人在德里仓促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寻求安全。^② 尽管有许多锡克人被他们的印度教徒邻居救出来, 对此他们感激涕零。但是绝大多数锡克教徒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愤怒。残杀、纵火持续了两天, 却极少见到警察出来干预。用于恢复秩序的军队也出现得很晚。民间团体的调查表明在德里的反对锡克的骚乱是国大党某些人有组织的进行的。公民自由人民联盟的调查说: “对德里及其郊区的锡克成员的攻击, 远不是政府所说……是民众对英迪拉·甘地之死的‘痛苦和愤怒的’自发表现, 而是最高层的国大党政治家以及管理机构当局有意识地……组织和计划的结果”。^③ 另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导, 在政府军重新稳定旁遮普邦的局势前, 北印度地区群体的暴力行动有增无减, 大约有 5 千多

^①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 中文版, 施美华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第 7 页。

^②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英迪拉·甘地传》, 中文版, 施美华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第 13 页。

^③ 公民权利人民联盟和民主权利人民联盟, 《谁是罪犯,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0 日德里发生的骚乱的原因和影响的联合调查报告》, 德里, 1984 年, 第 1 页。

名锡克人在这些暴力行动中丧生。^①

1984年11月，反锡克骚动之后，这个国家的普遍感觉是“锡克人活该如此”，“必须给锡克人一个教训”，此前一个“农夫”“士兵”和“小丑”的形象，被“一个潜在的杀手”和“叛国者”形象所代替。锡克形象上的这个变化，部分是由于锡克极端主义者的活动，更多的则是媒体作用的结果。^② 蓝星行动、蔷薇行动以及英迪拉被刺后发生的大规模的反锡克骚乱，使得锡克与印度教徒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大大加深了。

第五节 拉吉夫—朗格瓦尔协定与 总统治理的实施

旁遮普严重的政治危机导致的锡克民族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得印度政府和印度的各个党派冷静地考虑印度的前途，政治投机的政策不适用于民族国家中的政策实施。1984年11月1日，刚被推举为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和15位反对党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在国家遭受英迪拉·甘地悲惨去世带来严重损失的时刻，我们各主要政党的代表和政府，对在我国某些地区发生的毫无意义的暴乱深表悲痛。锡克人民从来就是印度人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争取自由和建立独立的印度的斗争中，锡克族人民都担负了光荣的责任，在加立安瓦拉·巴的斗争中，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的血曾汇流在一起。把一小撮误入歧途的人所犯下的罪行——不管如何凶残，——归咎于锡克族整体而施加暴力和侮辱，那是毫无道理的，也不符合我们容忍的美德。这种疯狂行为必须

^① 塔林·辛格：《恐怖笼罩旁遮普》，引自星期口泰晤士报，1986年12月7日。

^② 普里塔姆·辛格：《媒体的角色》，阿姆利克主编书，第156—157页。

立刻停止，我们呼吁各族人民，特别是政治活跃分子和公务人员，竭尽全力恢复理智，恢复平静。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印度必须珍惜自己的荣誉，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团结和完整，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公民的面前的光荣职责。”^① 11月4日，新德里主管治安首脑瓦加伊因未能有效制止甘地夫人遇害后出现的反锡克暴力事件被联邦政府解除了职务，由内政部副部长瓦利接任他的职务。1984年11月12日，拉吉夫·甘地在电台和电视台首次发表重要演讲：“我们国家的团结和完整是无比重要的，印度是不可分割的。非教族主义是我们国家的基石，它的含义不只是要求容忍，它要求为实现和睦而积极努力，没有任何宗教宣扬仇恨和不容忍。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煽动和利用教族情绪与暴力活动来分裂印度，用教族主义来对付教族主义只会帮助那些破坏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忙。人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就能挫败他们的阴谋。印度只有一个，它属于我们大家。”^②

1984年12月下旬，印度举行大选。在大选中，印度国家的统一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国大党鼓吹它是印度惟一能够保证印度稳定和团结的力量。由于对英·甘地惨死的同情，国大党赢得了许多同情票。国大党在508个议席中获得了403个席位，这是国大党自独立以来获得的席位最多的一次。然而这次选举不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经济纲领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们对于一个爆炸性政治形势的深深地不安和对稳定迫切渴望的基础上的。

在取得巨大的选举胜利之后，拉吉夫·甘地开始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从狭隘的政党利益角度考虑问题。此外，于1985年3月进行的11个邦和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的地方议会选举清楚地表明

① 《拉吉夫·甘地》，第44、45页。

② 《拉吉夫·甘地》，第45页。

虽然选民会不时地为对英迪拉的同情或者教派情绪所左右，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准备满足于包括国大党在内的任何政党开出的空头支票。国大党的新领导人没有自我陶醉的资本。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花言巧语是不可能解决它自己或者这个国家面对的问题的，也不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意识。国家整合和建设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印度这样一个民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面临的主要问题达成国家共识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看，解决旁遮普问题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鉴于旁遮普的正常政治进程的中断和它对于印度社会巨大的影响，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个人和社会集团也开始进行广泛的宣传，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主动采取行动解决旁遮普问题。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像由退休的中将贾格吉特·辛格·奥努拉领导的锡克论坛和以英德尔·古吉拉尔、库德力普·纳雅尔以及古尔巴昌·辛格领导的旁遮普论坛都起而宣传印度民主政治的实现是锡克的真正的使命。他们使锡克相信 1984 年的事件不是整个历史，只是印度民主政治中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从各个方向出现的标志。同时他们也提醒更大的社会集团，锡克正在为他们合法的权利和传统的尊严而斗争，他们信任印度的民主制度，相信印度应该能够重新信任锡克。

拉吉夫和他的顾问们也已经认识到使一个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的民族处于抑郁反叛状态中的危险性。作为解决旁遮普问题的第一步，拉吉夫·甘地任命富有才干的政治家，中央邦的首席部长阿琼·辛格担任旁遮普邦的邦长。阿琼·辛格得到拉吉夫的完全信任并且可直接与他联系。在中央，总理成立了一个由国防部长纳那西姆哈·拉奥、内政部长 S.B. 恰范和教育部长 K.C. 潘特组成的内阁特别委员会，协助他处理旁遮普问题。换句话说，是政治家们而不是政客现在控制局势，旁遮普问题终于有可能得到政治解决而不是通常的行政方式解决。1985 年 3 月通过一系列细心的协

调行动，印度政府开始打破僵局，与被监禁在狱中的阿卡利党温和派领导朗格瓦尔等进行秘密接触，不久在蓝星行动中被捕的阿卡利党领导人被无条件释放，政府也宣布废除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为非法组织的法令，并宣布对旁遮普提供一系列的经济援助和帮助。总理也降低了对阿兰德普尔决议批评的调子，并且宣布假如阿卡利党的要求是在宪法框架范围之内，政府愿意恢复同阿卡利党的会谈。1985年4月政府主动宣布任命一个司法调查团调查在德里发生的反锡克暴力事件。

就锡克方面而言，阿卡利党领导人在被释放之后，他们中间立即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由于在蓝星行动中向政府投降，他们在锡克民众中丧失了一部分影响力，相反激进分子的影响力则增加了许多。现在，他们被释之后首先是寻求重新获得这个社会群体的信任。阿卡利党主席朗格瓦尔一被释放，就去旁遮普旅行，对中央政府进行激烈的攻击，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对其反锡克政策负有全部责任。他拒绝批评锡克恐怖主义者，对英迪拉·甘地被刺杀一事拒绝发表评论，坚持中央政府应为攻击金庙一事而向锡克社会道歉。朗格瓦尔还提出，在中央政府与阿卡利党进行谈判之前，应该满足锡克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立即废除专门制定的审判有极端主义行为者的一系列司法程序，撤消反恐怖主义立法，释放所有被监禁的锡克，并允许从军队中逃走的锡克回到部队中去。对于他曾经驳斥过的一个单独的卡利斯坦国家的要求，朗格瓦尔也改变了腔调，他宣称：“我们不想要一个单独的国家，我们自己不想从这个国家中分离出去，……但是如果政府迫使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将予以考虑。”^① 阿卡利党的领导人贾格德夫·辛格·塔尔万迪在被释放之后，要求中央政府接受阿兰德普尔决议，并要求给予旁遮普以自治地位。塔尔万迪将自己打扮成

^① 《星期天》，Vol. 12, No. 21, 加尔各答，1985年。

宾德兰瓦拉的继承者。他还对朗格瓦尔发起攻击，指责他在金庙攻击开始时就向政府投降是一种怯懦行为。他还将宾德兰瓦拉吹捧为锡克教的殉道者。锡克中央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图赫拉被释放后，则向锡克社会提议将由政府出资重建的阿卡尔·塔哈特宫毁掉，因为这不符合锡克的传统，不是由锡克自愿去完成的。

阿卡利党领袖的好斗形象上的竞争给锡克政治带来了一个新的人物。由于每一个阿卡利党领导人都寻求宾德兰瓦拉的父亲——已经年逾八旬的巴巴·乔金德尔·辛格形式上的支持，使他迅速成了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1985年5月巴巴·乔金德尔·辛格宣布既然朗格瓦尔和塔尔万迪都寻求他的干预，他决定解散阿卡利党的两个派别，成立联合阿卡利党，并宣布这个政党将由一个9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管理。他除了任命朗格瓦尔、塔尔万迪、图赫拉以及曾担任过邦首席部长的巴德尔为委员外，还任命了几个有极端主义情绪的人为其成员。从这一任命看，很明显，他想成为继他儿子之后的锡克社会的救世主。除了塔尔万迪明白地表示欢迎成立这个组织外，其他阿卡利党的领导人则拒绝和联合阿卡利党发生联系。为了证实自己在阿卡利党中的实际影响，朗格瓦尔宣布辞去阿卡利党的主席职务，图赫拉宣布辞去SGPC的主席的职务，巴德尔也拒绝担任前阿卡利党议员的领导人。他们在锡克社会中制造的领导危机获得预期的结果。在他们作出上述决定的两个星期内，旁遮普的各个地区的贾萨达尔们、旁遮普之外的阿卡利党组织的领导人、SGPC执行委员会和前阿卡利党的议员们都举行了会议，请求他们的领导人收回各自的辞呈。当他们的眼前的领导地位的威胁被解除之后，阿卡利党领导人继续他们各自的努力，以巩固他们的地位。朗格瓦尔号召阿卡利党在1985年6月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和和平抗议，纪念金庙事件一周年。作为响应，联合阿卡利党宣布为在蓝星行动中的锡克殉道者哀悼十天。SGPC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要求政府为锡克庙产所受到的损失赔偿

100 亿卢比。同时它也指控蓝星行动的发动是“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执政地位的统治集团的秘密的政治动机造成的。”^①

在阿卡利党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时候，锡克极端主义者并没有蛰伏不动，暴力活动依然频繁发生。1985 年 3 月和 4 月在旁遮普发生了多起针对警察和执政的国大党成员的恐怖活动。1985 年 5 月，极端主义者在德里及哈里亚纳、拉贾斯坦和北方邦的城镇策划了一系列爆炸案。同月在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美国期间，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发现了一个刺杀他的阴谋，其中就有锡克极端分子介入。6 月，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发生意外，329 名乘客丧生。初步调查表明可能是一颗炸弹爆炸，两个以加拿大为基地的激进的锡克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

阿卡利党领导人使用好斗姿态巩固自身地位的努力有可能再次导致锡克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又一次对抗。锡克恐怖主义的活动进一步增加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爆发大规模教派对抗的可能性。然而此时大部分阿卡利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进一步对抗的无效性和危险性。经过蓝星行动和蔷薇行动，他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暴力集团无论多么强硬都比不上国家机器。他们在发表激烈言辞的同时，也努力抓住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4 月 12 日晚，朗格瓦尔决定推迟新的斗争作为对政府宣布的让步的响应。朗格瓦尔重申了他对印度的统一和完整的信仰。同月，朗格瓦尔对德里作了亲善访问。他在 1985 年 5 月再次当选为阿卡利党领袖之后，宣布将在旁遮普发动一场“和平攻势”。表面上他在锡克人的要求上仍采取好斗的立场，但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逐渐缓解教派对立情绪。他表示阿卡利党的不满是针对中央政府的，而不是针对印度教社会的。他在旁遮普内外的一系列的公共集会上重申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和睦的重要性，批评锡克极端主义分子的

^① 《发言人》，1985 年 6 月 24 日。

暴力行为，并且反复宣布阿卡利党并不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家的要求。

中央政府对朗格瓦尔表现出来的温和迹象，迅速作出了反应，旁遮普邦长阿琼·辛格秘密接近朗格瓦尔，表示中央政府愿意就阿卡利党的要求恢复同它的谈判。7月份，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给朗格瓦尔一封信，建议俩人之间进行一次会晤。为了维系双方之间的脆弱的纽带，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接到总理提出的这个主动的建议不久，朗格瓦尔召集了一次有阿卡利党的各个行政区的贾萨达尔和前阿卡利党的议员参加的会议。在获得他们的支持之后，便前往德里和邻近的拉贾斯坦和北方邦旅行。他向那里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发表讲话，表示阿卡利党正在同中央政府在印度宪法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同时他坚持：进行任何谈判之前，应该释放被政府监禁的锡克，废除特别的司法程序。

作为对朗格瓦尔要求的回应，几天后旁遮普的邦长宣布释放600名被监禁的锡克，并且表示，政府将进一步释放其他没有受到严厉指控的被拘留者，中央政府打算限制使用特别的司法程序。于是朗格瓦尔接受了印度总理的进行一次会晤的邀请，1985年7月23日：朗格瓦尔和拉吉夫两人举行会晤，在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印度政府宣布印度总理与阿卡利党的主席之间已经就有关旁遮普问题达成了一个协定。朗格瓦尔随即宣布阿卡利党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时期已经结束。

根据1985年7月25日《印度时报》所载，这个协定包括11项内容。主要有下列几项：关于昌迪加尔和领土问题，昌迪加尔的首府工程地区将交给旁遮普，以前被并入中央直辖区来自旁遮普邦的说旁遮普语的地区将交给旁遮普，那些说印地语的地区则交给哈里亚纳。整个苏卡纳湖将作为昌迪加尔的一部分交给旁遮普。甘地夫人曾一直坚持当昌迪加尔交给旁遮普时，在旁遮普的一些说印地语的地区将交给哈里亚纳，这次协定规定政府将任命一个

委员会讨论哪些地区要交给哈里亚纳，还规定以村庄为单元的领土接壤性和语言一致性将是作出这种裁定的依据。这个委员会将在 1985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报告。该报告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昌迪加尔和旁遮普的印地语地区的移交将在 1986 年 1 月 26 日同时进行。对现存的旁遮普和哈里亚纳边界的要求和反要求，政府将任命其他的调查团来考虑这些事情，并做出调查结果，同样其决定对有关各邦都有约束力。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阿卡利党宣布阿兰德普尔决议的要求是完全建立在印度宪法的框架之内的。这个决议的目的是要求给各邦提供更大的自治以加强这个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因为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是国家主体性的基石。联邦政府对此表示认同。关于河水的分配问题，旁遮普、哈里亚纳和拉贾斯坦的农民们将继续从拉维一比阿斯河中得到不少于 1985 年 7 月 1 日使用的水量。供德里消费的河水量将不受影响。旁遮普和哈里亚纳对剩余的河水的要求将交给一个由高等法院的法官为首的仲裁法庭予以处理。这个仲裁团的结果将在 6 个月以内作出，对各个集团都有约束力。关于 SYL 运河(连接朱木拿河和苏特里季河的运河)问题,规定运河的建设将继续进行,在 1986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关于全印锡克寺院法问题:印度政府同意考虑制定一个全印锡克寺院法,在同阿卡利党和其他相关的集团进行协商和完成所有相关的法律程序之后将提出立法。对于军队的征召原则问题:重申国家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被征召入伍,选择的标准将继续基于军事价值标准。协定的其他方面包括给予那些在鼓动中给被杀害的无辜的居民家属以抚恤金,对于财产受到损失的也将得到补助。还规定将兰加纳特·米什拉的调查团对德里 11 月份的骚乱的调查范围扩大到将博卡劳和卡普尔。对于金庙事件后那些受到指控的锡克军人,将努力对他们进行重新安置,提供有报酬的工作。撤消在旁遮普使用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现存的法庭将只审判与发动战争和劫机有关的事件。总理将写信给各个

邦的部长们重申所有有关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指示。中央也将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旁遮普语的发展。^① 协议并没有涉及到阿兰德普尔决议中有关争取给锡克人特别地位的问题。

从协定的内容来看，这个协定本身是建立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的，没有根本偏离双方早已公开宣称的立场。与原先谈判的一揽子内容相比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斯瓦兰·辛格和反对党及其他热心解决旁遮普问题的人士都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然而主要是由于甘地夫人不断地违背诺言而没有达成协定。甘地夫人过分担忧一旦接受这些要求将会被看成是在奉行暴力的阿卡利党的策略面前屈服，从而失去旁遮普、哈里亚纳、喜马偕尔邦和邻近诸邦的印度教徒的支持。另一方面阿卡利党领导人同样诡诈不实。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不时掺杂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极端因素。他们更多地关注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不是社区或者国家的福利。^②

旁遮普协定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印度各个阶层的欢迎。它有助于旁遮普邦民主进程的重建。这既符合国大党的利益也符合阿卡利党的利益，更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朗格瓦尔成功地说服了阿卡利党大会批准了这个协定。

但是使这一协定得以成功的秘密谈判却遭致了未参加谈判的阿卡利党的政治家的不满。前阿卡利党的首席部长巴德尔称这一协定是一个“背叛”行为。并称他对这一协定的每一个条款都不满意。^③ SGPC 的主席图赫拉宣布朗格瓦尔的做法好像是对其他锡克领导人的不信任。联合阿卡利党也对这个协定表示强烈地反对，认为自己才是惟一有资格就锡克人的要求与政府进行谈判的组织。巴巴乔金德尔·辛格宣布朗格瓦尔由于单方面与印度政府

① 《印度时报》，1985年7月25日。

② 阿马尔吉特·S.纳朗：《民主发展和扭曲》，新德里，1986年，第164页。

③ 《印度快报》，1985年7月27日。

谈判而成了锡克社会的“叛徒”。乔金德尔的支持者与朗格瓦尔的支持者在阿姆利则发生了暴力冲突。一面绘有卡利斯坦标记的旗帜又一次在金庙建筑上空飘起。

对于如何应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挑战这一现实问题，在拉吉夫——朗格瓦尔协定中没有涉及到，这是这一协定的一大遗憾。1985年8月20日，朗格瓦尔被刺表明极端分子决心使旁遮普的混乱局势继续下去。然而拉吉夫——朗格瓦尔协定的签订已经给了极端主义者一个初步的打击，而1985年的选举又给他们更进一步的打击。尽管朗格瓦尔被杀，但是政府和包括阿卡利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支持如期进行选举，选举中，竞争每个席位的平均人数比1980年竞选时还要多，有832位候选人(包括30名妇女)竞争邦立法会议的117个议席，有74人(包括6名妇女)竞争人民院的议席。在通常情况下，出现如此众多的竞争者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它更可以表明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尽管巴巴乔金德尔·辛格的联合阿卡利党号召锡克抵制选举，仍然有高达6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比1977年和1980年都高。^①选举的结果阿卡利党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席位，并且组成了以巴尔纳拉为首的旁遮普的邦政府。同时为了维持旁遮普的社会治安，中央政府还在旁遮普派驻了6万正规军，12.5万名准军事人员。巴尔纳那上台后，为了获得各个派别的支持，在自己的政府中还任命了少数阿卡利党外人士，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邦政府成立后，内部矛盾重重，同时他还面临恐怖主义分子威胁，由于新政府成立后，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满足锡克人的要求，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旁遮普与拉贾斯坦入哈里亚纳邦的纠纷。因此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种委员会和协调小组，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这再度刺激了锡克极端分子，全印锡克学生联盟还指定5位锡克高僧组成一个管

^①《印度国际评论》，1985年10月12日。

理委员会负责管理金庙的宗教事务，巴尔纳拉于是派警察进入寺院重新恢复了锡克寺院中央管理委员会的权力，锡克分子极为不满，他们枪杀屠夫，捣毁酒店，关闭理发馆，甚至还与印度教准军事组织湿婆军发生武装冲突。1986年夏天，旁遮普军警在与锡克教极端分子的冲突中打死38名恐怖分子，逮捕了744人，缴获各种武器1500余件，即便这样也未能阻止极端分子的暴行。报英国《卫报》1986年9月30日统计，在1986年的前9个月，共有500人被极端分子杀害。德里怀疑巴尔纳拉的工作能力，于是在1987年7月宣布在旁遮普实施总统治理。

尽管旁遮普阿卡利党邦政府组建不久就因其内部的派别斗争、拉吉夫·朗格瓦尔协定未能如期实施，以及旁遮普对政府允诺的对有关事务的调查和裁决的结果不满而垮台，并且因为锡克激进分子的暴行，又一次实行了总统治理，在旁遮普全境实施名为“霹雳行动”的警察行动，在旁遮普全境派驻了大量的军队警察和后备役部队，旁遮普局势一直未能改观，这次总统治理长达58个月。在拉吉夫·甘地1989年大选失败，人民党上台之后，旁遮普的局势依然没有改观，旁遮普的总统治理一直延续到90年代拉奥执政为止。

第六节 改革进程的全面启动与 旁遮普民主进程的恢复

一、印度政党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及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响

1985年，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执政后不久，由于无法解决印度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影响很快下降。在国内，他没有能实施与东北各邦达成的协议，以至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宗教上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让步通过伊斯

兰教法，向印度教徒重开巴布里清真寺，打开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冲突的又一个潘多拉盒子，博福斯军火案玷污了他作为清廉先生的形象，贸然出兵斯里兰卡使印度国际形象受损，种种因素使拉吉夫·甘地没有能够赢得 1989 年的大选。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只获得了 39% 的选票和 36.8% 的席位（人民院 525 席中的 193 席），上台执政的是由许多党派组成的全国阵线。具体说它是由人民阵线、人民党和民众党成立的新人民党和国大党（社会主义派）、泰卢固之乡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阿萨姆人民联盟组成的，全国阵线获得了 21% 的选票和 27.2% 的席位（143 席）。在印度人民党（此次选举中它获得 88 席）和印度共产党（32 席）的支持下全国阵线取得了执政的资格。但是由于全国阵线内部派系之间纷争不断，先后换了两个总理都没有能够干完四年的选举任期。维·普·辛格任总理后虽然亲自去金庙视察，并改组了处理民族和教派问题的全国统一委员会，力图打破旁遮普政治的僵局，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1990 年 11 月他就下台了。接着在国大党支持下执政的谢卡尔政府更没有任何解决国政的能力，由于国大党很快撤消了对他的支持，谢卡尔执政时间加起来还不到 4 个月，然后就成为了看守内阁的总理。

1991 年 5 月印度再次进行大选。这次国大党获得了 38% 的选票，获得人民院议席 227 个。印度人民党获得 119 席，1992 年 8 月通过补缺选举和旁遮普的选举，加上其他议员的投票，国大党的席位增加到 251 席。这次国大党以微弱的优势取得组阁的权利，纳拉西姆哈·拉奥组建了又一届国大党政府。但大选已经表明国大党已没有赢得压倒优势的选票的能力，自 8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有着浓厚印度教色彩的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已经在全国逐步有了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能力。地方性政党力量进一步增强。印度政党政治的新格局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终于形成，国大党已经彻底衰弱，再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印度建立起一

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无论是国大党执政，还是其他政党的执政，都要得到地方政党的支持，在地方党支持下的联邦政府不可能像以前的国大党那样，对各个邦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是在各个方面与地方性政党达成妥协，给各个邦更大的自主发展权力，各个地方政党的实力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地方各邦的政治关系大为缓和。

1996 年印度大选结束后，选民选票分散化的现象更为明显，没有一个政党得到人民院半数的选票。国大党只得到人民院 136 席，印度人民党得到 160 个席位。印度人民党组阁失败之后，德维·高达领导的 13 个小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人民院中只有 190 席）在国大党的支持下执政。至于这个阵线的性质，该阵线的领导人莫汉在印地语报纸《先锋报》上说，联合阵线代表的是与工业大都市根本不同的边缘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众。高达本人来自印度南方卡纳塔克邦，是印度第一个不讲印度的国语印地语的总理。在担任总理之前任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没有从事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经验。他的政府内阁成员中有一半来自南方，有三名穆斯林少数民族，一名锡克少数民族，其他大部分部长都属于在社会上受压迫的中、低种姓。1999 年印度大选，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改革开放的路线没有变化，并且进一步加深。德维·高达执政后也曾经发誓要给各邦以更多的权力。印度人民党虽然主张加强中央的权力，但是由于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不占多数，对于各邦有关更大的发展空间的合理要求也表示认同。

二、经济战略的变革对全印经济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实行的僵硬的发展模式，终于走到了尽头，代之以新的自由经济的发展战略。

但是虽然印度自 80 年代初在英·甘地的领导下已经进行了经济调整，到拉·甘地执政时进一步深入，但是改革刚开始不久即因

拉·甘地因卷入一起受贿丑闻而停滞下来。这种经济调整还没有触及印度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到 1991 年拉奥执政时，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苏联的解体，廉价的石油来源中断，印度人从海湾国家每年汇入的 20 亿美元也失去了。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印度经济濒临崩溃。纳拉西姆哈·拉奥的国大党政府上台执政后，对印度政府长期以来执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管理体制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改革是围绕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基本点进行的。

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混合经济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把半封闭的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政府基本上取消了沿用达 40 年的工业许可证制度，除了少数战略性的工业、有关国家安全的工业、关系到环境保护的工业，以及豪华消费品工业外，所有工业的开业都不需要申请。修改垄断法，政府对私人财团的财产不再过问。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缩小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明确规定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将是战略工业，高技术工业，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改革银行系统，允许私人开办银行。放弃过分强调的“自力更生”的政策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实行新的外资管理政策。降低关税，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刺激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速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使印度经济向国际化转轨。虽然受到一些阻挠，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没有变。1996 年国大党在竞选中失败，支持德维·高达执政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新政府不能从他开创的改革进程上后退。高达本人及其内阁成员也多次表示，要继续推进改革。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对于印度经济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政府决定优先发展农业。继“绿色革命”和“白色革命”之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印度政府又大力推行“蓝色革命”，发展水产业。1989 年 12 月 2 日人民党领导人维·普·辛格出任总理后宣布其工作重点为大力发展

农业,政府计划将 50% 的财力用于农村。拉奥政府更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实施有效的信贷政策,为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提供及时充足的资金。对实施特殊计划地区,如豆类、特种水稻和国家油菜籽开发区,政府更是给予大规模的信贷支持。1991—1992 年度,农业信贷增长 8.4%,1992—1993 年度增长了 9.5%,1993—1994 年度增长了 20%。多年来为了补贴城市消费者而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的印度政府,把支持农产品的价格猛然提高了 50%。其次,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中央和邦政府取消了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提高了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和收购价格,以补偿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政府还增拨 4000 亿卢比作为肥料补贴,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高达表示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上,意味着政府将在化肥、电和水方面增加补贴。

经济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本地企业大量增加。大量的海外资本流入印度,70 年代离开印度的美国国际商用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又回到了印度,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公司都准备在印度投资办厂。1991 年到 1992 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 0.9%,到 1994—1995 年度达到 5.3%,1991—1992 年度印度工业还停滞不前,1994—1995 年度增长达到 8%。就业人口 1991 年增加为 300 万人,1993—1994 年度增幅达 600 万人。在农业领域,以对印度经济影响极大的粮食生产为例,1991—1992 年度印度粮食产量为 1.68 亿吨,1993 年粮食产量达到 1.75 亿吨,比 1992 年增长了 4%,到 1994—1995 年达到 1.85 亿吨。由于政府不征收农业税,因此农业如果每增长 1%,那就会将 10 亿美元的收入放到农户手中。1991—1992 年粮食储量为 1390 万吨,1995 年 1 月为 3000 万吨。

三、宗教问题上的波折起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印度的经济经过改革调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宗教方面,教派政治的因素仍很

强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

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通过了向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让步的穆斯林离婚法。他重新开放了极具争议的巴布尔清真寺。通过后者，他打开了印穆冲突的又一个潘多拉之盒。印度人民党一次次利用重建寺院的鼓动，唤起占印度人口 82% 的印度教徒的支持，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捞足了相当的政治资本。今天在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依政府就是这样一步步赢得印度教选民的支持，最终成为印度政坛上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政党的。印度教派政治的盛行，为印度宪法中世俗主义政治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四、旁遮普经济的发展与民主进程的恢复

印度政坛政党政治的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对印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央新执政的地方党或者原先在印度执政的现在只有在地方政党支持下才能执政的国大党，对地方邦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大发展权的要求，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这对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极为有利。加上中央对旁遮普极端分子的有力打击，旁遮普长达 5 年之久的总统治理有了尽头，1992 年拉奥政府宣布在旁遮普邦举行邦议会选举。尽管阿卡利党中的极端派别仍号召锡克选民抵制选举，但并没有得到多少锡克的响应。相反，锡克人这次投票率相当高。包括阿卡利党温和派在内的许多政党都参加了竞选。最后国大党赢得了邦议会选举的胜利，组建了旁遮普邦政府。邦政府建立后，旁遮普邦内仍不时有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一些知名的锡克政治家也被锡克极端分子刺杀。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了整个锡克社会的谴责。阿卡利党内仍然派别林立，没有形成一股有力的合力。

旁遮普锡克人问题最终得以消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旁遮普新的经济机会的降临。锡克人要求的中心内容就是经济问题。旁遮普经济的特点是工农业生产的不平衡。绿色革命使旁遮普成了

印度最富庶的邦之一。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农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利润率降低。80 年代种小麦的实际利润只有 70 年代的 1/3。另一方面旁遮普工业落后,到 80 年代中期工业生产总值仅占该邦生产总值的一半。大大低于全国的 77% 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旁遮普的工业无力吸收因农业生产力提高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该邦失业人数增加,这是造成旁遮普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拉吉夫·甘地上台执政以后,逐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为了解决农业停滞不前的问题,1985 年 11 月旁遮普政府专门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农业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旁遮普农业的出路在于多种经营和发展食品加工业。“只有将目前用于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的 1/5 改种其他作物,多种经营的效果才会明显。”至于发展食品工业,报告认为更是当务之急。旁遮普生产的小麦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23%。但是该邦的面粉加工能力只有全国的 4%,该邦棉花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1/4,但是全邦几乎没有棉纺厂。因此农业专家 S.S. 乔尔指出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应依照日本模式,在农村建立食品加工厂,使 85% 的农户可以用部分时间耕作,在非农业劳动中取得 3/4 的收入。这样既可以吸收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也可解决受过教育的青年的失业问题。还可缓解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压力。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旁遮普的工业企业的资助,项目分配上也给予一定的优先,使旁遮普的工业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6 年 5 月旁遮普邦正式向中央提出成立一个由旁遮普邦农业企业、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和塔塔财团的 VOLTAS 公司三家组成合股公司,利用旁遮普的资源和劳动力加工生产和出口食品和饮料。这一建议于 1988 年 2 月被政府批准。根据可行性报告,新的合股公司每年可以消化和加工 12000 吨蔬菜和水果,占旁遮普蔬菜和水果产量的 1/4,并可直接或间接为该邦提供 25000 个就业机会。旁遮普经济也因此在这种大气候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入 90 年代旁

遮普经济发展更是迅速,1996—1997 年度人均国民收入以时价计算为 1.82 万卢比,邦国民生产总值 1996—1997 年度以时价计为 4644.4 亿卢比,1996—1997 年邦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6.76%,1992—1993 年度到 1996—1997 年度间邦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4.81%,农业和畜牧业占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2.0%,工业在邦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 24.6%,服务业占邦国民收入的比重为 33.4%。旁遮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远远高于印度平均水平。旁遮普的农场主和富裕的农户都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机会。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理由跟在极端分子后面与政府对抗。

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的坚决打击下,锡克极端分子在印度国内已没有多少活动的余地,纷纷转移到海外,企图依靠海外锡克人以及对印度有偏见的外国政治家的支持。但是经过印度政府的努力,在海外锡克较为集中的国家里,这些国家政府都表示不会允许本国成为这些极端分子反对印度的基地。由于锡克恐怖分子和各种物资大部分是从巴基斯坦入境的,印度还同巴基斯坦达成了一个协议,巴基斯坦也表示不会支持任何旨在反对新德里的恐怖活动。虽然印度海外锡克人还有一部分人支持建立锡克斯坦,而且这些人还相当有实力,但是他们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只要印度政府政策得当,它就不会在印度国内赢得多少支持者。1995 年 8 月锡克极端分子还暗杀了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这表明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仍在进行,但是这种恐怖活动得不到所有锡克的认可,极少数恐怖分子的活动已经不能对旁遮普的政局发生任何重大的影响。旁遮普政治已经走上了正常的政治轨道。

本章分析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变化所导致的政治文化的衰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各种教派势力的兴起和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后者还

在力量进一步壮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出了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要求，这一切使得英迪拉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旧的国家整合方式遭遇了新的挑战。但是英迪拉并没有随时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式，旧的政治方式依然在运行。印度国大党和在野的阿卡利党内部以及他们之间的不恰当的利益冲突，助长了宾德兰瓦拉为代表的锡克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最后导致了旁遮普悲剧的爆发。80年代旁遮普锡克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独立以来印度政治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新的印度执政党的领导人和在野党的领导人都没有很好地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英·甘地的国大党实用主义的执政方针和惟权是图的政治哲学，导致了它对旁遮普政治的极不严肃的玩弄，而阿卡利党人的非理性的政治鼓动方法以及锡克原教旨主义派别的相互竞争导致了1984年锡克人悲剧的发生，也是英·甘地的个人的悲剧和印度国家的悲剧，拉吉夫·甘地—朗格瓦尔的协定的订立，至少在政治上使旁遮普回到政党民主政治的正常轨道中，而印度政党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和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彻底变革使得旁遮普原有发展上的主要的障碍得以消除，从而使得旁遮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结 论

本书从民族国家现代发展与整合的角度探讨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民族，在现代发展中与中央关系上如何形成下列矛盾：在语言、文化与宗教等民族特性的保持和发展上与印度教文化为主体的印度文化以及印度国家的世俗主义文化和民主政治政策上的矛盾；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权与中央为了巩固国家的整合与统一所追求的偏向于中央集权的矛盾；发展本民族地方经济与印度国家从总体大局考虑实行的综合平衡发展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发展为地方民族主义利益与中央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以及矛盾怎样得到最终缓和的历史进程。通过对独立前后的印度及旁遮普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全面研究后，作者认为独立后印度旁遮普的锡克地方主义势力的兴起乃至恶性膨胀一方面有历史的积淀因素，更多的是独立后多民族国家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机制出现不协调，并且长期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的结果。

从整体上看，旁遮普问题是多民族国家独立以后自主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多元文化集团之间的利益整合与发展的问題。锡克民族与印度其他的民族相比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民族，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他们长期生活在旁遮普地区而形成的地方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的特质基本上包含于锡克教这一宗教之中。这种文化体系在近代发展过程中，随着英国殖民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以及旁遮普地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复兴过程中过分的教派行为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形成了近代锡克民族意识，并因为锡克民族对

民主政治的参与而进一步得以强化。作为印度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锡克民族有权保持它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民族国家的整合过程并不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消灭和吞并，而应该是一个相互融会共同发展的过程。在印度独立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中央政府，没有履行印度国大党在独立以前对锡克社会的承诺，坚决反对锡克人的语言邦的要求，这主要是他对教派、民族或者种族方面的认识上有偏差，没有认识到宗教教派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和印度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否定印度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认为印度只有一个民族。这种思想事实上来源于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心理。而这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是来源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穆斯林联盟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所谓的两个民族的理论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源于印度国家的领导人害怕一旦承认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么这个独立的国家内各民族的领导人会提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要求，从而导致印度再度分崩离析和巴尔干化的危险。印度国家的领导人坚持的印度是一个民族的理论的做法事实上是民族理论上的鸵鸟政策。英迪拉·甘地对旁遮普语言邦的认可本质上也不是出于对锡克民族的正确认识，而是源于她本人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需要。当锡克民族在80年代初提出进一步的自治权要求时，她也就不可能进行全面科学地分析和考虑。多元民族国家的整合是一个发展的变化的过程，每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对某些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多民族国家的组成只有在各个组成民族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从具体的问题来看，在行政区划和人口分布上，1947年的印巴分治，原有的旁遮普地区被一分为二。分治时剧烈的教派冲突形势使得原先分散地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锡克人几乎全部迁徙到印度境内。锡克民族大量居住在旁遮普邦形成了民族人口前所未有的集中，1966年旁遮普语言邦的建立又使得锡克民族成了新的旁

遮普邦居民人口的多数，为锡克人以后提出各种要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上，印度国家在旁遮普大量投资兴修水利，推进绿色革命，使旁遮普很快成了印度的粮仓的同时也成了印度最富庶的邦之一。在此过程中旁遮普主要以农业经营为主的锡克贾特农民中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农业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业经营者阶层，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的阿卡利党也因应这个势力的需要而不断提出新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绿色革命势头衰落之后，新兴的农业资产阶级需要继续维持原有的经济繁荣和丰厚的收入，要求国家在农业上继续给予优惠政策，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还要求投资发展工业企业，然而由于国家实行工业许可证制度，原有的印度资产阶级力图保持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新兴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得到新的工业企业许可证。同时由于旁遮普紧邻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以及客观的资源条件限制，国家一直将旁遮普作为一个农业产品生产基地发展而缺乏对其工业发展的积极投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国家统得过多过死的呆板的经济政策缺乏新的投资场所。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中央制定的发展政策逐渐产生矛盾并且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

在政治上，旁遮普与印度联邦中的其他各邦一样，在印度独立以后不久就要求打破印度原有的联邦体制给予各邦以更大的自主权，改变名为联邦制度实际上中央独揽大权的局面。作为地方性政党，阿卡利党和印度其他地方性政党一样，在全国执政的机会微乎其微，在地方上执政的机会就大得多，这样只有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这种地方性政党才可能更多地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是过度集权的联邦体制，使得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问题时偏向在联邦执政的政党，当其在某一个邦失去执政机会时，可以以种种借口在地方发展项目、资金分配上等诸多问题上刁难地方政党，使得地方政党在任期内毫无作为，从而削弱地方政党的政治影响力。

更为恶劣的是自 1957 年国大党通过不正当手段行使中央权力搞垮通过正当的宪政选举产生的印度第一个非国大党执政的邦政府——印度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政府之后，在中央执政的全国性政党，主要是国大党，屡次过度行使总统治理权力解散地方的非本党执政的政府。这样在事实上留给地方政党的活动空间极其狭窄，地方性政党的政治生命力也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促使地方性政党与中央矛盾加剧，要求给予地方更大自治权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而作为地方性政党阿卡利党则在这一问题上又赋予它以地方色彩，利用旁遮普地方锡克人曾经提出的锡克家园的口号要求给予地方邦以更大的自治权。我们不否认有一部分锡克极端主义者有分离主义倾向，但是这只是锡克民族中的极少部分，况且在 80 年代后期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政府的不恰当的政策造成的，当时执政的国大党应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文化、语言和宗教问题上，印度既存在多种宗教、语言文化，其所处相对地位也不同，就有个共同发展和协调的问题。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奉行多种文化共同发展和世俗主义政策，并使世俗主义政策成为印度政府的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出于多种考虑印度政府并没有能够完全地实行这些政策和规定。例如在语言邦问题上，就没有主动实施它在独立前一直鼓吹的语言邦政策。在国家语言问题上也与地方上发生矛盾，引起地方上的不满，并引发许多地区的语言骚乱。印度政府虽然高举世俗主义的大旗，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主张政教分离，各个宗教一律平等，国家对不管是占全国人口达 82% 以上的印度教还是占全国人口 13% 的伊斯兰教徒，或占人口不到 2% 的锡克教徒都要一视同仁。但是，在实践上存在不少问题。在印度这样一个信教人口几乎达到 100% 的国家里，宗教影响无所不在，在印度教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不能把世俗化简单地等同于不考虑任何宗教的影响。诚如研究印度社会的王树英先生在《宗教在

印度社会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说：“当我们了解印度社会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明和文化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①在对各种稀缺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宗教极容易为人们所利用，现代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锡克教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基督教传播、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复兴运动的矛盾与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宗教为意识主体的锡克民族教派情绪本来就很强烈，加之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剧烈的教派冲突和英国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教派情绪更加浓厚。锡克教徒将锡克教看作是其民族精神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任何细微的触动都被看作是不可容忍的侵犯。由于独立之后印度各个政党包括国大党，都在不同程度地在选举中利用宗教，而这一点在旁遮普的政治中又极为明显，这就给了锡克民族的政治家们将锡克教教义中宗教与政治不可分之说发挥到极致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得整个旁遮普危机笼罩在一片宗教的阴霾之中。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执政党应该考虑地方上的利益，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应该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对少数民族、少数教派尤其要进行适当的照顾。如果不给他们一定的照顾，片面地强调小民族与大民族的平等，往往是小民族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像阿卡利党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政党，也应该注意到，在提出的合理性的要求一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应该动辄拿民族的宗教感情作为获得要求的砝码，那样不但会纵容教派势力的发展，自己也会成为教派势力的俘虏。世俗的问题还是应该在世俗的范围内解决。不能将风马牛不相及的问

^① 王树英：《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南亚研究》（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1994年，第3期，第47—50页。

题扯到一起，那样只会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与事无补，于民族于国家都没有好处。

因此，我们在分析旁遮普危机问题时，看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分离主义或各种单个的问题，而是印度这个多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发展中，即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幅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图像。这些问题本身是由现代发展所引起的，绝大部分也可以通过及时调整发展政策和规划，重新划分社会各阶层各政党的权益要素而得到解决，但是倘若政府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地方提出要求的方式不妥，则会使矛盾加深、激化、爆发以至于阻碍地区的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旁遮普危机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于教派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而是锡克民族与中央执政党间矛盾冲突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值得借鉴，对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各国都具有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一:报刊杂志

- 1) Economic and Politic Weekly, Bombay
- 2)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Weekly) Hongkong
- 3) Hindu International Edition (Weekly) Madras
- 4) Indian Express (daily)
- 5) India Today (Fortnightly) New Delhi
- 6)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 Bombay
- 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Ann Arbor Michigan)
- 8)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rporate Politics, (three times a year) London
- 9) Modern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Cambridge, England
- 10) Overseas Hindustan Times (Weekly) New Delhi
- 11) Sydney Morning Herald (Daily) Sydney Australia
- 12) Tribune (Daily) Chandigarh
- 13) Times of India (daily) New Delhi and Bombay
- 14)《南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 15)《南亚研究》,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 16)《参考资料》,新华通讯社

二:中文书目

- 1.《英迪拉·甘地》,李连庆,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8年
- 2.《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高鯤、张敏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

3. 《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经济发展史》(美)弗朗辛·R. 弗兰克尔(孙培均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9 年
4. 《印度近现代史》, 林承节,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5 年
5. 林承节,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6. (印)拉达尔·达特等(雷启怀等译), 《印度经济》(上下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 1994 年
7. (巴)G. 阿拉纳(袁维学译), 《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83 年
8. 孙培均(主编), 《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1 年
9. (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施美华等译), 《英迪拉·甘地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 1992 年
10. (印)波奇帕达斯(夏南译), 《甘地夫人传》, 国际文化事业公司, 台北, 1984 年
11. (法)渥太黎(凌西译), 《甘地夫人传》, 香港中流出版社, 台北, 1987 年
12. (日)大石悠二(林泽文译), 《权利的恶果——甘地夫人政权败坏史》, 林西出版社, 台北, 1980 年
13. [印]贾·尼赫鲁, 《尼赫鲁自传》(张保芳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 1956 年
14. (俄)列宁, 《民族问题》,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54 年
15. 阮西湖〔主编〕, 《外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时事出版社, 北京, 1988 年
16. 刘兴武(主编), 《南亚民族问题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4 月
17. 肖宪, 《传统的回归,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

18. 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19. 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三:英文书目

1. Chib, Sukhdev Singh , Punjab , New Delhi, 1977

2. Ibbetson Denzit (1847—1908), Punjab castes; races castes and tribes of people of Punjab , New Delhi, 1987

3. Kapur Amp Chand , The Punjab crisis : an analytical study , New Delhi 1985

4. Kumar Pramed , Punjab crisis : context and trends , Chandigarh , 1984

5. Punjab Revenue Department, Punjab district gazetteers , Chandigarh , 1980

6. Barrier N Gerald, Punjab history in printed British documents : 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parliamentary papers and select, nonserial publications 1843—1947 , Columbia , 1969

7. Singh , Hari , Punjab peasant in freedom struggle , New Delhi 1984 V.2

8. Singh Amerik . ed , Punjab in India politics : issues and trends , London , 1986

9. Darling Malcolm Lyall , The Punjab peasant in prosperity and debt , London , 1928

10. Darling Malcolm Lyle , Punjab peasant life , New Delhi, 1928

11. Rai Satya M. , Punjab since partition , Delhi, 1986

12. Kaur , Amarjit, The Punjab story , New Delhi, 1984

13. Ali , Imran , The Punjab under imperialism 1885—1947 ,

Princeton, 1988

14. Johar Surindar Singh, The sikh religion , Delhi, 1988
15. Upindar Jit Kaur, Sikh relig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Delhi , 1990
16. Macauliffe, Max Arthur, THE Sikh religion; its gurus , social writings and authors in six volumes , New Delhi , 1978
17. Singh Jagjit , he sikh revolution;a perspective view, New Delhi , 1981
18. Kapur Rajir A, Sikh separatism: the politics of faith, London, 1986
19. Singh Hakam , Sigh studies in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printed books in English , Patiala, 1982
20. Singh Dharam, Sikh theology of liberation, New Delhi
21. Gough, Charles, The Sikhs and the Sikh wars, the rise, conquest and annexation of the Punjab state, Delhi, 1986
22. Mcleod. W. H. , The sikhs: history, religion and society , New York , 1989
23. Sandh, devinder Pal, Sikhs in Indian politics: study of a minority, New Delhi, 1992
24. Tatla Darshan Singh, Sikhs in North America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 New York , 1991
25. Grenal, J. S. , The Sikhs of the Punjab , Cambridge 1990
26. Singh Rajnant, The Sikhs ; their literature on culture history philosophy politics, religion and traditions , Delhi, 1990
27. Coie, W. Owen & Sambhi Piara Singh, The Sikhs ;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 London , 1978
28. Singh Khushwant, The Sikhs today 3rd. rev. New Delhi 1985 99p

29. Singh Nikky – Guniuder Kaur: Sikhism, New York, 1993
30. Cole, W. Owen, Sikhism and Christia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Basingstroke, 1992
31. Palanithurai. G. ed , Perspectives on India regionalism , Delhi, 1992
32. Mitra, Subrata kumar, Pow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local elites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India, London , 1992
33. Jain, Sumitra Kumar, Party politics and centre – state relations in India , New Delhi, 1994
34. Nayar, V. K. , Threat from within :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 New Delhi, 1992
35. Majeed Akhtar, Regionalism developmental tensions in India, New Delhi, 1987
36. Jeffery , Robin , What's happening in India? Punjab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test for federalism , Basingstroke, 1994
37. Sarin Ritu , The assassination of Indira Gandhi New Delhi, 1990
38. Vedalankar Kahitish, Storm in Punjab , 1984
39. Tully, Mark , Amritsar, Mrs. Gandhi's last battle , London, 1985
40. Mishra R. N. , Regionism and state politics in India , New Delhi, 1984
41. Rao, V. K. R. V. , The current criss; darkness before dawn, Allahabad , 1984
42. Sarkar Ajeya , Regionism state and the emerging political pattern in India: a new approach , Calutta , 1990
43. Chand , attar, Jawarharlal Nehru and politics in Punjab , New Delhi , 1989

44. Dhar, Pannalal,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ian Constitution, New Delhi 1986 198p
45. Kurian K. Mathew & Varughese P. N. ed., Centre – state Relations Delhi 1981
46. Gupte Pranay: Vengence, India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Indira Gandhi New York 1985 368p
47. Das, Hari Hara, Centre – state relations in India: A study of sub – national aspirations , New Delhi , 1986
48. Krishnasami A, The Indian Union and the states: a study in autonomy and integration , Oxford , 1965
49. Misra , Madhu Sudan ,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in India: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Punjab , New Delhi, 1988
50. Nijjar Bakhshish Singh, Indian Punjab (1947—1966), Jalandhar, 1985
51. Wallace Paul ed., Political dynamics and crisis in punjab, Amritsar, 1988
52. Rao, G. R. , Regionalism in India: a case study in Telengam issue , New Delhi , 1975
53. Reddy, G. Ram&Sharma B. A. V. , State government & politics: Andhra Pradesh, New Delhi, 1979
54. Verma K. K. , Changing role of caste associations , New Delhi , 1979
55. Arora S. C. , Turmoil in Punjab politics , New Delhi , 1990
56. Irschick, Eugene F. , Tamil revivalism in the 1930s , Madras , 1986
57. Ghosh, S. K, Communal riots in India(meet the challenge unitededly) , New Delhi , 1987
58. Brass, Paul R. , Caste, faction and party in India politics,

Delhi, 1987, V. 1

59. Barnett Margnerite Ros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south India politics, Princeton , 1976

60. Chaudhary Rekha,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ruling parties in India , New Delhi , 1991

61. Misa , B. B. , The India political parties ,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ur up to 1947, Delhi, 1976

62. Ahmad, Syed Nur, From Martial law to Martial law , politics in Punjab 1919 – 1958, Boulder 1985

63. Patra S. C, Form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Orissa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linguistic movement in India, Calcutta , 1979

64. Mohan , Kamlesh, Militant nationalism in Punjab 1919—1935, New Delhi , 1985

65. Mohan Lal. Pandit, Disintegration of Punjab, Chandigarh, 1984

66. Fox Richard Gabriel, Lions of the Punjab , culture in the making, Berkeley , 1985

67. Narang , Gokul Chand , Glorious history of sikhism from the times of teachings of Guru Nanak to the Maharaja Ranjit Singh , New Delhi , 1972

68. Gandhi Surjit Singh, Struggle of the Sikhs for sovereignty, Delhi, 1980

69. Gill, Pritam Singh , History of Sikh nation ; foundation assassination resurrection , Jullandar, 1978

70. Grover, D. R. ,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in the Punjab (1930—1934) , Delhi, 1987

71. Gaur Madan, India , forties years after independence: Witness to unmitigated anarchy , Bombay, 1988

72. Horiman B. G. , British oppression in Punjab , Chandigarh, 1980

73. Draper Alfred; Amritsar , The massacre that ended the Raj, London, 1981

74. Gupta, Hari Ram ed. , Punjab on the eve of first sikh war ,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punjab as depicted in the daily letters written chiefly from Lahore by British intelligencers i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30 December 1843 to 31 October 1844 , Chandigarh , 1975

75. Gupta, Hari Ram, History of the Sikhs New Delhi 1980
2nd rev.

76. Singh Kushwant, A history of Sikhs , Delhi, 1977, v. 2

77. Farmer, B. H. , Agriculture Colonialism in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 1974

78. Kaur, Harpinder ,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India , New Delhi, 1988

79. Venkates Warla, B, Dynamics of Green Revolution in India, New Delhi , 1985

80. Agarwal , Bina , Mechanization in India Agriculture, an analyt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unjab. New Delhi , 1983

81. Chadha G. K. , Production gains of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a farm size – wise analysis of Punjab experience)Chandgarh, 1979

82. Sims , Hilly, Political regimes ,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performance and rural change in two Punjab , New Delhi, 1988

83. Gill, Manohar Singh, Agriculture cooperatives: a Case study of Punjab , New Delhi , 1983

-
84. Leaf Marray J., Song of Hope,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Punjab Village
 85. New Jersey, 1984
 86. Nair, Kusum, In Defense of the irrational peasant, India Agriculture after the Green revolution, Chicago, 1979
 87. Westley John Richard, Agriculture and equitable growth: the case of Punjab - Haryana, Boulder, 1986
 88. Chandhri, D. P., Agr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Punjab, London, 1985
 89. Brass, Paul R., Languag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 India, Delhi, 1975
 90. Harmaider, Kaur, Blue Star over Amritsar, New Delhi, 1990.
 91. Kadri, Syed Shaneem Hussain, Creation of Pakistan, Lahore, 1982
 92. Ikram, S. M., 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 1858—1951, Lahore, 1965
 93. Hodson, H. V., The great divide: Britain - India - Pakistan, with an epilogue written in 1985 which sums up the events since partition, Lahore, 1985
 94. Jamil - Ud - Din Ahamed, Historic Documents of the Muslim freedom movement, Lahore, 1970
 95. Ali, Chaudhri Muhammad, The Emergence of Pakistan, Lahore, 1967
 96. Aziz, A., Discovery of Pakistan, Lahore, 1964
 97. Bell, Evans, The Annexation of the Punjab and the Maharajah Duleep Singh, Lahore, 1975
 98. Chopra Gulshan Lal, The Punjab as a sovereign state,

1799—1839, 1979, Lahore

99. Lal, Pandit Mohan, Disintegration of Punjab, Chandigarh, 1984

100. Khurana, G., British historiography on the Sikh power in the Punjab, London, 1985

101. Arun Shourie, The assassination and after, New Delhi, 1985

102. Moore, Robin James, Churchill - Cripps and India , 1939—1945, Oxford, 1979

103. Griffin Lepal, Ranjit Singh and the barrier between our growing empire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1986

104. Satinder Singh , Kalistan : An academic analysis , New Delhi , 1981

105. H. S. Bhatia , Rare documents on Sikh and their rule in the Punjab, New delhi, 1981

106. Prasad , Rajindra , India Divided, Delhi, 1986

107. Khuyav , Boris, I. , India national and Language problem, New Delhi, 1981

108. Nayar, Kudlip , khushwant Singh , The tragedy of Punjab, New Delhi, 1984

109. Mountbatten, Louis, Mountbatten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 1982, Vol. 1.

序 论

本论著研究旁遮普危机，说明它的起因和发展源于锡克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危机的实质并非简单的教派分裂活动，而是上述矛盾的总爆发。旁遮普危机能够在—个侧面反映印度民族国家整合政策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印度的现代发展是指 1947 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发展的进程，它也是印度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殖民统治下的发展进程自然对它有很大影响。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将这些多元因素纳入到—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目标追求的轨道上，这就要求进行民族国家的整合。所谓民族国家的整合，就是—个将多民族国家内的不同的族体统一成具有—个共同的民族主体性的认知过程。从大的方面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整合和情感整合；从小的方面看，可以细分为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多方面的整合，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印度官方关于民族整合的观点是：在“所有相关的集团的同意下，在—个国家中创造—种合适的社会和宗教氛围。在那里，所有的公民——不分宗教差别或者社会地位——都能够过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并且完全献身于建立—个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强大的、

繁荣的和进取的社会的共同的目标。”^①

独立以后，旁遮普锡克民族与印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引人注目，一直是学者们所探讨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也是所有多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重大课题。多民族国家只有成功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谈到共同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至于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后果，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非洲某些国家内部发生的长期民族仇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涉及到整个印度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从多个方面对旁遮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人以许多新的启发。从目前对旁遮普危机研究的状况看，学者们对于旁遮普锡克民族问题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旁遮普锡克人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这类著作强调了旁遮普锡克问题的历史因素，而对造成旁遮普悲剧的现实因素缺乏应有的重视。例如两卷本的库什万特·辛格的《锡克历史》。第二种观点，认为锡克人问题是一个宗教文化问题，认为旁遮普的锡克人的教派主义意识占主导地位，危机的产生是锡克人的宗教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强调危机的宗教性的方面。例如拉基尔·A. 卡普尔的《锡克分裂主义：信仰的政治》，它片面地夸大了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没有看到宗教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第三种观点，认为旁遮普的问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它的要求是少数民族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哈尔曼德尔·考尔的《旁遮普政治：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作者只注意到了旁遮普政治发展中的地方因素，而忽视了印度政治的总体发展与旁遮普地方发展之间的

^① M.N. 曼萨德：《民族国家整合的官方思想》，《世俗民主制》，新德里，1970年2月。

互动关系。第四种观点强调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是 60 年代中期印度进行的绿色革命的后果，认为在经济变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变动之间具有同步关系，没有认识到经济因素仅仅是旁遮普危机中的一个组成因素。哈尔品德尔·考尔的《印度农业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持这种观点。第五种观点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是地方分裂主义行为或者分离主义的行为，是要脱离印度国家，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卡利斯坦，它的出现对印度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是一种绝对不可放任的行为。这种看法事实上是将只占锡克人中的极小部分的极端主义分子的行为夸大为整个锡克民族的行为，同时没有看到印度政府在促使极端分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上的巨大作用。也缺乏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争取印度独立的各种势力之间互相利用的政治行为的深刻认识。就是在目前也仍然有不少印度学者仍持这种观点。

论述旁遮普危机的著作虽然很多，然而对旁遮普危机中多元因素作具体分析的不多，特别是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和发展的角度探讨旁遮普危机的研究更属少见。因此，本书拟从走向现代发展的印度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与旁遮普锡克人的地区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笔者在这本著作中，尝试提出这样几个因素并对这几个因素进行分析：一、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适变性。也就是说，多元因素刺激下的锡克民族的文化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锡克人的民族性。二、锡克人在印度独立以前对民族政治的参与，锡克与其他民族主义政党以及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对锡克民族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印度的独立和旁遮普的分治对锡克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立以后旁遮普政治发展的影响；独立以后，在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印度政府和锡克之间的争议和结果对旁遮普危机的影响。三、印度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及其政

策实施，给旁遮普地方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要求与中央政府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以及绿色革命对旁遮普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四、印度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变动对于印度地方政治的影响。通过对造成旁遮普危机的多元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旁遮普危机，事实上暴露出多民族的印度国家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整合政策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是其在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处理失败的必然结果。